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s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制度存續的鬥爭：影響北韓金正日時期(1990-2011)對外行為的國內因素

The Struggle for Regime Survival: Domestic Factors Affecting DPRK Foreign Behaviors during the Kim Jong Il Regime (1990-2011)

林伯駿

Po-chun Lin

指導教授：楊永明　博士

Advisor: Y. M. Philip Yang, Ph.D

中華民國 101 年 7 月

July, 2012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制度存續的鬥爭：影響北韓金正日時期
(1990-2011)對外行為的國內因素

The Struggle for Regime Survival: Domestic Factors Affecting DPRK Foreign Behaviors during the Kim Jong Il Regime (1990-2011)

本論文係林伯駿君（學號：R98322011）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101 年 7 月 25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楊永明
（簽名）

（指導教授）

王高成　　李明

謝辭

在打下論文的最後一個字時，我的內心比我原本想像的還要平靜——本來以爲我會非常感動、非常激動的——實際上，卻是孤獨的一人坐在研究室中，聽著壞掉冷氣的運轉聲，看著發光的電腦螢幕，擱下心中沉重的巨岩。八年前選擇進入台大政治系國關組，三年前選擇繼續攻讀碩士班，在學術的寶庫中遇到了許多優秀的學者啓蒙了我對人文社會科學多方面的興趣，也在參與的社團與活動中與許多同儕相識，豐富了這八年來的點點滴滴。一起流過的汗水和血水、一起旅行過的地方、一起翹過的課和分享過的筆記、一起聊過的八卦和進行過的筆戰……這些回憶，彷彿是昨天才發生的一樣，一幕一幕地湧上心頭，也成爲這本論文得以成功最佳的註腳。

這本論文得以完成必須要感謝許許多多的人，正如「要感謝的人太多了，所以謝天吧」這句國中課本的經典名句所說的一樣，透過謝天來感謝身邊的一切是最完滿的方式。但是畢竟天是遙不可及的，總是回歸凡世，向身邊的大家懷著感恩之心才是。

首先要感謝的是我的父母，能夠自小讓我在沒有負擔的情況下讀我自己想讀的書，往我自己想發展的方向前進。沒有他們的鼓勵，我不可能從小培養出對人文社會方面的興趣，說不定成爲一位整天埋首於數字和細菌的實驗室阿宅。沒有他們的支持，我不可能從小開始學習日文，也就與這本論文中眾多的日文資料無緣，使論述欠缺完整性。沒有他們的放縱，我不可能在全家希望我讀外文系或管理學院的情況下選擇了政治系國際關係組，而可能因此讓我失去未來奮鬥的目標。最後，沒有他們在物質和精神上的支持，我也不可能在心無旁騖的狀態下完成這份論文，也無法在校園中逗留那麼久的時間。

其次要感謝的是指導這份論文的楊永明教授，以及王高成老師和李明教授等兩名口試委員。楊永明教授在我建構整體的研究設計時給予我很大的協助和建議，也藉此給了我很多機會不斷地重新思考自己所真正想要寫的內容，同時容忍我寫如此巨大的題目讓我不用忍痛割愛讓我感動相當地感激。王高成老師糾正了許多我在緒論部份所犯的錯誤，也給了我不少相當好的建議，也讓這份論文在學術性研究設計上更爲完備，也讓我重新對方法論有更深層的認識。李明老師則相當細心地讀過我的草稿，糾正了我許多有關韓國文化、韓語等方面的錯誤，也在以朝鮮半島爲中心的國際關係上提點了我許多，讓我收獲良多。沒有這三位教授們的叮嚀與鼓勵，這份論文是絕對無法完成的，也讓我體會到學者的觀點和視野和小小的研究生相比，果然是很有深度也讓人嚮往的。

必須要感謝的，還有許多在我有困難或是疑惑時，陪我一起討論、一起思考來解決學術上的問題，或是一起吃飯、一起聊天、一起出遊來轉換心情的同學與朋友們。在同一間研究室奮鬥的晃銘、銘男、莉筠、安德烈、冠和與羽穎，一起上過許多課分享過許多心得的瀚輝、其睿、采薇、明萱、育真、方隅、守芬、庭豪、宜錚、宇都宮，以及許多位一起從大學部一起奮鬥上來的鈞凱、爲之、尉淳、俊廷、煒勛、厚穎、長毅、惠君等人，大家是我在寫論文的苦悶時光中最好的調濟，也是在學術上有疑問時最好的夥伴。當然，許多我自己人生不同階段中，默默不斷地一起互相扶持的好友和一起打球的好夥伴，若綺、翔渝、瓟姍、星辰、秋錦、牧捷、馨慧、冠妏、慧君、敬欽、旻憲、松甫、偉唐、楊晟、俊凱、任鴻、昱光、詠宜、翰禧、珮芝、東垣、Sae、婉萍、嘉欣、文咨、芳佳、予馨、明慶、明廷、宜凰、雯婷、彥璋等許多許多的人。大家豐富了我作爲研究生苦悶的三年，也讓我學習到相當多的寶貴知識與經驗，往成爲一位更爲好的人邁進。

另外，要特別感謝在寫論文最孤獨的最後三個月間，一起相互鼓勵、相互支持、相互打氣的思廷。每天晚上聊上幾句，偶爾一起吃個飯、逛逛街，一起盯彼此的論文進度和分享彼此的心得，成爲孑然一身面對論文時我最大的力量來源，彷彿是深夜驚濤駭浪中給予一葉扁舟指引和希望的燈塔，成爲精神上最大的慰藉。沒有妳，這本論文絕對不可能順利完成的。

論文完成的喜悅是不可言喻的，但是我懷著很謙卑的態度，向我這一路走來所以幫助過我、提攜過我、點醒過我和共同奮鬥的大家致上十二萬分的謝意。也許各位不記得有幫助過我什麼，也或許只是以聊天的輕鬆心態應付惱人的我，但是所有點滴之恩，我銘記在心頭，希望在未來的某天，能夠予以回報。

最後，謹以這本論文作爲我三年台大政研所生涯的終點，希望它的內容在無愧於我本人的同時，也無愧於這塊招牌。也許它會是我人生中的最後一本論文，也可能是未來無數本論文中的其中一本，但是我永遠不會忘記這八年來所學到的任何批判與反思的精神，在未來人生的所有關卡中，用努力、認真和批判的精神，用心作好每一件大大小小的事情。

懷抱著夢想迎向未來的挑戰！

伯駿

于民國一〇一年八月十日

中文摘要

北韓自冷戰結束以來一直被視爲東亞安全局面的破壞者，不僅發展核武和彈道飛彈，也保持著數量龐大的傳統武力，且不時利用武力向周邊國家進行要脅，至今也仍不放棄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原則。但在進行挑釁意味十足行動的同時，北韓也在保持封閉與不走中國式經濟改革開放的狀態下，除了與中俄兩國保持傳統上的友好關係外，也尋求與美日間的邦交正常化、同南韓展開雙邊經濟合作、對資本主義國家開展「實利外交」，並利用經濟特區希望吸引外資促進經濟發展等和平性作爲。這種兩面手法加上北韓本身的資訊不透明，使得國際社會對北韓的對外行爲有「不理性」、「窮兵黷武」和「具不可預測性」等誤解。

可是在當今學術研究中，不少學者認爲北韓對外政策具有務實主義和現實主義性質，而筆者認爲會產生上述誤解的原因在於對影響北韓對外政策的國內因素了解不足所致。因此，本文擬用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分析模式，分別針對歷史因素、國內政治制度以及北韓的官方意識型態等三個面向進行分析，試圖討論不同國內因素如何影響北韓的對外政策，並透過對北韓和重要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北韓的對外經濟行爲，以及北韓的核武和飛彈外交來檢證這些國內因素對北韓對外行爲的影響，並分析北韓在看似矛盾的對外行爲背後所追求的政制目標爲何。最後，根據上述的分析，筆者歸納出「對美外交是金正日時期的外交重心」、「思想因素對北韓對外行爲的影響相當深遠」、「對外行爲中偏好採取非傳統手段」、「外交決策體系高度集中」和「對外經濟在北韓對外關係中只是達成政治目標的輔助性條件」等五點北韓對外政策的特徵，希望有助於對北韓對外政策的進一步了解與分析。

關鍵詞：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北韓）、金正日、主體思想、先軍政治、國內因素

English Abstract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North Korea has been seen as an unstable factor of East Asian security. She not only develops nuclear weapons and ballistic missiles, but also maintains a large number of traditional forces, threatens her neighboring states with military force, and is not willing to abandon the possibility of unifying the Korean Peninsula with force. Alongside with these provocative gestures, under the status of isolation and not following the Chinese method of economic reformation, North Korea is not only maintaining her traditional friendship with China and Russia, but is also seeking to normalize her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the USA and Japan, cooperating with South Korea economically, practicing her "practical diplomacy" against capitalist states, and seek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foreign investment via establishing economic special zones. The two-handed strategy and the non-transparency of North Korean information caused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to misunderstand North Korea as an "irrational", "provocative", or "unpredicable"state.

On the other hand, in present day academic studies, many scholars see North Korean's foreign policies holding pragmatic and realistic characters, and I think the reason causing the previous mentioned misunderstanding is due to the lack of understanding on North Korea's domestic factors. Under such assumption, this thesis borrows the research structure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attempts to analyze Nor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through historical factors, domestic political system and North Korea's official ideology, and discuss how these different domestic factors influence North Korea's foreign behaviors. At the same time, I also attempt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s between the previous mentioned domestic factors and North Korea's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major states, North Korea's foreign economic behaviors, and her nuclear and missile diplomacy. The ultimate political goal behind

North Korea's contradictory foreign behaviors will also examined.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se analysis, I argue that during the Kim Jong Il era, North Korea's foreign behaviors had the following traits: 1) the foreign relation with the USA is top priority in the Kim Jong Il era; 2) idea factors influence North Korea's foreign behaviors deeply and thoroughly; 3) North Korea tends to use unconventional strategies; 4) her foreign-policy decision-making system is highly centralized; and 5) foreign economic behavior plays a subordinate role in achieving her political goal.

Keywords: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North Korea), Kim Jong Il, *Juche Sasang*, *Songun Chonchi*, domestic factors

目錄

中文摘要 I

English Abstract V

目錄 VII

圖表目錄 X

第一章　緒論 11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11
第二節　文獻回顧..... 14
第三節　研究設計..... 23
壹、研究方法..... 23
貳、研究架構..... 24
參、研究範圍..... 26
一、時間範圍..... 26
二、內容範圍..... 28
第四節　研究限制..... 30

第二章　影響北韓對外行為的歷史因素 33

第一節　朝鮮王朝時代..... 33
壹、「事大交鄰」的對外政策..... 33
貳、封建主義傳統與儒家思想..... 36
第二節　日本殖民統治與抗日游擊隊經驗..... 40
壹、日本殖民統治..... 40
貳、滿洲抗日游擊隊經驗..... 45
第三節　韓戰經驗..... 49
第四節　小結..... 53

第三章　影響北韓對外行為的政治制度因素 57

第一節　派系鬥爭與肅清..... 57
壹、朝鮮勞動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之形成..... 58

貳、韓戰前後的肅清.....60
參、「八月宗派事件」.....62
肆、「勝利者大會」與肅清甲山派.....64
第二節　黨唯一領導體系與「首領主導黨國制的確立」.....66
壹、《社會主義憲法》的制訂.....66
貳、唯一領導體系的確立.....67
第三節　金正日的崛起與接班.....70
壹、金正日早期的政治經歷.....71
貳、「三大紅旗運動」與金正日權力基礎的確立.....75
參、正式成為繼承人後的政治表現.....78
肆、「遺訓統治」與「苦難的行軍」.....80
第四節　「先軍體制」的發展與確立.....84
第五節　北韓的決策結構.....87
第六節　小結.....91

第四章　影響北韓對外行為的意識型態因素.....95

第一節　「主體思想」.....96
壹、「主體」概念的提出與確立.....96
貳、「主體思想」的金日成主義化.....98
參、「社會政治生命體」論.....101
第二節　「先軍政治」.....102
第三節　經濟思維的轉變.....107
壹、「自立民族經濟」.....108
貳、「新思考」、「實利主義」與經濟改革.....110
第四節　小結.....117

第五章　外交目標與對外行為間的關聯.....121

第一節　北韓的外交目標.....121
第二節　與主要國家間的外交關係.....123
壹、美國.....124
一、金正日時期朝美關係之性質.....124
二、金正日時期朝美關係的發展.....126
（一）老布希政府.....126
（二）柯林頓政府.....128
（三）布希政府.....133
（四）歐巴馬政府.....143
貳、南韓.....147
一、金正日時期兩韓關係之性質.....147

二、金正日時期朝韓關係的發展.....149
（一）盧泰愚政府.....149
（二）金泳三政府.....151
（三）金大中政府.....156
（四）盧武鉉政府.....160
（五）李明博政府.....164
參、中國.....173
一、金正日時期朝中關係的特質.....173
二、金正日時期中朝關係的發展.....175
（一）江澤民時期.....175
（二）胡錦濤時期.....182
肆、日本.....189
一、金正日時期朝日關係的特質.....189
二、金正日時期朝日關係的發展.....191
（一）1990 年代的朝日關係.....191
（二）森喜朗、小泉純一郎政府.....194
（三）後小泉時期.....198
伍、俄國.....200
一、金正日時期朝俄關係的特徵.....200
二、金正日時期朝俄關係的發展.....202
（一）戈巴契夫、葉爾欽時期.....202
（二）普亭政府時期.....204
（三）梅德韋傑夫政府.....207
陸、小結.....209
第三節　北韓的對外經濟關係.....215
壹、對外貿易.....216
貳、北韓的特別經濟區.....218
參、小結.....221
第四節　北韓的核武、飛彈發展與外交.....222
壹、核武發展與兩次核武危機.....223
貳、飛彈發展、外銷與談判.....227
參、「六方會談」與後續發展.....230
肆、小結.....237
第六章　結論 243
參考資料 249

圖表目錄

圖 1-1　本文分析架構.....25

圖 2-1　朝鮮王朝時代的對外關係.....35

圖 3-1　北韓「首領主導黨國制」的權力結構.....87

圖 3-2　北韓的軍事組織.....89

圖 3-3　北韓對外事務決策結構圖.....90

表 5-1　盧武鉉時期兩韓經濟關係量.....162

表 5-2　盧武鉉時期兩韓人員交流與援助.....163

表 5-3　胡錦濤時期朝中兩國貿易額.....185

表 5-4　胡錦濤時期中國對北韓投資流量.....186

表 5-5　金正日時期北韓與主要國家間關係.....209

圖 5-1　金正日時期北韓與主要國家關係趨勢圖.....212

圖 5-2　金正日時期北韓對外貿易額.....216

表 5-6　北韓的前兩大主要貿易國與其佔北韓整體貿易比例.....217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研究動機與目的

冷戰時代美國與蘇聯意識型態之間的對立，導致在世界上出了許多「分裂國家」，包括德國、中國、韓國與越南。其中東西德與南北越已經統一，兩岸關係歷經近三十年的交往後關係也不再劍拔弩張，反而是一度出現和平契機的朝鮮半島自冷戰結束以來發生多次衝突與危機。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和大韓民國（Republic of Korea）[1]作爲朝鮮半島上各自宣稱爲「代表韓國（朝鮮）唯一合法政府的國家」，自韓戰（Korean War）停戰以來歷經國家實力和國際影響力的消長，使得當前南韓在各方面的國家優勢均遠大於北韓，而北韓則幾乎被孤立於國際社會之外。兩韓競爭優勢的消長以及各種國內與國際客觀環境因素，導致國際社會普遍對北韓國內情況之不了解，亦難以了解其對外政治、軍事和經濟行爲背後的邏輯。以下便舉一段近來發生的事件。

2012 年 3 月 25 日，北韓在新任最高領導人金正恩（Kim Jong Un）的率領之下，於平壤（Pyongyang）展開對已故領導人金正日（Kim Jong Il）過世百日的追悼儀式。在儀式中，北韓總理崔永林（Choe Yong Rim）和人民武力部部長金英柱（Kim Yong Chun）除了分別代表內閣和朝鮮人民軍（Korean People's Army）發表對金正日的悼念之詞外，也都同聲譴責南韓的李明博（Lee Myung Bak）政府，金英柱甚至提到在金正恩的領導之下，北韓不會放棄用武力統一朝鮮半島的目標[2]。在金正日追悼儀式的九天前，「朝鮮中央通信社」（Korean Central News

---

[1] 有關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和大韓民國之稱呼，台灣與香港一般稱前者爲「北韓」、後者爲「南韓」，中國則稱前者爲「朝鮮」、後者爲「韓國」，日本稱前者爲「北朝鮮」、後者爲「韓國」，南韓自稱「韓國」、稱前者爲「北韓」，北韓則自稱「朝鮮」、稱後者爲「南朝鮮」。本文在引用各國原始資料時會以各國的官方稱謂爲主，故於此稍作說明。本文中提到「北韓」、「朝」或「平壤」均指「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提到「南韓」、「韓」或「首爾」則均指「大韓民國」。

[2] 民視（2012 年 3 月 25 日），〈金正日百日　金正恩率全民哀悼〉，《民視》。檢索於 2012 年 3 月 26 日。http://news.ftv.com.tw/NewsContent.aspx?ntype=class&sno=2012325I09M1；North Korea

Agency）才宣佈將在4月中旬發射人造衛星「光明星三號」[3]（Kwangmyongsong-3），但國際上大多不認爲北韓的目的是要發射人造衛星，反而認爲這是北韓用來試射長程導彈的藉口（Crawford, 2012; Fitzpatrick, 2012）；也對南韓政府試圖在 3 月 26 日於首爾（Seoul）召開的「核子安全高峰會」（Nuclear Security Summit）中把北韓核武議題納入表示抗議[4]。但是在這一連串具有挑釁意味的半個月前，北韓才於 2 月 29 日由外務省發言人宣佈北韓將在朝美會談進行期間暫停核武和導彈試驗，也停止在寧邊（Yongbyon）的濃鍊縮鈾活動（Enriched Uranium Program），以換取美方所提供的糧食協助[5]，也在 3 月 23 日表示將改善國內投資環境以吸引更多外國企業進入北韓投資，以改善北韓的經濟情況[6]。

北韓自冷戰結束以來便經常採取類似前述行爲的同時追求「戰爭」與「和平」的「兩面手法」，成爲東北亞安全局勢的一個重要的挑戰者。北韓除了發展核子武器與迄今進行過兩次核武試爆最受到國際社會注目之外，也積極發展與向外兜售飛彈技術，多次與南韓在海陸邊界發生小規模軍事衝突，持續維持大規模的傳統武力部隊，並至今仍不放棄「武力統一」的口號。但是在挑釁意味十足行動的同時，北韓也尋求與周遭國家之間的和解，除了繼續與中國和俄國維持良好關係外，也尋求與美日國家關係正常化，發展「實利（*silli*）外交」與許多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同時也與南韓舉行過兩次元首高峰會以及展開雙邊經濟合作。在這種看似自相矛盾的對外行爲下，國際社會往往難以了解與預測北韓的對外行爲，因爲她有時會提出極具挑釁性的衝突升高言詞或舉動，但有時卻又會

Leadership Watch (Mar. 25th, 2012), "Memorial Rally Ends KJL Mourning Period," *North Korea Leadership Watch*. Accessed in Mar. 26th, 2012. http://nkleadershipwatch.wordpress.com/2012/03/25/memorial-rally-ends-kji-mourning-period/。

[3]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2 年 3 月 16 日），〈先軍朝鮮の国力を誇示する衛星の打ち上げ〉，《朝鮮中央通信社》。檢索於 2012 年 3 月 26 日。http://www.kcna.kp/goHome.do?lang=jpn。

[4] KCNA (Mar. 23rd, 2012), "Lee Myung Bak Accused of Using Nuclear Security Summit for Anti-DPRK Confrontation,"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Mar. 2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12/201203/news23/20120323-08ee.html.

[5] KCNA (Feb. 29th, 2012), "DPRK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on Result of DPRK-U.S. Talks,"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Mar. 2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12/201202/news29/20120229-37ee.html.

[6] 新華社（2012 年 3 月 23 日），〈朝鮮表示將改善投資環境爲外商提供良好機會〉，《新華網》。檢索於 2012 年 3 月 26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2-03/23/c_111696076.htm?prolongation=1。

主動釋出善意，並希望與主要當事國進行和談。在追求對外關係的同時，也遲遲未改善國內經濟自冷戰以來的破敗情形，不願意進行中國或越南式的改革開放策略，在政治體制方面也採取共產國家中絕無僅有的世襲制，甚至有可能在「先軍政治」（*Songun Chongchi* or Military-first Politics）的政綱下朝向「要塞國家」（”garrison state”）發展。

這些各種看似前後矛盾的行爲加上北韓本身的資訊不透明，使得國際社會對北韓的對外行爲有「不理性」、「瘋狂」、「暴力傾向」和「不可預測」的誤解（Snyder, 1999: 5）。但實際上，近來的研究均指出北韓的對外行爲被後的邏輯其實就和世界上其他國家是一樣的，是帶有現實主義（Realism）思維的（Kang, 1995; Smith, 1996），而且北韓也有其所想要追求的持續性國家目標與固定的底線（Koh, 1991; Lankov, 2003），意味著北韓的對外政策是理性且可分析與預測的。北韓之所以難以分析的困難點在於，北韓的對外行爲受到其不同國內因素的影響，包括傳統朝鮮王朝、日本殖民統治、抗日游擊隊、韓戰等不同歷史因素的影響、「首領主導黨國制」（*Suryong* Dominant Party-State System）的政治體制方面，以及「主體思想」（*Juche Sasang*）和「先軍政治」等意識型態方面的影響，這些均導致北韓在追求國家目標時會採取與其他國家不同的思維邏輯與手段策略，也導致了其在具體對外行爲的表現上讓國際社會摸不著頭緒（Snyder, 1999: 17-42）。

雖然國際社會對於北韓的研究相當豐富，也有許多討論如何制訂對北韓政策以及應該如何與北韓交往的著作，但是卻缺乏完整且綜合性地討論北韓對外行爲的著作，特別是國內因素如何產生「北韓式」對外行爲的論著更是缺乏，大多仍是以討論北韓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Weapon of Mass Destruction）、談判策略、軍事行動，以及與周邊大國家之間的關係的個別論著爲主。因此，筆者希望可以透過針對這些一手與二手資料的整理，爬梳出影響北韓一系列對政治、軍事和經濟行爲背後的國內因素，並嘗試分析這些因素如何在其對外關係上所展現出來的具體特色與其所追求的政策目標。這也是筆者在閱讀許多有關北韓的文獻與資料中最希望可以解答的問題，更是此議題最主要的研究動機。

基於希望可以對北韓的對外行爲與對外政策目標有更深入了解的動機，本研究希望可以透過文獻的整理與分析達到下列三個目的：首先，希望可以扭轉對北韓的普遍性誤解，也就是不單純地以「不理性」、「瘋狂」或「窮兵黷武」等形容詞來概括北韓的思維，進而可以思考北韓當局所謂的「理性」爲何；其次，希望可以從歷史發展的角度，來分別探討不同的國內因素如何形塑北韓的對外行爲與對外政策目標；最後，則希望可以藉由對於金正日時代對外行爲的分析，指出這段期間北韓對外行爲的特色，以利未來研究者的進一步討論。筆者希望透過對於上述三個目的的達成，能夠藉由對北韓國內因素與對外行爲之間的連結釐清北韓在眾多看似前後矛盾的對外行爲中所追求的國家目標及其在對外行爲上之具體表現爲何，希冀能藉此發展出更爲精確的對北韓政策。

第二節　文獻回顧

早期因爲北韓政府對於國內資訊的封鎖以及國際社會對北韓研究的興趣缺乏，因此到 1990 年代之前有關北韓的文獻大多停留在來自平壤的官方宣傳，以及來自南韓的反北韓論述（Armstrong, 2011: 357）。直到兩韓合解、核武危機和糧食危機等事件相繼發生之後，學界才開始對北韓產生研究興趣，相關研究如雨後春筍般出現。不過早期針對北韓的對外軍事外交行爲經常被許多學者和分析家認爲是北韓是「瘋狂」的，因而產生先入爲主的錯誤觀點。部份學者認爲北韓是個具有過時意識型態和政治體制的「返祖性國家」（”atavistic state”），亦有人認爲北韓是一個以領袖爲中心爲國際社會所拋棄的國家（”pariah state”）（Kang, 1995: 253），也有學者認爲北韓是一個「遊擊隊國家」（和田春樹，1998），因此其外交行是無法以常理來去推斷的。近年來，美國更以「流氓國家」（”Rogue State”）（Wolfowitz, 1994）、「邪惡軸心」（”Axis of Evil”）（Bush, 2002）等用語來去形容北韓政權，使得外界往往以「不理性」的觀點來去審視北韓的外交行爲。

但是近來在許多有關北韓的軍事、外交行爲的研究中呈現出與一般社會認知不同的看法，他們認爲北韓的對外政策和行爲雖然有別於其他國際社會中的國家，

但是其基本的邏輯仍是現實主義式的思維邏輯，而且也具有持續性。B. C. Koh 早在冷戰期間就認爲北韓的對外政策的目標是追求經濟方面的自給自足和政治方面的獨立自主（Koh, 1965: 305-306），而到冷戰結束之初認爲北韓的外交政策會在追求正統性、安全及發展的三大目標前提下往務實主義的方向修正。「正統性」的追求指的是和南韓競逐何者才是可以在國際社會上代表全朝鮮人民的唯一合法政權之競爭，這從早期「漢賊不兩立」地追求絕對正統性（exclusive legitimacy），轉變到自 1970 年代兩韓對話開始之後，已經轉爲相對正統性（relative legitimacy）的競爭；「安全」所追求的主要是主權獨立與國家安全，這包括分別和蘇、中締結攻守同盟、要求駐韓美軍撤軍，以及希望同美國達成「和平協定」以取代《韓戰停戰協定》（*Korean War Armistice Agreement*）等訴求；在「發展」方面，則是追求建設成爲社會主義經濟強國的發展，其中也包括與共產集團之間的經濟合作，以及自 1970 年代中後期以來爲了追求產業升級而開始與西歐與日本有經濟、技術往來等行爲，其目的是希望以經濟作爲推動「正統性」與「安全」之後盾。由此看來，雖然北韓所追求的目標是具有一致持續性的，但是她在面對到大環境變化時，便改採較爲務實的作爲來達成其政策目標。此外，Koh 亦強調北韓在外交上尚有強調對外政策的自主性與獨立性，以及強硬與彈性相融的對外策略等兩項特點，是北韓官方所不斷強調且應用的（Koh, 1991）。

除了務實主義的思維外，亦有學者認爲北韓的外交政策其實和其他國家一樣是具有現實主義色彩的。其中 Hazel Smith 指出自從 1990 年代前後起，北韓的外交政策已經從過去追求和推動世界共產革命的「革命性」（revolutionary）思維轉向現實主義思維，這可以表現在於外交上推動「自主、和平、親善」原則，不再大規模地資助和訓練國際共產運動與恐怖活動，尋求自身經濟的現代化，在兩韓關係上不再堅持反對「兩個韓國」和交叉承認並且更大幅接受和南韓之間的交流，同時也開始和日本和美國就國交正常化進行交涉等行爲上得到驗證（Smith, 1996）。David C. Kang 則針對了過去學者對北韓的錯誤觀念一一進行指正，他認爲北韓其實並不是一個具攻擊性和擴張性的國家，因爲其所表現出來的行爲乃出

自於擔心被美韓聯軍所圍堵和侵略的恐懼，特別是在冷戰結束後北韓過去的共產陣營盟邦紛紛同南韓建立外交關係之後，北韓的恐懼是更爲加強的，故認爲其行爲其實是一種新現實主義式的外交行爲，也就是國際體系結構的變化促成其自身外交行爲與目標也必須跟著有所改變（Kang, 1995）。

Oh 和 Hassig 則稱呼北韓的外交行爲爲「主體外交」（”*Juche* Foreign Realtions”），認爲其中心想法是「主體思想」中所提倡的，追求國際秩序的民主化及所有成員權利地位的平等，因此堅持國際法中的「不干涉原則」（Principal of Non-intervention）和反對任何強權在外國駐軍，因爲上述兩種行爲給予大國干涉國內事務的權力。另外，由於北韓奉行「權力政治」（*Realpolitik*）原則並且在許多方面與南韓競爭代表全朝鮮人民唯一合法政權的正當性之故，因此北韓在外交上會有下列兩種特殊表現：首先是不顧經濟狀況希望權力維持其政權，這表現在北韓維持強大的軍事嚇阻能力來避免外國入侵，同時也封鎖國界與外來訊息來避免外來資訊削弱政權正當性；其次，則是必須保持與南韓相比具有獨立性的對外行爲，也就是透過遂行「主體思想」（*Juche Sasang*）中的政治自主、經濟自足、國防自衛等原則來突顯南韓是高度依賴美國與國際經濟體系的，同時也利用各種手段挑撥南韓與其盟友間的關係（Oh & Hassig, 2000: 148-184）。

道下成德（Narushige Michishita）在分析北韓自 1966 年到 2008 年間多次的對外軍事與外交行爲後也提出了類似的看法，認爲北韓不論是採取外交或是軍事手段的目的都和其他國家一樣是爲了要達成其政策目標而進行的，而在不同時間點所採取的不同作爲會因其所面對到的外在結構環境變化而有所改變。他認爲北韓的軍事外交行爲已經由 1960 年代較爲侵略式的作爲改爲 1990 年代較爲防衛式的作爲，且其軍事行爲與其政策目標是一致的，同時北韓領導人在軍事外交行爲上也展現出了「學習過程」（learning process）的特性，利用過去的教訓使其軍事與外交的綜合行爲日益老練。不過道下也指出，一般認爲北韓只有在面對不友善國際環境下才會採取軍事行動的觀點是錯誤，因爲其軍事策略所追求的是「嚇

阻」（”deterrence”）的展現，同時利用出奇不意的行動使觀察者會覺得其行爲相當「瘋狂」，以混淆對方的判斷（Michishita, 2010: 1-4）。

既然北韓的對外行爲是具有務實主義和現實主義色彩，而且又被認爲是理性行爲者的話，那爲何北韓的外交行爲經常反反覆覆且前後不一致呢？又爲何國際社會上對於北韓所可能採取的外交行動往往難以預測呢？筆者綜合學界的探討，認爲這可以從三個面向來進行討論：對北韓了解的缺乏、北韓行爲受到其國內及歷史因素的影響很深，以及北韓所採取的談判與外交策略，而這三者均源自於外界普通對其國內因素如何影響其對外行爲之不了解息息相關。

北韓由於訊息的封閉性以及近年來未公佈許多相關的國情資料，加上極度不透明的決策過程及看似反覆矛盾的行爲，使得國際社會往往難以掌握北韓透過對外行動所希望追求的目標，自然也難以預測其行爲。Pinkston 和 Saunders 在討論美國如何制訂一個更爲全面完善的對北韓政策時，提出了理解北韓的五大障礙：首先是語言上的障礙，認爲北韓經常釋放出精心設計成容易被曲解或誤解的訊息，加上韓文在翻譯上的困難，容易導致決策當局在情報上的錯亂及在錯誤情資的基礎上進行政策辯論等問題；其次是意識型態上的障礙，認爲仍以看待共產主義國家的視野來對待北韓是錯誤的，因爲自金正日上台之後，北韓開始推動小幅度的經濟改革，也在尋求外資和技術移轉等外來的經濟支援，因此若能把握北韓這種希望改善經濟狀況的想法，自然可以制訂較有效的應對政策；第三則是錯誤的資訊建構，認爲美國將北韓視爲蠻橫不講理的「流氓國家」在根本上是錯誤的，因爲如此美國便不會去考慮到該國的需求，而只會從希望推翻或改變現有政權的角度來與其交往，這樣子是無法釜底抽薪地解決事情的；第四則是認爲美國缺乏想像力且不願進一步理解北韓，也就是美國由於自認爲其動機是建立在良善基礎上的，故難以想像爲何如北韓這類的國家會把美國之存在視爲是國家安全的最大威脅；最後，作者認爲美國國內爲了政治和政策上的便利性，而有刻意曲解北韓的行動和言論，自然無法客觀地分析北韓之全貌（Pinkston & Saunders, 2003: 81-92）。

一國外交政策的制訂會受到其國內因素的影響，包括政府型態、領導型式和意識型態等因素之影響（林碧炤，1997：197-201），北韓自然也不例外，而對於北韓對外行爲與外交目標的錯誤認識源於對北韓政治制度、意識型態及其他可能影響北韓外交行爲的國內因素之不了解。鐸木昌之（Masayuki Suzuki）在討論金日成時代後期於經濟上的部份開放與改革政策上時提出，北韓由於先對「自立民族經濟」以及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間的關係進行重新詮釋，方才合理化了其所推動的一系列經濟上的小幅改革開放，可見意識型態對北韓對外政策的重要性（鐸木昌之，1992：203-214），而同樣的情形亦在金正日於 2002 年推動「經濟管理改善措置」時所提出的一系列「新思考」（*Sinsago*）中再度出現（徐文吉，2007：87-95）。重村智計（Toshimitsu Shigemura）甚至稱北韓所採取的社會主義爲「儒教社會主義」，是一個把社會主義思想和朝鮮式儒家的「君、親、師」一體觀念相融合的意識型態，建立一個「重視政治和思想、輕視經濟」的社會，而這也反映在北韓的對內與對外政策上（重村智計，2006：144-148）。此外，亦有學者從韓戰（Snyder & Lee, 2010）、傳統家族主義（Armstrong, 2005）和「主體思想」（Quinones, 2009）等角度思考不同國內因素對北韓對外所產生的影響。

除了上述片段性的論述之外，針對國內政治與歷史因素對北韓對外行爲之影響的最完整論述是由 Scott Snyder 所著討論北韓對外談判策略的 *Negotiating on the Edge* 一書。作者認爲，抗日遊擊隊傳統與北韓的建國、社會主義系統的採用、被日本殖民統治的經驗、朝鮮式儒家思想與日本殖民時代的「統治者─人民」關係、主體思想，以及金日成個人特質等六個不同的因素影響了北韓的談判策略。這些影響使得北韓在對外行爲上往往會採取非傳統式的做法，重視對外行爲的宣傳效果，同時也相當強調國家主權與自主獨立外交的重要性，並對於西方帝國主義與日本軍國主義對北韓國家安全構成的威脅有高度的疑慮（Snyder, 1999: 17-42）。

最後，北韓所採取的談判與外交策略也由於和其他國家有所不同，因此經常造成國際社會難以預測其下一步以及外交行爲所追求的目的爲何。Snyder 歸納朝

美之間的多次談判而將北韓的談判模式歸納爲「強硬─溫和─強硬」的三階段式談判風格：其中在第一階段時，北韓往往是不具彈性的，目的是要迫使對方退讓、向上級顯示捍衛國家最高利益的決心，並試圖營造有利於己的談判環境；北韓在第二階段所展現的彈性身段是尋求協議的手段，特別是利用非正式會議是用來刺探對手決心和了解對方立場之間的差別的以及共同尋求可能妥協方案，或是在非正式接觸挖掘對手的弱點和矛盾及拋出「風向球」藉機引導對手提案等；在達成共識時北韓所展現的彈性立場會在最後階段中以強硬立場取代之，希望可以搾取對方最後一點的讓步，故往往拖延完成最後談判的時辰，採取戰爭邊緣或虛張聲勢的策略迫使對方接受未完成的協議，或使其蒙受無法達成共識之公共期待的譴責。更重要的是，北韓認爲不論哪次的談判都是循環式的，且在問題真正獲得根本解決之前是會不時地挑起過去協議過的內容進行重新談判與議價的，這和一般線性與問題解決思考取向的談判邏輯是不同的。除了這三階段式談判風格外，北韓在談判過程中也擅長使用許多非傳統式的談判手法，如危機外交、戰爭邊緣、「苦生」[7]（*kosaeng*）與「體面」[8]（*ch'emyon*）策略、製造談判上的時間壓力等（Snyder, 1999: 43-96）。

其他學者也對北韓所採取的談判策略從不同的角度進行切入。如 Niksch 就認爲北韓爲了減少她在《核武不擴散條約》（*Nuclear Non-Proliferation Treaty*，以下簡稱 NPT）、《朝鮮半島非核化宣言》（*Declaration of the Denuclearization of the Korean Peninsula*）以及《美朝框架協議》（*Agreed Framework between U. S. A. and DPRK*）中所必須擔負的義務，因此會採取拒絕承認、修改條文詮釋和增加談判與條文模糊性的談判手段，同時爲了在擴大與美國之間雙邊談判的議題內容，也會採取威嚇手法，目的都是爲了要達成其外交目標[9]（Niksch, 1998）。另外 Ha 和

[7] 「苦生」代表的是不屈不撓的決心，北韓通常會透過到最後一刻仍不讓步的方法希望可以迫使對手讓步，以取得進一步的利益。

[8] 「體面」是指避免羞辱、避免承認失敗和避免讓步的守面子行爲。

[9] Niksch 認爲北韓所追求的外交目標包括在朝鮮半島議題上儘量孤立南韓、希望分化美國和南韓之間的同盟關係、希望在排除南韓的情況下與美國討論有關朝鮮半島的和平協議，以及希望美國承諾駐韓美軍可以在未來兩韓間發生衝突時扮演中立的角色。

Chun 則認爲，若仔細去討論北韓所採取的戰爭邊緣（brinkmanship）手段的話，可以分爲「離開式」（exit）、「進入式」（entry）和「進行中」（operational）三種策略，而北韓最大的特點是擅於利用進入式戰爭邊緣策略在談判過程中利用威嚇和吹噓增加自己在下次談判前的談判籌碼，或是利用這種行爲來迫使對方與其開啓雙邊或多邊談判（Ha & Chun, 2010: 93-96）。

此外，雖然南北韓自 1970 年代的雙邊紅十字會談判以來進行多次的事務性與政治性的談判，但是北韓對南韓的談判態度是與其他國家不同的，因此難以藉此來分析北韓在談判上所會採取的行爲，或是反過來利用兩韓之間的談判來去推估北韓與其他國家間的談判模式。北韓早期與南韓的談判是所謂的「鬥士型談判」（”Warrior Negotiation”），其目標是要製造使南韓共產化的局勢，並避免在國際上與南韓競爭時落入不利的位置，因此其所進行的大多是與談判主題無關的「假談判」。不過自 2000 的南北高峰會後，北韓開始採行「商人型談判」（”Merchant Negotiation”）的策略，目標是要改善國內的經濟環境以及維持政權的穩定性（Hun, 2006: 21-29; 55-70）。雖然談判的策略有所改變，但是北韓一直都把兩韓之間的談判視爲雙方爭奪朝鮮半島爲一合法政權戰場之延伸，因此只要在局勢較爲有利時便會採取極爲強硬的立場，只有在居於弱勢時才可能會讓步（Snyder, 1999: 98-106）。由此可見，北韓在面對其他國家和面對南韓時，所採取的談判模式是不同的，同南韓之間的談判在政權合法性上的較勁意味是很濃厚的，故無法藉此來分析北韓與外國談判上之行爲，抑或是反過來利用兩韓間的談判推估北韓與其他國家間的談判模式。

綜合以上學界對北韓對外行爲的討論，可以歸納出北韓在後冷戰時期在外交方面是一個務實主義和現實主義思維的國家，所採取的手段與所追求的目標受到國內因素、歷史影響和國際環境的變化之影響，往往採取「游擊隊式」的非正規手段遂行之，並透過對外軍事與政治行爲的「學習過程」不時調整其策略以混淆對手。同時其透過外交行爲所追求的國家目標與利益也是具有持續性的，只是國際社會因爲對北韓整體性了解的缺乏，以及未能明確掌握其國內與歷史因素對其

對外政策所構成之影響，也未能掌握其談判策略的變化，使得在外交行爲上的分析與預測產生困難。

但是上述學者的討論也並非完整而無漏洞的，筆者認爲對於過去學者的研究，可以歸納出三點主要的不足。首先是未對其國內及歷史因素對外交行爲上的影響進行全面性的整理，這包括對北韓整體對外行爲的分析以及對個別國家態度的不同。許多學者均提到國內因素與歷史經驗對北韓的對外行爲有影響，如 Snyder 和重村智計雖然不斷強調這些因素對其政策形塑的重要性，但是卻未能整理出一個可供分析的架構。此外，在討論到北韓與個別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時，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北韓對於不同國家持有不同的看法，而這往往與歷史因素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對不同國家的不同看法是否是來自相同的歷史淵源，還是出自國內政治、經濟或社會等其他因素，則往往未能言明。另外，北韓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型態又如何且多大程度地影響其外交行爲，也是值得探討的。因此，有必要在詳細分析可能影響北韓外交行爲的國內與歷史因素後，建立一個可供分析的架構，以有利於分析與預測北韓的對外行爲。

其次，過往研究經常對北韓的對外經濟行爲有所忽略。由於北韓往往給人「窮兵黷武」且具「高度侵略性」的印象（Kang, 1995），故其在經濟面向的對外行爲便容易被忽略。雖然北韓至今沒有參與主要的金融與經濟相關的國際建制，其國際貿易的額度也相當小，但實際上北韓也是一個具有以經濟作爲外交工具的國家（Nanto & Chanlett-Avery, 2010），而對外的經濟行爲也對其國家目標的達成佔有重要的地位。過往有關係北韓經濟方面的研究大多專注於國內經濟敗壞的狀況（Noland, 2000: 171-194）、北韓所接受的外來援助（Aaltola, 1999; Haggard & Noland, 2007: 79-161）、北韓對中國的經濟依賴（Choo, 2008; J. M. Kim, 2011）、兩韓間的經濟合作（朱松柏，2004：115-136；Kim & Winter, 2004）、北韓近年來的經濟改革（尹大奎，2003；李明，2002；Hale, 2005），以及經濟制裁對北韓的影響（Noland, 2009; Haggard & Noland, 2010）等，但是對於北韓透過對外經濟行爲遂行其國家目標的作爲，以及這是否與其追求正統性、安全與發展的目標有

所矛盾等面向則缺乏較爲深入的討論，故本文覺得在檢證北韓的對外行爲時，有必要加入北韓對經濟行爲的討論。

最後是研究時間方面的問題。許多研究是在北韓試爆核武前所發表的，代表的是北韓在後冷戰時期初期及成爲「擁核國家」前的對外政策與行爲。同樣的國內因素如何分別影響金日成與金正日時代的外交行爲，以及何影響揚言發展核武與實際上擁有核武的北韓對外行爲，都是值得觀察的面向。除此之外，綜合 Koh、Smith 和 Kang 等學者所言，北韓在後冷戰初期採取務實主義與現實主義思維的外交政策，並且具有追求正統性、安全與發展的國家目標一貫性，但是這是否與金正日時代的對外政策目標相一致，以及是否有在北韓擁有核武後有所修正，皆爲值得討論的議題。

綜合言之，近年來學界對北韓的對外行爲已逐漸形成與一般社會認知不同的共識，認爲北韓是一個具有務實主義與現實主義外交思維的國家，除了追求具有一貫性的外交目標與國家利益之外，也會因爲國內外客觀環境的變化調整其追求外交目標與國家利益之手段，以及修正其所追求的目標。同時，由於對北韓國內情勢、特殊的國內政治與歷史背景和採取的外交談判手段之不了解，導致了在分析與預測北韓的對外行爲與所追求的外交目標上產生諸多困難，也使得北韓被認爲是一個「不理性」乃至「瘋狂」的行爲者。雖然這些看法有助於我們進一步來釐清北韓的對外行爲與追求的目標，但是過往的研究仍有其不足之處，包括缺乏對其國內及歷史因素對外交行爲上的影響進行全面性的整理，針對北韓對外經濟行爲的忽視，以及是否能將對金日成時代的對外行爲同樣地類比到金正日時代等不足。上述疑問若能得到解決，配合過去對北韓外交所建立的學術基礎，對於未來分析與預測北韓的外交作爲將會產生莫大的助益，而這正是本研究希望達到的最主要目的。

第三節　研究設計

壹、研究方法

本文所採用的是文獻分析法。透過對於英文、日文及中文方面的過往研究，以及主要行爲者的公開言論與官方文件進行分析整理，藉此分析影響北韓對外行爲和所追求之國家利益的國內因素，同時利用相關的對外行爲對筆者所提出的觀點進行驗證與說明。

在過往研究方面，除了專書以外，尚有許多有關北韓的學術論文散見於中、英、日文學術期刊當中。其中爲了彌補筆者在韓文能力上的缺乏，因此如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及 *The Vantage Point* 等南韓方面所出版的期刊及其他國家出版的南韓學者著述之論文與專書，便成爲筆者了解南韓觀點的重要文獻來源。

在官方的言論與文件方面，主要行爲者的外交部或是駐北韓大使館的網站上都有相關的資訊，可作爲各國與北韓外交關係的重要文獻。由於北韓對於資訊的封鎖性，因此難以得到一手的北韓訊息，主要參考的資料來源包括北韓的官方對外媒體「朝鮮中央通信社」（Korean Central News Agency）、南韓的《朝鮮日報》（*The Chosun Ilbo*）和「韓國聯合通訊社」（Yonhap News Agency）等。

除此之外，以首爾爲中心希望推動北韓民主化的 Daily NK、Michael Madden 所創立的「北韓領導人觀測」（North Korea Leadership Watch），以及小林吉男（Yoshio Kobayashi）所創立的「小林吉男研究室」等四個網站也都對北韓當今的情勢有進一步的說明與分析。其中前者是以脫北者爲主的推動北韓民主化的團體所創立的網站，由於該團體在北韓境內有情報網，因此對於北韓國內的情勢變化掌握的相當快速；「北韓領導人觀測」則是對於北韓領導層中的重要人物進行追蹤報導，通常是把北韓官方所發佈的新聞綜合外電媒體進行分析，有助於掌握重要領導人物的最新動態；最後一個則主要是針對北韓官方所發佈的新聞、社論

進行整理，同時也收錄了大量金日成、金正日的著作以及北韓相關的法律文件。此外，由於北韓近年來均未公佈國家重要的經濟與軍事狀態的數據，因此南韓的統一部（Minister of Unification）、韓國民族統一研究機構（Korean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韓國銀行（Bank of Korea）和北韓統計網（North Korea Statistics）等機構所公佈的有關北韓方面的資訊便成爲了解北韓現狀的重要來源。

貳、研究架構

本研究擬採用新古典現實主義（Neoclassical Realism）的分析途徑來建立本文之研究架構，因此有必要簡述新古典現實主義的基本論述，以及本研究將如何應用此理論。新古典現實主義源於結構現實主義（Structural Realism）無法針對特定的歷史事件以及外交決策進行深入的分析，因此採用了結合體系層次、國內層次與個人層次的「多層次分析法」（analysis of multi-level）來進行個案研究，並試圖由此導出具有普遍性的國際關係理論。具體而言，新古典現實主義同意結構現實主義所提的體系層次會對國家的對外行爲產生約束和機會的觀點，也認爲在觀察一國外交政策時最優先應該考量的是國際體系的變化以及該國在國際體系中的相對地位，但是卻同時認爲結構現實主義在體系層次作爲自變數（independent variable）、外交行爲作爲依變數（dependant variable）的因果關係中，對於兩者間轉譯的過程沒有進行論述，故提出以國內因素爲主的中介變數（intervening variable）來說明其中的轉譯過程。新古典現實主義者認爲國內因素可以分爲國內政治（包括政治體制、政權脆弱性、領導人的認知與偏好等）和國家─社會互動（包括菁英的共識與一致性、國家汲取社會資源的能力等），而體系因素是透過此中介變數的複雜作用才會成爲具體的對外行爲，其中由於外交政策是由實際的政治領袖和菁英所決定的，因此他們對於國家相對能力的認知、對狀況與應對之道的共識，以及政治制度和社會加諸於決策者上的限制與機會等，均會影響最後外交政策的產出以及國家目標的制訂（林宗達，2011：195-237；

Rose, 1998；Schweller, 2003）。簡言之，新古典現實主義把古典現實主義（Classical Realism）中對於單元層次的論述納入結構現實主義的分析框架中，形成一個多層次的分析架構，試圖說明國內因素的作用是如何影響一國的外交行爲與決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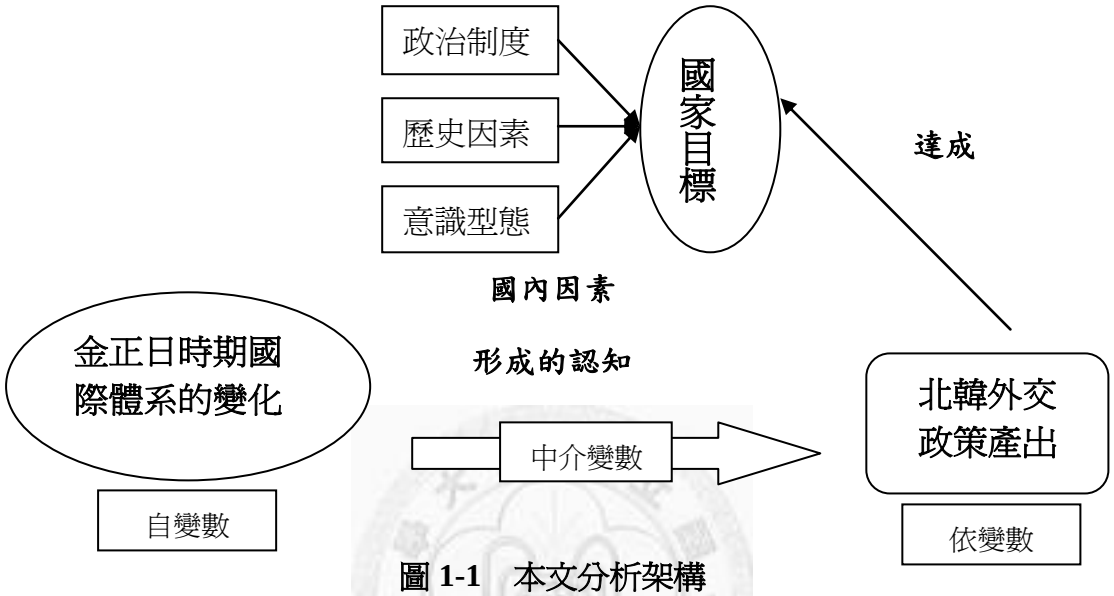


圖 1-1　本文分析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就如何運用新古典現實主義來建立本研究之分析架構方面，筆者將時間範圍集中在金正日時期，也就是大致集中在後冷戰時期所產生的國際體系變化對北韓對外行爲和其國家目標所產生的影響上，而這方面所造成的衝擊和影響，將會於下文進行說明。利用對於歷史因素、政治制度，與意識型態等三方面的分析，勾勒出北韓政治領導人是如何認知國際體系的變化、如何認知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相對地位，以及這些國內因素導致了什麼樣的外交行爲模式與國家目標。具體而言，本文的基本分析架構如圖 1-1 所呈現。在以金正日時期所面臨到的後冷戰國際體系的變化爲自變數的前提下，透過爬梳影響北韓對外行爲的國內因素，這包括不同階段的歷史經驗因素所形成的特殊外交觀、北韓特殊的「首領主導黨國制」政治制度的發展與形成，以及「主體思想」與「先軍政治」這兩個北韓最特殊的意識型態與其在經濟觀點上的變化等中介變數，分析這些因素如何影響北韓的對外行爲，並由此推演出北韓所追求的國家目標及其在外交行爲上的具體表現以及

北韓透過這些對外行爲所希望追求的政策目標。

參、研究範圍

一、時間範圍

本文把研究的時間範圍限縮在金正日在 1990 年 5 月擔任國防委員會（National Defense Commission）第一副委員長開始，到他於 2011 年 12 月過世這段期間的北韓對外關係，原因包括有國際體系的改變、金正日本人的權力掌控、北韓國內政經社情形的變化，以及北韓對外行爲的明顯轉變等四方面的原因。就國際體系層次來看，金正日擔任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的時機點恰好是冷戰結束之際，而冷戰結束象徵美蘇爭霸的結束並伴隨著前蘇聯與東歐共產主義集團的瓦解，這對北韓的軍事、經濟和國際影響力都形成的很大的衝擊，包括來自蘇聯與中國的無償經濟與能源援助不再、北韓產品主要銷售對象的東歐共產集團貿易圈之消失、前共產集團紛紛與南韓建立正式外交關係，以及蘇聯不再提供最新軍事技術給北韓等，均對北韓造成很大的衝擊，影響到北韓對外行爲所擁有的籌碼及其所追求的目標。有些學者認爲北韓從冷戰時期的向外推展共產革命的革命性（revolutionary）對外政策轉爲政治現實主義式的外交政策（Smith, 1996），也有學者認爲北韓在面臨到後冷戰時期對其不利的國際環境時，先後提出「我們式社會主義」（*Urisik Sahoejuui* or Our-style Socialism）、「紅旗精神」（*Pulgun'gi Chengshin* or Red Banner Spirit）以及「先軍政治」等有別於發展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只是單純追求「國家生存」的政綱（康宗憲，2006）。正如 David C. Kang（1995: 253）所認爲的，北韓對外政策與行爲變化是具有新現實主義（Neorealism）色彩的，國際政治結構的變化對北韓對外關係造成很大的衝擊。

從金正日的權力掌控來看，金正日在 1990 年 5 月 24 日被選爲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一職是在金正日當時的從政生涯中所從事的第一個政府職務，在此之前，金正日所擔任的都是朝鮮勞動黨（Korean Workers' Party）內部的職位。雖然金正日在自 1980 年代初期開始透過對於「主體思想」詮釋權的壟斷及黨組織

指導部以「黨中央」（*Dang Chungang*）的名義已經對北韓政治有很大的影響力，但是畢竟仍是透過黨組織間接管理，而且也尚未取得軍事方面的職位以進一步取得軍方的支持。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一職的取得不僅使得金正日正式進入國家機器當中，也正式進入國防軍事事務的決策單位內，並隨著次年金正日取得「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和再次年的「元帥」身份，金正日完全確立他在軍方內的最高領導地位，也更加鞏固其繼承體制。

從北韓國內政經社情形來看，由於社會主義集團的瓦解和蘇中支持的減少，使得北韓同時面臨到債務、能源、外匯與糧食危機，加上自北韓建政以來一直統治著國家的金日成（Kim Il Sung）於 1994 年 7 月 8 日過世等因素，這些均導致北韓在後冷戰時期於政治、經濟和社會上都產生了很大的變動。從政治上來看，金正日掌權初期有金日成與金正日間政治看法不一或政治權力二重化的問題（平井久志，2010：49-65）；金正日鞏固政權不僅改變了原有的統治體制和拉攏軍方，也開始產生了統治集團內部目標多元化的情形（McEachern, 2009；Pinkston, 2003）；自 2009 年以來金正日爲了確立「先軍體制」和兒子金正恩爲其接班人，也進行統治體制和人事上大幅度的調整（平井久志，2011：9-83）。從經濟上來看，冷戰結束初期外來能源和糧食援助的大量，使得北韓的經濟情況相當惡劣，於 1990 年到 1998 年間連續九年都是經濟負成長，同時國內的「公共分配體系」（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也因爲糧食的不足而停擺（Haggard & Noland, 2007: 51-76），人民爲了求生存進行了自發性市場經濟活動（Lankov, 2006），也使得北韓尋求改善與周邊國家的關係以取得外援和外來投資，進行「經濟管理改善措置」（Industrial Management Improvement Measures）片面承認由下而上的市場化和擴大企業經理人的自主權等，同時也開放特別經濟區（Special Economic Zone）尋求來自中國和南韓的資金與技術投入等。在社會上，由於「公共分配體系」的崩潰和本土產業的停擺所導致的由下而上的市場化，使得政府原有嚴密的社會控制網絡鬆動、以及小規模企業家階級的產生，衝擊了舊有的社會體系，同時由於難民和走私貿易，也使得愈來愈多外來資訊（特別是來自南韓的資訊）流入資訊控

管極嚴的北韓境內，使得北韓了解到外界的真相而產生對官方宣傳的質疑（Lankov, 2009a）。[10]這些國內情況的大量變化使得北韓爲了要追求政權延續和重建對國內社會的控制，必定會在外交作爲上有所改變。

上述的國內外因素導致了北韓在對外行爲上的具體變化，包括尋求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外交關係、積極尋求與美國和日本關係正常化、減少對第三世界游擊隊或恐怖主義的資助，以及更加活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作爲其外交工具等，可說都是金正日時期北韓對外關係的特點。

二、內容範圍

就討論內容的範圍而言，由於本研究希望透過探討國內因素如何影響北韓的對外行爲，因此筆者把焦點放在不同的國內因素如何影響北韓對體系變遷的詮釋，以及其對外行爲與國家目標的形成上，故分別從歷史因素、政治制度，以及意識型態等三個主要層面來論述其如何影響北韓的對外行爲，並透過其與周邊國家間的外交關係、對外經濟關係及核武和飛彈外交等議題進行簡單的分析與檢證。

從歷史因素角度來看，從朝鮮王朝（*Joseon Wangjo* of Choson Dyansty）時代至今的歷史過程中，主要影響的是北韓領導人的世界觀，也就是他們如何看待與周遭大國之間的關係，以及如何去理解這些周邊國家的行動。不同的時期的歷史經驗給予北韓領導人不同的世界觀，而這些不同觀念的綜合，形成了「北韓式」看世界的觀點。朝鮮王朝時代的「事大主義」（*Sadaejuui*）的對外關係便飽受北韓領導人的批評，因此在外交上追求「主體」（*Juche*），也就是在內政上不希望受到蘇聯與中國兩大共產主義國家的干涉，在國際社會上強烈主張自己的主權，排斥全球化對其國家主權所可能帶來的侵蝕，並反對任何型式上的不平等；日本殖民時代和抗日游擊隊經驗則構成了北韓至今仍稱呼日本爲「軍國主義國家」的

[10] 有關北韓國內民生經濟的情況，可以參閱芭芭拉・德米克所著《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以及姜赫與菲利普・格蘭傑羅所著《這就是天堂！我的北韓童年》兩本書。這兩本書均是由逃離北韓的「脫北者」之訪談與回憶錄，可以從中得知下層人民生活以及政府與人民間關係的第一手資訊。此外由 Andrei Lankov 所著，由許多短文集結而成的 *North of the DMZ* 也是了解北韓人民生活的參考資料。

原因，殖民統治的經驗也加深入了北韓人對於民族主義情感的追求，游擊隊的非正規作戰模式也被轉引到外交行爲上；最後在韓戰經驗上，則產生了至今北韓仍視美國爲主要威脅其國家安全國家之一的觀點，以及至今仍追求朝鮮半島唯一合法政權代表性等對外行爲特色。

從政治制度的角度來看，北韓是一個高度個人獨裁的黨國一體極權主義國家，用南韓學者 Kim Kap-sik 的話來講，是一個「首領主導黨國制」的政治體制（K. S. Kim, 2008），這對於其對外行爲主要產生了兩方面的影響。首先是在外交決策上產生了高度中央集權的特色：雖然北韓朝鮮勞動黨也有黨政治局、黨中央委員會等集體討論國事的機制，但是北韓的決策完全是由「首領」（*Suryong*）一人的獨斷所決定的，因此各種在對外政治、軍事、經濟行爲方面的決定都必須要有「首領」的核可才能被執行，也因此北韓在對外談判上往往會採取固執強硬的立場，主要的原因是在沒有「首領」的允許之前，談判代表是沒有讓步或改變立場的權限的。其次，這也對其對外的行爲模式產生影響：除了「首領主導黨國制」的政治體制外，其在政治制度上的另一個特色是軍人色彩相當濃厚，早期是以金日成的滿洲抗日游擊隊爲主要政治菁英，目前則是現役軍人和軍人出身的人在黨政治局、國防委員會和黨中央委員會中佔大多數，相對之下外交體系出身的人並不多，因此其在對外行爲上會有濃厚的軍事色彩，以傳統武力或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作爲嚇阻以達成其外交目的，抑或是以實際的軍事行動希望達成外交上的目標等。

在意識型態方面，對後冷戰時期北韓對外關係最重要的並不是社會主義思想，反而是金日成的「主體思想」以及金正日的「先軍政治」，以及伴隨兩者而來在經濟上意識型態的變化。這主要產生了對外行爲政策方向以及決策過程的變化。就政策方向來看，「主體思想」要求「政治自主」、「經濟自立」和「國防自衛」，「先軍政治」則視軍方爲經濟建設的主力故把資源優先分配給軍方，在經濟思想的變化則採取限制性對外開放的「蚊帳式戰略」（”mosquito-net” strategy）[11]和追

[11] 有關「蚊帳式戰略」的內容詳見 111 頁。

求實際利得的「實利主義」（*Silijui*），這些均影響北韓的外交目標和外交行爲。此外，意識型態對外交決策過程的變化也可以在「主體思想」和「先軍政治」中體現：「主體思想」自 1970 年代期開始提倡「唯一思想體系」，透過「確立黨唯一思想體系十大原則」以及金正日在 1986 年提出的「社會政治生命體」（Sociopolitical Organism）論，在意識型態上確立了個人獨裁的合法性；「先軍政治」內容主要是「軍事優先政治」的政治思維及「先軍後勞」的經濟概念，具體展現在軍方在決策方面擁有更大的影響力、國家資源優先分配給軍方、以軍需產業來推動經濟復甦等，這些都使北韓在金正日時代的對外行爲上有更大的軍事色彩。

綜合而言，本文在時間上主要是討論金正日時期的北韓對外關係，在內容上主要是討論歷史因素、政治制度和意識型態在其對外行爲中所產生的影響，並藉由其與周邊國家間的外交關係、對外經濟關係和核武、飛彈外交等面向進行檢證。

第四節　研究限制

由於北韓可說是當今世界上最爲封閉的國家，官方所發佈的訊息大多具有濃厚的政治與宣傳意味，其政治決策過程也相當地不透明，而且自冷戰以來官方也鮮少發佈有關北韓國內經濟、社會與軍事方面的資料，就算有也往往具有特殊的政治性訴求。就本文而言，主要面臨到三個主要的限制。

首先，是語言方面的限制。在討論北韓對外關係時主要的行爲者眾多，其中又以美國、南韓、中國、日本和俄國爲主，自然也會有大量相關的文獻資料。由於本人無法閱讀韓文與俄文，導致所引用的資料只能侷限在英文、日文以及中文資料爲主，南北韓與俄國方面的資料只能以有英、日、中文譯文的版本爲主。特別是在北韓的文獻方面，北韓雖然以官方宣傳爲由會主動把相關文獻翻譯成他國語言，但是由於北韓如其他國家的共產宣傳文宣一樣大量的使用形容詞，加上可能在翻譯上刻意曲解對方的意思或是出現對內對外宣傳不一致的內容，因此採用

譯本可能會有與原文所想傳達意味不實的情況發生等。爲了克服語言上的障礙，除了儘量尋找官方版本的譯文之外，也在討論到南韓與俄國觀點時儘量尋找這兩國學者的著作進行引用，希望可以藉此略爲彌補在語言上之不足。

其次，是在資訊上的限制。如前所述，北韓內部的資訊相當的不透明，無法直接取得北韓的第一手資訊，在國內以及在網路上所能夠取得描述北韓官方思想的著作也相當有限。爲了儘量取得相關訊息，筆者利用韓聯社的 The Vantage Point 月刊，以及 Daily NK 和《朝鮮日報》網站的相關新聞報導作爲資訊來源。官方數據方面則以統一部、韓國民族統一研究機構和韓國銀行等機構所發佈的資料，以及美國的「國會調查服務報告」（Congressional Research Service）爲主要參考。雖然這些資訊普遍爲學術著作引用以爲參考，且也反映了北韓內部部份的實情，但是精準程度爲何仍是可以被質疑的。

最後，是在觀點上的限制。由於南韓方面會封鎖北韓的部份訊息，因此雖然南韓的北韓研究極爲重要，但是在國際社會中北韓研究的中心仍是以美國爲主，也因此大量的文獻與資料不僅是以英文爲主，也會帶有美式觀點，而這種觀點也會爲其他國籍的學者所引用或承襲。美式觀點的重點放在如何解決北韓的核武、飛彈、人權，以及如何與其接觸等議題上，對於北韓本身的觀點鮮少碰觸，因此產生了如在「六方會談」中平壤與華盛頓間對問題基本看法完全不同的情形，亦有學者針對這種情形進行討論（李庚嬉，2008：1-2；Pinkston & Saunders, 2003）。因此爲了修正此限制，筆者儘量採用不同國籍學者的看法，也試圖了解北韓國內在政治結構與思想方面的論述，試圖從更貼近北韓當事國的角度來討論其對外政策。

在本研究當中，我主要面對到的限制有語言、資訊和觀點等三方面，而同樣的問題也出現在當今學界中的許多研究當中。因此，雖然對於北韓的學術研究汗牛充棟，但是對於是否接近北韓決策者的思維邏輯，或是否已經解釋了其政策行爲的全貌，仍存在許多的疑問。但是，在北韓內部進一步的資訊未公開的同時，北韓仍將維持「隱士之國」（”The Hermit Kingdom”）的神秘色彩，自然也對北韓

研究構成許多限制與困難。

第二章　影響北韓對外行為的歷史因素

任何國家的外交決策者在解讀國際環境和制定本國外交政策的同時，都會受到國家過去歷史經驗的影響，這對北韓亦不例外。筆者認爲就北韓的案例而言，歷史因素最主要影響北韓的是在世界觀上，也就是北韓在經歷了自朝鮮王朝、日本殖民統治、抗日游擊隊，以及韓戰等歷史經驗的影響，型塑了北韓獨特的世界觀，影響北韓的外交決策當局的視野與態度。以下則分爲「朝鮮王朝時代」、「日本殖民統治與抗日游擊隊經驗」與「韓戰經驗」三節來說明不同歷史因素如何在不同面向上影響北韓的對外行爲與外交政策。

第一節　朝鮮王朝時代

「朝鮮王朝」又稱「李氏朝鮮」(*Rissi Joseon*)是在 1392 年由李成桂(Yi Seong Gye)所建立的朝鮮半島上最後一個王朝，其在外交上先後奉明朝與清朝爲正朔，採取「事大交鄰」的政策，在內政上則建立以「兩班」(*Yangban*)爲統治階級、採取「崇儒廢佛」的文化政策，建立一個以儒學爲中心的封建社會體制。其中，朝鮮王朝「事大交鄰」的外交政策對於北韓以「主體」爲中心的外交政策與思維有直接的影響，而「兩班」社會結構與儒學則對於北韓的統治結構的形成與內容有所影響，間接地影響北韓的對外行爲與外交政策。

壹、「事大交鄰」的對外政策

朝鮮時代的對外關係雖然可以用「事大交鄰」來總謂，但是實際上朝鮮在面對不同對象時分別有「事大」、「交鄰」與「宇小」等不同的態度與作爲，其態度的不同則端視朝鮮如何看待該國與朝鮮之間的關係。「事大」的對象只有中國，透過向中國朝貢以及接受中國的冊封，取得統治的正當性，意味著受到來自中國的保護，也免於受到國力強大鄰國的威脅，使其能更集中精力在內部事務上。「交鄰」的對象則以琉球和日本爲主，是一種類似兄弟關係的「平等式」外交關係，

是以共事「中華之父」爲基礎的關係，其原則以信義爲主[1]。「宇小」則是朝鮮在面對蝦夷、蒙古諸部、女真、對馬及日本中西部小豪族時所採取的態度，基本上是一種視自己爲中心的「小中華外交秩序」的態度，也就是把中國加諸在自己身上的華夷秩序，加諸在其他部落、國家上[2]，而這秩序亦爲這些部落國家所接受（王明星，1998：11-18）。由此可見，朝鮮王朝時代的外交雖然在東亞秩序下稱臣於中國，但是在面對中國以外的國家、部落時則同樣以儒家文化和秩序爲標準，分別採取「交鄰」與「宇小」的態度，形成一種多層次的對外關係架構，如次頁圖 2-1 所示。

在上述的概念中，「事大主義」是北韓官方最主要批評的對象，也是用來理解「主體」外交政策最好的出發點。「事大」在朝鮮王朝時期並不具有任何價值判斷的意思，只是用來客觀地描述朝鮮與中國之間的關係，但是在北韓的官方論述中，「事大主義」成爲導致國家滅亡的主要因素（金日成，1983：7-8）。北韓認爲，「事大主義」代表著背叛國家和民族利益的出賣祖國與背叛民族的思想，同時也是一種盲目地輕視自我、崇拜大國的虛無主義，更是一種助長大國專橫的容忍大國主義（沈儀琳編，1983：56-57），因此視其和修正主義、教條主義一樣爲必須打倒和排除的思維。

[1] 《朝鮮通交大紀》中載曰：「交鄰之道，在於信義，不可以利動，不可以威迫。利動則傷義而興怨，威迫則虧信而邀禍。」由此可見「信義」是其面對「兄弟之邦」時的主要對外原則。

[2] 《李朝實錄・世宗》中記載，1458 年時世宗曾對臣下說道：「大抵野人，一以仰中朝（指中國明朝），一以仰我國，故夏月來叩。彼既不廢事大之禮，我當撫以宇小之義。」可見朝鮮王朝在面對中國、琉球和日本以外的部落和邦國時，亦自視爲「上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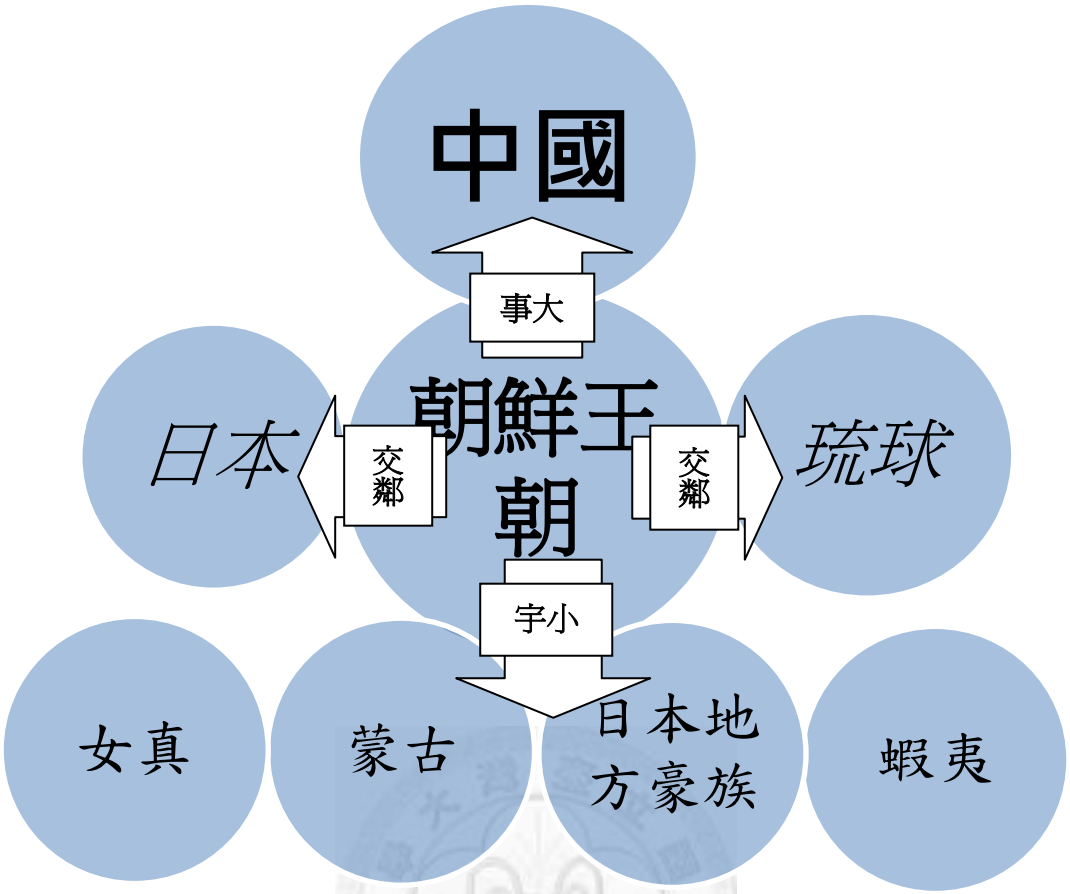


圖 2-1　朝鮮王朝時代的對外關係

資料來源：作者自繪

金日成認爲「人犯事大主義，就要變傻瓜；民族犯事大主義，就要亡國；黨犯事大主義，就要斷送革命和建設」（沈儀琳編，1983：60），因此有必要提出新的思想來與其抗衡，而這就是「主體」。有關「主體」與「主體思想」的具體內容會在第四章第一節中進行詳述，不過若從歷史因素的角度來看「事大主義」和「主體」之間的關係的話，大致可整理出三點內涵：首先是對於主權的強調（Snyder, 1999: 36），亦即認爲過去「事大」的行爲由於臣服於大國之下，是種將國家主權置於外國操弄下的喪權辱國行爲，因而產生北韓不斷在外交上強調的「自主性」（*chajusong*）和「自主、和平、親善」的原則；其次則是藉此反對大國對北韓內政的干涉，批判對於外國理論的機械性適用，希望有創造性地運用馬列主義來進行朝鮮的共產主義建設；最後則是體現出一種樂觀主義的態度，認爲

「主體」是「周邊地區對抗強大國家所強調的普遍邏輯及勢力的自我肯定」，與「事大」的否定自我和悲觀精神完全相反，藉此凝聚強烈的民族主義情感（鐸木昌之，1992：42-43），甚至進一步認爲朝鮮民族是負有解放所有在帝國主義鎖鏈下受壓迫人民的使命的民族（都興烈，1988：157）。

由此可見，影響北韓最主要政治行爲的「主體」觀念乃是源自於對朝鮮王朝時代「事大」的批判，因而在國際社會上強調自己獨立自主的地位、強調自己的主權，也強調不干涉原則的重要性。

貳、封建主義傳統與儒家思想

朝鮮王朝是以「兩班」爲其社會的中堅階級，指的就是分爲「文（東）班」與「武（西）班」的文武官僚，而後擴大包括爲文、武官僚的家屬在內的統治菁英階級。「兩班」可以說掌握了朝鮮時代社會上一切的特權，不只管理政治、享有最多教育機會、擁有國家授與的田地與俸祿，也享有免稅和免役的特權（簡江作，2005：88-90）。除了「兩班」以外，社會上更分爲中人、常民（或稱良民、平民、庶民）和賤民等階級：「中人」主要是統治階級和被統治階級的中間人，擁有醫學、外語、法律、天文、算學、音樂、繪畫等專業技術，可以參加雜科考試擔任官職成爲鄉吏，是朝鮮社會的行政實務者；「常民」從事農工商業的生產，負有納稅、貢賦和重役的責任，不具有受教育和考科舉的資格，其中農人的地位又高於商人和匠人；「賤民」主要是奴婢、巫覡、才人、白丁和娼妓職業族群，其中以奴婢的身份最爲低下，不僅當認爲是財產可以買賣和贈與，身價有時甚至比馬還不如（朱立熙，2006：114；簡江作，2005：91-92）。

在此以「兩班」爲首的階級社會中，佔主導地位的是宋代理學（新儒學），強調「理」和「義」爲社會關係的中心概念，透過盡孝道與守義務維持家父長式的家族內秩序，更藉此建立起社會不同階級間的秩序，並懲罰試圖破壞此秩序的人（Snyder, 1999: 31-32）。在一個血緣共同體當中，「孝」是最重要的概念，因爲朝鮮式儒學認爲自己的生命不僅是父親、祖父等先祖的生命之延續，之後會隨

著子孫、宗族的延續而持續下去，亦即就算自己的肉體生命結束了，生命還是會透過後輩的成長而持續下去，因此透過孝行便可以使自己的生命達到永遠（鐸木昌之，1992：156-157），而父輩的權威在這種血緣關係下也是絕對不能被挑戰的（重村智計，2006：123）。

朝鮮王朝的階級社會基本上是以某種程度被移植到今日的北韓社會中，正如 Oh 和 Hassig 所說的：「朝鮮王朝過去是由受到『兩班』貴族所支持的儒家君主進行統治的，這種階級結構和今日的北韓並無不同，只不過新的『兩班』換成了朝鮮勞動黨的幹部們，而最高領導人換成金正日。」（Oh & Hassig, 2000: 4）北韓在 1958 年到 1960 年間進行「黨集中指導」的工作，對於所有國民的「出身成分」和「社會成分」進行調查，其中「出身成分」是指由自己算起到三代內親人的出身階級與職業，而「社會成分」則指的是目前所從事的職業，開始進行人民的「成分」（*songbun*）劃分，並於 1970 年代確立了「核心階層」[3]（*hacksim kyech'ng*）、「動搖階層」[4]（*tongyou kyech'ng*）和「敵對階層」[5]（*chuktae kyech'ng*）的區分國民社會地位「成分制」（高峻石，1993：163-164），後來到 1990 年代改為「主要大眾」（Main Mass）、「複雜大眾」（Complicated Mass）和「敵對階級剩餘」（Hostile Class Remainders）（Chon, 2005: 50-53），但兩者的內容是大致相同的，也都類似於朝鮮王朝中兩班、中人、常民和賤民之階級劃分。這種階級劃分成為決定北韓人民生活條件和社會地位的主要因素，包括居住的地區、住房的品質、升學和陞

[3] 「核心階層」包括下列：革命遺族和家族、戰死者遺族和家族、愛國烈士的遺族和家族、人民軍眷屬、殉職者遺族和家族、榮譽軍人、朝鮮勞動黨黨員、世世代代皆為勞動者者、世世代代皆為佃農者、世世代代皆為貧農者、解放後的基層工務員，以及解放後的知識份子。這些人有機會成為黨、政府或是軍隊中的幹部，在各方面的配給也會優先且較優渥。

[4] 「動搖階層」包括下列：解放後的勞動者、中農出身者、小商人出身者、手工業者出身者、中下層服務業出身者、家屬逃到南方但未反對北韓政權者、從中國和日本歸國者（已入黨者除外）、解放前從留學者、從事娼妓活動的女性，以及來自南方但未參與派系鬥爭者等。這些人有機會成為低階的官僚和技術人員，並有極少部份有機會可以上升到「核心階層」。

[5] 「敵對階層」包括下列：地主出身者、富農出身者、資本家出身者、日殖時代的反動官僚、曾在南朝鮮政府服務過者、為朝鮮勞動黨開除黨籍者、反黨反革命份子、親日親美份子、新教徒、天主教徒、天道教青友黨員、政治犯及其家屬、儒學者、佛教徒、從事間諜活動者及其家屬、入獄服刑後獲釋者、經濟犯，以及前民主黨員等。這些人不僅被剝奪成為黨員和進入大學的資格，也被強行遷移到山區居住並長期受到國家監督，且除了表現優秀的孩童之外，幾乎不可能上升到「動搖階層」。

遷機會、公共物資的配給[6]，在這種情況下，入黨或是從軍成爲可以邁向更好生活品質的唯一道路。

儒家文化和目前北韓政治、社會體制之間的關係更是爲許多學者所討論的，日本學者鐸木昌之認爲北韓體制是「社會主義與儒家傳統之間的共鳴」（鐸木昌之，1992：156-163）、重村智計則稱北韓爲「儒教社會主義國家」（重村智計，2006：182-184），就連東德最後一任駐平壤大使 Hans Maretzki 都將北韓形容爲「紅色儒家文化與民族社會主義的混合體」（Lintner, 2005: xi-xii），如此可見儒家文化對北韓的影響。儒家文化與當今北韓政治社會體制之間的關係，筆者認爲可以從兩方面來進行探討，分別是領導人與人民大眾之間的關係，以及領導人繼承關係。

從前者來看，北韓對於金日成與金正日「偶像化」的工作可被看作是要建立合乎朝鮮儒學中理想領導者「君師父一體」的行爲（重村智計，2006：145-146）。「君」指的就是成爲唯一且絕對的最高領導人，因此必須排除其他可能的競爭對手並樹立自己身爲「首領」的權威，故有各種政治整肅行爲、歷史篡改，以及神化金氏家族的行爲。成爲「師」的意思也就是要建立一套讓國民得以遵循的道理，就這點來看金日成的「主體思想」和金正日的「先軍思想」正是一套讓國家與國民得以依循的準則，透過北韓官方的不斷灌輸與宣傳，成爲國家的核心指導思想。最後，則是要把領導人塑造爲民族之「父」，以叛逃到南韓的前朝鮮勞動黨書記黃長燁（Hwang Jang Yop）的說法來描述，是指「把忠誠和孝行集中在首領身上，只有首領才是所有國民的親身父親或父母，因此他作爲指導者便能夠要求所有的黨員和國民對首領盡絕對性的忠誠和孝行」（久保田るり子，2008：92-93），也因此自 1980 年前後開始，北韓提出「家族國家論」，提出「母親般的黨」（*omoni dang*）、「父親般的首領」（*oboi suryong*）等口號（和田春樹，1998：148-149），希望把北韓人民建立爲「金日成民族」。

[6] 從脫北者的訪問中可以得知，就算擁有再優秀能力的北韓人民，很有可能因爲自己「成分不好」而被剝奪陞遷與升學機會。可以參閱芭芭拉・德米克所著的《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一書。

從後者來看，也就是藉由儒家文化中家族主義的世襲傳統來確保包括最高領導人在內的世襲得以順利進行。前面提到過在朝鮮式儒家文化中認爲「孝」是血緣共同體當中的重要概念，因爲自己的生命不僅是祖先生命的延續，也會隨著宗族的延續而持續下去，因此即使自己的肉體生命結束了，生命還是會透過後輩的成長而持續下去，故透過孝行便可使自己的生命永遠存活下去。在「家族國家論」下，北韓官方把整個國家塑造爲一個大家族，「父親」是首領、「母親」是黨，也因此首領、黨和人民爲了盡孝道都有把「家族」血脈延續下去的義務，這個血脈是以金氏家族「愛國者代代輩出的稀有革命家系」爲本，以及進行徹底掃除資產階級及達成民族統一團結鬥爭的「繼續革命」（鐸木昌之，1992：76-77、158）。這個精神，在 1972 年金正日提出的「確立黨唯一思想體系十大原則」中的第十條：「必須代代相承以完成金日成同志所開創的革命偉業」，便可以充份地獲得體現，這不僅是合理化未來金正日的繼承，更是合理化最高統治菁英的世襲繼承，確保其在北韓政權下的絕對特權地位（渥美文夫，2007：109-110）。除了上述在概念（normative）層次的要素之外，北韓也利用學校教育、組織生活等政治教育手段，並創立各種以金氏家族爲中心的符號、節日、儀式等作爲，透過揉合概念、規範（regulative）和文化認知（cultural-cognitive）三個層面來制度化對金氏家族之崇拜與，藉此把北韓人民所認知的傳統「忠孝」、「仁德政治」之儒家概念移轉到北韓政權上，正當化北韓的家族繼承（Lim & Yoo, 2010）

綜合來說，雖然朝鮮時代的社會階級與儒家文化在表面上看起來最直接影響到的是北韓內部的政治、社會與思想結構，不過卻對北韓的外交政策制訂與對外行爲有間接性的影響。從社會階級的角度來看，這促使北韓的決策圈相當狹小且固定，換言之，下面的聲音難以撼動高高在上的決策當局，而決策者也不用爲了討好人民進行決策，形成集中且高度中央集權的決策圈。從儒家文化的角度來看，「主體思想」和「先軍政治」成爲兩個指導北韓外交大政的方針，並同時灌輸到人民生活當中，而人民在國家意識型態的教育下也必須無條件服從於領袖的指揮，更難以對北韓的外交發揮任何的影響作用。因此，朝鮮王朝時代遺留下來的封建

傳統與儒家文化，反而透過北韓官方的利用，成爲人民接受包括對外政策在內所有政治決定都是高度集中化的利器。

第二節　日本殖民統治與抗日游擊隊經驗

2009 年修正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憲法》第二條提到：「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是繼承反帝國主義侵略、光復祖國，以及爲實現人民自由與幸福，革命鬥爭光榮傳統的革命國家。」其中「反帝國主義侵略」的具體內容雖然在現行憲法中被刪除[7]，但是在北韓的官方宣傳中卻仍不時可見相關的用語。其中，美國和日本被北韓認爲是最重要的反帝國主義對象（Roy, 1988: 1281），也是北韓自建國以來所認爲的主要敵人。爲何美國會被北韓視爲主要敵人的原因將於下一節進行說明，本節則希望從朝鮮半島受到日本殖民統治的歷史，以及金日成的滿洲抗日游擊隊經驗來說明北韓爲何會有敵視日本的觀點，而這兩個歷史經驗又如何地影響北韓的對外行爲。

壹、日本殖民統治

近代日本對朝鮮半島的野心由來以久。早在 1868 年明治維新（Meiji Restoration）時期，日本政府向朝鮮通報新政府建立並請求建立邦交，朝鮮依慣例不承認日本天皇的存在，也認爲日本在國書中自稱「皇上」的用語過於傲慢而拒絕之，刺激了日本國內「征韓論」的產生。1875 年發生日本軍艦以測量地圖爲藉口在朝鮮外海受到朝鮮守備軍砲擊的「雲揚號事件」，次年日本便以此事件爲契機與朝鮮締結了《江華島條約》（或稱《日朝修好條規[8]》、《丙子修好條約》），藉此希望排擠清朝的宗主權。1882 年的「壬午軍亂」[9]中日本的軍事教官被殺害，

---

[7] 1972 年版本的憲法第十六條第三款中提到：「我國基於馬克思・列寧主義與無產階級國際主義的原則爲基礎，同社會主義各國和反對帝國主義的世界各國人民團結，積極地支持並聲援他們的民族解放鬥爭。」

[8] 日本在開國初期，和西洋各國之間所締結的協定稱爲「條約」，和傳統東亞秩序的國家之間締結的條約稱爲「條規」。

[9] 《江華島條約》簽訂後，以高宗（Gojong）和閔妃（Minbi）爲中心的外戚勢力採取開化政策，這導致儒學者和舊軍士兵的不滿，特別是舊軍對新成立的「別技軍」的特殊待遇不滿，於是在大院君（Daewongun）的暗中鼓動下，舊兵便破壞軍火庫竊取武器，分別攻擊閔氏宗親的宅邸和日本工使館，殺害日籍教官堀本禮造（Erijo Horimoto），隔天更殺入王宮殺害高官，史稱「壬午軍

日本公使館也被摧毀，日本爲了求償和朝鮮簽定《濟物浦條約》，使日本軍隊此後可以駐屯在日本公使館內。以此事件爲契機，朝鮮國內希望擺脫清朝勢力、學習日本明治維新的「開化黨」勢力開始抬頭，並於 1884 年發動「甲申政變」試圖推翻守舊勢力，不過爲袁世凱所率領的清軍所鎮壓。1885 年 1 月，朝、日達成《漢城條約》向日本公使館遭到破壞以及日僑被殺害進行謝罪，同年 4 月日、中也就實踐《漢城條約》的內容達成《天津條約》，同意在出兵朝鮮時會事先通知對方。在平定「東學黨之亂」[10]後，日本所提出的共同改革朝鮮內政提案爲清廷拒絕，於是爆發了甲午戰爭，並在《馬關條約》第一條中便承認朝鮮爲完全獨立自主的國家，徹底否定清朝的宗主權地位。在清朝退出朝鮮後，朝鮮便試圖利用同日本在滿洲有利益衝突的俄國制衡日本，可是在日俄戰爭俄國戰敗後簽訂的《樸資茅斯和約》（*Treaty of Portsmouth*）中，俄國承認日本在韓國[11]的政治、軍事和經濟利益，也不得干涉阻礙日本對韓國所採取的指導、保護和監督等措施，自此韓國便成了日本的保護國。1905 年 11 月的《第二次日韓協定》（又稱《乙巳保護條約》）中，日本接收了韓國的外交權，同時設「統監」（Resident General）進行管理。1907 由於發生「海牙密使事件」[12]，日本強迫韓國簽訂《第三次日韓協定》，解散韓國軍隊、事實掌握警察權，並規定在中央地方官吏中必須任用日本人。1909 年 7 月，《巳酉覺書》中韓國把司法權和監獄事務移交給「統監」，完成兩國事實上的合併。1910 年 8 月 29 日正式發佈《日韓併合條約》，朝鮮王朝結束，也使朝鮮半島正式成爲日本殖民地（千葉功，2007：55-61、78-81；朱

亂」。後來高宗招大院君入宮把政務交付給他才平息舊軍和新軍間的紛爭，但是朝鮮的開化政策也因而全面受阻。

[10] 「東學教」（*Donghak*）本來是 1860 年代由崔濟愚（Choi Che U）爲了對抗傳入朝鮮的西方文化，並致力於幫助窮困農民爭取權益而成立的，被朝鮮政府視爲邪教而將崔濟愚處死。1892 年起，信奉東學教的農民們自發組成軍隊，白日勞作、晚間訓練，到 1893 年 5 月兩萬多名教徒聚集聲討貪官污吏，並樹起「斥倭洋」的旗幟，到次年 2 月於全琫準（Jeon Bong Jun）的率領下爆發革命運動。後來在清軍和日軍的介入下，東學黨人連敗於日軍之下，許多領袖被殺或遭到逮捕，亂事才被平息。

[11] 1897 年朝鮮改國號爲「大韓帝國」。

[12] 1907 年 6 月，高宗利用在荷蘭海牙（Hague）舉行外國和平會議時，派密使到海牙抗議韓國未接到邀請書且要求出席會議，但會議主席認爲韓國爲日本的保護國且已喪失外交權，因此沒有出席會議的資格。

立熙，2006：155-173；簡江作，2005：145-179）。

日本對朝鮮的殖民統治大約可以分爲三個時期，分別是「武斷統治」時期、「文化政治」時期和「皇民化」時期。日本首任朝鮮總督寺內正毅（Masatake Terauchi）上台後以強大的憲兵警察網推動他自稱的「武斷統治」，給予「朝鮮駐劄憲兵」上到討罰暴徒、裁決犯罪，下到取締非法墓地、推廣種痘的廣泛權力，以此來維繫朝鮮的治安。在財政上，朝鮮總督府雖然也對人蔘、煙、鴉片和酒等物品進行專賣，但是其大半的收入來源主要來自於鐵路、電信等官營企業和土地稅、關稅等。此外，總督府到 1918 年爲止推動「土地調查事業」，要求土地所有人對土地所有提出申告，若限期內無法提出證明者土地將由總督府沒收，導致許多農民田地遭到沒收，而許多公田、朝鮮王室的土地以及村里宗族的土地也因爲無法提出所有權申告，也爲總督府所接收。這些爲總督府所接受的土地大多賤賣給東洋拓植株式會社（Oriental Development Company）以及其他日本移民，使得日本人成爲擁有大半朝鮮土地的地主，只有少數過去擁有收租權的「兩班」在總督府的懷柔政策下成爲地主，其他大部份的人民淪爲零細小作農（朱立熙，2006：175-177；駒込武，2007：191-192；簡江作，2005：181-184）。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美國總統威爾遜（Woodrow Wilson）所提出的「民族自決」（Principal of Self-determination）原則影響到朝鮮，導致 1919 年爆發追求朝鮮獨立的「三一運動」[13]，促使原敬（Takashi Hara）內閣對於殖民地採取「內地延長主義」，日本殖民朝鮮進入「文化政治」時期。「文化政治」時期表示總督不再限定由軍人擔任，同時把憲兵警察制改爲普通警察制，推動教育普及以使其和日本人齊同，也允許朝鮮人發行自己的報紙等表面上看起來提升朝鮮人地位的政策，但實際上這只不過是總督府的懷柔政策。首先，是在日本標榜「鮮滿防衛」體制的建築下，到日本實際上從未派任過文官總督；此外，普通警察制下雖然擴大了

[13] 1919 年 3 月 1 日，由天道教、基督教和佛教領袖集會發表了〈獨立宣言〉，並發起了無武裝的和平示威運動一直持續到同年 8 月。面對這場連日本警察網都未察覺到的行動，總督府動用大量的軍警武力對參與民眾殺傷逮捕，遭成 7000 多人死亡、46000 多人遭到逮捕。這個運動導致上海「大韓民國臨時政府」的成立，也迫使總督府改變朝鮮統治的策略。

半島上的警察網也增加了警力，但是警察仍兼任著原本憲兵在進行的司法與行政工作，而許多警察更是由憲兵轉任的，故在本質上根本沒有差別；教育方面，雖然規定了每三個村里要設置一個學校，但是這些學校大多是爲了因應日漸增加的日本移民而設的，實際上朝鮮人和日本人所受的教育仍是有差別的；在民族報紙的發行方面，在 1920 年初雖然《朝鮮日報》和《東亞日報》（*Dong-a Ilbo*）相繼成立且可用韓文發表，但是這實際上只是方便總督府就朝鮮人的意見進行控制，對於許多有民族思想言論的媒體，平均每個月都會遭到五、六次的刪除、沒收和停刊處份。除此之外，經濟上總督府自 1920 年起的十五年間展開「稻米增產計畫」，希望把朝鮮發展成日本的糧食基地，其結果是雖然朝鮮的稻產量增加了，但是因爲大量輸往日本，反而使得朝鮮人糧食不足而必須從滿洲進口雜糧，這種掠奪政策使得朝鮮的農業固定在單作型農業上，造成經濟結構的貧弱（朱立熙，2006：177-180；駒込武，2007：193-197；簡江作，2005：185-190）。

在日本發動侵略中國和大東亞戰爭以後，爲強化戰時體制，高舉「內鮮一體」的口號，並在朝鮮發動「皇民化運動」。總督府先是在 1936 年下達《朝鮮思想犯保護觀察令》箝制朝鮮人民的思想；1937 年要求所有學校每個月要爲「皇軍的武運長久祈願」而參拜神社；1938 年發佈《第三次朝鮮教育令》禁止韓語教育和禁用韓語，也在同年推行「陸軍特別志願兵制度」動員朝鮮人投入戰爭，並開始在日常生活風俗等各方面推行日本化、皇民化措施；1939 年以「勤勞動員」的名義徵調農民充軍或到軍需工廠和礦場勞役；1940 年則強制「創氏改名」，要求所有人改日本氏名字，也在同年將《朝鮮日報》和《東亞日報》停刊，規定所有文藝創作都必須用日文進行；1944 年起更因爲兵員的短缺而在朝鮮採行徵兵制，使朝鮮和日本本土一樣完全進入戰時體制（朱立熙，2006：181；駒込武，2007：204-205；簡江作，2005：197）。

由於這段被日本殖民統治的時期，北韓是相當仇日的，如在 2006 年 9 月 20 日的《勞動新聞》（*Rodong Sinmun*）中就有篇名爲〈日本軍國主義是百年來的敵人〉的社論總括了北韓官方對過去這段歷史的看法，其中提到：

據今一百三十一年前，日本軍國主義者為了使朝鮮王朝政府屈服，以「雲揚」號事件為藉口強壓朝鮮王朝政府締結《江華島條約》，而這也開啟了日帝以武力占領朝鮮的序幕……以「雲揚」號事件為始，對朝鮮的侵略與殖民地化、恐怖政治、狡猾的文化統治、人力物力資源的掠奪、對朝鮮人民的野蠻鎮壓與虐殺、策動民族文化的抹殺等，過去日本所犯下的罪行是不勝枚舉的……日本軍國主義乃是朝鮮民族不共戴天的敵人，是百年來的敵人。朝鮮民族必定與日本就其過去所犯的下罪行進行總清算。（轉載自宮塚利雄、宮塚寿美子，2007：16）

這種「反日」、「仇日」的觀點，以及擔心日本軍國主義再起的想法透過北韓的教育深深地影響北韓人民與決策者，這在宮塚利雄（Yoshio Miyatsuka）和宮塚壽美子（Sumiko Miyatsuka）所合著的《北朝鮮令人驚愕的教科書》一書中有詳細的介紹。本段落則希望就這段歷史對北韓對外行爲的影響進行說明。

首先，由於這段亡國的歷史，北韓對於任何與主權相關的議題都是相當敏感的（Snyder, 1999: 30-31）。北韓對於任何可以會減損其主權地位的議題和行爲都是相當反對的，如在 1995 年 5 月北韓透過「朝鮮中央通訊社」發表聲明譴責美國在執行《框架協議》上時提到：「倘若美國仍堅持其不公正的立場的話，我們將無可避免地只能採取自己的作爲，且我們有決心這樣幹下去。《朝美框架協議》對我們而言是好的，但是主權對我們而言是更重要的。」（轉引自 Snyder, 1999: 36）此外，北韓也相當堅持國際法上的「不干涉原則」與各國主權平等，從早期堅持社會主義各國是平等的（Scalapino, 1963: 43-44），到憲法中強調「我國基於國家間的完全平等與自主性、相互尊重與不干涉內政，以及互惠的原則，與友好對待我國的國家締結政治、經濟、文化關係。」

同樣的亡國經驗也讓北韓更加地強調「民族主義」的精神，特別是在日本殖民時代後期總督府對朝鮮人民採行民族文化抹殺式的「皇民化」政策，更使得「抗日」的民族主義訴求成爲北韓政權建政初期的重要政權基礎（ガバン・マコーマック，2004：77）。這種民族主義精神一方面促成了「主體思想」的發端，認爲

過去朝鮮王朝會滅亡就是因爲當時的政治家一味地希望學習來自清朝、日本或俄國的經驗，而忽略了朝鮮本身的情形，因此金日成強調「爲了推動朝鮮革命，必須了解朝鮮的歷史、朝鮮的地理，和朝鮮人民的風俗」，且批判「一味地讚揚外國的事物而貶低本國事物的現象」，也批判「機械式地適用國外的經驗」（金日成，1955）。另一方面，這在外交上也產生了追求「民族主義式生存」（”Nationalistic Survival”）的理念，積極追求國家安全、經濟繁榮、民族榮耀等目標，以證明自身民族的優越性，也避免如過去一樣再度受到鄰近大國的欺壓（Hwang, 2009: 32-37）。

最後，這段歷史自然也影響到北韓如何看待日本的對外行爲，以及和日本之間的外交關係。北韓視日本是「不願意悔過的殖民侵略者」（Oh & Hassig, 2000: 160），認爲日本至今的對外政策仍是過去用來侵略東亞諸國「大東亞共榮圈」（”Greater East Asia Co-prosperity Sphere”）的翻版（Roy, 1988: 1281），也認爲日本透過和美國之間的「從屬性同盟關係」尋求「軍國主義」的復活以再度侵略朝鮮半島（中日關係研究會編，1972），故認爲「反對日本軍國主義的鬥爭就是保衛亞洲和世界和平的鬥爭。」（沈儀琳編，1983：73）因此，在北韓和日本的國交正常化談判中，北韓方面相當關心的其中一項議題是希望日本就過去殖民朝鮮半島時所造成的傷害進行道歉與賠償。金正日在 1997 年便表示：「日本必須誠摯地反省過去，放棄對共和國所持有的敵對政策……如此一來，我們便會友善地回應我們的鄰國日本，朝鮮和日本間不正常的關係就可以獲得改善。」（轉引自 Oh & Hassig, 2000: 160）

貳、滿洲抗日游擊隊經驗

面對日本的殖民統治，在朝鮮國內外都有抗日的組織與行動，而其中與北韓政權最息息相關的就是以中國東北爲主要根據地的抗日游擊隊：不僅金日成崛起的背景是來自於此，在金日成鞏固其唯一領導體系地位時，主要的政治菁英主要都是來自這股力量，而金正日的繼承地位也是由於游擊隊勢力前輩與第二代的支

持才得以確立的。因此，日本學者和田春樹（Haruki Wada）便稱呼北韓爲「游擊隊國家」，而這種政治傳統也影響了北韓的對外行爲甚深。

北韓官方雖然試圖營造出在滿洲的抗日游擊隊行爲是在金日成的領導下所達成的偉業，但實際上金日成在滿洲地區的抗日行爲是中國共產黨所組織的「東北抗日聯軍」的一部份，其中不僅有朝鮮人的參加，更有不少漢人的參與。金日成先是加入了由李鐘洛（Yi Jong Rak）所組織的「朝鮮革命軍」，後來在 1931 年 10 月李鐘洛部隊遭到檢舉投降於日本關東軍以後，金日成才輾轉加入中國共產黨的抗日游擊隊。1936 年 2 月，散佈在滿洲各地的東北人民革命軍在中共黨員楊靖宇的整合下組成了東北抗日聯軍，金日成成爲聯軍第二軍第三師（後來爲第六師）的師長；1938 年 11 月，東北抗日聯軍由於和日本關東軍作戰使得人員傷亡慘重而進行重新編組，金日成成爲第二方面軍的軍長。這段期間，1937 年 6 月的「普天堡（Pochonbo）戰鬥」和 1940 年 3 月殲滅朝鮮總督府警察官前田武市（Takeshi Maeda）部隊的兩次戰鬥最爲有名，也奠定了金日成在東北抗日聯軍的朝鮮人中之最高地位。但是由於關東軍自 1939 年 10 月在滿州東南地區展開「治安肅清工作」，對東北抗日聯軍進行全面性的討伐，加上聯軍許多領導人的戰死和投降，金日成便聽從第二任聯軍司令官魏拯民的指示，把部隊分批往蘇聯沿海州進行撤退。由於 1941 年簽訂《蘇日中立條約》(*Soviet–Japanese Neutrality Pact*)，因此蘇聯便停止所有在蘇聯領土內的滿洲遊擊隊活動，便將游擊隊員集結到維亞特斯科耶（Vyatskoye），組成由周保中領導的「紅軍第八八號特別狙擊旅」（或稱「紅軍第八八號特別偵察旅團」、「八八旅」），進行對滿洲地區的諜報和破壞工作，同時也進行軍事訓練以在蘇聯進行對日作戰時可以派上用場。日本投降以後，蘇聯便派遣以金日成爲主的游擊隊勢力進入朝鮮半島北部，展開對當地的占領統治（和田春樹，1998：29-57；徐大肅，1996：32-38；高峻石，1993：17-29）。

日本學者鐸木昌之在比較不同年代版本的北韓歷史書籍後發現，北韓當局完全不提在 1941 年以後滿洲游擊隊撤往蘇聯一事，而聲稱這些部隊仍在滿洲地區進行游擊活動，同時革命的中心也逐漸往金日成移動，而不去提當時其他一起抗

日的游擊隊領袖如金策（Kim Chaek）和崔庸健（Choi Yon Kun）等人（鐸木昌之，1992：164-171）。1967 年，北韓提出了「像抗日游擊隊員般生活與勞動」的口號，1974 年也提出「生產和學習和生活採取抗日游擊隊式」口號，強調抗日游擊隊的歷史對北韓建國的重要性，並在 1980 年第六次黨大會中所修改《朝鮮勞動黨規約》中更明言：

> 朝鮮勞動黨的創立乃奠基於金日成同志於 1926 年創立我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的革命組織「打倒帝國主義同盟」以來，透過黨組織和思想基礎的建立，所形成的長期抗日革命鬥爭……黨將繼承與發展金日成同志在抗日革命鬥爭時期所建立的光榮革命傳統……黨將貫徹抗日游擊隊式活動方法……

如此舉動都是希望建立以金日成爲中心的抗日游擊隊傳統爲北韓政權的正當性來源，以確立其政治地位和金日成爲唯一領導的制度。

這種抗日游擊隊經驗與傳統對北韓對外行爲的影響，在於其經常會採取「非傳統式」（unconventional）的對外行爲，甚至爲對手帶來「詫異」（surprise）也是北韓對外行爲中很重要的要素（Michishita, 2010: 2-3）。這種「非傳統式」的外交行爲，筆者認爲可以分爲三個主要的內涵，包括「避免與對手進行正面衝突」、「諜報工作與外交工作併行」（重村智計，2000）和「迫使對手必須讓步的戰爭邊緣（brinkmanship）手法」，而三者都與游擊隊的作戰和談判模式有所關連。

從北韓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就可以看出「避免與對手進行正面衝突」的精神：北韓雖然視美國爲主要的敵人，但是卻不具有打敗美國的能力，因此北韓一方面希望透過與美國之間的談判希望可以換取國交正常化、安全承諾和解除經濟制裁等利益，一方面也利用美日韓三國之間對北韓問題上的利益衝突來或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同時更不惜以核武和飛彈來和美國進行議價。這三種行爲都是希望在和美國不進行正面軍事衝突的前提之下換取自己國家安全和制度存續的手法。

「諜報工作與外交工作併行」的特色則可以從北韓和南韓之間的關係來觀察：北韓自韓戰結束以來就希望透過推動「南朝鮮革命」來達到統一朝鮮半島的目標，

爲此北韓以日本的「在日朝鮮人總聯合會」（The General Association of Korean Residents in Japan or *Joseon Chongryeon*，以下簡稱「朝總聯」）爲根據地訓練了許多的情報員，國內也訓練許多特種部隊成員進行相關工作。北韓綁架日本公民以訓練潛入日本的情報員（日本方面稱之爲「拉致事件」）、派特種部隊試圖暗殺朴正熙（Park Chung Hee）、發動仰光（Yangon）爆炸案、發動大韓航空爆炸案，以及派遣大量人員試圖拉攏日本社會黨（Japan Socialist Party）和南韓的左翼人士等都是相關諜報工作的具體行爲；在此同時，南北韓間在 1970 年代初期和 1990 年代起舉行了多次會談，北韓與日本間「國會外交」和關係正常化的談判也同時在進行，可見對北韓而言，諜報和外交只是處理兩國關係的不同手法罷了。

最後從採取「迫使對手必須讓步的戰爭邊緣手法」來看，北韓經常利用談判、公開發言和軍事行動來表達自己強硬不妥協的立場，希望藉此迫使對方讓步。根據 Ha & Chun（2010: 93-98）的研究，北韓所採取的戰爭邊緣手法可以分爲「進入式」（entry brinkmanship）和「離開式」（exit brinkmanship）兩種，其中前者的目的是爲了增加自己的談判籌碼和相對地位，後者是單純在離開談判桌時所利用的各種威脅和吹噓，而北韓會在整個談判過程中靈活地利用兩者已達成其目的。舉例而言，北韓在第一次核武危機時曾威脅退出 NPT 目的是要吸引相當重視國際核不擴散議題的美國與其進行談判，而後來北韓也因此與美國達成了《框架協議》。又譬如說，在第二次核武危機中「六方會談」（Six-party Talks）的過程中，北韓頻頻試射飛彈和試爆核武，也是試圖增加自己籌碼的戰爭邊緣手法，最後也成功地在「六方會談」中達成《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等共識，也促使美國在 2008 年 10 月把北韓從「贊助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

由此看來，北韓的游擊隊抗日經驗促使北韓在對外行爲上採取了和游擊隊作戰一樣的非傳統作風，包括避免與強大敵人正面衝突、對外行爲是諜報工作與外交工作併行，以及在策略上採取迫使對手必須讓步的戰爭邊緣手法等。這些行爲不僅可以提高北韓的談判籌碼，模糊對手焦點使其無法立刻了解北韓的底牌與談判目的，也透過使對方「詫異」來讓對方難以預測北韓的下一步，這也是爲何北

韓的對外行爲經常被認爲是不理性且難以預測的主要原因。

第三節　韓戰經驗

韓戰[14]對兩韓而言都是一場歷史意義相當濃厚的戰爭，因爲這場戰爭不僅固定化了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兩韓分立的局面，也使得兩國在政治分立的情況下往完全不同的政治、經濟、社會方向發展，而這場戰爭也深深地影響到兩國在日後的外交與軍事政策發展。筆者希望透過本節來分析韓戰對北韓在對外行爲和政策上所造成的影響爲何。

這場戰爭的起源在於美國和蘇聯對甫脫離日本殖民的朝鮮半島進行分別佔領與統治。美方在蘇聯於 1945 年 8 月初蘇聯向日本宣戰入侵朝鮮半島以後，便向蘇聯提出以北緯 38 度線爲界由美、蘇共佔領朝鮮半島，而蘇聯也接受此提議故把軍隊退回 38 度線以北。1945 年 12 月底召開的莫斯科三國外相會議中，針對朝鮮半島問題決定設立「美蘇共同委員會」以協助朝鮮半島再度建立獨立的國家，同時也決定對朝鮮半島進行爲期五年的信託統治，其中任何有關朝鮮半島的緊急問題均由在朝鮮半島的美軍與蘇軍司令部派代表進行協商與解決。但在兩次的「美蘇共同委員會」均無具體結果的情況下，美國於 1947 年 9 月把朝鮮半島議題提交給聯合國（United Nations），並在大會（General Assembly）中決議在朝鮮半島舉行全面性的自由公正選舉以建立朝鮮半島上的獨立政府，但是蘇聯方面反對這項提議。美國在 1948 年 2 月向聯合國提議「在可能進行選舉的地區進行大選」的提案，最後決定 5 月 10 日在美國佔領區進行大選。南韓的李承晚（Rhee Syngman）政府於同年 8 月 15 日成立，而蘇聯佔領區則進行自己的「最高人民會議」（Supreme People’s Assembly）選舉，於 9 月 9 日成立北韓政權，朝鮮半島正式分裂爲兩個政權（ガバン・マコーマック，2004：29；高峻石，1993：81-85）。

兩個政權分別建立後，蘇軍和美軍分別於 1948 年 10 月和 1949 年 6 月撤離

[14] 韓戰在不同國家中有不同的稱呼。北韓稱之爲「祖國解放戰爭」、南韓稱之爲「韓國戰爭」、中國和日本則之爲「朝鮮戰爭」，其中中國把韓戰後半部「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的部份稱爲「抗美援朝戰爭」。

朝鮮半島，同時南韓則以「北伐統一」、北韓以「國土完整」和「祖國解放」爲名，均希望以武力統一朝鮮半島，兩國之間發生了許多次的邊境衝突。1950 年 1 月 12 日，美國國務卿艾契遜（Dean Acheson）在向國家記者俱樂部（National Press Club）發表演講時定義了美國的「防衛圈」（”perimeter of defence”），把南韓排除在外。金日成便以此於 4 月前往莫斯科（Moscow）向史達林（Josef Stalin）證明美國不會介入朝鮮半島的戰爭，史達林答應給予北韓軍備方面的協助；同年 5 月，毛澤東也同意金日成發動戰爭。北韓軍隊便以軍事演習爲名將部隊調到 38 度線，並於 6 月 25 日凌晨向南韓全面進攻（和田春樹，1998：86-93；Ford, 2008: 29-32）。

有關韓戰的細節，筆者在此並不詳述，但是可以大致上分爲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 1950 年 6 月 25 日到 9 月 15 日之間，這段期間北韓軍隊勢如破竹地發動攻勢，不僅在 6 月底就已經拿下首爾，更把南韓軍隊包圍在釜山（Pushan）一帶。同時，在蘇聯杯葛中華人民共和國無法取得中國代表權的情況下，聯合國安理會（UN Security Council）在 6 月 25 日就已經通過決議要求北韓停止軍事行動，並於 7 月 7 日決議由麥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指揮聯合國部隊（United Nations Command）協助南韓作戰。第二階段則是 9 月 15 日到 10 月 25 日之間，聯合國部隊於 9 月 15 日在仁川登陸（Inchon）後截斷北韓的後勤線並發動全面反擊，不僅奪回首爾，也攻下平壤並把北韓軍隊一路逼到鴨綠江邊。金日成向中國求援，而毛澤東在 10 月 5 日決議由彭德懷爲指揮官派遣「中國人民志願軍」參戰，並於 10 月 25 日起和聯合國部隊開始戰鬥。第三階段則由中國加入韓戰起一直到 1953 年 7 月 27 日達成《韓戰停戰協定》爲止，這段期間雖然北韓曾經一度於 1951 年 1 月 4 日再度佔領首爾，但是雙方大致上是沿著 38 度線進行戰爭，同時也自 7 月 10 日起先後在開城（Kaesong）與板門店（Panmunjom）進行多次停戰會談，最後由北韓、中國和美國三方於 7 月 27 日簽署《韓戰停戰協定》（井口治夫、松田康博，2007：235-241；和田春樹，1998：94-106：Ford, 2008: 33-39）。

韓戰對北韓帶來的影響可以從兩方面進行說明，分別是北韓對美國的態度，

及對北韓國防政策的影響。韓戰對北韓最大的影響就是使北韓採取敵視美國的態度，視美國爲阻撓北韓發動朝鮮半島統一大業的最大障礙（Koh, 1998: 87），也認爲美國不斷地試圖在國際社會上孤立北韓，故爲了達到和平必須要「對抗美國帝國主義」（Scalapino, 1963:36）。北韓在 2007 年的〈新年共同社論〉中，便很清楚地闡明此立場：

> 美國對由我們民族自己攜手走向朝鮮半島統一的大趨勢蓄意阻攔，對朝鮮半島的支配野心意圖實現，對反共和國、反統一戰爭的陰謀瘋狂而固執地堅持。美帝的卑劣陰謀嚴重地威脅到了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全。守護和平的鬥爭是為了民族生存基礎的正義的愛國的鬥爭……全民族在反戰和平擁護鬥爭中要徹底地粉碎一切如軍事壓力、戰爭演習、武裝力量增強等陰謀。要看清美國的霸權主義和侵略的本性，要堅持用軍事手段強佔南朝鮮的美軍撤兵。（勞動新聞、朝鮮人民軍、青年前衛，2007）

基於這個立場，北韓長期以來要求駐韓美軍撤離、要求美國撤出在朝鮮半島的核武、要求美國給予「消極安全承諾」，以及要求美國用「和平協議」取代《停戰協定》，均源自於北韓視美國爲其最主要安全威脅之故，而一切的根源均是韓戰時期以美軍爲首聯合國部隊的介入、美軍對朝鮮半島的大規模空襲、美軍曾計劃用核武來結束韓戰（ガバン・マコーマック，2004：43-45），以及美國對南韓政權的扶持等歷史因素。除了官方立場外，北韓在教育當中也大量灌輸反美宣傳（Lankov, 2007: 45-48），也長期以來運用「反美反帝」的口號試圖團結社會主義國家但第三世界國家，增加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影響力（沈儀琳編，1983：69-73）。

韓戰也大幅地影響北韓的國防政策與戰略思維，其中最具體的表現爲金日成於 1962 年 12 月在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四屆第五次全體會議中提出包括全人民武裝化、全地域要塞化、全軍幹部化，以及全軍現代化的「四大軍事路線」（*4-Tae Kunsa Noson*）政策，這些是金日成根據韓戰的失敗經驗所提出的希望可以改善北韓國防體質的具體政策，並用來取代原本北韓採用的蘇聯式「大部隊」

（”big-forces”）戰略（Oh & Hassig, 2000: 108）。其中，「全人民武裝化」是針對韓戰期間未能組織地方性民兵導致地區的防禦能力薄弱、居民死守家園的意願不足的缺點進行改善，因此自 1972 年起實施徵兵制，並在地方上組織「勞農赤衛隊」、「紅色青年近衛隊」等民間武裝組織，目的就是要加強地方防禦能力。「全地域要塞化」則希望能夠在北韓全境內建立完善的防衛設備與軍事要塞，並確保戰時軍需生產和後勤仍能夠在戰爭期間正常供給，這是源於韓戰時由於美軍擁有制空權導致北韓軍隊指揮體系和後勤補給的破壞，因此透過對主要軍事、政治機關和設施的地下化，以及都市人口和重要機構的分散化達成目標。「全軍幹部化」則是希望能夠多培養在戰鬥能力和思想教育方面都充足的軍隊幹部，由他們帶領軍隊作戰，並在必要時協助各民兵團體的訓練，這是受到在韓戰期間朝鮮人民軍缺乏擁有戰鬥指揮能力的軍官的影響而提出的改革方案。最後，「全軍現代化」則是希望透過購買與開發新型武器、學習新的戰鬥技巧，針對韓戰時裝備落後與徹底模仿蘇聯軍事理論進行改變，金日成在 1966 年 10 的朝鮮勞動黨第二次黨代表大會中提到：「如祖國解放戰爭中的經驗所顯示，一味地模仿他國戰術和武器的教條主義會為國防帶來巨大的損失，因此人民軍的現代化在導入外國事物的同時，必須依據我國的現實情形進行發展。」（高峻石，1993：173-178）

在戰略思維上，韓戰讓北韓意識到是無法靠一己之力擊敗與美國結盟的南韓（徐大肅，1996：82-83），因此在堅持「民主基地論」（”Democratic Base”）[15]以武力解放南韓的目標同時，也在戰略上採取「嚇阻」（”deterrence”）的策略，希望可以減少美國對南韓的援助。除了在傳統武力的擴軍之外，北韓最主要的嚇阻策略就是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發展，其中彈道飛彈和核子武器是北韓最主要用來進行軍事嚇阻的手段。北韓在 2006 年 10 月 3 日的外務省發言中就提到北韓「不會首先使用核武和進行核威脅」，也提到其核武是「遏制戰爭的力量」，是針對「美

[15] 「民主基地論」的概念是北韓在韓戰結束後發現無法以武力達成朝鮮半島統一後所採用的策略，其基本概念是要先建設朝鮮北方成為推動社會主義建設和民主主義革命的基地，並以朝鮮北方為「基地」推到南朝鮮革命。

國的侵略威脅爲了保衛朝鮮的國家最高利益和民族安全」而存在的[16]。在 2007 年的〈新年共同社論〉中也提到：「我們自己擁有的核遏制力量的事實誰也不能撼動……我們的軍隊和人民再也不怕任何核戰爭的威脅和侵略的陰謀了……我們所締造的核遏制力是維護東北亞地區和平與安全……的強大力量。」（勞動新聞、朝鮮人民軍、青年前衛，2007）由此看來，北韓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發展重點是放在嚇阻美國的軍事行動，一方面是爲了避免美國入侵北韓，另一方面希望在未來若朝鮮半島發生戰爭時可以避免美國的介入。

綜合而言，韓戰經驗使得北韓採取極度敵視美國的態度，並在國防上以「四大軍事路線」爲主要建軍指針，同時利用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爲主的嚇阻戰略來避免外國的軍事行動。

第四節　小結

在本章中，筆者透過不同的角度來析這些不同的歷史因素如何影響到北韓的對外行爲。朝鮮時代的「事大交鄰」對外政策在北韓當局看來是「亡國」的對外行爲，因此提出「主體」，強調國家主權和獨立自主的地位，也強烈反對大國對國內事務的干涉和機械式地完全引用外國事物；同一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封建和儒家傳統導致了「家族國家論」的領導人與人民關係和合理化了領導人世襲的體制，這些導致外交決策圈集中在少數政治菁英手上，同時人民透過意識型態的灌輸被教導要對領導人絕對忠誠，導致人民難以影響外交決策，而政治菁英在進行相關決策時也不用顧慮民意。日本殖民時代則帶給北韓在對外行爲上三方面的影響：首先，由於朝鮮王朝被日本所併吞產生的亡國情感，導致北韓對於任何跟主權有關的議題都高度的敏感與重視；其次，同樣的亡國經驗導致北韓對民族主義的重視，從早期以「抗日」爲政權合法性的訴求，到後來強調「必須了解朝鮮的歷史、朝鮮的地理，和朝鮮人民的風俗」以推動革命，同時批判「一味地讚揚外國的事

[16] KCNA (Oct. 3rd, 2006), "DPRK Foreign Ministry Clarifies Stand on New Measure to Bolster War Deterrent,"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Mar 3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6/200610/news10/04.htm#1.

物而貶低本國事物的現象」的態度都可以看出這種民族主義的訴求；最後，殖民統治時期也使北韓對日本採取敵視的態度，至今仍認爲日本軍國主義可能復活、日本的外交行爲仍是「大東亞共榮圈」的翻版等，導致在兩國的邦交正常化談判中，有關殖民時代的賠償和要求日本道歉等問題，仍是北韓據理力爭而無法同日本達成共識的爭點。游擊隊隊經驗則促使北韓經常在對外行爲上採取出人意料的「非傳統式」作爲，諸如避免與對手進行正面衝突、同行進行諜報工作與外交工作併行，以及採取迫使對手必須讓步的戰爭邊緣手法等。韓戰經驗除了奠定北韓高度仇視美國的基本外交態度之外，也促使北韓在國防政策與戰略思維上進行大幅度的變化，除了透過「四大軍事路線」政策的提出希望全面性的改革朝鮮人民軍自韓戰以來的不足外，在對外軍事戰略上也加強發展以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爲主的嚇阻戰略，以對抗美韓同盟和平衡朝鮮半島的軍力平衡。

透過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到這些歷史因素主要影響到了北韓對外的世界觀：除了產生對美國和日本的敵視與不信任的態度之外，更重要的是極度擔心再度被殖民和再度讓其他大國能夠干涉其內政，因此相當強調自己作爲主權獨立國的獨立自主地位，也強調國家和國家之間的對等關係，故強力反對任何形式的外國干涉本國事務言行。這種獨特的世界觀爲北韓外交決策當局的對外態度定下了基調，而從金日成至金正日時期的對外行爲中，雖然具體的作爲可能有所改變，但是這種基本態度是一直沒有改變且未受到北韓內部政治菁英的挑戰。因此，北韓目前雖然爲了經濟目的積極地希望可以和美國與日本建立外交關係，但同時卻又不惜放棄現實利益要求來自美國的安全承諾以及日本的道歉與賠償，乃是基於此基本立場所派生出來的作爲。

特別需要注意的是，除了滿洲游擊隊經驗和韓戰時期的不同陣營之外，南北韓其實經歷過完全一樣的歷史經驗，也有學者提出南北韓在透過對外行爲所追求之國家目標上的相似性（B. Hwang, 2009: 32-37）。除了國際體系的因素之外，到底是何種國內因素導致雙方的對外行爲有如此大的不同？筆者認爲，兩者間完全不同的政治制度和意識型態是這個問題的答案，且對兩者之探討有助於進一步了

解北韓的對外行爲，而這將是本研究在其後兩章的重點。

第三章　影響北韓對外行為的政治制度因素

本章從北韓國內政治制度的角度切入，討論政治制度的逐步形成對北韓在金正日時期和後冷戰時期的對外關係產生了何種程度的影響。其中，目前北韓的「首領主導黨國制」是經過國內多次的派系肅清、憲法修改以及政治動員運作下的產物，而本章集中討論金日成和金正日時期的政治活動，以及政治制度的演變。另外，與這段期間政治制度演變相關的政治意識型態的發展，則將於第四章中進行更深入的分析討論，於本章僅針對重點的部份進行簡要的說明。

本章首先對「首領主導黨國制」的形成進行交代，先由金日成在朝鮮勞動黨和北韓政權建立之初與不同派系之間的權力鬥爭討論起，並論及透過 1972 年《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憲法》中訂定「國家主席」和黨內唯一領導中心的確立形成金日成絕對獨裁的政治體制的發展，以及金正日自踏入政治舞台以降到 2009 年修憲正式確立「先軍思想」體制之間的政治活動。在本章最後的部份中，則統整上述之歷史發展對目前北韓政治體制運作與外交決策系統之影響，並討論這些政治制度因素如何在北韓外交決策過程和對外行爲模式上產生影響。

第一節　派系鬥爭與肅清

金正日時代的朝鮮勞動黨是以金正日爲中心，周邊環繞著由其親信所組成的領導層爲決策核心進行運作的。但是由於朝鮮勞動黨成立的歷史背景因素，黨早期內部是存在許多不同派系的，包括「滿洲派」、「蘇聯派」、「延安派」、「國內派」和「甲山派」（*Kapsan* Faction）等，這些派系的主張各自不同，背後甚至有不同的外國勢力在背後支撐，形成黨內部的鬥爭。因此，今天我們所看到具有單一領導中心的朝鮮勞動黨其實是經過多次的派系鬥爭和血腥肅清下的結果，而這在北韓的「首領主導黨國制」建構過程中，扮演重要的地位。本節則針對朝鮮勞動黨

不同時期的黨內派系鬥爭的內容與過程進行說明，介紹金日成是如何在朝鮮勞動黨和北韓政權中的眾多政治菁英中，利用政治鬥爭成爲唯一且不可被質疑的「偉大的首領」。

壹、朝鮮勞動黨、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之形成

1945 年 8 月日本宣佈投降以後，蘇聯和美國佔領軍便以北緯 38 度線爲界，對朝鮮半島進行分區佔領統治，其中蘇軍佔領區扶持金日成爲領導人，而美軍佔領區則由長期在海外宣揚朝鮮獨立運動的李承晚和曾任大韓民國臨時政府主席金九（Kim Gu）等人爲領導中心，對朝鮮半島南部進行軍事統治。可是實際上，金日成並沒有真正地在朝鮮半島內活動過，因此和其他長期以來在朝鮮半島境內進行地下共產活動的獨立人士相比，金日成的知名度和號召力不足，甚至不少當時的蘇軍佔領區人民認爲領導他們的金日成是「假的」，認爲他只是一位冒充爲「金日成」的青年（渥美文夫，2007：56-57；轉引自宮塚利雄、宮塚寿美子，2007：54-55）。同時於 1945 年 9 月 11 日，朴憲永（Pak Hon Yong）在首爾正式創立了朝鮮共產黨（Communist Party of Korea），使得在朝鮮半島內外的社會主義與左派人士紛紛前往首爾進行戰後政治活動。由此可見，金日成在掌權之初是充滿各種外來政治勢力的挑戰的，而使其得以成功成爲獨裁者的原因除了蘇聯的力挺之外，更重要的是其高明的政治手腕。

朴憲永在成立朝鮮共產黨之初，就把金日成列入政治局委員之一，同時在平安南道（South Pyongan Province）、咸興（Hamhung）地區也有當地左派人士自主成立朝鮮共產黨的地方性黨組織，也獲得首爾黨中央的承認。同年 10 月 10 日到 13 日召開的「朝鮮共產黨五道黨員及熱誠者聯合大會」中，在蘇聯派的金鎔範（Kim Young Beom）和金日成等人的提議下，全員表決通過在朝鮮半島北部成立朝鮮共產黨的分局，此提議於 23 日獲得黨中央的同意，正式成立「朝鮮共產黨北朝鮮分局」（North Korea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Korea）。同年 12 月初，蘇聯籍朝鮮人黨員如許謁誼（Ho Ka I）以及曾參與中國共產黨抗日戰

爭的延安派人士如金科奉（Kim Tu Bong）、武亭（Mu Jong）紛紛來到蘇軍佔領區，於是在 12 月 17 日起召開「朝鮮共產黨北朝鮮分局第三次擴大執行委員會」，由金日成擔任第一書記、吳琪燮（Oh Gi Seob）和武亭擔任第二書記，另外武亭尚擔任幹部部長、蘇聯派的許誾誼則擔任勞動部長，並於次年 2 月改名爲「北朝鮮共產黨」。在接受蘇聯顧問的提議下，北朝鮮共產黨和延安派的新民黨（New People's Party）合併，於 8 月 28 日成立「北朝鮮勞動黨」（Worker's Party of North Korea，以下簡稱「北勞黨」），以金科奉爲黨委員長、金日成和朱寧河（Chu Nyong Ha）爲黨副委員長，而朝鮮共產黨也在 11 月 23 日與其他政黨[1]合併成爲「南朝鮮勞動黨」（Worker's Party of South Korea，以下簡稱「南勞黨」）（高峻石，1993：44-55；徐大肅，1996：56-58；和田春樹，1998：64-68）。自此，朝鮮半島南北雙方的許多社會主義與左派團體均整合爲北勞黨和南勞黨兩大黨。

從北韓政權的發展來看，蘇聯佔領軍在 8 月 20 日於平壤設立司令部，並根據史達林的指令，在佔領區各地建立「人民委員會」，並於 10 月初由佔領區各地的人民委員會代表召開大會後，10 月 28 日建立「北朝鮮五道行政局」，成爲北韓政權最早的雛型。但是由於行政局委員長曹晚植（Cho Man Sik）反對美蘇間所協議的要對朝鮮半島進行爲期五年的信託統治一案，因此辭去委員長一職導致行政局停擺，故於 1946 年 2 月 8 日由北朝鮮勞動黨、朝鮮獨立同盟、北朝鮮職業同盟、北朝鮮婦女同盟、北朝鮮青年同盟與各地區人民委員會代表集會，成立「北朝鮮臨時人民委員會」（Provisional People's Committee for North Korea），以金日成爲委員長、延安派的金科奉爲副委員長，並於 3 月 25 日發表《二十點政綱》[2]，推行土地改革、「三七制」[3]、產業國有化政策以及發佈《有關北朝鮮男女平等權的法令》及《有關北朝鮮勞動者與事務員的勞動法令》等。1946 年 11 月 3 日，北韓進行了自己的道、市、郡人民委員會選舉，各地方人民委員會選舉

[1] 朝鮮共產黨在 1946 年 11 月與呂運亨（Yuh Woon Hyung）率領的朝鮮人民黨（People's Party of Korea）和白南雲（Baek Nam Woon）的南朝鮮新民黨合併爲「南朝鮮勞動黨」。

[2] 《二十點政綱》的主要內容包括肅清日本帝國主義統治之一切殘餘力量、鎮壓反動勢力、保障人民自由和民主權利、實行重要產業的國有化、實施土地改革、發展文化教育和工、農、商業等。

[3] 「三七制」是指在非自耕農的土地上，所有土地收入的三成歸地主，其餘七成均歸佃農所有。

出代表，於次年 2 月 17 日召開「北朝鮮人民會議」，以金枓奉爲會長，並由人民會議選舉出「北朝鮮人民委員會」，由金日成擔任委員長、金策擔任副委員長。（高峻石，1993：67-78；玉城素，1969：12；和田春樹，1998：60-78）。另外，自 1946 年 2 月金日成建立的訓練軍幹部的「平壤學院」（Pyongyang Institue）正式開學，同時命令當時的保安局長崔庸健招募軍人並進行保安幹部的訓練；1948 年 2 月初正式成立「民族保衛省」，宣告朝鮮人民軍正式建軍，海空軍也在當年年底相繼成立（中川雅彥，2001：4-7）。

1948 年 2 月北韓公佈《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憲法》，並於 9 月 9 日爲回應大韓民國之建國，宣佈成立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平壤爲臨時首都，以金日成爲共和國首相、南勞黨派的朴憲永和游擊隊派的金策爲副首相，兩韓的分裂局面自此成爲定局。1949 年 6 月 30 日，由於南韓的李承晚政權大力鎮壓左派勢力，北逃到北韓境內的南勞黨已經無法再於南韓境內公開活動，故與北勞黨合併成立「朝鮮勞動黨」，黨委員長爲金日成、副委員長爲朴憲永和許謌誼（平井久志，2011：106-107；和田春樹，1998：81-83）。

貳、韓戰前後的肅清

根據前文所描述之朝鮮勞動黨和北韓政權的建立過程可以發現，北韓不論在黨組織或是在政府中，其初期是充滿許多不同政治勢力的，是偏向「聯合陣線」（”united front”）式的權力結構，這導致了金日成雖然在背後有蘇聯的支持，但是無法建立史達林式的絕對權威。簡單來說，當時北韓政治中主要可以分爲五個主要的派系：首先是「蘇聯派」[4]，這些人都是居住在蘇聯的朝鮮人，不少人擁有蘇聯國籍和蘇聯共產黨的黨籍，對於黨組織的建立、黨幹部的訓練以及宣傳工作的進行有很大的貢獻，同時他們也與蘇聯黨政人員與派駐在北韓的顧問團關係相當密切，以許謌誼、朴昌玉（Pak Chang Ok）、南日（Nam Il）等人爲代表；其次是「國內派」，他們大多是在殖民期間進行地下社會主義運動的黨員，對於

[4] 有關蘇聯派的起源、發展和重要代表人物，可以參閱 Chong-Sik Lee 和 Ki-Wan Oh 所著的”The Russian Faction in North Korea”一文。

國內狀況較爲了解，也繼承了 1920 年代「朝鮮共產黨」的遺風，早期有被整肅的鄭達憲（Jung Dal Hun）爲代表，晚期則有南勞黨的朴憲永和李承燁（Yi Song Yop）等；第三則是「延安派」，這批人在二戰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的部隊中參與抗日戰爭，與中共的關係相當良好，也受過完善的軍事訓練，代表人物包括金枓奉和武亭等；第四則是金日成本身率領的「滿洲派」，這批人早期在滿洲邊界活動與日本關東軍進行游擊隊作戰，後來戰敗逃到蘇聯接受蘇聯的軍事、組織等方面的訓練，在早期的北韓政權中於軍事和警察工作上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其代表人物尚有金策、崔庸健、金一（Kim Il）等人；最後則是長期在長白縣（Jangbaek）進行游擊隊活動的「甲山派」，其成員爲「祖國光復會甲山工作委員會」（Korean Fatherland Restoration Association Kapsan Operation Committee）的成員與其後代，在金日成進行游擊抗日時曾多次與其合作，被視爲是滿洲派的主要盟友，代表人物有朴金喆（Pak Kum Chol）和金道滿（Kim To Man）等人。

金日成在韓戰進行期間和韓戰後進行了兩次較大規模的肅情，把當時蘇聯派和國內派的重要政治領袖予以鏟除。金日成於 1950 年 12 月 21 日舉行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針對當時朝鮮人民軍戰爭的失利發表了嚴厲的批評，並把平壤失守的原因歸咎延安派的武亭（時任朝鮮人民軍第二軍團長兼首都平壤防衛司令官）上，因此將其進行整肅。同時在會議上也決定進行「黨組織復原事業」，也就是希望能讓因爲美軍入侵而被迫放棄黨籍或遺失黨證的人可以更容易的恢復黨籍。但是當時黨組織業務的負責人，蘇聯派的許謌誼（時任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副首相）與金日成持不同的看法，他偏好更多的勞動階級加入朝鮮勞動黨，並認爲唯有通過繁瑣的革命理論知識和職業背景審查過程的人才有資格成爲黨員，甚至還在 1951 年開除了當時 60 萬黨員中的 45 萬人；而金日成則偏好把朝鮮勞動黨塑造成「群眾政黨」（mass party），也就是希望未受教育的勞動者、農民等也能夠加入黨組織，希望藉此在黨內擴大自己的支持力量。最後在 1951 年 11 月 1 日召開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

全體會議上，金日成批評許謌誼的作爲是種「關門主義」，將其降職[5]（平井久志，2011：108-109；徐大肅，1996：78-79；高峻石，1993：124-128；鐸木昌之，1992：32；S. C. Kim, 2006: 60-62）。

從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三次全體會議開始，以朴憲永（時任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副首相兼外務相）爲中心的國內派便批評金日成要爲戰場上的失利以及未能促成黨的團結一致負責，但同時金日成也指責國內派誇大在南韓境內的地下活動導致軍事計劃無法成功。1951 年 8 月，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中成立了負責對南事務的「中央黨聯絡部」，身爲黨書記的李承燁（時任黨中央委員會書記、司法相）便任命了同爲朴憲永心腹的裴哲（Bae Chul）爲部長，於是以朴憲永和李承燁爲中心的反金日成勢力便以黨聯絡部爲核心匯聚。1952 年 12 月，金日成先是在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中對於黨內的「宗派份子」進行嚴厲批判，後來在次年 1 月起進行思想檢討，展開對國內派的批判。同年 2 月，時任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的金枓奉授予金日成「元帥」的封號，不僅免除了金日成的戰爭責任，也表達延安派對金日成整肅行爲的默認。最後於 1953 年 7 月 30 日，李承燁等十一人被以「美帝間諜」罪名起訴，而李承燁、裴哲等人也被處死。朴憲永則是以相同罪名，到了 1955 年才被判處死刑。而國內派被整肅後所主要空缺則爲甲山派所補上，其中甲山派領導人朴金喆被拔擢爲黨中央聯絡部長，成爲政治委員會的一員，後來更升爲黨組織部部長（平井久志，2011：109-111；徐大肅，1996：80-81；高峻石，1993：126-127, 130-135）。

參、「八月宗派事件」

韓戰期間的兩次肅清主要是把國內派的勢力排除在北韓的政治菁英之外，雖然延安派的武亭和蘇聯派的許謌誼等其他派系的主要人物也被降職或整肅，但是對於後兩派在北韓政權中的影響力並沒有太大的影響。真正將這些勢力鏟除掉的是以 1956 年的「八月宗派事件」（”The August Incident”）爲始，以及其後一連串

[5] 北韓官方在 1953 年 3 月公佈許謌誼自殺身亡。

的黨員重組與監控人民的政治作爲才徹底將這些派系屏除於北韓政治菁英之外，確立了金日成的最高領導地位。

韓戰結束以後，北韓自 1954 年推動「經濟復興三年計劃」以恢復在韓戰中受到嚴重破壞的基礎建設。在 1953 年 8 月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中金日成提出了「重工業優先，農業集體化」[6]的計劃方針，引發了希望優先發展民生工業的蘇聯派和延安派人士的不滿，於是解除了延安派財政相崔昌益（Choe Chang Ik）和蘇聯派輕工業相朴義琓（Pak I Wan）的職務。1955 年 12 底，金日成在向宣傳煽動部的幹部會議以「關於爲了確立主體性而一掃思想活動中的教條主義與形式主義」爲題的演講時便提到：

> 我黨思想活動的主體到底是什麼？我們不應該按照其他國家搞革命的方式搞革命，而應該認真地進行朝鮮的革命……在我們的宣傳煽動活動中，一直出現讚揚他人的事物而貶低我國事物的現象……到人民學校時，發現牆壁上掛得都是馬雅科夫斯基（Vladimir Mayakovsky）、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我們朝鮮人的相片一張也沒有。這樣子的兒童教育是要如何培養民族自信心呢？……有些人說蘇聯的方法比較好，有些人說中國的方法比較好，但是我們不是應該思考我們（*Uri*）的方法嗎？（金日成，1955）

這段話表面上是在講北韓不應該一味地抄襲其他國家的革命經驗，而應該試圖建立符合北韓實情的革命方式，實際上是在批評蘇聯派的前黨宣傳部長朴昌玉（Pak Chang Ok）和朴永彬（Pak Yong Bin），而兩人也在隔年 1 月被逐出黨政治局（玉城素，1969：14-15；平井久志，2011：111；和田春樹，1998：110-115）。

1956 年 2 月 14 日起蘇聯共產黨召開第二十屆黨代表大會，北韓方面派遣崔庸健爲代表團前往參加，並於 3 月底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三月全體會議中進行報告。其中該次大會對北韓最重大的影響是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在會中針對史達林個人獨裁和偶像化進行了強烈的批判，標誌著蘇聯史達林體制的

[6] 在重工業優先方面，金日成把製鐵、機械、造船、非鐵金屬、電力、化學、建材等重工業視爲應該要優先發展的「基礎工業設施」。農業集體化方面，則在承認土地與生產工具私有化的前提下，從部份地區爲試點開始，逐步推行並組織農業合作社。

崩潰。這影響到朝鮮勞動黨內對金日成搞個人獨裁與偶像化運動的不滿，因此延安派的金枓奉（時任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最高人民委員會常任委員長）、崔昌益（時任中央委員會委員、副首相兼財政相）和蘇聯派的朴昌玉（時任黨中央委員會委員、副首相）等人便趁金日成於該年 6 月和 7 月到蘇聯、東歐進行訪問之際企圖進行政變，不過因爲蘇聯駐朝大使伊凡諾夫（V. I. Ivanov）向金日成的通報而失敗（高峻石，1993：141-143, 147-154）。

8 月 30 日在黨中央委員會的全體會議中，延安派的尹公欽（Yun Kong Hum，時任商業相）首先發難批評金日成的個人崇拜以及警察政權，並和擁護金日成的崔庸健在會中互罵。最後，會議中決定把崔昌益、尹公欽、朴昌玉等人從中央委員中除名，也把兩位蘇聯派的副首相朴義琓和金承化（Kim Sung Hwa）給革職。在蘇聯第一副總理米可亞（Anastas Mikoyan）和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的求情下金日成雖未處決這些黨員，不過卻將這些人的黨職和軍政職務全部予以剝奪，許多人也流亡海外（和田春樹，1998：117-118；高峻石，1993：154-156）。

爲了徹底鏟除反對勢力，勞動黨自 1956 年底至次年初進行「黨員證交換事業」，以換發黨員證爲名鏟除黨內蘇聯派、國內派和延安派的勢力；同時根據朝鮮勞動黨政治局的〈五・三〇決議〉[7]，自 1958 年 6 月到 1960 年 5 月對全國人民進行嚴密的身家調查，把全部的人民分爲「核心階層」、「動搖階層」和「敵對階層」等三種身份，確立具有高度社會階層性與歧視性的「成分制」（高峻石，1993：163-164；渥美文夫，2007：81；鐸木昌之，1992：34；Lankov, 2007: 66-67）。

肆、「勝利者大會」與肅清甲山派

爲了彌補大量被鏟除的蘇聯派與延安派人士所遺留的空缺，金日成啓用了大量滿洲派的政治人物以及一批甫從蘇聯留學歸國的技術官僚，其中包括擔任內務相的方學世（Pang Hak Se，親金日成蘇聯派）、任黨組織指導部長的金日成胞弟金英柱（Kim Yong Ju）、任黨宣傳煽動部長的金道滿（甲山派）和副部長黃長燁

[7] 該項決議的全名爲〈關於將同反革命份子鬥爭轉變成全民全黨運動之決議〉。

等。1961 年 9 月 11 日起召開朝鮮勞動黨第四次大會，其中在黨中央委員會的組成中滿洲派和甲山派就佔了 85 席中的 37 席、技術官僚則有 31 席，徹底打壓其他三派的勢力[8]，因此該大會被《勞動新聞》稱爲「光榮的勝利者大會」（平井久志，2011：114），金日成也在大會上表示：

> 黨……徹底地掃除黨內反黨分派份子，在促進黨的統一團結上獲得巨大的勝利……透過頑強的鬥爭掃除反黨分派份子與其思想毒素，把這些長年以來對我國勞動運動造成莫大傷害的派系連根掃除，對於黨的統一團結有決定性的強化作用，也達成了完全統一朝鮮共產主義運動的歷史偉業。這是朝鮮共產主義者經過長期艱困的鬥爭才贏得的寶貴成果，也為我國的發展在取得了具有歷史意義的重大勝利。（轉引自高峻石，1993：159）

藉此，金日成完全掌控北韓的政治權力，也開始在社會中宣揚抗日游擊隊的傳統，藉此進一步建立個對金日成個人的崇拜，也確保滿洲派和甲山派的權力（和田春樹，1998：119-120）。

隨著 1961 年開始的「七年經濟計劃」目的無法達成，甲山派便開始批判金日成以重工業爲主的經濟政策，而要求重視民生經濟。同時，當時擔任黨宣傳煽動部的金道滿也利用各種方式試圖提高甲山派領袖朴金喆的地位，甚至還拍了一部名爲「一表丹心」（*Ilpyon Tansim*）的電影宣揚甲山派在抗戰時期的英勇表現。1967 年 2 月，金日成曾警告過甲山派不要再搞「個人英雄主義」，但是沒有被理會，因此在同年 5 月 4 日起召開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四屆第十五次大會上以「布爾喬亞份子」、「修正主義份子」[9]的罪名把甲山派的朴金喆（時任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兼黨書記）、李孝淳（Yi Hyo Sun，時任黨中央委員會副委員長兼黨書記）、金道滿等人予以肅清，正式確立金日成唯一獨裁的地位，同時也正

[8] 當時如蘇聯派的南日、國內派的朴正愛（Pak Chong Ae），以及延安派的金昌滿（Kim Chang Man）等人其實都是親金日成的人士，因此可以說些派系在中央委員會的存在只是代表著過去「聯合戰線」的權力結構型式，實際上真正的掌控權均在滿洲・甲山派的手中。

[9] 根據北韓官方資料，甲山派被整肅的理由有下列四點：在各方面妨害金日成革命思想武裝的思想教育事業；散播資本主義和修正主義等不健全思想；庇護搾取階級，反對「千里馬運動」（*Chollima* Movement），阻礙社會主義建設的即早發展；在南朝鮮革命與祖國統一問題上，有右傾投降主義和玩弄修正主義式詭辯之傾向。

式確立金日成的革命思想爲「唯一思想體系」。（高峻石，1993：160；渥美文夫，2007：97-98；鐸木昌之，1992：35；J. C. Lim, 2009: 39）。

第二節　黨唯一領導體系與「首領主導黨國制的確立」

壹、《社會主義憲法》的制訂

在鏟除黨內其他的政治派系之後，金日成進一步透過法律制度的修改以及意識型態的灌輸確立其獨裁統治的地位。就法律制度的修改而言，其具體行爲是於1972年北韓將其1948年所制訂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憲法》修改爲《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憲法》，建立了「國家主席制」，給予金日成不受限制的權力。在意識型態的灌輸方面，以朝鮮勞動黨的宣傳煽動部爲中心，建立了以金日成的「主體思想」爲指導黨國的唯一思想原則，並確立金日成爲黨國的唯一領袖，更在金正日所主導的「全社會金日成主義化」運動下，不僅更進一步鞏固金日成在國內至高無上的地位，也開啓了神化金氏家族的偶像化運動。

在1970年11月舉行朝鮮勞動黨第五次黨大會中選舉金日成擔任總書記，並對於黨中央委員會成員進行大幅度的改組，組成了以金日成的滿洲派爲主的領導中心（和田春樹，1998：129-131），同時進行《朝鮮勞動黨黨綱》的修改，規定「在我國革命遂行與黨建設的過程中，朝鮮勞動黨的基本原則是在黨內確立唯一思想體系」，而確立黨內唯一思想體系的方法是「在政治思想上誓死擁護與保衛首領，貫徹首領的教示與黨的政策，就算赴湯蹈火也要繼續鬥爭」，而思想體系的具體內容則是「黨活動的指導方針是馬列主義及配合我國現狀由偉大的金日成同志適用馬列主義所創造發明的主體思想」（鐸木昌之，1992：63-64）。

1972年12月25日召開第五屆最高人民會議的第一次會議，於27日通過了憲法修正，制訂《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憲法》，在憲法層次上給予金日成獨裁的地位。就國家的指導思想而言，規定「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將馬克思•列寧主義創造性地運用於我國現實的朝鮮勞動黨的主體思想作爲自己

活動的指標」（第四條），正式把「主體思想」與馬列主義併列。同時在政府組織上原本的內閣改為「政務院」，隸屬於國家主席所領導的中央人民委員會之下，成為純粹的行政執行機關（第一〇七、一〇九條）；並設置了「國家主席」，直接領導國家最高領導機關的中央人民委員會（第九十一條），為共和國一切武裝力量的最高司令官、國防委員會委員長，指揮和統率國家的一切武裝力量（九十三條），還有公佈法令、發佈命令、批准和廢除與外國締結的條約等法律上的權力（九十四到九十六條）。「中央人民委員會」的權限更包括制定國家的對內對外政策；領導政務院、地方人民會議和人民委員會的工作；設立和撤銷政務院的各部門執行機關；根據政務院總理提名，任免副總理、各部部長和其他政務院成員；有事時宣佈戰爭狀態，發佈動員令等（第一〇三條）。這樣的體制使得國家主席透過「指導」可以獲得龐大且不受制衡的權力。如此一來，不論是在黨內或是在政府體系內，金日成擁有最高領導人的地位，其所提出的「主體思想」也成為最高指導原則。

貳、唯一領導體系的確立

在法律與政治制度上確立金日成的唯一領導地位之後，接下來的工作便是要將對金日成的忠誠與服從之心推廣到社會當中，也就是不只將「首領制」與「主體思想」作為政治指針，更要把這兩者內化到人民的當中，因此產生了由金正日推動主導的「全社會金日成主義化」運動。這個過程，基本上正是「主體思想」發展成熟的過程（鐸木昌之，1992：51）。於本段落中，將集中討論相關的政治運動，而有關「主體思想」的具體內容以及這一連串作為對金正日政治生涯之影想，則分別於下一節與第四章當中進行討論。

「全社會金日成主義化」除了與「主體思想」的發展有關之外，也和金正日的崛起有密切的關係。金正日於 1974 年 2 月的第五屆黨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大會中金正日被選為政治局委員，並在 2 月 19 日發表了「有關達成全社會金日成主義化之黨思想活動需面對之課題」的演說中提到「金日成主義，一言以蔽之，就

是主體的思想、理論及方法體系」（轉引自和田春樹，1998：144），把「主體思想」和「金日成主義」進行連結，並在之後十多年內以自己的名義針對「金日成主義」進行闡明與詮釋，藉此確立金日成至高無上的地位，也確保自己作爲繼承人地位之穩固。

爲了達到「全社會金日成主義化」的目標，金正日的作法是加強思想方面的工作。首先是把抗日鬥爭的正統性和金日成主義進行結合，故在 1974 年 3 月提出「生產和學習和生活採取抗日游擊隊式」口號，並於 4 月 14 日的演說中提到要以「抗日游擊隊式」的精神來開展黨的思想活動，而這看法也在隔年獲得金日成的首肯（和田春樹，1998：145）。其次，則是要確立金日成作爲唯一領導、「主體思想／金日成思想」作爲唯一思想的體系，因此也在 1974 年 4 月 14 日中提出「確立黨唯一思想體系十大原則」，其後並在黨組織中不斷進行「再討論」，目的是要改變黨員的個人信仰，不僅是由馬列主義轉變爲「主體思想」，更重要的是希望建立對首領的絕對服從與無條件效忠。有關「確立黨唯一思想體系十大原則」之內容如下：

> 一、必須在偉大首領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下為整個社會的一致化上奉獻生命不斷鬥爭；二、必須以最高的尊敬與忠誠，奉行偉大首領金日成同志的命令；三、必須將偉大首領金日成同志的威權絕對化；四、必須信仰偉大首領金日成同志的革命思想，將首領的教示信條化；五、必須遵守無條件原則，執行偉大首領金日成同志的教示；六、必須強化以偉大首領金日成同志為核心的全黨思想意志的統一，以及革命的團結；七、必須追隨及學習偉大首領金日成同志，保持共產主義的風貌、革命的事業方法及人民的作業風範；八、必須珍視偉大首領金日成同志所賦與的政治生命，以高度的政治自覺與技術忠誠回報首領偉大的政治信任與考量；九、必須在偉大首領金日成同志的唯一領導下，樹立全黨、全國及全軍一致強而有組織的規律；十、必須代代相承以完成偉大首領金日成同志所開創的革命偉業。（轉引自鐸木昌之，1992：100-101）

除了在黨的層次進行思想改造外，也將其深入到一般人民的生活當中，包括在 1976 年制訂的《幼兒保育教養法》中強調要培養忠於金日成的孩童、1978 制訂的《主體型社會主義勞動法》中規定勞工每天要花八小時學習「主體思想」（高峻石，1993：216），另外也利用原有的「組織生活」（*chojik saenghwal*）不斷反覆地進行政治教育與「生活總和」[10]（*saenghwal ch'onghwa*），不斷地灌輸對「主體思想」的認識及對首領的效忠（Lankov, 2007: 200-201）。

除了思想教育方面的推動之外，同一時間進行的另外一項確立金日成唯一領導體系的大規模動員活動是所謂的「三大革命小組運動」（Three-Revolution Team Movement）。「三大革命」起源於金日成在 1964 年 2 月 25 日在「有關我國社會主義農村問題的提示」報告首次提及思想、技術和文化的「三大革命」一詞，到了 1970 年的第五次黨大會上，爲了促成全社會革命化、勞動者階級化，因此必須同時推行思想革命、技術革命和文化革命，其中應該以思想革命爲主（鐸木昌之，1992：77-78）。1972 年 9 月起，金日成承認由於國家把產業重心放在重工業上而輕忽輕工業，導致許多舊幹部沒有善加利用新購入的工業器具和沒有有效經營這些企業，導致人力和物力方面的浪費，因此他派大學生與青年進入這些輕工業工廠中進行指導協助，希望可以提升輕工業的生產水平。由於金日成本人對這項運動的效果相當滿意，因此自 1973 年 2 月便把它推行到全國層次，開啓了「三大革命小組運動」（J. C. Lim, 2009: 75）。表面上「三大革命小組運動」是以 20 到 30 名大學生爲單位組成「三大革命小組」，派到各地工廠、集體農場和企業中進行技術指導，希望能協助改善當時的北韓經濟，但是實際上卻是一個效法中國紅衛兵運動的奪權與世代交替的活動。被選入「三大革命小組」的成員大多是被認爲忠於金日成且對於「主體思想」、首領制熟稔且絕對忠誠的青年人，這些人進入到各地工廠、集體農場和企業中後，地位往往高於各單位原有的黨組織且直

[10] 「生活總和」是北韓政治教育的重要措施，通常是以工作場所爲單位，每週與每月針對自己生活中不合乎金日成、金正日思想和其他官方意識型態的活動進行反省和檢討，同時也進行相互的批判，除了用來掌握所有人民的生活與行蹤之外，也藉此促使北韓公民彼此之間相互監視，使他們之間產生不信任感。

接向金日成（後來是金正日）負責，成員除了指正舊有幹部在企業、農場營運上的不足外，更重要的是以「主體思想」對舊有幹部和勞動者進行「思想革命」。到了 1975 年 1 月「三大革命小組運動」的負責人交到金正日手中後，許多曾參與「三大革命小組」的幹部便成爲金正日權力的基礎，自 1980 年 10 月的第六次黨大會中隨著金正日進入到北韓政治的核心（高峻石，1993：204-205；J. C. Lim, 2009: 75-77）。

第三節　金正日的崛起與接班

作爲金日成接班人的金正日一直以來是國際社會與媒體當中令人捉摸不定的領導人。早期金正日所進行的任何指示或是講話都被北韓媒體與官方以「黨中央」的名義進行發表，在正式接位後也鮮少進行公開演講，也僅出訪過中國與俄國而已，和其父金日成喜愛進行公開演講、到社會主義和第三世界國家出訪的具有群眾魅力形象的風格是完全不一樣的。也因此，金正日的領導人特性對於從國內因素理解金正日時期的對外行爲也是相當重要的因素，因此本節希望透過了解金正日在北韓政治舞台上的崛起，以分析作爲一個政治領導人，金正日是怎樣的政治人物，和這對金正日時期北韓對外行爲的影響爲何。

本節共分爲四個段落進行分析：第一段討論金正日自金日成綜合大學（Kim Il Sung University）畢業以後進入朝鮮勞動黨的組織指導部、宣傳煽動部等部門的政治歷練，以及他如何透過宣傳來獲取金日成與滿洲派人士的支持；第二段則討論自 1974 年金正日被選爲朝鮮勞動黨政治局委員，內定爲接班人以來，到 1980 年 10 月之間在朝鮮勞動黨第六次黨大會中接任黨政治局、黨書記、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等重要黨職，成爲北韓政治權力排序中第二順位，正式向外公開指定他爲繼承人之間的政治表現，除了有「三大革命小組運動」外，也包括他如何排除其他潛在競爭對手的手段等；第三段則是討論自 1980 年成爲繼承人以後到 1994 年金日成過世這段期間兩個人「共同統治」的時期，主要內容包括他對「主體思想」以及金日成崇拜的進一步深化，和父子之間在金日成時代末期的政策矛盾；

最後一段則討論1994年金日成過世到1998年正式接任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這段期間的「遺訓統治」（*Yuhun Tongchi*）時期，討論金正日如何在這段時間鞏固自己的最高領導地位，並爲日後「先軍政治」以其「強盛大國」（*Kangsong Taeguk*）目標鋪路的過程。

壹、金正日早期的政治經歷

雖然有關金正日負面的傳聞經常在國際媒體上流傳[11]，但是許多學者均認爲金正日是相當具有能力的政治人物，也因此才得以在北韓政治鬥爭中最後獲得金日成的青睞而成爲接班人的。Kim Sung Chull（2006: 37, 48）便認爲金日成從青年階段就已經具備了身爲政治人物所必須要有的好奇心、熱忱、榮耀感與權力慾望等特質，這使得他對政治事務充滿熱忱和求知慾，讓金正日對於政治事務有更細微的思考能力和分析能力，因而得以在政治鬥爭中勝出。Chon Hyun-joon（2010: 48-50）也認爲作爲一個獨裁國家的領導人，金正日是相當稱職的，因爲他具有優秀的戰略視野、做事大膽的同時還事必躬親且慎重、對於組織管理和政治宣傳相當擅長，另外也擅長爲自己營造神秘感等因素。叛逃至南韓的朝鮮勞動黨書記黃長燁也曾提到：「這些（指各部會上呈的報告）構成巨大的工作量，但是金正日從來不假手他人……不論他多忙，他一定會親自閱讀呈給他的政策建議並提供他的看法與結論。」（轉引自 Becker, 2005: 126）由此可見，金正日對北韓政治事務與決策過程是投入且事必躬親的，也因此他在各方面決策的影響力必定相當龐大。

金正日在 1964 年春天自金日成綜合大學政治經濟學部畢業以後便進入黨組織指導部擔任指導員，1965 年雖曾短暫在金日成的內閣首相室內工作，後來又回到黨職，自此一直在黨的組織與宣傳方面擔任要角。他在 1966 年 2 月進入黨宣傳煽動部，於兩年後成爲該部「文化藝術」與「出版報導」部份的負責人，並

[11] 其中有關金正日家族以及其私人生活的記載，曾任金正日御廚的藤本健二（Kenji Fujimoto）的《金正日的廚師：近距離觀察權力者的真面目》（金正日の料理人－間近で見た権力者の素顔）與《金正日的私生活：必須公開的招待所全貌》（金正日の私生活－知られざる招待所の全貌）是經常被學者引用的著作。

於 1969 年成爲黨組織指導部副部長，1970 年轉任黨宣傳煽動部副部長。1973 年 9 月的朝鮮勞動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大會中，金正日被任命爲負責黨組織、宣傳和煽動業務的書記，並在 1974 年 2 月的朝鮮朝動黨第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八次大會被選爲政治局委員，正式被認可爲金日成的繼承人（徐大肅，1996：191；S. C. Kim, 2006: 39；J. C. Lim, 2009: 36-37, 55）。金正日在這段期間的政治活動大致上可以分爲兩個面向來說明：利用藝術宣傳來提高金日成與滿洲派的地位，以及透過實際政治成就來確立自己繼承人地位等三個面向。

在文化藝術宣傳方面，金正日最主要的目標是要確立對金日成與其家族的偶像化作業，以及進一步確立唯一思想體系，這是來自於甲山派金道滿的教訓。爲達到其目標，金正日從三方面進行：在對金日成的偶像化作業方面，他指定了許多其家族曾參與革命的重要場地並要求國民參訪這些地方、在各地建立「金日成革命研究辦公室」、大量出版金日成的文集與文選，另外也要求文藝工作者創作歌頌有關金日成游擊隊活動的文藝作品；在家族偶像化方面，則從各方面改寫扭曲古代朝鮮的歷史，把金日成的曾祖父金庸禹（Kim Ung U）塑造成率領朝鮮人民擊退美國商船「雪曼將軍號」（*USS General Sherman*）的領導人、把金日成的父親金亨稷（Kim Hyong Jik）形容成熱衷於朝鮮獨立運動的活動者與教育家等，目的是要確立金氏一族推動朝鮮民族獨立的優良「血脈」，以爲自己繼承大位的合理性鋪路；最後爲了進一步確立唯一思想體系，金正日則進一步深化對金日成的忠誠運動，因此出現了許多有關抗日游擊隊員和模範勞工效忠金日成的文藝作品，建立願意犧牲自我以完成金日成首領命令的模範形象（J. C. Lim, 2009: 43-45）。

在這些活動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日在電影和舞台劇方面的投入。金正日認爲「電影是一種綜合藝術，因爲它可以包含文學、音樂、繪畫等其他藝術種類在其中，因此推廣電影就等於推廣其他種類的藝術。因此，作爲意識型態工具，製造足以教育人民大眾的具高度意識型態的藝術電影是相當重要的。」（轉引自 J. C. Lim, 2009: 45）而他也對舞台劇持同樣看法，金正日的夫人成蕙琳（Song Hye

Rim）的姊姊成蕙琅（Song Hye Rang）就在其回憶錄中提到：「金正日書記對其引以爲傲的五大歌劇[12]的導演、選角、台詞，甚至於舞台佈置和演員的演技都一一投入，也讓蕙琳看過，聽取她的意見。」（轉引自李相哲，2011：107-108），足見其投入的程度。這段期間金正日所監督的電影和「革命歌劇」（"revolutionary operas"）大多描寫滿洲游擊隊的抗日英勇事跡、游擊隊刻苦的生活，以及利用民族主義的敘述方式對資本主義與地主進行清算、宣揚社會主義的作品。因此，徐大肅（1996：200）便認爲金正日所投入的電影和舞台劇事業並不是如有些學者所謂的滿足他個人的私慾與玩心的浪費，而是藉此鞏固黨的唯一思想體系、強調首領和黨與人民間的關係，並以此向金日成與滿洲派表示效忠，確立自己在黨中央的政治地位。

這段期間，在共產世界中由於蘇聯發生史達林死後赫魯雪夫批評史達林的事以及林彪試圖利用政變推翻毛澤東的事件，使得北韓當時不得不認真考慮繼承人問題，而當時在金正日之外尚有金日成的胞弟金英柱及金日成的第二任妻子金聖愛（Kim Song Ae）曾被認爲是繼承人。金英柱在北韓建政初期就被金日成矚意爲繼承人，他在 1959 年就被任命擔任黨組織指導部部長，掌握黨組織改造以及黨人事任免的大權，也是金正日在早期擔任黨職時就主要的監督者與指導者；1966 年成爲黨政治委員會候補委員，1970 年便成爲黨政治委員會委員，在當時地位僅次於滿洲派的其他政治菁英。不過根據南韓方面在 1970 年代從事南北會談的官員表示，金英柱自 1960 年代末期起罹患「植物性神經不調和症」使其不時會陷入無意識狀態，因此自 1974 年起轉任副首相，逐步淡出北韓政壇（平井久志，2010：28-29；J. C. Lim, 2009: 52-53）。

金日成的元配，亦即金正日的親生母親金正淑（Kim Chong Suk）在 1949 年過世以後，便於 1952 年私下迎娶在金日成辦公室擔任電話接線生的金聖愛，並於 1965 年被正式介紹爲「金日成同志的夫人」。她於 1965 年 11 月成爲「民主

[12] 「五大歌劇」爲金正日在 1970 年代初期所投入指導創作的劇作，內容仿傚中國的「現代京劇」樣板戲，以宣揚社會主義、反帝國主義和金日成崇拜之內容爲主，包括「血海」、「黨真正的女兒」、「在密林中述說」、「賣花的少女」和「金剛山之歌」等五部。

女性同盟」（Democratic Women's Union）的副主席，並於 1969 年升任主席。到了 1970 年代初期，金聖愛的政治影響力開始擴大：1971 年 1 月金日成在與農民會面的場合中提到「金聖愛所講的話與我相同」，自此金聖愛在官方媒體中逐漸取得與金日成平等的對待與篇幅，而民主女性同盟的地位也因此提升，在任何工作會議或是「生活總和」中一定會有民主女性同盟的代表列席。後來她也發起「向康盤石（Kang Pan Sok）夫人學習」運動，利用直接訴諸金日成母親的手法，開始削減金正淑原本的地位，並在各地的民主女性同盟辦公室中以自己的相片取代金正淑的，也開始散發自己的語錄，同時也拔擢他的兩位兄弟以制衡她不所屬的滿洲派政治勢力。這引發滿洲派的強烈反對，認爲她是北韓版的江青，並認爲她崛起的原因是基於金英柱生病所留下的權力真空，因此開始支持當時在政治宣傳工作上相當有所成就的金正日，而金日成也開始發表有關「世代交替」的講話。因此金聖愛在金正日於 1974 年確定繼承以後，再度被貶爲「金日成同志的夫人」之角色，同時她也在 1975 年 3 月 8 日的國際婦女節演講中稱讚金正淑爲「無敵的共產革命家和偉大的女性活動者」，象徵她奪權活動的結束（J. C. Lim, 2009: 50-52, 54）。

至於爲何這時滿洲派的政治人物會選擇以金正日來取代金英柱就是值得討論的一點。首先必須觀察金日成對於繼承人的態度：由於他擔心自己過世以後年輕一輩的領導人不會繼承他的革命，也不會試圖完成以共產主義統一朝鮮半島的使命，因此希望讓他信得過且足以繼承他志業的人繼承（An, 1977: 181），因此在北韓學者金裕民所著的《繼承者論》中便提到繼承人的資格是「在侍奉和擁戴首領方面有相當的時間，在首領身邊侍奉及輔佐首領，了解並接納首領的意思，同時在黨的革命及國家全部的事業與建設的所有領域內，能確實且穩定地實現首領領導的唯一指導者。」（轉引自鐸木昌之，1992：75）在這種情況下，致力於推動金日成偶像崇拜與唯一領導體系的金正日自然會被金日成認爲是能夠在未來實現自己志業的繼承人。其次則必須從其他滿洲派政治菁英的角度來思考：這些政治菁英最主要在乎的是自己的政治利益與特殊社會地位是否得以維持，在這

種情況下，非滿洲派出身且有意制衡甚至鏟除滿洲派政治勢力的金聖愛自然會受到這群政治菁英的排除，而在第一代領導人紛紛衰老過世的情況下，自然便會把目光轉向利用宣傳文藝活動大力宣傳滿洲抗日游擊隊傳統不遺餘力的金正日，加上金正日兒時在游擊營隊長大的背景，滿洲派政治菁英向金日成力薦金正日爲繼承人也是相當合理的（J. C. Lim, 2009: 43）。因此，雖然表面上金正日是世襲金日成的大位，但是若沒有其在組織和宣傳方面的具體政治表現，是不可能獲得金日成與滿洲派的青睞而被指定爲繼承人的。

貳、「三大紅旗運動」與金正日權力基礎的確立

從 1974 年到 1980 年這段期間，可以說是金正日「繼承體制的形成期」（鐸木昌之，1992：79），因爲一來可能的繼承人競爭者大多已經退出政治舞台，二來擔任負責宣傳與組織的黨書記也讓金正日可以在黨事務一展其政治上的能力，並藉此鞏固自己的權位和支持基礎，使其得以在 1980 年的朝鮮勞動黨第六次黨大會中接任黨政治局以及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等重要黨職，正式成爲金日成繼承人。他在這段期間的政治表現，可以分別從組織、宣傳，以及從日後形成其權力基礎來源的「三大革命小組運動」三個面向來觀察。

在黨組織方面，金正日最主要的工作是希望可以加強黨的組織紀律，除了促進組織革新以外，更重要的是要加強在意識型態的灌輸，特別是對於金日成的唯一思想體系與唯一領導體系的灌輸。首先，他開始培養只聽從平壤黨中央或是地方黨部命令的全職黨幹部，並將他們派到所有基層單位與政府機關中，處理所有與黨相關的業務，以確保所有單位的工作情況有確實地在執行黨的政策路線，且利用「生活總和」來確保黨灌輸的意識型態有確實爲人民所接受（S. C. Kim, 2006: 65-67）。其次，由於全職黨幹部人數的增加，因此自 1972 起金正日得以推行以每隔日或每週一次的新的黨生活總和制度，並把社會主義思想、抗日游擊隊思維、反帝國主義思想以及對金日成的個人崇拜均納入「生活總和」的內容中，要求人民自我批評與相互批評不合乎上述想法的生活行爲，背誦金日成（日後還包括金

正日）的言行與思想，藉此控制黨員與人民的思想（鐸木昌之，1992：89；S. C. Kim, 2006: 69-75）。第三，他也加強朝鮮勞動黨對政府的控制，在各政府機關中設立「黨指導委員會」與「黨委員會」[13]，強化對於政府內執行黨決策以及黨員生活是否合乎黨的要求之監督（鐸木昌之，1992：91-92）。

同時，金正日也利用黨宣傳工具進一步發展金日成的思想與領導體系，利用獨佔金日成思想的解釋權來最大化自己的權立，建立自己在黨內的「唯一指導體系」（*yuilchok chido che'je*）。前述提到金正日在1974年2月首次提及金日成主義，也在同年 4 月提出「確立黨唯一思想體系十大原則」，這些在表面上雖然是進一步確立金日成的地位，但其實確是藉此清除黨員中的「不純潔份子」以建立金正日在黨內的指導體系，同時也利用這些意識型態灌輸藉著生活總和牢牢地控制北韓人民的思想（J. C. Lim, 2009: 87-88）。爲了進一步合理化金日成主義，因此把抗日游擊隊的正統性與金日成主義加以結合，在 1974 年 3 月提出「生產和學習和生活採取抗日游擊隊式」口號，在軍中也不斷宣傳要「發揚革命傳統」、確立金日成對朝鮮人民軍的唯一領導體系，也在 1979 把建軍節改爲北韓官方宣稱「抗日人民游擊隊」建軍的 4 月 25 日，把抗日游擊隊與朝鮮人民軍正式連結在一起。同時也在各地廣設「金日成同志事蹟館」、各單位內建立「金日成同志革命思想研究室」、學校內設「金日成元帥革命歷史研究室」等（宮塚利雄、宮塚寿美子，2007：210；鐸木昌之，1992：106-107），並自 1979 年起爲了慶祝將到來的金日成七十歲誕辰起開始建立各種大型紀念碑和紀念性建築物，希望「具有不朽革命性的大型紀念性建築所代表的內容能與偉大的首領一致，保持其具高度思想性的內涵。」（轉引自和田春樹，1998：146）

「三大革命」與「三大革命小組運動」的內容於本章第二節中已經有所說明，在此不再詳細說明，但是值得注意的是，由於被選入「三大革命小組」的成員大多是被認爲忠於金日成且對於「主體思想」熟稔且絕對忠誠的青年人，因此這些

[13] 「黨指導委員會」是由各行政部門的指導單位組織而成的集體協議機關，其基本任務是討論及決定正確的對策與方式以確實執行首領的教示和黨的政策，同時掌握和統制該機關單位的所有活動。「黨委員會」則是指導黨員的組織與思想生活。

人便遵從金日成（實際上是以「黨中央」爲名的金正日）的命令進行各單位的「思想革命」，徹底進行前述的黨組織改造以及意識型態灌輸的工作。1975 年初金正日接任「三大革命小組運動」負責人後，便派遣「三大革命指導小組」到各地負責監督地方黨部與各地的三大革命小組，希望可以藉此深化思想灌輸以及達成預期的經濟目標。同年底，金正日便發動「三大革命紅旗運動」（The Three-Revolution Red Flag Movement），仿傚金日成在 1956 年曾推動的「千里馬運動」（*Chollima* Movement）[14]，希望透過群眾動員利用「速度戰」、「閃電戰」在短時間內達成經濟目標，並且鼓勵生產單位之間進行產量的競爭活動以「奪取紅旗」（J. C. Lim, 2009: 79-80），同時也在軍中宣揚此活動（中川雅彥，2001：19）。藉此，金正日不只將其權力擴大了到各地方黨部中，也培養了一批忠於自己的新幹部群，更加確立自身的繼承人地位。

同時，金正日也開始利用黨組織鞏固他在朝鮮人民軍中的地位。他自 1964 開始便開始單獨或是與金日成到各地的人民軍基地進行訪問，並在 1969 年 1 月時透過黨軍事部和黨組織指導部開始掌握朝鮮人民軍幹部的人事任免權，加上時任人民軍總政治局局長的吳振宇（O Chin U）與金正日的交情相當好，金正日進一步利用吳振宇對朝鮮人民軍有更大的影響力。1975 年元旦，金正日便以黨宣傳煽動部的名義向朝鮮人民軍發起「全軍金日成主義化」的口號，利用人民軍總政治局進一步推動對金日成的效忠和灌輸金日成思想；在「三大革命小組運動」時期，金正日也於 1976 年元旦透過在朝鮮人民軍中的黨政治委員宣傳「爲了金日成同志付出生命戰鬥」的口號。透過黨組織的改造，金正日的指示經過人民軍總政治局可以直達各個部隊的政治委員和軍中的組織指導、宣傳煽動單位，故可以透過政治委員監督各部隊指揮官和確立黨可以對部隊進行政治指導的體系。1979 年 12 月 6 日，金日成發動「向吳仲洽（O Jung Song）同志學習運動」，要求部隊對最高司令官金日成的命令（同時也是黨中央和金正日的命令）抱有絕對

[14] 「千里馬運動」是金日成於 1956 年 12 月爲了促進經濟發展和社會躍進所推動的生產方面的運動，其內容類似中國的「大躍進」，是在一定期間內投入大量勞力以增加生產量的經濟發展方式。1999 年爲了使北韓經濟從 1990 年代的衰敗中復甦，金正日發起了「第二次千里馬運動」。

和無條件遵行的態度，同時也要透過對金日成的忠誠確立軍隊的紀律與凝聚力（中川雅彥，2001：17-20）。由此可見，金正日透過朝鮮人民軍負責黨事務的人民軍總政治局發揮他對軍方的影響力，而他在 1980 年接任黨軍事委員會委員一職，只是合理化他藉由黨組織對軍隊的影響，使其日後對人民軍有更大影響力，也成為他日後掌權的重要權力基礎來源。

參、正式成為繼承人後的政治表現

在 1980 年 10 月 10 日起召開的朝鮮勞動黨第六次大會中，金正日被選為黨政治局常任委員會委員和政治局員、黨書記（負責組織指導與宣傳煽動業務）以及黨軍事委員會委員。由於在金日成時代從來沒有任何一人可以同時兼任這三個重要職務，因此金正日在名實上都已經取得北韓政權「二把手」的地位，成為正式的繼承人。由於另外一名可能的繼承候選人金平一（Kim Pyong Il）雖然長期擔任軍職，但是一直無法擔任黨職與在黨內有影響力，後來也被長期派駐於東歐擔任大使[15]，因此金正日的權力可以說達到正式接位前的巔峰，進入他和擔任國家主席的金日成的「共同統治」階段。

金正日在這段期間就主要的政治表現是進行對於「主體思想」的進一步詮釋以壟斷對其的解釋權，另外就是鞏固他在軍中的權力和影響力。雖然自 1974 年金正日就已經在思想方面有壟斷性的解釋權，但是在這段期間金正日將其進一步地深化，把原本紛雜的「主體思想」內容進行系統化的闡述，並將其與對金日成的無條件忠誠連結在一起，使主體思想「宗教化」（Christian Mission, 2012），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是金正日在 1982 年 3 月 31 日為紀念金日成七十壽誕所撰寫的〈關於主體思想〉一文。在此文章中，金正日捨棄了傳統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社會關係為歷史發展主體的觀點，認為人民大眾才是社會歷史的主體，而歷史的

[15] 金平一為金正日同父異母的胞弟，母親為金聖愛。金平一在 1979 年就被派到南斯拉夫擔任武官，1988 年成為駐匈牙利大使、1989 年成為駐保加利亞大使、1994 年轉任駐芬蘭大使，1998 年至今則擔任駐波蘭大使。雖然 2011 年 6 月金平一曾返回平壤探望病危的母親金聖愛，但是在平壤時受到居家監禁和嚴厲的監控，因此對於北韓政局毫無影響力。Daily NK (May, 9th 2007), “Photo’s of Kim Jong Il’s Brother, Kim Pyong Il and Recent Visits,” *Daily NK*. Accessed in Apr. 20th, 2012. http://www.dailynk.com/english/read.php?cataId=nk03100&num=2040。

發展是源於人與大自然之間的鬥爭，是人民爲了追求自主性而進行鬥爭的歷史，並把堅持自主立場、運用創造性方法推動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和優先進行思想改造和政治工作作爲主體思想的指導原則（金正日，2002a），使得主體思想在哲學層次上系統化且定於一尊，日後對於主體思想的任何詮釋都不能脫離〈關於主體思想〉一文[16]。之後在 1986 利用「社會政治生命體」（Sociopolitical Organism）的論述，將「首領─黨─人民大眾」以有機生命體的關係進行連繫，認爲首領和黨才是人民大眾政治生命的核心，人民要透過效忠首領才能維持政治生命等論述（S. C. Kim, 2006: 124-128），進一步把主體思想與金日成偶像運動結合，確立「家族國家論」，藉此合理化金日成與黨的獨裁統治以及唯一思想體系。以「主體思想」爲基礎，金正日也宣揚了金日成所提出的「我們式社會主義」以對抗當時蘇聯和東歐共產主義國家的瓦解，金正日在〈我國社會主義是體現了主體思想的我們朝鮮式社會主義〉中提到：「我們黨和人民正在按照主體思想，用我們自己的方式發展並完善社會主義。偉大領袖不僅開闢了建立社會主義制度的獨創性道路，而且指明了發展和完善社會主義的最正確的途徑。」（金正日，1990b：9），並在此文中提及朝鮮式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同時在〈我們朝鮮式社會主義戰無不勝〉提到：「領袖、黨和群眾團結一致的我們朝鮮式社會主義的威力，是任何力量都破壞不了的。我們一定要依靠領袖、黨和群眾團結一致的威力，粉碎帝國主義和反動派的反社會主義陰謀活動，實現祖國的自主統一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事業的最後勝利。」（金正日，1991：33），認爲必須堅定地效忠首領和黨的路線，以朝鮮式社會主義對抗任何試圖顛覆北韓政權的陰謀、推動社會主義建設。

早期金正日利用人民軍總政治局利用黨宣傳和組織對朝鮮人民軍發揮影響力，，1980 年被選爲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之後，開始可以直接對軍團的黨委員會下指示，並在 1982 年 6 月的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會議中金正日除了原有的政治指導之外，也獲得了軍事指導的權力，自此開始參加朝鮮人民軍的各種公開會

[16] 如金正日在 1990 年 10 月就曾發表「對主體哲學要有正確的觀點和理解」之演講，批評社會科學工作者從唯物辯證法的角度解釋主體思想，認爲這些學者未能正確地理解人社會存在的本質，也過於斷然區分三大改造工作而忽略主體思想真正追求的人的社會政治自主性等。

議。1990 年 5 月 24 日的第九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一次會議中，金正日被選爲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此後便在軍中出現許多擁戴金正日的政治活動，如 1991 年 2 月 15 日朝鮮人民軍的第 525 部隊〈宣誓文〉中就提到：「不論外界吹起什麼樣的風，我們將毫不猶豫地相信親愛的指導者同志（指金正日），遵從指導者同志的領導，以我們的力量用我們的方式準備人民軍的戰鬥。」（轉引自平井久志，2010：41），又如在同年 11 月的「人民軍中隊長大會」中也宣示：「針對親愛的指導者同志的領導，各中隊將化身爲無限忠誠的真正的忠臣孝子，將戰鬥隊伍整備到最強固的態勢。」（轉引自平井久志，2010：41-42）1991 年 12 月 24 日，在第六屆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第十九次大會中被推舉爲「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正式從金日成手中取得軍隊的戰鬥指揮權，並於 1992 年 4 月 20 日授予金正日「元帥」的封號取得軍人的身份，1993 年 4 月 9 日第九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五次會議中取代金日成被選爲國防委員會委員長（中川雅彥，2001：20；平井久志，2010：38-48）。自此，金正日的接班在黨政軍各方面均已經完成。

肆、「遺訓統治」與「苦難的行軍」

1994 年 7 月 8 日金日成因爲心臟病發過世，而北韓媒體於次日發佈訃告，20 日召開中央追悼大會，宣佈全國爲金日成守喪三年，進入爲期三年的「遺訓統治」時期。其中在對外關係的遺訓方面，包括：

> 朝鮮幹部不善經商，因此要把貿易人員派到外國，擴大視野，熟悉商情……我認為今後無論哪一個國家要與我國經濟合作都應答應與其合作，雖然不與外國經濟合作也可以活下去，但與其經濟合作也不會有什麼損失……為解決經濟問題……應以自力更生、刻苦奮鬥之革命精神突破瓶頸……我們應高舉主體思想的旗幟，以實現社會主義之完全勝利及祖國統一，完成主體革命的偉業，主體思想是我國人民代代相傳、高舉前進之革命及建設之指導思想……（轉引自林秋山，2011：74-75）

在這三年間，基本上維持金日成時代的政策和人事，不進行大規模的人事改組和

政策改革，同時金正日也不接任金日成所遺留下來的國家主席和朝鮮勞動黨總書記職務。不過，如《勞動新聞》在 1994 年 7 月 23 日的社論所說「對我們而言，親愛的指導者金正日同志即是偉大的領袖金日成同志，金正日同志正是我們偉大的領袖」（轉引自鈴木典幸，1996：47）一般，金正日在此時已經成爲唯一的最高領導人。雖然有關爲何金正日遲遲未接大位有諸多的揣測（佐藤尋生，1997：3-6），不過可以確定的是，金正日在面對艱難的經濟狀況的同時，利用「遺訓統治」致力於鞏固自己的權力基礎，利用「先軍思想」口號爭取軍方的支持、修憲引入「責任內閣制」給予內閣更大的經濟權力（K. S. Kim, 2008），並使國防委員會成爲實際上國家最高決策機關。這些都是有別於金日成時代的統治模式，也是觀察金正日時代政治決策的關鍵。

這段期間，金正日最主要的政治作爲是要平衡不同的政治勢力，以使自己成爲如金日成一樣的唯一獨裁者，爲此他進行了世代間和跨部會間的權力平衡（Jeon, 2000）。金正日於 1994 年 11 月 1 日在《勞動新聞》上發表了他在金日成死後的第一篇論文，名爲〈社會主義是科學〉：認爲「社會主義在一系列國家的崩潰，並不是作爲科學的社會主義的失敗，而是意味著社會主義變質的機會主義的破產」，「由於它（指社會主義）具有科學性和真理性，因而必將復生，並取得最後的勝利」（金正日，1994：1），確立了北韓將繼續往社會主義的路線前進，消除了金日成後期開放政策所造成的強硬派反對。在世代間權力平衡上，他讓老一輩的政治菁英繼續保有大位但把實權和實際政治運作移交給年輕世代，同時減少對自己的偶像化運動（Jeon, 2000: 765-768），發表〈尊崇革命前輩，是革命者崇高的道德情義〉一文以「恪守對革命前輩的道德情義」，並「使所有青少年積極學習革命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金正日，1996），同時安撫不同世代以建立兩者間的權力平衡。在跨部會間的權力平衡上，金正日先廢除黨內管理經濟事務的部會並停止黨代表大會、政治局和書記處的定期聚會，在減少黨對政府影響力[17]的

[17] 但是朝鮮勞動黨對軍方的控制力還是很大，除了總政治局直接聽命黨中央委員會之外，各兵團和野戰部隊內也都有政治委員進行監督，黨組織指導部更針對軍方高層進行全面性的監控。如

同時把權力高度集中在自己身上，同時利用修憲把原本附屬於中央人民委員會下的內閣（時稱「政務院」）提升到行政最高機關，並給予其更大的經濟裁量權。在軍事事務上，把國防委員會地位提高到與內閣一樣的地位，並在隸屬於內閣的「人民武力部」[18]（即國防部）內建立「總政治局」、「總參謀部」和「保衛司令部」三頭馬車式的領導模式市彼此相互牽制，並由人民軍最高司令官和國防委員會委員長的金正日進行全盤的管理（Choi, 2009: 152-155; Jeon, 2000: 768-772）。

這段期間由於北韓的經濟受到嚴重的打擊，因此北韓官方稱之爲「苦難的行軍」（*Konanui Haengkun* or Arduous March）時期。1993 年 12 月的第六屆黨中央委員會第二十一次大會中宣佈第三次七年計劃失敗，並自 1994 年到 1996 年之間的三年間爲「緩衝期」，其中 1994 年的雹暴、1995 年夏季的大雨和嚴重的水災，以及 1997 年的旱災均使得北韓已經不足的糧食生產更爲吃緊，都市地區的「公共配給系統」幾乎徹底崩潰，因此北韓不得不向國際社會要求糧食援助，金正日也在 1996 年 12 月的金日成綜合大學五十年校慶上公開表示「糧食危機正爲國家帶來混亂」（J. C. Lim, 2009: 110-111）。但是這段期間，金正日除了在 1995 年向政務院指示要「以全黨、全國、全人民總動員的態勢決定性地增加穀物生產」（鈴木典幸，1996：55-56）之外，並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的經濟改革措施，反而在同一場校慶演講中以「首領（指金日成）在生前數度告訴我，絕對不能插手經濟事務，一旦插手經濟事務，就無法進行黨活動，也無法進行軍隊活動」（轉引自平井久志，2010：120）的「遺訓」爲由迴避了自己在經濟政策上的責任，也加緊對人民的政治教育，認爲「爲了勝利完成社會主義事業，就要把思想作爲根本抓起來，保證思想工作先行於其他一切工作。」（金正日，1995：2）這段期間，金正日便提出了所謂「苦難的行軍精神」，要求人民發揮自力更生和刻苦奮鬥的精神、要在逆境中保持樂觀的態度，更重要的是要對首領報持絕對的崇拜心（平井久志，2010：69），其中最後一項後來發展成爲「紅旗精神」成爲「與指導者共

此的目的就是要確保「軍隊成爲名符其實的黨的軍隊」（金哲佑，2002：15）。

[18] 2009 年的憲法修訂中，把人民武力部由內閣抽離，使其直接受到國防委員會的管轄。

同成爲命運共同體的首領擁護精神」（轉引自康宗憲，2006：296）。自 1995 年夏天的大水患開始，「苦難的行軍」時期一直持續到 2000 年 10 月在《勞動新聞》中〈我們不會忘記〉的一篇社論中正式宣示「苦難的行軍」時期結束[19]，並在隔年發表以〈憑藉對苦難的行軍之勝利的氣勢打開邁向新世紀的進擊路〉爲題的新年共同社論，象徵這一經濟艱難時期的結束。

1997 年 7 月 8 日召開金日成主席過世三週年中央追悼大會，象徵「遺訓統治」時期的結束，並於次日由黨中央委員、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國防委員會、中央人民委員會和政務院等五個機關的共同決定書決定，北韓改採「主體年號」並以金日成誕生的 1912 年爲「主體元年」，另外訂金日成的生日 4 月 15 日爲「太陽節」。同年 10 月 8 日，黨中央委員會和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共同發表，「推舉」金正日爲朝鮮勞動黨總書記[20]，正式開啓金正日體制。1998 年 9 月召開第十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一次會議，進行修憲、內閣改組和改選國防委員會委員等重要決議。在修憲方面，廢除國家主席制，以金日成爲「永遠的國家主席」，並以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長成爲「國家元首」；廢除中央人民委員會，把政務院改稱內閣，成爲「最高主權的行政執行機關，爲全面性的國家管理機關」（第一一七條）；將國防委員會獨立出來，爲「國家主權的最高軍事指導機關，爲全面性的國防管理機關」（第一〇〇條），同時國防委員會委員長「指揮統率一切的武力，指導一切的國防事務」（第一〇二條）；另外也把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從憲法中刪去，「以人類中心爲世界觀，爲了實現人民大眾的自主性之革命思想的主體思想爲其活動的指導原則」（第三條）。這次的最高人民會議組成中，有 59.4%的議員爲新人，金日成時代的首相姜成山（Kang Song San）、副首相金達玄（Kim Dal Hyun）、黨書記徐寬熙（So Kwan Hi）和金日成的遺孀金聖愛等人全部都被排除在外，取而代之的包括洪成南（Hong Song Nam）首相、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的趙明

[19] KCNA (Oct. 3rd 2000), "Heroic Epic 'Arduous March',"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Apr. 2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0/200010/news10/03.htm#14.

[20] 值得注意的是，金正日和金日成雖然都被稱爲總書記，但金正日是「黨總書記」，而金日成一直以來都是「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這可能與金正日時期不定期召開各種黨內委員會的風格有關。

祿（Jo Myong Rok），以及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Kim Yong Nam）等人（平井久志，2011：159-166）。

第四節　「先軍體制」的發展與確立

「先軍政治」是金正日時代所提出來的主要政治指導原則，它自 1997 年首次由金永南提出以來，成爲 1998 年和 2009 年兩次修憲的主要內涵，也是金正日用來達成「強盛大國」目標的主要工具。2009 年的修憲中，正式把「先軍思想」和「主體思想」併列成爲北韓的最高指導原則，同時國防委員會委員長也在法律上成爲國家最高領導人，正式確立了「先軍體制」。有關「先軍政治」在思想方面的內容，將會於第四章第二節中有更進一步的說明，本節則僅就在政治制度方面的發展進行討論。

與「先軍」相關的最早言論出現在 1997 年 2 月金永南在金正日五十五壽辰上所發表的演講，他提到：「金正日同志所提示的，以革命軍隊爲革命主體的核心力量、爲主力軍的軍隊即是人民、即是國家、即是黨的獨創性軍重視思想，將引導我們邁向主體軍事建設偉業的勝利，開創革命武力建設的巔峰期，將我國人民強化發展成忠孝一心、無敵必勝的強大軍隊。」（轉引自平井久志，2010：88）同年 4 月總參謀長金永春（Kim Yong Chun）也提出了類似的談話。1998 年 4 月 25 日《勞動新聞》的社論〈我們的革命武力是以槍完成主體偉業的〉首次介紹了「先軍革命領導」的概念並強調金正日是這種領導模式的繼承人（平井久志，2010：88-89）。以上這些文章和談話爲金正日以國防委員會委員長身份統治北韓的提出了正當的理由，也爲日後「先軍思想」的發展鋪路。

如前面所介紹，在 1998 年 9 月的最高人民代表會議中金正日被選爲國防委員會委員長，同時也進行修憲，廢除中央人民委員會，使國防委員會的地位提高與內閣相當，並規定國防委員會爲「國家主權的最高軍事指導機關，爲全面性的國防管理機關」。表面上看起來國防委員會只是管理國家在軍事國防方面的事務，但是在憲法修正案通過的 9 月 5 日當天，憲法規定上的國家元首──最高人民會

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卻在演說中提到：

> 國防委員會委員長是，為了守護社會主義祖國的國家體制和人民的命運，並強化國家的防衛力和全方面的國力，組織並發展相關事業，率領著我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事務以領導整個國家的最高職務。（轉引自重村智計，2006：240）

表明國防委員會委員長才是事實上的國家領導人。

這段期間有幾樣變化顯示軍方地位的上升。首先是在意識型態上，政府把軍隊定位爲「完成社會主義事業的主力軍、支柱與骨幹」（金哲佑，2002：11），「以人民軍所創造出來精神和風氣爲全國勞動者的模範，推進國家建設和經濟發展」（轉引自嚴敞俊：2005：70），希望透過對「軍優先政治」和「先軍思想」的提倡來達到「強盛大國」目標（Koh, 2005），因此也強調「軍隊與人民一心同體」、「軍民一致」（金哲佑，2002：61-64），目的就是要突顯在先軍思想下以軍方爲推動社會主義支柱的重要性，並灌輸人民此觀念。其次，軍方在經濟事務上也有更大的影響力，在「把重視軍事看成第一國事」的口號下，提出了「先軍後勞」的概念，亦即軍方可以優先分配到經濟資源，在糧食危機時軍方的糧食也是優先被確保的，同時軍人也成爲許多經濟建設下的主要勞動者。此外，以軍需產業爲中心的「第二經濟」不僅佔了北韓國內經濟產出的 60％到 70％（Pinkston, 2003: 8），飛彈銷售等軍火販賣也是北韓主要的外匯來源（斎藤直樹，2009：127-128），軍方形成的「財閥」（*chaebol*）也在北韓經濟中扮演日益重要的角色（Habib, 2011: 50-51）。最後，軍方在政治決策上的影響力也提高，因爲在政治局和黨中央委員會都沒有正常召開的情況下，金正日便利用國防委員會作爲主要的決策單位，而在金正日任內的三屆國防委員會中，除了延亨默（Yon Hyong Muk）、張成澤（Chang Song Taek）、白世鳳（Paek Se Bong）和全秉浩（Jon Pyong Ho）外，其他委員均是軍方出身或具有軍事背景，而上述提到的四人中白世鳳和全秉浩均出身負責軍需產業的「第二經濟委員會」（Second Economic Committee），和軍方也有相當密切的關係。

隨著 2002 年 7 月提出的「經濟秩序改善措置」的失利，改革派的首相朴奉珠（Park Bong Ju）在 2007 年 4 月被解任由陸海運相金英逸（Kim Young Il）擔任，北韓又開始回復到社會主義計劃經濟，同時恢復黨對經濟事務的影響力（Choi, 2009: 158-160; Lankov, 2009b:58-66）。2009 年 4 月 9 日召開第十二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一次會議，進行憲法修訂，正式確立北韓的「先軍體制」：在國家最高指導原則上，確立了以「主體思想」和「先軍思想」爲國家活動的指導指針（第三條）；同時確立國防委員會委員長爲國家最高領導者（第一〇〇條），國防委員會的任務爲「爲了貫徹先軍革命路線制定國家重要政策」（第一〇九條）；此外，也在共和國主權所有者中，除了原有的勞動者、農民和勤勞知識份子外特別加入軍人（第四條），顯示軍人在國家的特殊地位。同時，北韓也把負責海外情報收集的「黨三十五號室」，以及負責對南特務人員訓練、對南滲透工作以及蒐集南韓情報的黨作戰部和人民武力部偵察局等三個局室進行統合，建立「偵察總局」直接隸屬於國防委員會之下，由金英柱上將擔任局長，把原本主要屬於朝鮮勞動黨內部的對南工作納入國防委員會管轄下（平井久志，2011：181-182；Choi & Shaw, 2010: 185）。

自此，北韓以國防委員會委員長爲國家最高領導人，以軍方作爲推動社會主義建設主力的「先軍體制」正式確立。只是必須澄清的是，雖然軍方的影響力有所上升，但是北韓仍舊如其他共產主義國家一樣，是由共產黨（即朝鮮勞動黨）控制一切的政治行爲，軍方並沒有足夠的權限可以決定一切事務，因爲北韓認爲「黨是革命的參謀部，而軍隊是用武裝保證黨實現黨的戰略目標和任務的支柱。如果軍隊拒絕黨的領導，軍隊就不問政治、不問思想，成爲烏合之眾」（金哲佑，2002：15），加上金正日在軍方刻意建立起三頭馬車式的組織架構使得軍方除了自己以外沒有最高領導人，因此軍方的整體權力和政治影響力雖然提高了，但是仍是黨的軍隊。

第五節　北韓的決策結構

由上述的歷史發展我們可以了解，北韓的政治發展由左派統一戰限線發展到滿洲派一黨獨大，到金日成確立黨國一體的一人獨裁體制，最後到金正日時期則逐漸促成「先軍體制」的確立。在本文所討論的金正日時期中，北韓分別在 1992 年、1998 年和 2009 年進行了三次的修憲，而若單從憲法的角度來看，北韓的政治決策結構是有所變化的。但是必須要注意的是，北韓是一個帶有黨國一體的一人獨裁權力結構，因此任何的國家機關乃至於黨集體領導體制的制度設計，目的都是要合理化最高領導人的一人獨裁支配體制，乃至於只是體制合理化的裝飾品（徐雲龍，1984）。因此，雖然在金正日時期經過三次的修憲，但是當金正日在金日成過世後成爲北韓最高領導人以降，其基本的決策結構並沒有太大的改變。北韓的「首領主導黨國制」體制可以以下圖來說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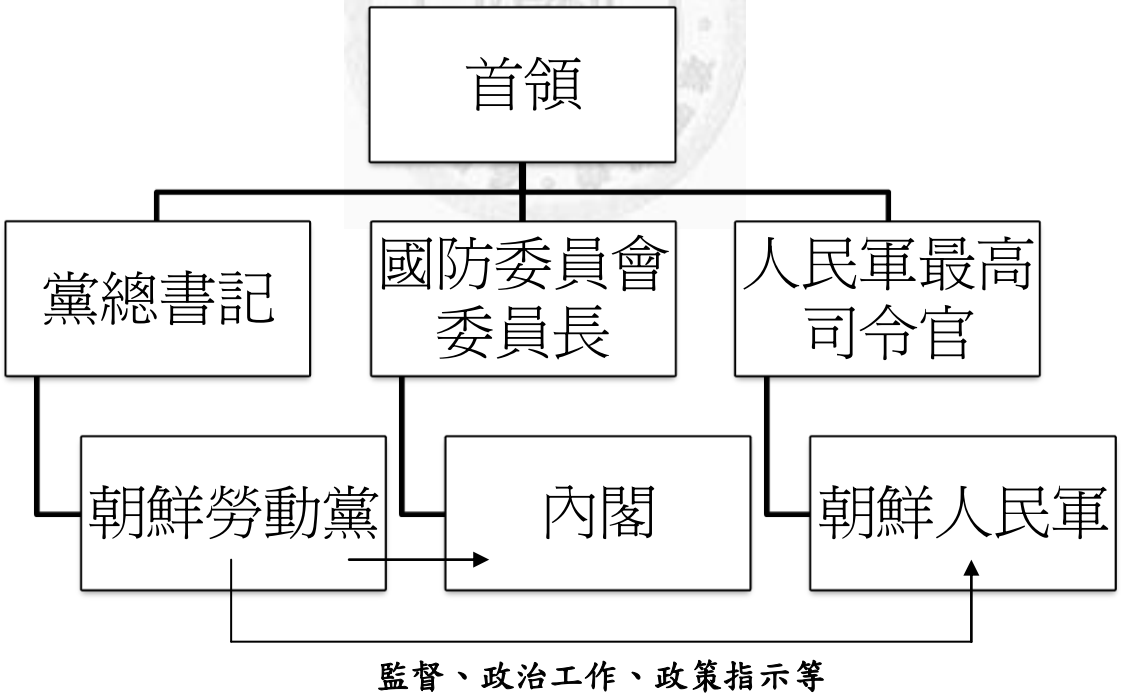


圖 3-1　北韓「首領主導黨國制」的權力結構

資料來源：K. S. Kim, 2008: 104

圖 3-1 所顯示的並不是北韓在憲法規定上的權力結構，而是實際運作上的權

力結構。其中最高領導人的「首領」身兼朝鮮勞動黨總書記、國防委員會委員長以及朝鮮人民軍總司令等黨、政、軍三方面的最高領導人，而朝鮮勞動黨的組織指導部又利用在政府機關的各級黨委員會和在朝鮮人民軍的的總政治局等黨組織，對政府與軍方進行政治工作、政策方面的建議與指示，以及在人事與政策執行方面的監督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黨組織指導部並沒有部長只有第一副部長，是由黨總書記直接控制的，因此首領透過黨組織指導部的各級黨組織可以對黨、政、軍發揮極大影響力。以下便就首領身兼這三個職務所能發揮的決策影響力進行說明。

從黨總書記來看，朝鮮勞動黨雖然有「書記室」（*Suhkishil*）的機關，但是此機關並不能發揮任何決策作用，充其量只是進行諮詢、輔助與行政方面的業務（Choi, 2009: 156），因此最終的決策權仍是掌握在總書記手上。此外，黨的其他集體決策機構如黨中央委員會、黨政治局和黨中央軍事委員會等在金正日執政初期也都沒有定期召開，故這段期中權力理所當然地集中在金正日一人身上。不過在 2010 年 9 月召開第三屆黨代表會議，進行了自 1993 年 12 月黨中央委員會總會以來首次的上述機構之人事改選，被學者認爲是黨權力的回歸（Choi & Shaw, 2010）。不過金正日仍是上述三個部門的最高領導人，因此雖然黨的集體決策結構恢復了，但並未改變金正日仍是掌控一切黨決策權力的事實。

國防委員會委員長一職雖然一直到 2009 年的修憲才成爲國家最高領導者一職，但是從金永南在 1998 年 9 月修憲完後金永南的「國防委員會委員長是……率領著我國的政治、軍事和經濟事務以領導整個國家的最高職務」談話中便可以得知，國防委員會至少自 1998 年以來就已經成爲北韓最高決策機關了，而擔任國防委員會委員長的金正日也成爲政府的最高決策者。在金正日時期初期（1998 年修憲以前），政務院（後來改稱爲內閣）之上有由國家主席所率領的中央人民委員會進行政治決策，政務院只是執行政策，不過由於中央人民委員會的委員大多身兼黨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徐雲龍，1984：206），加上金日成過世後進行「遺訓統治」，因此黨基本上壟斷了政務院的決策權。1998 年修憲廢除中央人民委員

會、政務院改稱內閣並取得部份決策權，而當時的首相洪成南也成爲北韓權力排序僅次於金正日和金永南的第三位（平井久志，2011：165），朝鮮勞動黨也把黨內負責經濟事務的部門裁撤掉時，雖然內閣在經濟事務上獲得極大的決策權，但仍必須聽命於國防委員會。在朴奉珠內閣的改革措施功效有限後，北韓於 2007 年 9 月把負責對南經濟事務的「民族經濟合作委員會」（Commission on National Economic Cooperation）收回黨統一戰線部管轄，2009 年 5 月的第十二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三次大會中選舉出長期爲黨官僚的崔永林爲首相，同年 9 月的黨代表大會中又重新在黨內設立「輕工業部」和「機械工業部」，顯示朝鮮勞動黨把原本釋出的經濟決策權再度收回，而擁有最終經濟決策權的仍舊是同時身兼黨總書記和國防委員會委員長的金正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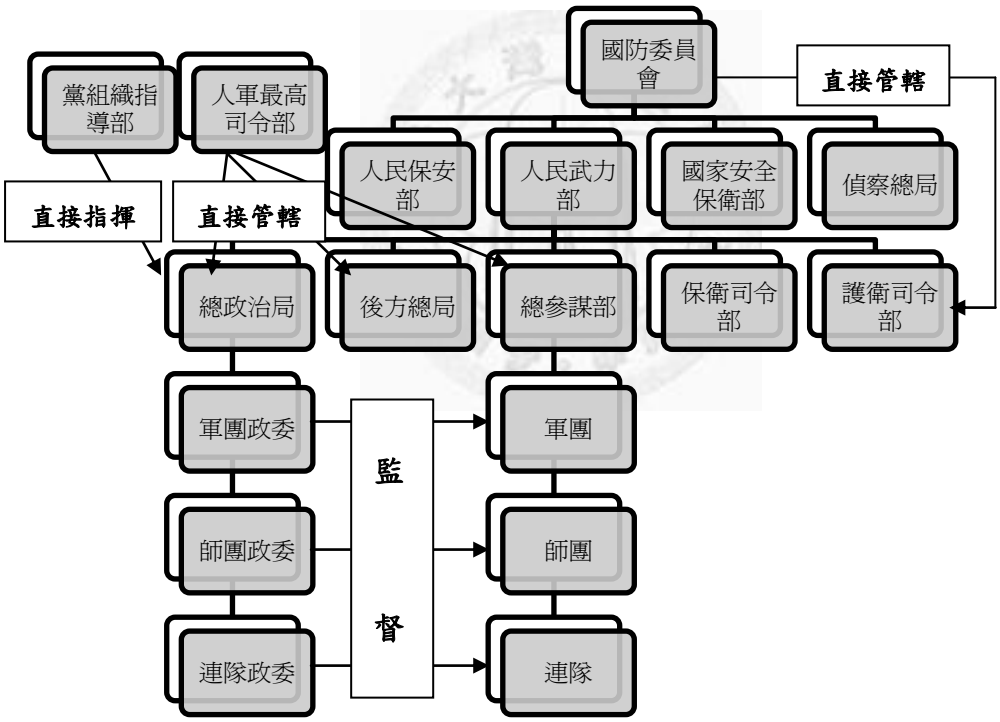


圖 3-2　北韓的軍事組織

資料來源：整理自李相哲（2011: 184-185）、中川雅彥（2001: 20）、Jeon (2000: 768-771)。

作爲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金正日同時成爲人民武力部、人民軍總參謀部以及人民軍總政治局等軍政、軍令和軍中政治統制的最高領導人。如前所述，金正日爲了更進一步確保自己對軍方的控制，不僅長期在軍中建立自己的權威、推動「先軍」政治以拉攏軍方，更重要的是在人民軍中建立三頭馬車式的體制，使得

沒有任何一個軍事將領可以在軍中建立自己的最高權威。此外，金正日也利用國家安全保衛部（即秘密警察）、偵察總局、人民武力部下的保衛司令部以及總政治局等不同的機關進行秘密監視、幹部監督、防諜、情報收集等工作，進行相互的監督與告密，而這些機關均由金正日在黨、政、軍的領導地位進行直接掌控。另外，負責軍需工業的第二經濟委員會雖然隸屬於內閣下，但是和內閣閣員不同的是，如第二經濟委員會主席白世鳳和黨軍需工業部第一副部長朱奎昌（Ju Kyu Chang）等均是國防委員會的成員，顯示軍需工業是獨立於內閣運作的，其負責的對象是身為國防委員會委員長的金正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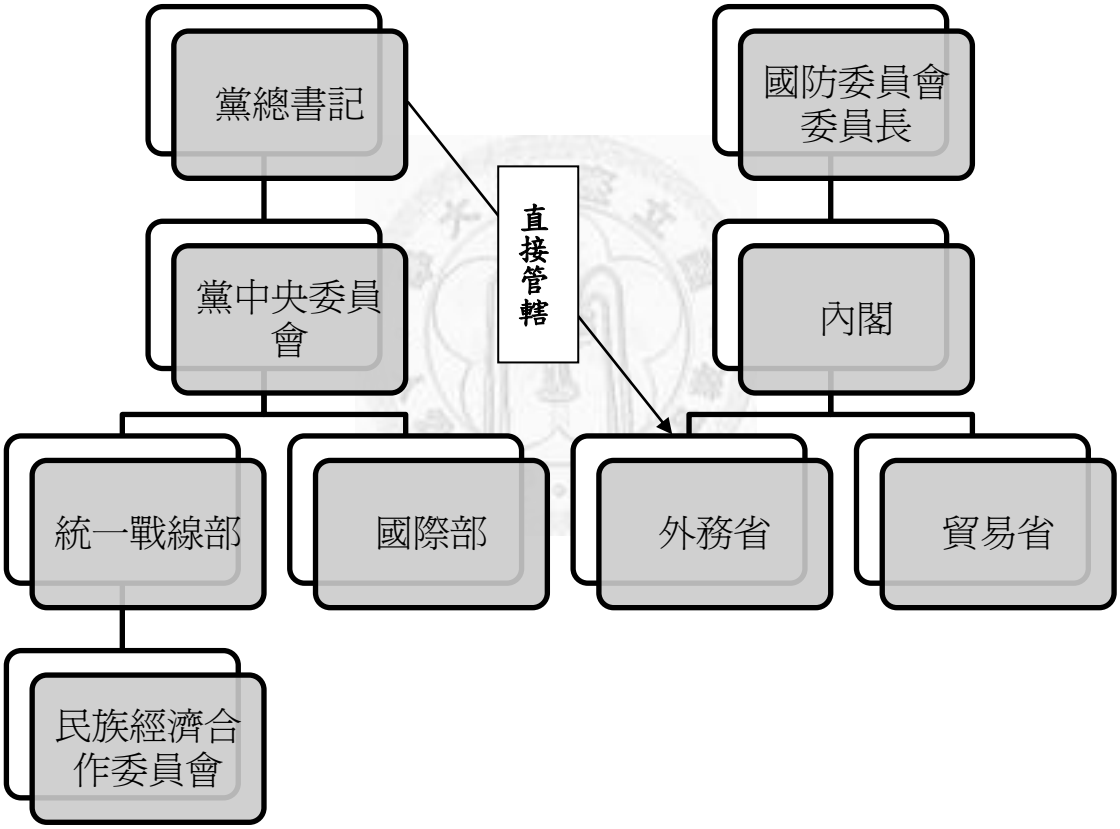


圖 3-3　北韓對外事務決策結構圖

資料來源：整理自中川雅彥（2004：21）、Chon et al. (2009: 39)和 Lim (2002)。

由前所述可以得知，北韓的黨、政、軍體制設計使得最高決策權均集中在首領，也就是金正日一人身上，這在對外事務方面也是一樣的，如圖 3-3 所示。北韓的對外關係依對象國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負責單位（平井久志，2011：239-240），其中黨國際部在冷戰時期主要負責的是與共產集團國家之間的關係，目前主要是

處理和中國之間的關係；黨統一戰線部處理的是和南韓之間的關係，因爲北韓至今仍追求赤化南韓、推動南朝鮮革命的目標，因此是由黨組織來處理和南韓之間的關係；其他大多數的國家則透過內閣下的外務省（即外交部）來進行，其中第 14 局處理對日本事務、第 16 局處理對美國事務，而第 12 局則是負責在國際上宣傳朝鮮半島統一的部門（Chon et al., 2009: 38）。此外，外務省雖然名義上隸屬於內閣之下，但是卻直接向金正日的秘書室進行匯報，而金正日也可以直接進行裁示（J. H. Lim, 2002: 92-96）。不過值得注意的是自 2009 年起，長期擔任朝美談判要角的外務省第一外務次官姜錫柱（Kang Sok Ju）升任爲副首相，同時也成爲黨政治局的一員，這是否意味著內閣對外交事務的影響力和以前相比有所提升，是未來值得注意觀察的一點。

在對外經濟事務方面，黨內並沒有專責負責對外經濟事務的處室，除了被併入黨統一戰線部負責對南經濟關係的「民族經濟合作委員會」以外。在政府方面，目前北韓內閣下的貿易省則是將原有的對外經濟委員、貿易部和對外經濟事業部等三個部門合併之後形成的（中川雅彥，2004b：21），負責對外貿易與外國進入北韓投資等相關事宜。相關對外經濟行爲的最終決策權也都在金正日的手上，特別是自 2007 年起朝鮮勞動黨逐步收回經濟權力以來，這個趨勢是日益明顯的。

由上述的分析與歸納可以發現，北韓的政治體制雖然表面上是三權分立的，但是實際上權力集中於身兼黨、政、軍領袖的首領身上，形成黨國一體一人獨裁權力結構的「首領主導黨國制」。因此，首領對於所有的對外政治、經濟與軍事事務都有最終的決策權，而任何的政策執行也都會受到黨組織與其他情報機關的監督，並把相關情報上呈給首領，形成對外決策高度集中的情形，其他的組織頂多只能扮演諮詢或輔助的角色。

第六節　小結

在分析討論了北韓的國內政治發展以及決策結構以後，筆者認爲這對北韓的對外行爲產生兩方面的影響，分別可以從對外決策高度集中與軍方影響力日益增

加兩方面的說明。

從對外決策高度集中來看，這導致影響北韓對外行爲的不是民意或任何組織的利益，而是最高領導人對於國內外環境因素的評估與裁示，才是構成北韓對外行爲的真正因素（J. H. Lim, 2002: 103）。也因此，首領與相關統治菁英如何分析與評估國內外局勢的變遷便成爲影響北韓決定其國家利益和對外行爲的重要因素，這點在第二章內已經有所討論，也將會在第四章中就意識型態的層面進行討論。也因爲這種決策的高度集中性，從北韓的角度了解其領導菁英的政治目標與思維邏輯，才有助於了解北韓對外行爲的想法，也有助於預測北韓之動向，和提出適當的應對之道（Cha, 2002; Lankov, 2003; Quinones, 2009）。

另外一個重要的影響則是軍方在對外政策上的影響力逐漸擴大。過去在金日成時代，1972 年以金日成擔任首相和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管理對外事務，1972 年後則是以國家主席的身份透過中央人民委員會和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的身份管理對外事務，可見軍方在對外事務上的影響力有限。但是自 1994 年金正日接班以來，金正日是以國防委員會委員長和黨總書記兩個身份管理對外事務的，而其中國防委員會的組成是以軍方領導人、將領和軍需工業的負責人爲主，其對對外事務的影響力自然會較金日成時期國防委員會純粹管理國防事務相比，大幅地提升。同時，黨內的軍方人士也有所增加，如 1994 年金日成最後一屆的黨政治局的十二位委員中僅三人與軍方有關係，但到了 2010 年的黨政治局的十七位委員中則有六人與軍方有關[21]，顯示軍方在黨內的影響力也有所提升。軍方在對外事務影響力的上升，代表著北韓在對外行爲上可能傾向於採取更爲挑釁、衝突傾向或是戰爭邊緣的作爲，也使得國內的飛彈和核武計劃更傾向於繼續進行。而在「先軍體制」的旗幟下，不僅合理化軍方對於國內外決策影響力的增加，更在軍人成爲推動社會主義革命的主力軍的思考邏輯下，將經濟資源優先分配給軍方、

[21] 1994 年的政治局中，與軍方相關的分別是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吳振宇、人民軍總參謀長崔光（Choi Kwang）和時任黨軍需工業部部長的全秉浩（Jon Pyong Ho）。2010 年的政治局中，除了仍留任的全秉浩外，尚有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趙明祿、人民軍總參謀長李英鎬（Ri Yong Ho）、人民武力部部長金永春、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李勇武（Ri Yong Mu）和人民保安部長朱霜成（Chu Sang Song）。

採取「先軍後勞」的策略等壓縮到北韓的經濟發展的作爲，而同時進行的飛彈與核武發展更使北韓受到國際社會進一步的譴責與制裁，不僅無法吸引到外國投資和拓展國際貿易，也使得北韓難以和美國、日本等主要國家建立正式邦交關係。這對北韓未來的對外關係發展會產生何種影響，仍是必須關注的焦點。

總而言之，經過自北韓建國以來的政治整肅、偶像化運動、唯一思想體系的確立、繼承體制的確立，以及先軍體制的確立等政治發展下，北韓成爲以首領爲中心的黨國一體一人獨裁支配體制，使得最高領導人在所有的國內外事務上都擁有最高的決策權。同時，在金正日時代下，由於提倡「軍優先政治」和「先軍政治」等重視軍方的政治口號，軍方在北韓國內外事務決策過程中的影響力也提高，國防安全事務也優先於經濟發展。在這種政治制度下，北韓的對外行爲產生了由於對外行爲決策高度集中，導致最高領導人對國內外環境因素的評估與裁示爲決定北韓對外行爲的主要因素，以及軍方在對外政策影響力的擴大等兩方面的影響。

在這種特殊的決策結構下，了解北韓最高領導人，乃至於領導菁英的想法就成爲很重要的分析依據。因爲北韓領導層如何去評估國內外環境與他們如何認知國內外環境是息息相關的，而這與他們本身的價值觀、世界觀和意識型態等因素有直接的關係。在第二章中，筆者透過對歷史因素的分析，提供了上述因素的部份解釋，但影響北韓更爲重要的是「主體思想」與「先軍政治」這兩個官方意識型態。「主體思想」與「先軍政治」和歷史因素形成的世界觀進行結合，才能真正完整地勾勒出北韓領導層對國際政治與國際經濟的看法，而此乃筆者欲在下一章所討論的。

第四章　影響北韓對外行為的意識型態因素

北韓雖然在表面上是一個共產主義國家，但是卻自 1998 年修憲以來把「馬列主義」、「社會主義」等字眼從憲法中刪除了，取而代之的是「主體思想」、「先軍政治」等北韓獨創的思想體系，只在政治制度保留史達林式的黨國一體個人獨裁體制，以及在經濟上維持農業集體化、產業國有化與民生物資和糧食的「公共配給體系」等表面上的制度。在許多學者與其他共產國家的進行比較研究後發現，北韓的思想體系是一種結合史達林主義（Stalinism）、毛主義（Maoism）、民族主義以及朝鮮傳統儒家文化後的產物（Cheong, 2000），是一種結合極右民族主義和極左史達林主義所形成的思想體系（Chen & Lee, 2007）。

也因爲北韓在意識型態方面的特殊性，因此其對外行爲與一般所認知的共產主義國家有所不同，也影響到北韓在後冷戰時期的實際行爲，故筆者認爲對這方面的深入了解是有助於分析與預測北韓的對外行爲。本章主要分三大部份進行討論：前兩節分別討論金日成所提出的「主體思想」和金正日提出的「先軍政治」，均從個別概念的起源與背景開始討論起，並論及其發展與各自對北韓對外行爲和外交政策的影響；第三節則根據上述兩個思想體系，特別挑出有關經濟發展與對外經濟行爲的部份進行說明，由於這方面的思想體系自 1980 年代以來有較大幅度的改變，對北韓的對外經濟行爲也有很大的影響，這也是爲何北韓至今仍採取「不上不下」的經濟開放政策的原因，故進一步的探討有助於對北韓對外經濟行爲與政策制訂的進一步了解；最後一節則從這三方面的意識型態因素來看北韓所謂的「自主政治」，藉此闡明思想層次對北韓對外行爲的影響。

第一節　「主體思想」

壹、「主體」概念的提出與確立

如在第二章第一節中曾介紹過的，北韓政權在建立初期受到蘇聯影響相當大，韓戰時也獲得中、蘇方面的軍事援助，國內也有「蘇聯派」和「延安派」等具外國背景的派系在朝鮮共產黨內活動，展開與金日成的「滿洲派」間的權力鬥爭。金日成先在 1955 年 4 月的演說中公然批評蘇聯派和延安派的流派主義，主張強化黨的思想教育活動，並強調為了在馬列主義的學習上能適用於現實，因此必須努力學習本國的歷史（鐸木昌之，1992：41）。同年 12 月金日成在著名的「關於為了確立主體性而一掃思想活動中的教條主義與形式主義」演講中認為「馬列主義不是教條，是行動的指南、是具有創造性的學說」，認為「不學習馬列主義的真理而只是一味地追求其形式，是有百害而無一利的」，因此強調要建立朝鮮革命的主體性。不過，這並不意味著就完全不學習外國的經驗，「學習的目的是要把蘇聯等社會主義國家的先進經驗運用在朝鮮革命上」，因此透過「掌握研究兄弟黨（指其國家的共產黨）的經驗掌握其本質，將這些經驗具現實性地正確適用在我國上，了解什麼經驗是有價值的、什麼經驗是沒有價值的，因為如果只是一味地模仿的話將只會導致失敗，不僅會傷害我們的事業，也會使兄弟黨寶貴的經驗招致不良的結果」，所以「必須了解朝鮮的歷史、朝鮮的地理，和朝鮮人民的風俗」才能正確地掌握現實狀況與需求，正確地運用外國的社會主義經驗與理論（金日成，1955）。在這個時期，金日成所提出的「主體」表面上雖然是極度強調要依據北韓自己的國內狀況進行屬於自己的朝鮮社會主義革命，但是重點是藉此和蘇聯派與延安派進行社會鬥爭，批評他們在不了解國內現實的情況下就一味地引用外國經驗。

隨著共產主義陣營中蘇聯和中國路線的日益分歧，北韓為了同時與兩國之間保持良好關係，開始在兩國之間採取「中立」路線（徐大肅，1996：91-125；Koh, 1969），也使得「主體」的概念有了進一步在對外政策上的意義。1965 年 4 月 14

日，金日成在印尼的阿里•阿恰姆社會科學院（Ali Archam Social Science Institute）發表「有關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社會主義建設與南朝鮮革命」之演講，正式提出「思想主體、政治自主、經濟自立、國防自衛」的建立主體性之具體政策方向。他認爲所謂建立主體性是指：

> 堅持在革命與建設上遇到的一切問題都單獨地、根據本國實情地、以自己的力量來解決問題之原則。這是反對教條主義，將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國際革命運動同自己國家的歷史條件和民族特性相調合適用的一種反映現實的創造性立場。這是發揮捨棄對他人的依賴心的自力更生精神，自己的問題自己解決的自主立場。（金日成，1965）

而若不先在政治思想分面確立此主體性的話會「無法發揮創意，無法看清楚事情的是非，最終只會盲從於他人」。這種現象所產生的修正主義、教條主義或是左傾、右傾機會主義都最終會導致革命與建設的失敗（金日成，1965）。

1966 年 8 月 12 日，《勞動新聞》刊了一篇名爲〈擁護自主性〉的社論，反映了朝鮮勞動黨的基本立場。社論認爲「我們在建立與實踐自己的路線和政策時，是絕對不可能忽視我國民族與歷史上的特殊性。由於各國各有不同的條件與環境，因此遂行革命與建設的方法也不會相同」，因此「有必要了解自己國家的優秀傳統，也有必要了解現況。若不了解自己國家的過去與現況的話，就無法產生具自主精神的愛國民和民族光榮感」，藉此強調民族主義和愛國主義與社會主義中的國際主義是不相衝突的。社論進一步表示「共產黨和其他勞動階級政黨之間的關係應該是，完全平等、自主、相互尊重、不干涉內政，以及同志般地相互援助的。大國主義只會招致兄弟黨之間的關係惡化。」不過，自主性的原則並不表示會走向孤立主義，也不否定在反帝國主義鬥爭上的國際合作，也不認爲反美帝國主義之鬥爭和反修正主義路線間有所矛盾（轉引自高峻石，1993：211-213）。

1967 年 12 月 16 日在第四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一次大會中，金日成以首相身份進行政綱的演說中提到「共和國政府爲了使我黨主體思想在所有方面都能具體實現，將徹底貫徹能強固我國政治自主性、能強化保障我們民族完全統一獨立與

繁容的自立民族經濟基礎、能強化固守祖國安全國防力的自主、自立、自衛路線」，正式把「主體思想」訂爲國家政策方向。其中強調：

> 反對事大主義與教條主義，以我國的歷史條件和民族特性為基礎，具創造性地適用馬列主義的普遍性真理和其他國家的經驗；放棄對外國的依賴心，發揮自力更生的精神，懷抱自己的問題終究是自己的責任之心態自主地解決問題。（金日成，1967）

在對外關係方面則強調「所有民族都是平等的，都有自己決定自己命運的神聖民族自決權利」，希望：

> 完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原則為基礎，朝向和外國建立政治與經濟關係的方向努力。不論是反帝國主義鬥爭，或是反對左傾、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都是以自己單獨的判斷與信念為基礎，根據我們的實際情況採行的，絕對不允許任何人對我民族權利與尊嚴的踐踏與褻瀆。（金日成，1967）

由此可見，原本是用以批評蘇聯派和延安派政治勢力的教條主義與形式主義，藉此削弱他們政治權力正當性的「主體」概念在經過國內外情勢的變遷以後，成爲一個主導北韓政策方向的最高主導原則之「主體思想」。其發展從原本單純地追求以自力更生精神和本國實際情況確立具有主體性的朝鮮社會主義革命，演變至「思想主體、政治自主、經濟自立、國防自衛」之具體政策方向，到後來在對外關係上尋求完全平等、相互尊重、不干涉內政和反對大國主義等內涵。

貳、「主體思想」的金日成主義化

原本只是政策方向的「主體」概念是如何發展成爲具領袖崇拜和全方面意識型態的「主體思想」呢？這與金正日在黨組織中的活動有密切的關係。如前所述，金正日透過獨佔對主體思想的詮釋權、推動「全社會金日成主義化」，以及加強對金日成的偶像化崇拜等手段，加強金日成的唯一領導體系和主體思想的唯一思想體系，透過加強金日成的權威和地位以鞏固和拓展自己的政治權力。在第三章

中已經就當時在政治方面的發展進行說明，本段落則主要針對思想方面的變化進行闡述。

早在 1966 年前後在「主體」的概念下已經出現「首領論」：認爲唯有在賢明首領的領導下人民大眾才能成爲革命建設的真正主人，首領組織完全服從首領的政黨來領導人民大眾的革命鬥爭，透過促使人民大眾對於自己階級性和民族性的覺醒，闡明鬥爭方向與方法，組織人民大眾參與革命活動（鐸木昌之，1992：58）。故當 1970 年 11 月在黨綱中規定「黨活動的指導方針是馬列主義及配合我國現實由偉大的金日成同志適用馬列主義創造發明的主體思想」（轉引自鐸木昌之，1992：64），以金日成所提出的主體思想作爲指導人民大眾革命鬥爭方向與方法的理論依據已然確立，而其他政治菁英也不得提出其他政治方向挑戰主體思想。在金正日於 1974 年把主體思想和金日成思想進行連結，並提出「確立黨唯一思想體系十大原則」確立金日成的最高地位後，金正日也發展出正當化首領一人獨裁的「革命首領論」：認爲所有組織機關之形成唯一的目的是要保障首領的唯一領導，而首領是所有黨組織意志的體現者，其革命思想是全黨唯一的組織意志，人民大眾若缺乏首領的領導是無法成爲社會及歷史的主人，因此人民要世代相承且永遠服膺於首領的革命傳統之下，直到人民大眾成爲真正的主人爲止（金正日，1981）。而此觀念後來發展成爲進一步一體化「首領─黨─人民大眾」之三者關係的「社會政治生命體」，將於之後進行詳述。

除了藉由提高金日成的權威與地位確立「主體思想」的高度之外，金正日也利用他在黨內的地位壟斷了對主體思想的詮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他在 1982 年 3 月 31 日所發表的〈關於主體思想〉一文。在該篇論文中，金正指出主體思想是以人爲中心的世界觀，認爲「人是一切的主人，人決定一切」，「人是具有自主性、創造性和意識性的社會存在」（金正日，2002a：7-8），並進一步認爲「世界的一切事物，只有爲人服務，才有價值。」（金正日，2002a：10）主體思想也脫離了傳統馬克思主義的思維，認爲人民群眾才是社會歷史的主體，而人類的歷史是人民群眾爲了實現自主性而鬥爭的歷史，所要爭取的是在社會政治上的自主性，

而作爲其後盾是自主的思想意識（金正日，2002a：12-27）。具體而言，主體思想追求三方面的目標：堅持自主的立場、運用創造性方法達成社會主義革命，以及優先進行思想與政治工作。在堅持自主的立場方面，必須先透過熟悉本國事物、高度的民族自尊心和革命自豪感、發展民族文化與提高群眾文化技術水平、反對事大主義等手段，以「在思想上樹立主體」，並以此建立黨的唯一思想體系；其次要「在政治上堅持自主性」，建立屬於人民的政權，對內自主地制定並執行一切的路線與政策，對外則要能行使完全的自主權與平等權，認爲所有國家和民族都是平等自主的，並堅持反帝國主義、支持殖民地民族解放和國際工人運動；爲了達成自主的目標，也必須「在經濟上自立」以確立社會生活的物質基礎，要建立不附屬於他人的自立民族經濟，堅持自力更生的經濟建設原則，以重工業爲中心綜合地發展經濟，並藉此培養民族技術人材，努力促進國民經濟的主體化、現代化和科學化；最後，爲了確保國家的政治獨立和經濟自立，必須「在國防上自衛」，如此才可以以自己的力量保衛自己的國家，擊退帝國主義者的侵略戰爭，而具體的作爲就是要落實金日成所提出的「四大軍事路線」政策（金正日，2002a：27-40）。在運用創造性方法達成社會主義革命方面，金正日認爲要依靠人民群眾，因爲「人民群眾比誰都熟悉實際情況，而且具有豐富的經驗。只有把廣大群眾的意志和要求加以集中、加以總結，才能制定出符合人民的意志和利益的正確的路線和方針」；爲此，要透過思想把人民團結起來發動群眾性運動，依照現實的情況創造性地解決問題，不能盲目地仿傚他人的經驗和理論（金正日，2002a：42-45）。而爲了要使群眾性運動能夠順利發生，必須優先進行思想與政治工作，以正確的革命觀和世界觀對人民進行思想改造，透過說服與教育的方法進行政治工作（金正日，2002a：45-52），因爲唯有提高人民群眾的思想覺悟才能發動他們投身於社會主義鬥爭與建設當中（金正日，1995：2-11）。

參、「社會政治生命體」論

「社會政治生命體」是將「主體思想」、「首領論」與「唯一思想／領導體系」三者進行結合的思想論述，其根本的核心概念是要建立一個以首領爲中心，將首領、黨和人民大眾三者整合成爲一個有機體，以推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意識型態。此論述的核心概念是對「肉體生命」與「政治生命」之間的區別：「肉體生命」也就我們的性命，是由父母所授予的；「政治生命」按金日成的用語則是「黨生活」，也就是黨員必須尊重黨的決定，執行黨交付的任務，這不僅限於黨員，也包括所有的勞動者，而「政治生命」的最終目的是要追求主體思想中的政治社會自主性（鐸木昌之，1992：129-130）。其中，人的「政治生命」是比他的「肉體生命」還要重要的，因爲「人類是具有自主性的生命，人類在社會上若失去其自主性的話，那就和動物沒有兩樣」（金日成，1972a），故若喪失追求政治社會自主性的「政治生命」，就喪失人作爲歷史社會主人的意義。也由於「政治生命」比「肉體生命」還重要，因此賦予人民大眾「政治生命」的首領比賦予我們「肉體生命」的父母還要重要，而「政治生命」的持續是必須透過參與黨生活和在黨的組織、紀律與秩序下活動才可持續下去的（鐸木昌之，1992：133-134）。

延續這種觀念，金正日在於 1986 年 7 月的「關於主體思想教育的若干問題」演講中，以前述「政治生命」論爲基礎，正式完整地闡述了「社會政治生命體」的概念。他認爲首領是形成「社會政治生命體」的最高頭腦，意即他是「統一指揮此生命體生命活動的中心」，換言之他必須要分析和總合人民大眾對於自主性的要求和利害關係，並利用黨等其他組織協助人民大眾實現此要求。黨是「社會政治生命體」的神經中樞，它主要是以首領爲中心，在組織上和思想上團結人民大眾的核心部隊，它不僅要貫徹首領所提示的思想、路線與政策，也將人民大眾組織與動員起來，同時也利用其組織整合集團成員內的要求，呈報給首領。人民大眾則是推動革命與建設的主人，但是他們在沒有首領和黨的領導下是無法發揮其歷史角色與能力的，因此有賴首領的指示以及黨組織的動員；不過同時，如果

首領與人民大眾分離的話，也只不過是無法指揮革命建設鬥爭的個人而已。這三者之間的社會關係不是透過服從的從屬性關係產生的，而是透過革命義理與同志愛所達成的，兩者是以自由與平等前提且不論合理與否，以追隨自身首領、部屬所屬集團之最大利益爲原則的集體主義社會觀，如此「可以根絕人與人之間的壓搾，也可以保障人與人之間的平等狀況」，使人的自主性和創意可以被高度地發揮。這種革命義理與同志愛的最高表現是對於首領的效忠，因爲他是「社會政治生命體」的最高頭腦，也是集團生命的代表，故對首領的效忠與同志愛應該是無條件的，並認爲把對首領的效忠視爲「第一生命」的舉動，是主體型共產主義革命家的基本品格。值得注意的是，雖然「社會政治生命體」的論述是要強調人民對於首領和黨的絕對效忠，但是並不把三者看成分立的個體，而是「三位一體」的有機體，因爲不僅人民沒有首領無法發揮其歷史意義上的力量，首領與人民分離也無法指揮人民的革命鬥爭活動，黨在與首領和人民分離的話也就喪失其動員、組織與資訊傳遞的意義，因此「對首領的效忠」、「對黨的效忠」和「對人民大眾的效忠」都是相當重要的，只是以對首領的效忠爲最高表現（金正日，1986）。

透過「社會政治生命體」的論述，金正日建立了一套以「主體思想」爲中心的社會關係論述，合理化北韓的「首領主導黨國制」，也把對於首領和黨的指示之服從與忠誠內化成爲道德性的內在規範。如此一來，便形成首領藉由黨組織利用主體思想的革命思想與政策方向指揮人民大眾推動朝鮮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的社會關係，其中首領和人民之間的關係不只是基於同志愛和革命義理，更是「政治生命」的賦予者，因此對於首領的效忠必須是絕對且無條件的。

第二節　「先軍政治」

雖然北韓在官方上表示先軍政治的起源是「金日成將軍以其非凡的睿智和突出的政治能力，在 1960 年代後期開始推行先軍政治，並於 1990 年代中期達到全面性的實現」（轉引自宮田敦司，2007：103），不過大多學者仍認爲「先軍政治」是在金正日時期所發展出來的政治理念。有關「先軍政治」的內容也眾說紛紜：

有學者認爲這是具有高度抽象性且缺乏具體政策內容的統治手段，未來勢必對其進行進一步詮釋與修正（宮田敦司，2007）；也有學者認爲「先軍政治」已經達成其任務性在經濟復甦、鞏固金正日權力和控制社會的目標，未來會往抽象化方向前進（嚴敞俊，2005）；更有學者認爲「先軍政治」不是一個過渡時期的統治手段而是一個長期的政治戰略，不論在國內政治和對外政治方面都會發揮其作用（J. C. Lim, 2009: 150-155）。因此，本節將透過對「先軍政治」之發展與基本概念的介紹，勾勒出「先軍政治」真正的內涵，以利於分析其在北韓對外行爲上的影響。

金正日對於軍方地位的提升最早始於 1995 年元旦對第 214 中隊的視察，並在短時間內晉陞了許多軍事將領和對軍事單位進行密集的「現地指導」，也表達了他對地方和企業黨幹部的不滿，希望以「革命軍人精神」來武裝黨幹部來渡過當時的經濟危機（J. C. Lim, 2009: 151-152）。此時，金正日已經思考以軍隊的組織體系來取代或補足因爲經濟危機所導致的地方黨機關執行力缺乏和組織力不足的問題，同時也希望利用軍隊的精神與紀律來約束黨幹部。1997 年 2 月金永南在金正日五十五壽辰的演講中提到：「金正日同志所提示的，以革命軍隊爲革命主體的核心力量、爲主力軍的軍隊即是人民、即是國家、即是黨的獨創性軍重視思想，將引導我們邁向主體軍事建設偉業的勝利，開創革命武力建設的巔峰期，將我國人民強化發展成忠孝一心、無敵必勝的強大軍隊。」（轉引自平井久志，2010：88）代表著金正日的以軍事組織補強黨組織的政策主張已經在運作了。

1997 年 12 月 12 日，《勞動新聞》在〈以將軍的實力爲基礎所展現的傑出表現正是先軍政治的實力。這是作爲革命支柱、守護主體偉業的軍隊的實力〉的社論中首次提出「先軍政治」這個概念（嚴敞俊，2005：68；宮田敦司，2007：104）。1998 年 4 月 25 日在〈以作爲革命武力的槍完全主體偉業〉的社論中將金日成的建軍、建黨和建國運動稱之爲「先軍革命領導」，並提到「偉大首領（指金日成）的先軍革命領導之歷史爲最高司令官金正日同志所繼承與發揚光大」（轉引自平井久志，2010：89-90），強調金正日所提出的「軍重視思想」是對金日成領導的

繼承。同年 10 月 10 日在〈追隨偉大黨的領導完成發揚主體革命新時代〉社論中提到「為了建設主體的強盛大國的我黨鬥爭，為金正日同志所獨創的先軍革命領導所點綴。先軍革命領導乃是不知何為不可能、只為取得勝利而誕生的偉大的金正日政治的根本特徵」（轉引自平井久志，2010：90）；20 日，朝鮮中央電台（Korean Central Broadcasting Station）則以「重視、優先看待軍隊，在強化軍力上注入精力，此為金正日同志的政治特徵」（轉引自宮田敦司，2007：104）為內容，向北韓人民介紹「先軍政治」的概念。1999 年 6 月 16 日在《勞動新聞》和《勤勞者》（*Kulloja*）中共同刊出一篇名為〈我黨先軍政治必勝不敗〉的文章，表示金正日的「先軍政治是我們的基本政治方式，是引導我們取得革命勝利的萬能寶劍」，並強調「給予國防事務優先地位不是只是戰術性手段，而是與革命命運與未來發展有密切相關的戰略議題。」[1]

2003 年 1 月 29 日，金正日在題為「先軍革命路線是我們時代偉大的革命路線，是朝鮮革命百戰百勝的旗幟」的演講中正式為「先軍政治」的諸多概念進行定調，將其提升到「先軍思想」的層次。金正日把「先軍政治」定義為

> 把軍事當作第一國事，藉由人民軍的革命氣質與戰鬥力，達到守護祖國、革命與社會主義，以及全方位強力推行社會主義建設的革命指導方式、社會主義政治方式。先軍政治即是以軍事為第一要務，以軍隊作為革命的核心部隊、主力部隊，以強化軍隊為基本原則。（金正日，2003）

並認為這是「正確地反映時代與革命要求的具科學性的革命路線與政治方法。」在為何要以軍方作為推動社會主義建設的主力部隊一事上，金正日認為：

> 人民軍誓死擁護黨和領袖，誓死貫徹黨的政策，把自己的生命奉獻給黨的偉業和社會主義偉業。人民軍的將領與士兵們……用槍守護祖國和革命的先鋒部隊，比誰都還要熱愛祖國、比誰都還要強烈擁護社會主義精神、比誰都還要對帝國主義和階級懷有同仇敵愾的心態，並為此戰鬥到底……人

[1] KCNA (Jun. 16th, 1999), "WPK's policy of giving priority to army is invincible,"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l. 4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1999/9906/news06/16.htm#1.

民軍是社會所有團體中，集團主義精神最強，組織性、規律性和團結力也最強的團體。全軍以最高司令官為中心而一心同體，遵守最高司令官的命令和指示行動，所有的生活與活動都奉軍事規範為基準。（金正日，2003）

換言之，正是這種高度的組織性和紀律要求使得金正日選擇以軍方取代經濟危機後鬆散的黨組織。在和「主體思想」的關係上，金正日則認爲「我黨先軍政治，是能夠使主體思想具體化的最強力且最具尊嚴的自主政治」，因爲：

先軍政治是指，在面對到當今複雜且嚴峻的情勢下，高舉自主之旗，以我們的思想和信念作為革命建設的基礎，根據我國的實情和朝鮮革命的利益，堂堂正正地以我們的方法推動革命建設……由於先軍政治，我們可以確保自主性……我黨先軍政治是徹頭徹尾為人民的政治，為推動擁護保障朝鮮人民的自主權利和根本利益，必須獲得全人民的支持和忠實地遵守。（金正日，2003）

最後，金正日也表示「黨的指導就是人民軍的生命」，強調雖然金正日透過「先軍政治」修補黨組織效力之不彰，但是黨優於軍的根本原則並未受到改變。（金正日，2003）

綜合來看，先軍政治在根本的概念上是指：

一種在軍事領先的原則下，解決革命和建設中出現的一切問題，以軍隊為革命支柱推進整個社會主義事業的政治……意味著把軍事作為第一國事……在制定路線和政策時要把軍事放在首位……把革命軍隊看成完成社會主義事業的主力軍、支柱和骨幹。（金哲佑，2002：11）

也就是希望透過強化軍力來解決社會主義建設時所發生的問題，並以軍隊爲革命的主力軍來推動社會主義革命。北韓認爲「先軍政治」是一種爲人民、保證自主和維護和平的政治方式，它可以保衛社會主義的必勝、推動「強盛大國」建設、引向祖國統一，並主導新世紀的正義（金哲佑，2002：18-38）。但是重視軍事不代表對思想工作上面的退讓，先軍政治要求「以建設思想堅定的軍隊作爲建設軍隊的根本原則」（金哲佑，2002：41），因爲「戰爭中武器固然重要，但操縱它的

主人乃是軍人，決定軍隊威力和戰爭勝敗的不是武器而是人，只有軍人用革命思想牢固地武裝起來……才能打敗任何敵人」（金哲佑，2002：47），而其所重視的思想包括「主體思想」、「軍隊即是人民、即是國家、即是黨」的「槍隊哲學」，以及反帝國主義鬥爭精神（嚴敞俊，2005：106-108）。經濟方面，提出了「確立軍人爲革命的支柱，以其威力飛躍地推進經濟建設」（轉引自康宗憲，2006：298）的口號，因爲北韓當局認爲：

> 國防工業可以說是先端科學與技術的總合，若發展國防工業的話，以重工業為基礎此部門之最新科學技術將會促進重工業的發展。重工業的發展也就代表著，包括輕工業和農業等，經濟全方面發展之保障。（勞働新聞，2006）

此外，也提出「先軍後勞」的概念以合理化軍方優先分配到經濟資源（平井久志，2010：90-94；Jeung, 2007: 17-18）。

因此，從以上北韓官方的論述來看，「先軍政治」並不是要針對任何單一國家進行進一步的軍事威脅行動政治思維，而是希望透過強化軍方力量來確保自己的防禦能力，以強化對可能的外來侵略之防守，也藉此加強對國內社會的統治力。經濟方面，除了希望藉由對軍需產業的發展推動其他方面的經濟發展之外，也把軍隊投入農業和基礎建設當中（J. C. Lim, 2009:151），「把闖過難關的重任讓人民軍承擔起來」（金哲佑，2002：68），以往建立「強盛大國」目標前進（Koh, 2005）。而在黨和軍方的關係上，也並沒有出現軍隊可以專斷行事或是軍隊凌駕於黨的情形，軍方充其量只是填補了原有黨組織在決策和執行上的不足，並沒有產生和黨相左的利益與價值（S. C. Kim, 2006: 97-98）。而從 2009 年修憲後把「先軍思想」與「主體思想」併列爲北韓最高指導原則後，北韓當局已經不把「先軍政治」當作過渡時期的緊急應變手段了，而是希望透過在思想體系的精緻化、加強其與「主體思想」的連結，以及在具體政治作爲上的實踐，將其塑造成金正日繼承金日成所提出來的新政治指導原則。因此，筆者認爲不論是在金正日時期或是金正恩時

期的北韓，「先軍政治」是必須與「主體思想」等量齊觀的意識型態，如此才可以更爲精確地了解北韓的對外行爲。

第三節　經濟思維的轉變

北韓在後冷戰時代展現出相當大的不安全感，除了在國際政治上社會主義的集團的瓦解、南韓國際地位的提升，軍事上蘇聯（及後來的俄國）與中國不再跟北韓維持軍事同盟的關係之外，在經濟方面北韓也陷入了「三難、三低、三惡」[2]（李明，1998：124-125）的經濟困境，加上南韓經濟實力的快速提升，更加深了北韓在經濟領域上的不安全感。會導致這樣子的經濟困境除了因爲北韓在冷戰時期北韓高度依賴社會主義國家集團的援助與市場之外，也由於在「主體思想」的指南下，北韓推動「自立民族經濟建設路線」以達到「經濟自立」的政策目標，因此建立了一個脫離國際分工貿易體系的經濟體制，使得北韓在經濟領域的技術、思想概念、管理模式等均未能與世界經濟體系同步，而無法在國際經濟體系中保有競爭力。自 1980 年代以降，北韓在經濟上面先後發展了「新思考」和「實利主義」等理論概念，先從理論方面正當化北韓推動經濟「重建」（*kaegon*）與「改善」[3]（*kaeson*）等措施，以爲制訂吸引外資的相關法令和建立經濟特區等經濟改革行爲進行鋪路。有鑑於此，筆者認爲對北韓經濟思想概念的了解與釐清有著於了解北韓的「經濟觀」，也有助於了解北韓如何看待國際貿易、國際經濟合作，更有助於了解對外經濟在北韓的對外行爲中扮演何種角色。

---

[2] 「三難、三低、三惡」指的分別是有形物質上的外匯難、食糧難、物品難，精神與科技層次的國際競爭力低、人民勞動意願低、技術水準低，以及製成品粗劣、生活環境惡化、機器設備的老舊破敗之結果。

[3] 北韓方面對於任何措施的改變均不稱「改革」而稱爲「改善」，這是因爲北韓認爲「改革」是代表過去所採取的措施是不好的因此必須改變，這代表對金日成和金正日的政治指示、思想之否定，是違反唯一領導體系和唯一思想體系的，也破壞北韓官方對最高領導人所塑造的睿智、永遠正確的形象。「改善」一詞則不具有否定過去的意味，而是在過去的理論或行爲基礎上進行「改良」或「調整」（modify），並未違背過去的政治指示和思想，是配合時代環境的變遷而進行的變革，這反而符合「主體思想」中「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工作」的原則（金正日，2002a：43-45）。

壹、「自立民族經濟」

金日成早在建國初期就以「自主經濟」提出不可以在經濟方面依賴他人的看法，他在 1947 年 2 月時表示：「建設民主主義國家就代表我們必須確立我們自己民族的自主經濟，若不確立自主經濟基礎就無法發展人民經濟、無法提升人民經濟，倘若無法做到這點，我們不僅無法獨立自主、不僅無法建國，更無法在世上生存。」（轉引自中川雅彥，2004a：4）後來隨著「主體」概念的發展，「自主經濟」也就發展成爲「自立民族經濟」的經濟指導原則。

自立民族經濟是指「建立不附屬於別人，而用自己的腿走路的經濟，建立爲本國人民服務，靠本國資源和本國人民的力量來發展的經濟」（金正日，2002a：33），而其最高的指導原則是所謂的「自力更生」（*charyukgaengsaeng*）。自力更生是指「共產主義者要用自己的力量將革命進行到底的革命精神和鬥爭原則」（金正日，2002a：34），在經濟上「並不意味著根本不使用別人的機器，反對向他人學習及不接受他人的援助，而是指將用處較多且重要的原料由本身生產使用，而將沒有生產的或較少使用的副產品，經由對外貿易來解決」（轉引自朱松柏，1995：52）。其意義在於把人民從依賴別人的思想中解放出來以充份發揮他們的自主性和創造性，另外就是希望藉此最大限度地調動本國人力和物力資源以保證經濟建設的高速度（沈儀琳編，1983：51）。

根據上述的原則，「自立民族經濟」大致上可以分爲以下五點內容：一、根據本國的技術與資源發展經濟；二、優先投資重工業；三、目標朝向多方面的發展；四、裝備現代技術；五、在對外經濟關係方面，以「互通有無」的原則進行貿易（中川雅彥，2004a：3）。其中，筆者認爲北韓方面對「優先投資重工業」與「互通有無式的對外貿易原則」這兩點突顯了北韓「自立民族經濟」的特色，也是在日後經濟改革中於思想論述上改變最多的兩點，因此將於下針對這兩點內容進行進一步的討論。

1953 年 7 月 28 日在金日成於《韓戰停戰協定》簽訂後對國民的演講中特別提到「人民經濟的復興，要把重心放在重工業上。」（金日成，1953）同年 8 月 5 日到 8 日的朝鮮勞動黨第六次中央委員會全體會議中，金日成提到戰後經濟建設要以克服殖民時代的偏頗性、擴張重工業發展，與輕工業的快速復興爲主要目標，並特別提出鋼鐵、機械、武器、造船、礦業、電氣、化學、建材和輕工業等應該優先發展的工業項目（中川雅彦，2004a：14），從金日成所提出的優先發展工業項目中，可以發現金日成對重工業是較爲看重的。後來金日成在北韓科學院的蔡喜正（Chae Hee Jeong）之發展下，「重工業優先」的經濟政策有了以下的內涵：首先，若不以重工業作爲人民經濟的基礎進行發展的話，就無法保障人民經濟的自立性，也無法確保未來工業化之順遂；其次，由於重工業是提供所有人民經濟部門生產手段之部門，因此其他人民經濟部門，特別是工業部門的經濟復甦有賴於重工業之發展；最後，重工業是作爲保障和平建設、強化國防力的物質基礎（中川雅彦，2004a：14-15）。在前述的政治派系鬥爭中，金日成也藉此把「輕工業優先」的其他政治人物進行肅清，使得「重工業優先」成爲「自立民族經濟」的內涵之一。金正日在《關於主體思想》中便提到：

> 以機械製造為核心的重工業，是自立民族經濟的支柱。只有擁有這樣的重工業，才能在經濟技術上自立，才能在現代科技的基礎上迅速地發展包括輕工業和農業在內的整個國民經濟。只有在發展重工業的同時，也發展輕工業和農業，才能有計劃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重工業本身的發展也才能得到促進。（金正日，2002a：35）

「自立民族經濟」的對外貿易原則是所謂的互通有無式的貿易：在進口方面，是以自己所無法生產或是生產不足的東西爲優先進口的物品，其中以計劃經濟所需要的物資爲優先進口的對象；在出口方面，則以自己所擁有且生產過剩的產品爲出口商品，主要目的是要獲取進口所需的外匯（沈瑞文、林正生、李靜芳，2010：272-273；中川雅彦，2004a：3）。之所以會有這樣的態度是因爲金日成認爲：「我們所反對的，是以『經濟合作』和『國際分工』爲藉口，阻礙他國經濟自立性與

綜合性發展，進行使自己國家經濟爲他國所束縛的大國主義傾向」（金日成，1965），另外若在「原料和燃料依賴於別人，就等於把經濟命脈託付給別人」。（金正日，2002a：36）這些問題，在資本主義經濟體系中最爲明顯，因爲「資本主義國家間的相互關係的特點是經濟發達的國家同落後的國家之間的支配與依附的關係。」（沈儀琳編，1983：50-51）因此北韓實際上不反對國家之間的經濟合作和相互原則，希望各國在相互尊重彼此自立民族經濟建設的基礎上，以完全平等和互惠的原則與各國進行經濟合作，對外貿易也必須以完全平等互惠原則爲前提，以互通有無、相互協助的關係爲基礎進行（金日成，1965）。

綜合以上，北韓的「自立民族經濟」並不是完全的孤立經濟體系，而是希望減少在經濟各方面依賴其他國家的經濟方針，透過以本國技術、資源和人材爲基礎綜合地發展不同的經濟項目，以達成使經濟成爲政治自主、國防自衛的物質基礎目標。爲達到此目的，金日成提出「重工業優先」的發展原則，希望透過以重工業帶動輕工業、農業發展，以重工業發展建立自己的軍需產業，使北韓在糧食、民生用品和軍備上都能達到自給自足；同時在對外經濟關係上，也強調完全平等互惠原則，反對國際分工體系，強調互通有無式的貿易關係與經濟合作關係，目的是要避免經濟命脈操之於他國之手。對北韓官方而言，「只有建立起這樣的經濟（指自立民族經濟），才能合理地綜合利用國家的自然資源，來迅速發展生產力，不斷地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才能牢固地奠定社會主義的物質技術基礎，加強國家的政治、經濟、軍事力量。」（金正日，2002a：33）

貳、「新思考」、「實利主義」與經濟改革

在金正日時代，北韓主要經過兩階段的經濟改革。首先是自 1984 年到 1998 年之間的「改革實驗與摸索階段」：在這段期間，北韓於 1984 年 8 月推動「八三民生必需品增產運動」，希望提高以民生必需品爲主的輕工業產；9 月頒佈《外國合作資經營法》（以下簡稱《合營法》），希望可以吸引以在日朝鮮人爲主的外資進入北韓投資；定 1989 年爲「輕工業之年」，並在「第三次七年經濟建設計劃」

之餘又訂立了「輕工業發展三年計劃」；1991 年 12 月配合聯合國開發總署（United Nations Development Program）所提出的「圖們江（Tumen River）流域開發計劃」，仿傚中國在福建、廣東沿海所建立的經濟特區，將羅津（Rajin）和先鋒（Sonbong）劃定爲「自由經濟貿易地帶」，也相繼訂立《外國人投資法》、《外國人企業法》和《自由經濟貿易地帶法》等相關法規；1993 年 11 月則提出重視農業、輕工業和對外貿易的「三大第一主義」。第二階段則是自 1998 年至今的「『新思考』與特區開放時期」：1998 年 9 月北韓進行憲法修改，納入「獨立會計制度」（independent accounting system）概念、擴大對所有權的容許範圍、擴大可以進行對外貿易的主體，並在憲法上明文規定特別經濟區的成立；1999 年元旦的〈將今年轉換爲強盛大國建設的偉大光耀之年〉新年共同社論中，正式提出建設「強盛大國」的概念，希望在思想、軍事大國的基礎上，把北韓建立成爲經濟大國（勞働新聞、朝鮮人民軍、青年前衛，1999）；同年也制訂了「科學技術五年計劃」，希望發展資訊產業、改善經濟上的科技效率（technological efficiency），並以更爲科學的方式制訂經濟計劃；2002 年 7 月更推出「經濟管理改善措置」，徹底執行國營企業的獨立會計制度、引入論工計酬的薪資制度、在計劃經濟的前提下進行部份性的去中央化措施，以及承認在經濟危機間快速擴張的黑市等；2010 年 1 月和 3 月，國防委員會也先後成立「大豐國際投資集團」（Taepung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Group）和「國家開發銀行」（State Development Bank）作爲國家經濟發展、對外經濟合作和進軍國際金融市場的機關單位；同一時間，也紛紛建立金剛山（Kumgangsan）觀光地區（2011 年 4 月改名爲「金剛山國際觀光地區」）、新義州（Sinuiju）特別行政區、開城工業區等與南韓和中國進行經貿合作的特別經濟區（尹大奎，2003；朱松柏，1995：56-60；姜英之，2004：2-7；徐文吉，2007：87-103, 117-119；張慧智，2010；Chung, 2004: 287-302；Hong, 2002）。爲了因應這些經濟政策上的改革措施，北韓官方也必須在思想體系上進行修正，包括修改對資本主義的認識、提出合理化採取改革措施與特別經濟區的論述，以及

「先軍政治」的經濟作用等。本段落則將針對這些經濟思想上的變革進行分析，而有關北韓對外經濟的具體行爲，則將於第五章第二節中進行說明。

在引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式的思維以前，必須先對資本主義的概念進行修正，才能合理化北韓採取相關措施的行爲。在金正日的〈關於主體思想〉一文中提到建立自立民族經濟不是否定國際上的經濟合作，而是反對以「國際分工」爲藉口帝國主義式剝削，換言之，北韓從來不反對進行國際經濟合作，前提是必須要在完全平等互惠的前提下進行，而自 1970 年代以來，北韓也加強了和日本和西歐國家之間的貿易關係，可見北韓並不執著於與社會主義集團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間的經濟交流。1987 年 9 月金正日發表了「高舉反帝鬥爭的旗幟，強力往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道路前進」演講，認爲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以美國爲中心的資本主義國家以跨國企業爲中心產生聯結與合作，透過經濟和技術上的相互依賴和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的建立，使得瀕臨瓦解的資本主義體系獲得重生；更重要的是，主要資本主義國家間並未發生軍事衝突，反而透過軍事同盟強化彼此間的關係，取而代之的是層次較低的經濟和政治矛盾。同時在資本主義國家內部中，由於中產階級的增加和福利國家的建立，勞動階級意識已經受到布爾喬亞意識的影響而麻痺，因此在這些國家國內也無法建立「具有唯一思想與指導者的黨」以推動以「主體思想」爲本的先進資本主義革命（金正日，1987）。金正日透過國際和國內情勢的說明，認爲資本主義國家並不會因爲列寧（Vladimir Lenin）所指出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國家會因爲內部鬥爭而走向滅亡之論調，反而因爲跨國企業所建立的國際資本主義經濟體系和勞動階級受布爾喬亞意識之麻痺，導致資本主義國家會繼續存在，而解決資本主義國家對發展中國家產生的政經問題之唯一出路，就是拋棄以新殖民主義爲本的舊國際經濟秩序，建立能使發展中國家經濟與技術均得到發展的新國際經濟秩序，而若資本主義國家不拋棄新殖民主義思維的話，資本主義國家必然走上崩潰之途（金正日，1987）。換言之，金正日雖然仍高舉反帝鬥爭和堅持社會主義優越性的立場，但是已經內含資本主義國家同社會主義國家與發展中國家是有可能共存、相互依賴，乃至合作之可能性。

既然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共存乃至合作在短期內是不可避免的，那應該如何避免布爾喬亞思想滲透到北韓國內，破壞人民的勞動階級意識？爲此，金正日提出了「蚊帳式戰略」。在 1989 年 6 月金正日所發表的「強化黨以使其領導角色提高」的演講中提到：

> 為了避免黨員和勞動者們受到外部的不健全思想要素所污染，唯一的方法就是強化在他們間的思想教育事業……強化黨員和勞動者們的思想教育事業就跟掛蚊帳的道理是相同的。正如偉大的首領曾指示，若開門而不掛蚊帳的話，蚊子會飛進來螫我們的臉，蒼蠅也會飛進來……若掛起蚊帳，蚊子和蒼蠅就飛不進來，門再敞開也沒有問題……我們發現一部份的國家因為採取過深的改革和政策改變，導致帝國主義者有機會對社會主義進行狠毒的破壞，展開對黨員和勞動者們的思想攻勢，因此，為了不使這些修正主義和布爾喬亞思想等不健全的思想要素滲透到我國內部，我們必須要建立徹底的防禦陣式。（轉引自平井久志，2011：348-349）

這種「蚊帳式戰略」除了反映在對思想教育層面上的強化之外，更反映在北韓特別經濟區的設立：當前北韓的四個特別經濟區分別座落於國家的四隅，且都與平壤距離遙遠，同時對於內部人員的出入管制相當嚴格，甚至在劃定特區時還進行大規模的居民遷移，也會對曾經與外國人士接觸過的幹部、技術人員進行額外的政治思想教育（重村智計，2006：200-201），目的是要避免「不健全的思想要素」以任何型式滲透到北韓社會當中，在思想上、制度上、地理位置上都「掛起蚊帳」。

但是北韓面對 1980 和 1990 年代之際的國內外環境大變革，這種消極性、防禦性的經濟思想無法帶領北韓脫離經濟困境，不僅造成自 1990 年到 1998 年連九年的經濟成長率下降、產生嚴重的糧食危機與能源不足，也無法吸引外資投入北韓，促使北韓渡過嚴峻的「苦難的行軍」時期。面對這種問題，北韓提出了「建設強盛大國」與「實利主義」的政策理念，在既有「主體思想」和計劃經濟的前提上，進行經濟改革活動。

1998 年 8 月，《勞動新聞》的社論中正式提出了「建設強盛大國」的政策構想，該社論指出要成爲強盛大國，必須在思想政治、軍事和經濟方面都成爲強國才行，且認爲「已經是思想強國、政治強國、軍事強國的我國可以確定的是，在不遠的將來會成爲經濟強國」（轉引自康宗憲，2006：298），故認爲尚未達到的是在經濟方面的建設。在 1999 年元旦的新年共同社論中，北韓官方進一步表示「經濟建設是建設強盛大國最重要的課題。我們在政治思想上和軍事上的威力必須以經濟力作爲後盾，才能登上名實俱符的強盛大國地位」，其中提出包括農業、電力、石炭業、交通運輸、輕工業和科技等發展目標，使得「建設強盛大國」成爲正式的政治口號與政策目標，也再度強調經濟的重要性。爲了達成「強盛大國」的經濟目標，金正日以「新思考」爲名提出「實利主義」，希望針對當前社會主義計劃經濟體制的缺失進行效率上的提升，另外也透過「先軍政治」確立以軍需產業爲中心推動整體經濟產業復甦與發展的方向。

有關於「實利」的內容，最早可以見於 2000 年的新年共同社論，其中提到「在所有部門中徹底保障實利是極爲重要的」，隔年的新年共同社論中也提到「在進行經濟組織事業時，必須有效率地產生實利」（轉引自礒崎敦仁、澤田克己，2010：114），那麼究竟「實利」的具體內容爲何？就其內容來看，可以分爲兩點：首先，實利代表的是「實際」的意思，也就是政策必須用來解決實際面臨到的問題，而當時北韓想要解決的問題包括提升經濟產值和效率（農、工業均包含在內）、正常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分配體系，以及吸引外資等，因此在實利主義下所提出的改善「主體農業」政策、推動「經濟秩序改良措置」引入市場機制和觀念，以及建立特別經濟區吸引外資都是具體希望改變現有問題的政策，也因此也有學者稱「實利社會主義」爲「實際社會主義」（”Practical Socialism”）（Chung, 2004）；其次，實利代表的是「實際利得」，也就是引入市場經濟中成本與利益的概念，因此北韓在「經濟秩序改良措置」後不再強調平均主義的薪資制度而強調「論工計酬」，同時獨立會計制度的全面推行也要求地方企業對自負盈虧，政府不再對國營企業進行補助等措施，藉此提高人民和企業的生產誘因。

在這種「實利」觀念下，北韓以金正日爲首逐漸發展了「新思考」。2001 年 1 月 9 日的《勞動新聞》社論中提到「必須徹底捨棄古老過時的事物，根本地改變思考觀點、思考方式、作事方法和生活風氣，所有的事物都必須重新思索、重新實踐。」（轉引自平井久志，2010：128）同年 1 月中旬，在金正日結束對上海的非正式訪問後，也提到「所有的幹部都必須以新的觀點取代舊觀點，並革新他們的工作態度。」（轉引自 Chung, 2004: 289）4 月 5 日的第十屆最高人民會議第四次會議中，洪成南首相則提出「新思考」下的重點課題，分別是去除無法產生實利的過時產業、引入現代機械設備、推進與國外的科技交流、強化科技情報事業，以及發展對外貿易（平井久志，2010：129）。同年 10 月 3 日，金正日在「關於配合強盛大國建設要求改善強化社會經濟管理」的演講中提到：堅持社會主義原則並實現實利最大化、在計劃經濟中融入更加可行的現實性和科學性、透過權力下放給予企業更多自主權以提高經濟整體生產力、保持與經濟體系的靈活應變能力等經濟原則，並提出廢除不良的平均主義、權力下放到下屬部門和地方、建立「社會主義物資交流市場」之構想、強化銀行機能、強化獨立會計制度、重視科學技術、進行農村改革，以及對盈利部門進行重點投資等具體內涵（金正日，2001）。

推動「建設強盛大國」目標的第二個重要核心政策是根據「先軍政治」，推動優先發展國防工業，依此同時發展輕工業和農業的經濟政策路線，而其基本的概念可以由北韓官方經濟理論期刊《經濟研究》的〈關於根據先軍時代的經濟路線基本要求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生產部門均衡設定問題〉一文中有更深入的了解。優先發展國防工業的意思是指將人民經濟的其它部門，如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置於次之的地位，因此在經濟部門間的資源分配時，國防工業不僅可以優先取得資源，也必須無條件且不可怠慢地保障其資源，這是對「先軍政治」中「重視軍事」、「軍事先行」原則的徹底性實踐。國防工業下所生產的軍需物資因爲不具生產性所以不是生產工具，但同時它也不是單純的消費品，因爲軍需物資除了部份會被拿來使用外，大多是拿來儲藏積累用的，是有事之際才使用的產品，雖然它

也包括了糧食、日常用品等消費品在內，但由於其特性不同所以有必要將其與其他產部門進行區別。軍需用品生產部門、生產工具生產部門和消費品生產部門三者間的關係是相當緊密且相互不可取代的，因此三種生產部門間必須進行均衡發展，其中發展順序是軍需用品部門先於生產工具部門先於消費品部門：國防工業乃是推動社會主義建設與革命的命脈，而且是維持政治自主和國防自衛的根本，因此必須優先發展；生產工具部門先於消費品部門發展是因爲這樣可以使得再生產的效率得以擴大，因爲消費品終究是會被消耗掉，是無法爲國家累積財富的，但是生產工具的進一步發展和技術革新有助於生產的進一步擴大，可以爲國家累積財富、精進生產技術，以及作爲鞏固國防、民生之基礎；最後，三者之發展必須合乎社會的現實需求進行發展，因此必須要透過經濟建設計劃先制定當年的生產目標、釐清國家所有不同單位的需要之後，方能進行有效率的生產。此外，該文中也特別指出，北韓的國防工業跟帝國主義各國的以賺錢和侵略他國爲目的的國防工業在本質上是不一樣的，因爲北韓國防工業的目的是要守護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守護自己國家的自主權，故是自衛性的國防工業（經濟研究，2006）。

由此可知，北韓在面對到國際環境變革和本國經濟狀況惡化的情況下，先在1980 年代修正對資本主義的看法，並提出「蚊帳式戰略」，希望可以在加強與資本主義國家的合作的情況下，社會上不會被修正主義、資本主義、布爾喬亞意識等「不健全思想要素」所污染。可是在經過連年的經濟負成長、糧食危機之後，北韓也意識到之前消極性的作爲是不足夠的，因此提出「建設強盛大國」目標，透過「實利主義」的「新思考」之經濟政策和制度改革，以及「先軍政治」的以國防工業帶動其他經濟部門發展的經濟建設路線，希望可以達成經濟復甦，進而使北韓成爲「經濟大國」。

第四節　小結

《勞動新聞》在 2006 年 11 月 6 日刊出一篇介紹北韓「自主政治」的文章，這是一篇綜合「主體思想」、「先軍政治」和「新思考」下所寫的社論，代表黨對於國內外政治的基本理念，也剛好可以作爲本章的結論。其內容如下：

> 為了保護國家和民族的尊嚴，必須遵守自主政治的原則。只有當一個國家遵守自主政治的原則時，她才可以根據自己的特殊情況以合乎人民利益的方法解決在革命和建設過程中所發生的問題，並透過最大化人民的創造性在革命和建設上取得成果……黨反對事大主義、教條主義等各種依賴外人的想法，也排拒任何來自外國的壓力與干涉。它的一切分析與判斷都是根據朝鮮革命利益而做出來的，不會拘泥於既成理論和既有公式當中，以自己的力量根據自己的命運與決心，推動複雜且艱困的朝鮮革命。朝鮮勞動黨和朝鮮人民堅定地堅守主體的獨立自主路線，因此才沒有被如現代修正主義等機會主義潮流所打敗……才可以在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紛紛垮台的嚴峻局勢之際，堅持捍衛且榮耀以人民大眾為中心的朝鮮式社會主義……一隻強大的軍隊是主權的象徵與國家民族尊嚴的象徵，也是確保自主政治的當然保證。若沒有一隻強大的軍隊，就不可能在帝國主義者所加諸的叢林法則中，獨立地處理與國家命運有關的議題……只有一隻強大的軍隊，才能確保國家勇往直前地執行自主政治與捍衛國家民族尊嚴。[4]

其中「自主政治的原則」、「反對事大主義、教條主義等各種依賴外人的想法，也排拒任何來自外國的壓力與干涉」、「堅守主體的獨立自主路線」等字句正是「主體思想」中概念；而文末對於「一隻強大的軍隊」之強調則是「先軍政治」中以軍方作爲達到國防自衛與社會主義建設主力軍、支柱和骨幹的概念；「一切分析與判斷都是根據朝鮮革命利益而做出來的，不會拘泥於既成理論和既有公式當中」則強調的是「實利」與「新思考」的概念，要求拋開陳腐的想法並根據現實的利

[4] KCNA (Nov. 6th, 2006), "Rodong Sinmun on Independence Policy,"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May 2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ndex-e.htm.

益來進行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而唯有透過上述目標的達成，才能「捍衛且榮耀以人民大眾爲中心的朝鮮式社會主義。」

綜合前三節對於北韓思想方面的內容分析與這篇社論的內容，筆者認爲意識型態對於北韓對外行爲主要產生兩方面的影響。首先，北韓在對外行爲上追求「自主」、「自立」、「自衛」的「主體」目標。由於追求這樣的「主體」目標，北韓在政治上高度強調各國主權平等的原則，也認爲在思想理論、軍事、經濟等方面對他國的過度依賴和導致自己喪失獨立自主的地位，因此重視政治思想工作、採取「蚊帳式戰略」，並相信「致力於國防工業的先軍政治才是加強國家整個國力的可靠保證」（朝鮮勞動黨，2008：10）。在經濟上，北韓希望可以建立「自立民族經濟」以作爲達成「主體」目標的經濟後盾，而建設成爲經濟大國也是「強盛大國」的目標之一，而以「實利主義」爲中心的「新思考」之用意正是爲了要修正已經過時的概念，透過對於計劃經濟體制的改善來改良生產效率、提高生產誘因、追求實際利益，目的不是要引入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不是要改採國際分工式的對外貿易，目的是要正常化社會主義計劃經濟與分配體系，吸引外資和取得外匯以促進經濟復甦和產業升級，其終極目標仍是「自立民族經濟」的建立。在國防上，「先軍政治」導致北韓視安全事務爲第一要務、國防工業爲優先發展的產業，希望以此捍衛國家主權、國家安全，並透過以國防工業帶動其他產業發展的模式，鞏固「軍事大國」現狀並進一步發展成爲「經濟大國」，透過「自衛」減少對其他國家在軍事上的依賴，並進一步防衛自己以免於帝國主義國家的入侵。

其次，這些思想概念導致北韓排斥任何形式的外來干涉，舉凡國內事務、思想、經濟發展、國防安全，乃至於在朝鮮半島統一的目標上，北韓都反對外來因素的干預。會導致北韓有這樣子的想法是因爲北韓對於「主體」，也就是「自主政治」的追求，這除了和「主體思想」和「自立民族經濟」的思維有關係外，更重要的是希望藉此削弱南韓作爲另一個代表朝鮮人民政權的正當性：南韓建國時受到大量的美國援助、美國至今仍在南韓駐軍、美日韓三國的軍事同盟、南韓完全融入世界資本主義經濟市場、南韓採取西方式的代議民主制度等行爲在北韓看

來，都是缺乏「主體」且近似於過去「事大主義」的輕視自我、崇拜大國行爲，而唯有北韓藉由「我們式社會主義」所進行革命建設才是真正完全排斥外國影響、完全體現國家主權獨立自主的行爲。因此，北韓在對外行爲上反對在主權上的任何讓步、強力支持不干涉內政原則、反對國際分工體系、反對一國在另一國領域內駐軍、反對資本主義國家對第三世界國家的經濟剝削、堅持完全平等互惠的對外政治和經濟關係、堅持保有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權力等外交訴求和行爲，都是其「自主政治」之具體表現。

第五章　外交目標與對外行為間的關聯

在第二章到第四章當中，筆者分別從歷史因素、政治制度以及意識型態因素等三方面分析了影響北韓對外行爲的不同國內因素，而本章將針對北韓在金正日時期的實際對外行爲作爲，就前面所提到的一些觀點進行檢證與分析，試圖爬梳北韓對外行爲之邏輯性，以及其背後所追求的國際利益與目標爲何。本章主要分爲四節：第一節中先指出北韓的外交目標爲何，並分析導致北韓追求此外交目標的國內因素；第二節中則討論北韓和重要國家之間的外交關係，包括美國、南韓、中國、日本和俄國（1991 年前爲蘇聯），其中北韓利用各國在朝鮮半島政策和利益上的不同，透過在重要國家間採取「鐘擺外交」（”pendulum diplomacy”）之作爲，從各國的矛盾中試圖獲取本國利益的最大化，以達成其外交目標；第三節則討論北韓的對外經濟關係，包括對外貿易關係和特別經濟區的設立，試圖從經濟的角度觀察北韓在國家利益上之追求；第四節則集中討論目前北韓最引起國際社會注意的核武和飛彈議題，包括兩次核武危機發生之談判過程與結果、朝美之間的飛彈談判、「六方會談」的內容，以及當前北韓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政策等內容，以理解北韓爲何不顧國際社會的強烈譴責與制裁，堅持發展兩者之理由和欲達到目標爲何。此外，在第二節以降的三節中，也會於各節的小結中分析不同對外行爲與北韓外交目標與國內因素之間的關連性，希望藉此突顯出不同國內因素如何對北韓的對外行爲構成影響與限制。

第一節　北韓的外交目標

外交的目的是要追求與維護國家最大的利益，也就是追求保障與拓展國家的核心利益（黃奎博，2007：170），因此思考何謂對北韓而言的國家核心利益，自然就是了解北韓外交目標的最佳途徑。Donald Nuechterlein 在討論美國的國家利益時曾提到了四種不同面向的國家利益，分別是涉及國家存亡的「生存利益」

（survival interest），任何嚴重影響國家政治、經濟與人民福利的「重要利益」（vital interest），影響到國家政經利益與穩定的「主要利益」（major interest），以及不涉及國家福祉的「周邊利益」（peripheral interest）等四種（Nuechterlein, 1979）。但是並不是所有的國家都像美國一樣有能力和資源同時兼顧這些不同層面的利益，而可能只有能力把重心放在前兩、三種利益之上，北韓正是一例。由於北韓的國力有限，因此所能夠動用的資源和手段就受到限制，加上北韓身爲分裂國家中居於劣勢的一方，因此其所追求的外交目標必和其他相同國力條件的國家有所不同。

身爲分裂國家的一部份，意味著有另外一個聲稱自己主權是及於北韓全境的國家，而這個國家就是不論在經濟實力、國際影響力、軍事實力和社會發展程度都遠勝於北韓自己的南韓，同時，北韓也聲稱自己的主權範圍是包括南韓全境在內的。因此這兩個國家不僅要爭誰才是「朝鮮半島唯一合法政府」的正當性之外，也互爲構成對方國家安全最大威脅的國家，也導致南北韓雙方都將大部份的軍力集中在兩國之間的軍事分界線一帶。因此，北韓和其他國力水平類似的國家面臨到最大不同點在於，北韓存在一個對自己有具體領土野心、雙方長期以來互爭正當性的國家；換言之，若用 Nuechterlein 的用語來看的話，北韓領導層認爲自己國家面臨到國家存亡的「生存利益」問題，而這也是北韓政權難以全心全力追求經濟發展的主要原因。

因此，北韓透過對外行爲所要追求的目標就是本身制度的存續：這包括追求現有政治、經濟、社會和意識型態體制的存續，包括追求現有金氏政權的存續，也包括追求北韓作爲一個主權獨立國家在國際社會中的持續存在。因此，北韓的一切對外行爲所希望達到的目標與利益之最終目的，就是要協助達成「制度存續」這個北韓對外關係上的終極目標。於本章的第二節到第四節中，筆者將會針對北韓如何透過不同的對外行爲手段達成此目標之內容，進行分析與說明。

此外，筆者希望從前述歷史、政治制度和意識型態的國內因素角度來看分析其與北韓外交目標間的關係。北韓之所以會相當重視制度存續和政權存亡，與其

在歷史上因爲被日本殖民統治而亡國和在韓戰期間險些被以美軍爲主的聯合國部隊所殲滅有很密切的關連，加上在金正日時期的現實國際環境中，南韓的強大和北韓傳統盟邦的消失都讓北韓增添了更多的危機感，因此希望以不同的手段來達成其追求制度存續的目標。由此來看，北韓的外交目標和具體的對外行爲受到國內因素的影響和限制是相當深的，這是由於北韓在長期政治發展下由集中式民主的共產國家發展成爲一人獨裁黨國體制的「首領主導黨國制」，導致以「首領」爲中心的領導階級受到各種國內因素影響對於國內外環境因素的評估與裁示才是影響北韓對外行爲與外交目標的核心原因。也正因如此，試圖從北韓的角度了解其領導菁英的政治目標與思維邏輯，才有助於進一步了解北韓在對外行爲上的邏輯，也有助於預測北韓未來的動向並提出適當的應對之道。

第二節　與主要國家間的外交關係

外交是一種不經戰爭而達到國家目的的手段或工具，其目的是要追求與維護國家的最大利益，以爭取對方支持、阻止對方去做某件事情，或是至少使對方了解自己的立場（黃奎博，2007：170-171），就這點來看，北韓和其他國家的外交行爲並沒有明顯的不同。北韓在對外關係上最明顯不同之處在於，北韓會同時利用外交、軍事行動和諜報工作來達成其國家利益與目標，並認爲三者均是可以達成其外交目標的政治性手段。根據日本學者道下成德的分析，北韓在金正日時期的對外關係大致上可以分爲「恐怖主義興起時期」（1983 年到 1992 年）和「高度精緻化的軍事外交行動時期」（1993 年至今）（Michishita, 2010: 12-15）；另外一位日本學者重村智計則直接指出，北韓在對美關係上是以外交爲主、對日關係是外交與諜報併用、對韓關係上是以諜報爲主，其中諜報工作的目的是要促進朝鮮半島統一（重村智計，2000：22）。

事實上，北韓在與主要國家的外交關係上經常帶有「鐘擺外交」的性質，也就是和主要大國之間保持等距離的關係，讓國際局勢或該大國對自己的政策轉變時，可以迅速地轉移重心到其他國家上，藉此確保自己的利益和獨立性，這在冷

戰期間可以展現在北韓於蘇、中兩國間的擺盪，在後冷戰時期則可以表現在北韓同美、日、韓三國間的關係。這種擺盪或重心的轉移並不代表北韓就完全冷卻某段外交關係，反而是種制衡與突顯對方國家間矛盾的作爲，而其根本目的是爲了要達成自己的國家目標與取得所欲之利益。而這些內容將於本節中分五個小節就個別國家進行分析與說明。

壹、美國[1]

一、金正日時期朝美關係之性質

北韓和美國在金正日時代的外交關係可以分別從過程、內容和目的三者間來看。從過程而言，兩國之間關係的推展是種「危機趨動」（”crisis-driven”）式的關係，這個危機不完全是由北韓造成的，也可能是由美國蓄意挑起的（Armstrong, 2004a: 13-29）。兩國在冷戰期間，除了在「停戰協定委員會」（Military Armitice Commission）內的接觸外，並沒有直接的溝通管道，而兩國也直到 1988 年才有第一次的事務官等級之接觸，後來由於北韓支持中國在天安門事件中鎮壓民運人士而中止。在金正日時期，兩國間主要的談判都是由於產生危機而進行的：第一次核武危機導致《美朝框架協議》的產生和「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orean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以下簡稱 KEDO）的成立；1998 年 8 月 31 日，北韓發射「大浦洞一號」（Taepodong-1）飛彈導致美國與北韓展開飛彈談判，美國也發佈了名爲〈佩里報告〉（*The Perry Report*）的對北韓政策，也導致最後雙方於 2000 年的北韓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趙明祿與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Madeleine Albright）互訪，並發表《美朝聯合公報》（*U.S.-D.P.R.K. Joint Communique*），爲至今兩國關係最融洽的時候；2002 年爆發的第二次核武危機則促使解決核武問題的「六方會談」之展開，在 2005 年 9 月 19 日達成《共同聲明》，2006 年 2 月 13 日和 9 月 30 日分別達成《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和《落實共

[1] 同美國之間就核武和飛彈議題間的談判將於本章第三節中有進一步的說明，本小節僅就兩國在雙邊會談與接觸、關係正常化，以及制裁之實施與解除等方面進行討論，而相關提到的核武與飛彈議題內容在本小節中僅點到爲止。

同聲明第二階段行動》等共識，同時美國也部份地解除根據國內法對北韓所進行的制裁；2009 年 4 月和 5 月，北韓又分別進行大規模飛彈試射和第二次核武試爆，雖然因此開啓了新一波的危機，但是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並沒有如先前的柯林頓（Bill Clinton）與布希（George W. Bush）政府一樣有明顯的回應，原因在於歐巴馬政府處理北韓問題的態度爲「戰略性容忍」（”strategic patience”），因此在目前「六方會談」仍遲遲無法重新召開的情況下，美國也不會有進一步動作，兩國關係也難以有進一步突破。

從內容來看，北韓的對美政策是一種「透過強硬手段達成和解」（”coercing to reconcile”）之作爲，也就是利用「嚇阻」（”deterrence”）和「威逼」（”compellence”）的方法試圖改善和美國之間的關係。其中嚇阻的目的是希望可以確保其政權與體制得以延續，利用傳統武力與特種部隊、核武能力，以及彈道飛彈能力之部署、研發與能力展現，嚇阻美國不要妄自對北韓發動軍事行動，也嚇阻美國不要在兩韓發生軍事衝突時介入。在威逼方面，其目的是希望達到和美國邦交正常化和獲得經濟援助，而北韓的邏輯是「除非妳放棄對我們的敵對政策，不然我們就會繼續研發和部署這些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甚至不排除使用它們或是賣給其他國家」，因此也同樣以傳統武力、核武和彈道飛彈能力等手段來達成此策略。不過這也因此構成了北韓在對美政策上的兩難：由於嚇阻和威逼之策略是透過同樣手段達成不同目的的，因此若在軍備上讓步可以達成威逼的目的卻會減少嚇阻力，反過來看，堅持不在軍備上讓步雖然可以保持嚇阻力卻無法達成威逼之目的（Michishita, 2006: 1019-1025）。這種困境也構成了北韓在以軍備爲籌碼與美國進行外交談判之際，時而強硬、時而彈性的擺盪。

最後，從北韓對美政策的目的來看，北韓對美政策的終極目的是希望透過與美國邦交正常化以確保自己政權與體制的延續。在第二章第四節的分析中，筆者提到北韓因爲韓戰因素導致其採取強烈反美的政治立場，而這點雖然在北韓的官方發言中仍未改變，但是對於美國的認識卻在 1990 年代之初有所轉變，認爲美國可以在北韓的國家安全上扮演正面的角色，希望可以透過改善和美國之間的關

係取得美國的「安全承諾」(security assurance)和實質上的經濟利益(Koh, 1998)。如在 1993 年 6 月 11 日，兩國發表《美朝共同宣言》(*US-DPRK Joint Statement*)，表示「確保不威脅使用和使用包括核武在內的武力」、「在非核化的朝鮮半島上保持和平與安全……相互尊重對方主權，並不干涉對方的國內事務」(The People's Korea, 1997)；又如在 2010 的元旦共同社論中，北韓也提到「今天，在保障朝鮮半島與區域性和平安定所直接面對到的根本問題是要終結朝美間的敵對關係。透過對話與交涉為朝鮮半島建立堅固的和平體制、實現非核化等目標一直以來是我們一貫的立場。」(勞働新聞、朝鮮人民軍、青年前衛，2010) 由此可見，北韓在金正日時期對美政策的目標，是要透過改善和美國之間的關係確保自己的國家安全和政權延續，但同時也仍視美國為其主要敵人。

二、金正日時期朝美關係的發展

(一) 老布希政府

由於北韓於冷戰期間身處於共產集團中，加上美國和南韓之間締結軍事同盟關係，因此兩國沒有邦交關係，除了定期於於板門店進行的「停戰協定委員會」會議外，兩國並沒有直接進行雙邊對話的管道，也因此兩國之間的接觸較少。雖然金日成在社會主義集團國家紛紛瓦解之際，仍舊指出「妨礙朝鮮統一的主要勢力是美國。美國自以為是主人，用武力占領著南朝鮮……美國的對朝鮮政策基本上來說，就是要建立『兩個朝鮮』並把南朝鮮當作殖民地進行永久掌控」(金日成，1990)，但同時又不排除與美國改善關係。金日成 1991 年 9 月 26 日接受日本岩波書店 (Iwanami Shoten) 的社長訪問時，針對朝美關係的未來發展表示：

> 我們共和國一直努力地想改善朝美關係，這是因為美國是造成朝鮮分裂的直接責任國，所以我國統一問題的解決必與美國的對朝政策有密切的關連。從美國針對南朝鮮的軍事占領所造成的朝鮮分裂開始，到美國將南朝鮮建設為核武軍事基地、提高發生戰爭的危險性等事情對祖國統一所造成的重大障礙，是世人皆知的事情……在兩大強國對立之際，美國以反共的名義

在南朝鮮建立軍事基地，在今天這個藉口已經不存在了。但是美國依舊在南朝鮮設置軍事基地，對我們共和國造成軍事威脅……我們認為，應該是時候美國應該改變其對朝鮮政策了……美國若在時代變遷之際重新檢討其對朝鮮政策，並往協助朝鮮統一的道路上邁進的話，朝鮮和世界人民將會歡迎此舉，並為朝美關係改善打開新的局面……我們希望透過這些已經在進行的接觸，以締結和平協定問題為始，期待為來能夠發展成為解決朝美兩國間所存在的根本問題之對話。（金日成，1991a）

換言之，北韓當局希望透過改善和美國之間的關係，解除美國對北韓所構成的軍事威脅、促成雙方以「和平協定」取代《韓戰停戰協定》，並在未來不要阻礙南北韓就自行解決統一問題上進行阻撓。

在北韓發表此言論之際，其實北韓和國際原子能總署（International Atomic Energy Agency，以下簡稱 IAEA）之間正因為無法達成《防護管制協定》（*Safeguard Agreement*），以及美國於 1980 年代末期利用人造衛星發現北韓所建設的其中一座原子反應爐周遭也完全沒有任何發電廠和送電設施，因此推測這座發電廠是用來將核廢料加工為核武用鈽元素等問題，使得國際社會對北韓的核子計劃有所質疑。不過老布希（George H. W. Bush）政府在 1991 年 9 月 27 日宣佈單方面限制與裁減美國的戰術型核武（tactical nuclear）彈頭，並在 11 月 5 日批准〈國家安全指示 64 號〉（*National Security Directive-64*），撤出所有在南韓境內的戰術型核武，間接促成南北韓在同年底簽訂《南北和解、互不侵犯，交流與合作協議》（*North-South Agreement on Reconciliation, Nonaggression, Exchanges, and Cooperation*）以及隔年初的《朝鮮半島非核化宣言》。美國於 1992 年 1 月 7 日宣佈取消了該年度的「團隊精神」（”Team Spirit”）美韓聯合軍事演習，北韓為了回應美國所提出之善意，與 IAEA 於 1992 年 1 月 30 日達成《防護管制協定》。美國同時也派助理國務卿 Arnold Kanter 與朝鮮勞動黨書記金勇三（Kim Young Sam，音譯）會面，就兩國關係正常化的前提條件進行討論，包括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議題、韓戰中美軍陣亡軍人遺體歸還議題、北韓宣示不再支持恐怖主義活動、持續

與南韓間的會談和改善人權狀態等內容（Reiss, 2001: 49）。

不過看似有所改善的兩國關係，卻因爲美國對北韓疑似進行飛彈擴散活動的公司進行制裁[2]，以及美國於 1992 年 10 月 8 日宣佈將繼續舉行 1993 年度的「團隊精神」美韓聯合軍事演習，導致北韓相當生氣，不僅把「團隊精神」聯合軍演視爲「犯罪行爲」，也認爲此舉使得「朝美關係在展現改善的跡象時候鋪上一層陰影」（轉引自 Sigal, 1998: 46）。而在 1993 年 1 月初，老布希政府時代雙方的最後一次會面時，北韓代表則表示如果美國執意進行「團隊精神」聯合軍演的話，北韓將會採取激進的手段（Sigal, 1998: 47）。

（二）柯林頓政府

柯林頓政府在上台以後，仍舊如期於 3 月 9 日進行「團隊精神」聯合軍演，引發北韓方面相當大的反應。金正日先在 3 月 8 日以朝鮮人民軍最高司令官的身份宣佈全國軍民自隔天起進入「備戰狀態」（Michishita, 2010: 93），並於 3 月 12 日以美韓「團隊精神」聯合軍演與 IAEA 所要求的特別視查（special inspection）有違國家「最高利益」爲由，退出 NPT。北韓駐聯合國副大使在 3 月 19 日接受訪問時表示，只有在美國解除對北韓的核威脅及 IAEA 能夠以更公平的態度對待北韓的情況下，北韓才會返回 NPT（E. Lee, 2000: 28-29）。後來，金正日於 3 月 24 日宣佈結束全國的「備戰狀態」，29 日北韓外務省則要求朝美雙方進行雙邊會談，美國方面也在 4 月 22 日表示願意與北韓進行雙邊會談，任命助理國務卿格魯奇（Robert Gallucci）爲談判代表，但同時表明核議題是屬於北韓與國際社會間的議題，美國方面支持由適當國際組織所提出的有助於解決問題之方案。

雙方會談在6月2日於紐約由格魯奇和北韓外務省第一副部長姜錫柱之間進行。姜錫柱在一開始就以「朝鮮不是東德。我們不會崩潰，你們也無法掐死我們」（轉引自 Sigal, 1998: 63）之言論，表達了北韓方面強硬不願妥協的立場，之後提出了六點要求：一、美方保證不會對北韓使用核武；二、永久停止舉辦「團隊

[2] 這兩間公司分別爲龍月山機械設備出口公司（Lyongaksan Machineries and Equipment Export Corporation）和長光新永公司（Changgwang Sinyong Corporation）。

精神」聯合軍演；三、撤除美國在南韓的美軍基地；四、不再提供南韓核子保護傘；五、確保 IAEA 之公正性；六、承認北韓的共產體制（E. Lee, 2000: 32）。當時美國方面最迫切的希望是要求北韓能夠重返 NPT，而北韓也利用這點，提出若美國不使用核武威脅北韓則願意停止發展核武，也提到願意以不容易發展軍用核能的輕水反應爐（light-water reactor）來換取北韓現有的石墨反應爐（carbon-graphite reactor）。6 月 11 日，北韓突然單方面宣佈暫停退出 NPT，雙方共同發表《美朝共同宣言》，北韓方面得到美方承諾對北韓不使用和不威脅使用包括核武在內的各種武力，也對北韓尊重北韓的主權和不干涉其內政，在六點要求中滿足其中兩點。不過在 6 月 18 日，姜錫柱重新確認北韓方面的立場，認爲美國所採取的「反朝政策」乃是朝鮮半島核問題的核心所在，因此釜底抽薪的作法是要排除兩國之間的敵對關係（Michishita, 2010: 95）。

在北韓返回 NPT 後，兩國之間就核武議、北韓何種程度地接受 IAEA 視查，以及美國和南韓之間的軍事同盟關係等議題一直無法取得共識，期間北韓也多次升高軍事緊張情勢，如 1993 年 11 月加強在軍事分界線（Miliatry Demarcation Line）上的軍力、1994 年初密集地進行軍事演息、5 月 31 日和 6 月 2 日在日本海上試射蠶式（*Silkworm*）反艦艇導彈等。6 月 10 日，IAEA 將北韓問題提交到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中，促使北韓在 13 日宣佈退出 IAEA、不再接受任何型式的核視查，並再度宣稱聯合國對其進行的任何制裁北韓均視爲宣戰行爲（Michishita, 2010: 101），並在隔天馬上試驗了大浦洞飛彈的推進引擎。

促使當時劍拔弩張局面得以改善的，是美國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在 1994 年 6 月 15 日到 17 日間的私人訪朝行程。他在返國後接受 CNN 訪問時提到「北韓不是屈膝要求美國援助和要求與美國建交的國家。他們視自己爲驕傲且值得尊敬的主權國家，因此希望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與我們發展關係」（轉引自 Sigal, 1998: 150），而正是這種態度促使他和金日成間達成協議。金日成於 16 日與卡特的會面中表示朝美兩國間最主要的問題是雙方缺乏互信，而也提到北韓真正需要的是核能而不是核武，北韓已經多次向美國提出這點但是美方卻完全不相

信北韓的說詞，並提到若美國願意放棄用武力威脅北韓並提供北韓輕水反應爐的話，北韓願意放棄現有之石墨反應爐並返回 NPT 機制，同時也允許當時仍在北韓境內的兩位 IAEA 視查員留境；卡特則回應金日成會建議美國政府盡早與北韓之間進行高層會談，並會建議美國政府支持北韓取得輕水反應爐；雙方也同意未來要往促進朝鮮半島非核化努力（Oberdorfer, 1997）。柯林頓政府循著金日成和卡特會面所達成的共識，最後於 10 月 21 日達成《框架協議》，其中第二條和第三條對於改善雙邊關係有進一步規定，以下茲引此兩條之全文：

> 貳、雙方將會針對政治和經濟關係的正常化邁進：（一）在本文件簽署後三個月內，雙方會減少貿易和投資障礙，包括在電子通訊服務和金融交易方面的障礙；（二）在透過實務討論解決領事和其他技術性問題後，雙方會在對方首都互設辦事處；（三）只要雙方在所關切議題上有所進展，美國和朝鮮會提升雙邊關係為大使級關係。
>
> 參、雙方會努力維持非核化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全：（一）美國會就不對朝鮮使用核武和不威脅使用核武提出正式保證；（二）朝鮮將會採取步驟逐步達成北南朝鮮半島非核化宣言；（三）由於本框架協議有助於改善會談的氣氛，朝鮮將會進行北南會談。

不過《框架協議》的簽訂並沒有使得兩國關係隨之有所改善，反而使得兩國關係在這段期間陷入僵局。雖然美國在 1995 年 1 月允許對北韓進行直接電子通訊、允許美國企業進口北韓的菱鎂礦，也給予美國企業提供北韓人道援助的執照，但是雙方未能在對方首都內互設辦事處，以及美國遲遲未將北韓從「贊助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名使得兩國關係難以改善。這段期間，北韓針對《停戰協定》的適用性多次提出挑戰，並希望可以和美國達成「和平協定」：1995 年 2 月 20 日和 22 日，北韓方面增加在「共同守備區」（Joint Security Area）的駐軍和軍備，引發美國國務原在 23 日發表聲名表示北韓透過軍事手段減少《停戰協定》效力以逼迫美國與其簽訂「和平協定」的作法是無用的；6 月 29 日，北韓外務省發表聲明表示希望駐韓美軍撤軍和與美國簽訂「和平協定」，若前兩者在短期內難

以達成的話，那至少先解散在南韓的聯合國部隊（United Nations Command）；隔年 2 月 22 日，外務省又提出三點建議，希望和美國達成暫時性協議、希望組織朝美聯合軍事機制，並希望就上述兩議題盡快與美國進行會商（Michishita, 2010: 140-141）。雖然在這短期間雙方在具體改善雙邊關係上沒有具體的改善，不過兩國仍在1996年5月10日達成北韓送還美軍遺骨的協議（簡江作、劉順福編，2009：113），美國也自 1995 年下半年起透過非政府組織（non-governmental oraganization）和世界糧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me）提供北韓人道援助，自 1997 年 2 月起採行「會談換取糧食」（"food for meetings"）的援助政策（Haggard & Noland, 2007: 130-132），促使美國到 1999 年前後給予北韓大量的糧食援助（Manyin & Nikitin, 2008）。

1998 年 8 月 31 日，北韓在咸鏡北道（North Hamgyong Province）的舞水端里（Musudan-ri）朝日本海進行「大浦洞一號」的飛彈試射，引起各國震驚。北韓方面表示，這次的飛彈上頭搭載了名爲「光明星一號」（Kwangmyongsong-1）的人造衛星，而外務省發言人進一步指出：

> 和平使用外太空，是國際社會所公認的主權國家的權力……我們從來沒有對美國和日本使用人造衛星進行批評……因此我國擁有人造衛星，很自然的是我國主權之行使—但是這項能力會用於軍事與否，則完全端視我們敵對國家的態度而定。[3]

從朝美關係來看這次飛彈試射（或人造衛星發射），這其實是針對兩國自 1996 年以來就飛彈議題進行談判未能達成具體成果的表現，北韓希望透過進一步展現其導彈實力來迫使美國與其達成協議。這某種程度證明了柯林頓政府的對北韓政策必須進行修正，因此 1998 年 11 月，柯林頓任命前國防部長佩里（William Perry）爲「北韓政策協調員」（North Korea Policy Coordinator），要他對過去的兩國關係進行重新的檢視，並提出新的政策方案。

[3] KCNA (Sept. 4th 1998),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on successful launch of artificial satellite,"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4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1998/9809/news09/04.htm#2.

佩里於 1999 年 5 月訪問北韓，並於同年 9 月提出〈佩里報告〉。報告中指出，美國應該優先處理的是北韓的核武與長程飛彈問題，因爲報告中認爲若北韓掌握兩者其一或兩者均有時，將會破壞朝鮮半島上的嚇阻平衡，使得雙方緊張情勢升高，並阻礙彼此關係的改善，也有可能挑起東亞地區新一波的軍備競賽。不過任何解決相關問題的方法必會面臨到三個限制：首先，短期內北韓政權沒有改變的跡象，因此美國必須同現政權交涉；其次，若發生戰爭的話，不只會有 37000 名駐韓美軍喪生，更會有大量南北韓與盟軍軍民喪生；第三，雖然《框架協議》飽受批判，但是它卻是達成凍結寧邊核計劃和得以進行金倉里（Kumchang-ri）地區視查的基礎，因此當務之急不應該是試圖放棄《框架協議》，而應該設法達成其中的內容。最後在具體政策建議上，報告中提到「正常化」與「圍堵」併行的「雙軌策略」（two-path strategy）：在關係正常化方面，首先要確保北韓沒有核武計劃並停止飛彈之出口，此後美國將以逐步且互惠的方式減少美國對北韓構成的威脅和壓力，而若北韓最終願意放棄其核武和長程飛彈計劃的話，美國將會與之關係正常化，並解除相關的貿易制裁；不過若北韓在這方面不合作的話，就將採取圍堵的策略，也就是要盟邦合作確保各國自己的安全和圍堵任何來自北韓的威脅，同時美國也應確保《框架協議》之有效性並避免發生直接軍事衝突（Perry, 1999）。由於〈佩里報告〉的出爐，因此同時在柏林進行的朝美雙邊會談也出現了改善的契機：柯林頓於 9 月 17 日宣佈將解除根據《與敵國貿易法》（*Trading With the Enemy Act*）、《國防生產法》（*Defense Production Act*）等規定中北韓的經濟制裁，而北韓方面則於 24 日宣佈在朝美會談期間將不會試射飛彈（Michishita, 2010: 127）。

2000年10月9日到12日，北韓國防委員會第一副委員長趙明祿作爲金正日特使訪問美國，和柯林頓總統、國務卿歐布萊特和國防部長柯漢（William Cohen）等人會面，並在這次訪問中達成《美朝聯合公報》和《關於國際恐怖主義聯合宣言》（*Joints Statement on International Terrorism*）。其中在《美朝聯合公報》中提到：

作為（改善關係的）第一步，雙方都宣佈對對方不持有任何敵對意圖，並承諾雙方會往建立擺脫過去敵對關係的新關係努力。雙方都同意要努力去除彼此間的互不信任、達到互信並以具建設性的態度來達成1993年6月11日朝美聯合宣言和1994年10月21日框架協議的內容。有鑑於此，雙方都重新確定，兩國關係應該建立在相互尊重主權和不干涉對方國內事務的原則上，如此有有利於透過雙邊和多邊管道建立日常外交接觸。雙方也同意要彼此合作以發展互利經濟合作與交換……雙方均認識到飛彈議題的解決對於朝美關係改善和亞太地區的和平與安全能做出重要貢獻。朝方通知美方，在雙方進行建立新關係談判的過程中，朝方不會發射任何長程飛彈。朝鮮和美國也都保證會加強對於框架協議義務執行上的用心與努力，並全力確認如此可以達到朝鮮半島的非核化、和平和安全。[4]

而在《關於國際恐怖主義聯合宣言》中，北韓宣佈反對針對任何國家或個人的任何形式之恐怖主義，而美國則承諾會在合乎國內法的情況下，儘速將北韓由「贊助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名。10月23日到25日，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也訪問平壤，在和金正日的會談中，金正日承諾不會製造、測試或部署射程500公里以上的飛彈，提出停止飛彈輸出以換取美國給與價值10億美金的糧食或能源援助給北韓，也希望美國可以協助北韓的人造衛星發射計劃這樣北韓就不用進行本土的飛彈發展計劃（Michishita, 2010: 127-128）。

本來有意訪問北韓的柯林頓最後在12月28日宣佈將不會在任內訪問北韓，也結束了朝美高層在柯林頓政府末期的密集交流。

（三）布希政府

朝美關係在柯林頓政府末期達到最高潮，兩國不只進行高層互訪、達成《美朝聯合公報》、飛彈談判進行順利，而美國對北韓的糧食、能源援助與經濟制裁的解除也正在逐步落實，因此對北韓而言，希望能夠持續兩國間這種正面發展的

[4] KCNA (Oct. 12th, 2000), "Joint communiqué between DPRK and USA,"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4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0/200010/news10/12.htm#3.

關係。北韓外務省發言人在2001年1月25日時就表示「朝鮮完全準備好面對美國新政府所採取的任何政策立場」，但是北韓也了解到新上台的布希政府傾向於對北韓採取較強硬的政策，因此也提到「若美國拿劍向我們揮舞，我們也會以劍回擊；若美國展現其誠意的話，我們會回報之。」[5]北韓在這段期間也分別派了其駐聯合國大使李亨哲（Li Hyong Chol）及外務省中負責對美事務主任韓成烈（Han Song Ryol）到華府就重啓雙邊會談與接觸，向布希政府進行探尋，不過布希政府以要對柯林頓政府時期的外交政策進行全盤重新檢視爲由，未對北韓所提出的重啓雙邊會談進行回應（Quinones, 2003: 205-206）。面對美方對於重啓雙邊會談遲遲沒有回應，北韓官方也提出了強硬的回應，表示：

> 美國新政府的外交與國家安全政策團隊逐漸地對平壤採取「強硬態度」，宣稱柯林頓前政府時期所做的只是給北方好處而已，因此新政府會採取和柯林頓政府時期不同，強調「分階段執行」和「帶有條件與嚴格互惠性」的「交往政策」……根據日內瓦朝美框架協議和紐約朝美聯合公報等文件，朝美雙方同意去除長期以來構成雙方互不信任、對立和誤解之根，朝關係正常化努力。據此，雙方有義務終結敵對關係、建立互信以去除彼此之疑慮。因此，美國所提出的「有條件互惠」和「分階段執行」代表唯有朝鮮先動作，美國才會履行期承諾……朝鮮一直以來堅持的立場是，唯有在華府向朝鮮保證不會威脅我國安全並採取實際行動終結敵對關係時，朝鮮才會解除對美國之威脅……若美方仍如今日般，對於執行框架協議內容如此不真誠的話，那我國也沒有受其約束之必要……美國堅持唯有建立國家飛彈防禦系統才能對付來自朝鮮的「飛彈威脅」，並稱呼我國為「流氓國家」，在人類面對20世紀的戰爭、對立和鮮血並於新世紀想追求真正和平之際，是相當落後的思維。這也是土匪般的邏輯……如果朝美間沒有任何協議的話，我國就不受到前任美國政府有關飛彈議題的要求。我國雖然決定會談

[5] KCNA (Jan, 25th, 2001), "DPRK ready to cope with whatever stand to be taken by new U. S. administration,"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1/200101/news01/25.htm#1.

期間不試射長程飛彈，但不表示會永遠不試射……對於任何可能發生的事態，我國都有所準備了。[6]

2001 年 6 月 6 日，布希政府提出新的對北韓政策，在布希總統的聲明中，他提到希望加快在《框架協議》中有關核議題內容之執行、對於北韓的飛彈計劃與飛彈出口進行可驗證之約束，並希望北韓減少其傳統武力規模（Bush, 2001）。在這段聲明中，布希對於美國政府應盡之義務隻字未提，反而在柯林頓時期的核子與飛彈議題外，另外加入傳統武力的議題，這等於是變向地要求朝美雙邊會談的前提條件是北韓全面性的裁武。對此，北韓方面自然也難以接受，在 7 日針對美國於東海部署神盾級（*Aegis*）戰艦表示「她們真正的目標是要用武力威脅朝鮮，並隨時動員大量飛彈對我國進行先制攻擊」[7]，10 日《勞動新聞》的社論則批評布希政府的孤立主義與保守主義的政策是落後於時代潮流，如此持續下去美國只會遭致國際社會的更多譴責[8]，13 日《勞動新聞》更直接稱呼美國爲「侵略者」和「強盜」[9]，足見北韓當局對布希新政策之不滿。

雖然如此，北韓仍舊希望可以與美國重新開啓雙邊對話，因此分別在 6 月 26 日和 7 月 9 日的《勞動新聞》社論中重申北韓的基本立場表示，「恢復對話不是美國給朝鮮的禮物」[10]，認爲布希所提出的核武、飛彈、傳統武力等三個重啓會談條件是北韓所無法接受的[11]，因爲「美國所提起的不實際和不合理之議題永遠不會是朝美會談的議題」，並認爲當務之急是要討論美國如何放棄對北韓的

---

[6] KCNA (Feb. 22nd, 2001), "Spokesman for DPRK Foreign Ministry on new U. S.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DPRK,"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1/200102/news02/22.htm#1.

[7] KCNA (Jun, 7th, 2001), "U. S. will have to pay a high price,"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1/200106/news06/07.htm#11.

[8] KCNA (Jun, 10th, 2001), "U. S. urged to change its attitude,"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1/200106/news06/10.htm#5.

[9] KCNA (Jun. 13th, 2001), "U. S. branded as aggressor and plunderer,"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1/200106/news06/13.htm#10.

[10] KCNA (Jul. 9th, 2001), "U. S. urged to properly understand DPRK's principled stand toward U. S. proposal," *Korean News Service*. Retrieved on Jun. 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1/200107/news07/09.htm#9.

[11] KCNA (Jun, 26th, 2001), "U. S. urged to properly approach DPRK-U. S. negotiations," *Korean News Service*. Retrieved on Jun 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1/200106/news06/26.htm#1.

敵對政策，以及如何彌補北韓在無法如期提供輕水反應爐情況下所造成的電力損失[12]。10 月 23 日北韓外務省發表發明，除了持續批評布希政府提出的條件外，也認爲雙邊會談應該以「有關執行框架協議內的相關實際問題和兩國所簽訂的聯合公報內容爲始」，並要求雙方的會談應該從柯林頓政府後的結果爲起點繼續發展[13]。在發生「九・一一事件」後，北韓外務省也發表聲明表示「這場相當遺憾與悲劇的事件再度提醒我們恐怖主義的嚴重性。作爲聯合國會員，朝鮮不會改變反對任何型式的恐怖主義及所有支持恐怖主義作爲之態度」[14]，也表示願意加入《防止金融資助恐怖主義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for the Suppression of the Financing of Terrorism*）和《反對挾持人質國際公約》（*International Convention against the Taking of Hostages*）[15]，透過支持美國的反恐行爲希望能夠與美國有進一步接觸。

2002年是朝美關係急轉直下的一年。2002年1月29日，布希在國情咨文中將北韓和伊拉克、伊朗同列爲「邪惡軸心」（”Evil of Axis”）國家，並批評北韓爲「以飛彈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武裝自己同時，使自己百姓挨餓的政權」（Bush, 2002），視北韓爲應該去除掉而非與之談判的國家（Armstrong, 2004a: 25）。不過布希在隔天接受記者訪問時也提到，若北韓願意裁撤其傳統武力並停止武器輸出的話，美國願意與北韓展開對話（三船恵美，2002：10）。1月31日北韓外務省反批布希政府採取「單邊主義和自我意見中心的外交政策」，並認爲布希的言論「接近於向朝鮮宣戰」，而「美國公開地揭露其欲用武力打擊朝鮮的企圖使我們了解到，朝鮮一直警戒美國作爲，並採取勒緊腰帶、發展強大攻擊性與防禦性手段的作爲是極有遠見的政策。」[16]3月9日，美國《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

[12] 同註 10 和 11。

[13] KCNA (Oct. 23rd, 2001), “Spokesman for DPRK Foreign Ministry slams Bush’s remark,”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1/200110/news10/23.htm#9.

[14] KCNA (Sept. 12th, 2001), “DPRK stance towards terrorist attacks on U. S.,” *Korean news Service*. Retrieved on Jun. 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1/200109/news09/12.htm#3.

[15] KCNA (Nov. 3rd, 2001), “DPRK accedes to major anti-terrorism conventions,”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1/200111/news11/03.htm#8.

[16] KCNA (Jan. 31st, 2002), “Spokesman for DPRK Foreign Ministry slams Bush's accusations,”

把美國國防部提交給國會的秘密文間《核子態勢報告》（*Nuclear Posture Report*）洩漏出來，其中把北韓視爲「立即性的危機」（immediate contigency），列爲美國的核打擊對象之一（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2: 16）。針對這項核武政策，北韓外務省的回應是：「在現階段核武瘋子在白宮掌權的狀況下，我們被迫重新檢視所有曾和美國達成的協議。萬一美國用武力攻打朝鮮的計劃成真，朝鮮將被迫在不受任何朝美協議的約束下，採取反制手段。」[17]6月4日，美國國務卿鮑威爾（Colin Powell）則提出兩國進一步會談的前提條件爲：一、北韓不再進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擴散行爲，也不要再以長程導彈威脅他國；二、北韓應該盡力改善國內兒童健康狀況不佳的問題；三，北韓應該朝減少其傳統武力威脅方向努力；四、北韓應該要完全接受NPT與IAEA的相關規範（Harnisch, 2002: 872）。7月31日在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的會場上，北韓外長白南淳（Paek Nam Sun）和鮑威爾進行會談，北韓方面表明接受美方派助理國務卿凱利（James Kelly）爲特使至北韓進行會談[18]。

不過10月凱利訪問平壤的行程無助於改善兩國關係，反而開啓了第二次核武危機。3日他在和北韓副外長金桂冠（Kim Kye Gwan）會面時表示美國已經握有北韓違反框架協議發展濃縮鈾（enriched uranium）計劃的證據，希望北韓方面提出說明；次日，北韓方面由第一副外長姜錫柱出面，反問凱利：「我們擁有精鍊鈾計劃有錯嗎？我們當然有權利擁有自己的濃縮鈾，而且也有能力製造出比這更爲強大的武器。」（轉引自Funabashi, 2007: 94）此外，姜錫柱也表示北韓方面認爲《框架協議》已經失效，並認爲若美國願意與北韓達成互不侵犯協議、解除對北韓的制裁、不要阻撓北韓和日本關係正常化、與北韓關係正常化，以及賠償拖延輕水反應爐建設對北韓造成的損失的話，北韓願意就核議題的解決方案與美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2/200201/news01/31.htm#1.

[17] KCNA (Mar. 13th, 2002), "DPRK ready to take countermeasure against U.S. nuclear attack,"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2/200203/news03/13.htm#13.

[18] KCNA (Aug. 1st, 2002), "DPRK foreign minister meets U. S. state secretary,"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2/200208/news08/01.htm#3.

國進行高層會談（Michishita, 2010: 163）。在凱利歸國後，北韓外務省於7日更發表聲明，表示：

> 特使以高姿態和跋扈的態度提出「關切議題」，提到朝日關係、北南關係和朝美關係的只有在朝鮮滿足美國所單方面要求的核武、飛彈、傳統武力和「人權」議題後才能平順解決。美方所提出的「關切議題」是對朝鮮敵對政策之產物……布希政府採取的不是對話政策，而是一種帶有敵意的強硬政策，目的是要迫使朝鮮屈服……美國不會把朝鮮從「邪惡軸心」和「先發制人的核攻擊」名單中除名，且至今仍維持單方面對北韓的強硬敵對政策……這種不變的政策迫使朝鮮必須採取所有必要的反制措施……[19]

10月16日，美國政府宣佈在美朝會談中，北韓官員承認發展作爲核武用途的濃縮鈾計劃，認爲北韓此舉嚴重違反NPT、《框架協議》和《朝鮮半島非核化宣言》等條文規定。北韓方面也有所回應，不承認其有濃縮鈾計劃，認爲當時的回應只是爲了要提出新的解決方案，同時批評美國完全沒有誠意履行《框架協議》內的義務，並希望在承認北韓主權、承諾不侵犯北韓以及不妨礙北韓經濟發展的三前提下，與美國進行核子議題的會談[20]。不過由於美方沒有回應北韓的要求，加上美國將該議題提交到KEDO促使其中止對北韓的重油援助，因此北韓於2003年1月10日宣佈退出NPT[21]，並於6月9日表示若美國持續用核武威脅北韓的話，只有發展核嚇阻力一途[22]。

美國爲了解決第二次核武危機，先是在 2003 年 4 月和北韓與中國進行「三方會談」，自同年 8 月起展開「六方會談」，試圖以多邊外交的途徑解決此問題，

---

[19] KCNA (Oct. 7th, 2002), "Spokesman for DPRK FM on DPRK visit of special envoy of U. S. President",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2/200210/news10/07.htm#1.

[20] KCNA (Oct. 25th, 2002), "Conclusion of non-aggression treaty between DPRK and U.S. called for,"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2/200210/news10/25.htm#1.

[21] KCNA (Jan. 10th, 2003), "Statement of DPRK Government on its withdrawal from NPT,"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3/200301/news01/11.htm#1.

[22] KCNA (Jun. 9th, 2003), "KCNA on DPRK's nuclear deterrent force,"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3/200306/news06/10.htm#7.

而細節將會於本章第三節中進行說明。在前三輪的會談中，由於北韓和美國在看法上相當分歧，因此「六方會談」並沒有達成具體的共識，北韓方面則認爲「美國是否能放棄敵視朝鮮的政策，將會是會談中是否能生出果實的試金石」[23]，而「如果美國一直抱持著不改變對朝政策的態度的話，六方會談只會成爲無法解決朝美核問題的無用會談而已」[24]，表達對美國方面的失望。12 月 9 日，北韓外務省宣佈願意接受美國所提出來的「書面安全保障」，而希望在第一階段北韓凍結其核設施的同時，美國能夠將其從「贊助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名，能夠解除對北韓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制裁，也能夠提供其能源援助[25]。對此，美國方面沒有直接回應，反倒是副總統錢尼（Dick Cheney）回應「我們不與惡魔談判，我們打敗他們」（轉引自 Michishita, 2010: 166），間接表示美國不願意在「六方會談」框架外另外進行兩國會談的意思。2004 年 10 月 18 日，美國國會通過《北韓人權法案》（*North Korean Human Rights Act*），讓美國政府能夠在北韓境內提供北韓人民人道援助，資助相關私人機構向北韓推廣人權、民主、法治和市場經濟觀念，促進北韓內部的資訊流通，以及提供脫北者人道與法律援助等。北韓方面沒有直接回應，只有在聯合國大會中表示美國將北韓視爲「邪惡軸心」與「先發制人的核攻擊對象」的政策才是朝鮮半島核問題的癥結[26]。直到 2005 年 3 月才在外務省的備忘錄中引用「美國之聲」（Voice of America）的內容，明確批評該法爲「以保護脫北者的名義，企圖使朝鮮體制破壞的戰略。」[27]

2005年2月10日，在布希第二任期開始三週後，北韓外務省發表了重要的聲

---

[23]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3 年 8 月 5 日），〈会談の成果は米国の態度にかかっている〉，《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rokusya.2003080500.html。

[24]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4 年 2 月 29 日），〈米国の態度に失望―第２回６者会談開催で―〉，《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rokusya.2004022900.html。

[25] KCNA (Dec. 9th, 2003), "Spokesman of DPRK Foreign Ministry on Issue of Resumption of Six-Way Talks,"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ndex-e.htm.

[26] KCNA (Oct. 20th, 2004), "DPRK Delegate Manifests Stand for Permanent Peace,"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6th, 2004. http://www.kcna.co.jp/item/2004/200410/news10/21.htm#4.

[27]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5 年 3 月 2 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外務省備忘録〉，《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0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shiriyo.tyoson.2005030200.html。

明，內容指出：

> 我國多次提出希望美國能夠放棄顛覆朝鮮體制的敵視政策，並轉變為朝美和平共存的政策，表明如此一來，全部的核問題就得以解決之立場。但是，第二任布希政府終究還是無視於我國的正當要求，從總統就職的演說、年度國情咨文和國務卿人事任命聽證會中的發言可以得知，布希政府將把絕對不與我國共存的原則給具體政策化……外務省面對美國的敵視朝鮮政策之重大事態，發表下面幾點聲明：首先，雖然我們希望六方會談能夠召開，但是在確認我國參加之合理性以及構成會談成果產生的氣氛成熟以前，我國無可奈何地將無限期中止參加六方會談……其次，在美國仍揮舞著核武的棒子，試圖無論如何都要封殺我國體制之際，為維護朝鮮人民所選擇的思想、體制、自由和民主主義，將會增加我國的核子武器庫存……我國已經為了對抗布希政府施加於我國的孤立、封殺朝鮮政策而堅決地脫離核武不擴散條約，為了自衛而生產核武。我國的核武，將會是會了發展自衛性核嚇阻能力而發展的核武……以對話和協商解決問題是我國一貫的原則和立場，而追求朝鮮半島非核化的最終目標也始終沒有改變。[28]

這段談話可以視爲北韓正式向國際社會宣佈自己正在發展核武的宣言，同時也強調自己的核武發展是基於自衛與建立嚇阻能力所進行的發展。布希政府在第二任期中對於外交人事也進行更換，因此也發展了外交與防禦性手段併用的「雙軌」對朝政策（Michishita, 2010: 168），一方面不透過雙邊和多邊外交談判希望與北韓進行交涉，另外一方面也希望利用各種制裁手段乃至軍事手段對北韓施加壓力，希望北韓能改變其行爲。針對美國的施壓手段，北韓於2005年4月25日的外務省發言中一如往常地表示，北韓視任何由安理會進行的制裁爲宣戰行爲，且美國在改變其對北韓不友善的政策以前，北韓沒有回到「六方會談」之合理性[29]。經過

[28]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5 年 2 月 10 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外務省声明〉，《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shiriyo.kaku.2005021000.html。

[29] KCNA (Apr. 25th, 2005), "Spokesman for DPRK Foreign Ministry Assails Rice's Reckless Remarks," *Korean Nee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0th, 2012.

雙邊多次的協商，金桂冠和美國新任「六方會談」代表希爾（Christopher Hill）才於7月達成協議，北韓決定返回「六方會談」。

9月15日，美國財政部突然針對澳門匯業銀行（Banco Delta Asia）進行制裁，認定該銀行的帳戶協助北韓進行洗錢工作，下令美國的金融機構中止與該銀行之間的往來，同時也要求其他銀行停止和北韓之間的業務往來。10月12日，美國指控北韓進行俗稱「超級鈔票」（”surpernote”）的高品質100美元鈔票的僞造工作，也在18日以疑似參與大規模毀滅性擴散活動爲由，凍結了八間北韓公司在美國的資產，12月7日美國駐韓大使Alexander Vershbow更直接稱呼北韓爲「犯罪國家」（重村智計，2006：77-78；楊永明，2008：388；Michishita, 2010: 170）。同年11月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 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決定中止對北韓的糧食援助，KEDO也於2006年1月撤出所有的輕水反應爐建設人員（Michishita, 2010: 170-171）。針對美國這一連串被北韓的制裁行爲，北韓方面自然相當光火，對於美國所提出的僞鈔事件強烈否認，並認爲美國在「六方會談」進行途中進行這種制裁行爲是在「玩弄小聰明」[30]、是使本來已經不樂觀的情形持續惡化下去[31]，並反過來指控美軍基地才是全世界流通之僞鈔的來源[32]，同時要求解除對北韓的金融制裁，認爲這是傷害「六方會談」誠信精神的最大障礙[33]。北韓方面爲了表現誠意，於2006年2月9日透過外務省發言人表示「朝鮮政府一直以來的政策是反對在金融領域的所有非法行爲。朝鮮擁有對付僞鈔和洗錢等非法金融行爲的完整法律與制度體系，並會對此非法行爲進行嚴厲處罰。朝鮮會如以往一樣，積極參與反對洗錢行爲之國際行動。」[34]

---

http://www.kcna.co.jp/item/2005/200504/news04/26.htm#1.

[30]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6年3月25日）〈小細工を弄してはならない〉《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2012年6月10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shiriyo.kaku.2006032500.html。

[31]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6年3月13日），〈情勢を故意に激化させる行爲〉，《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2012年6月10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shiriyo.kaku.2006031300.html。

[32]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6年4月19日）〈僞造紙幣は米軍基地で印刷〉《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2012年6月10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shiriyo.cyomi.2006041900.html。

[33]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5年12月2日），〈金融制裁解除は、6者会談進展の必須の要求〉，《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2012年6月10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shiriyo.kaku.2005120200.html。

[34] KCNA (Feb. 9th, 2006), “DPRK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Urges U.S. to Make Policy

7月5日，北韓朝日本海進行多種不同飛彈的試射，導致聯合國安理會在7月15日通過《第1695號決議》，要求會員國避免向北韓輸入飛彈相關物品和技術，同時也要阻止任何與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相關的資金移轉（Michishita, 2010: 171-172）。針對此制裁，北韓在次日發表強硬聲明，認爲飛彈發射是作爲國防自衛訓練的正當軍事活動的一環，針對此次安理會決議，北韓外務省提出兩點聲明：

> 第一、朝鮮全面反對與排斥由美國的對朝敵視政策主導的聯合國安全理事會決議，並將完全不受其拘束。第二、針對美國所採取的極端敵對行為，朝鮮將會因應可能到來的最壞情形，用盡各種手段與方法全方面地強化我國在自衛戰爭中的對抗能力。[35]

10月9日，北韓進行第一次核武試爆，震驚全世界。不過北韓外務省早在3日就已經預告將要進行核武試驗了，同時指出自己的不首先使用核武以及不進行核武技術轉移的核武政策，並強調北韓會在全球核裁武的脈絡下追求終極的全面核裁武與朝鮮半島之非核化[36]。布希政府對此馬上發表聲明，除了譴責北韓的行爲外，也認爲此舉違反了國際社會的普遍意向，因此會將此議題提交到聯合國安理會上進行進一步的討論與處理（Bush, 2006）。北韓外務省則在11日回應說北韓的核武試爆完全歸因於美國對北韓造成的核威脅、制裁和壓力，認爲布希政府以制裁和封鎖回應北韓希望透過對話解決核問題的誠意，只要美國還有絲毫的對朝敵對政策，北韓就仍有保留核武的必要，另外也強調自己希望透過對話達成朝鮮半島非核化的目標始終沒有改變[37]。而在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1718號決議》對北韓進行制裁後，北韓外務省也在17日發表聲明駁斥這次決議，認爲這次核武

Switchover,"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6/200602/news02/10.htm#18.

[35]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6年7月16日）〈ミサイル発射は自衛的権利〉《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2012年6月10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shiriyo.kaku.2006071600.html。

[36] 同第三章註16。

[37] KCNA (Oct. 11th, 2006) "DPRK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on U. S. Moves Concerning Its Nuclear Test," *Ko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6/200610/news10/12.htm#1.

試驗是「作爲主權國家擁有合法防禦手段以保護國家與人民生命安全，免於美國不斷升高的核武戰爭威脅、制裁和壓力的獨立性且具正當性的行爲」，認爲安理會此舉是「向美國無知的對朝敵視政策屈服」，是「向朝鮮的宣戰行爲，因爲（決議內容）是基於美國希望摧毀以人民大眾爲中心的朝鮮式社會主義之劇本」，因此認爲決議乃是美國對朝敵對政策的產品故完全反對之[38]。

爲了解決雙方的僵局，兩國代表在10月31日於北京會面，其中希爾承諾會把對北韓的金融制裁和「六方會談」內的議題分開討論，北韓方面也於次日承諾回到「六方會談」。2007年1月16日到18日，金桂冠和希爾在柏林進行會談，其中金桂冠同意北韓將會在60天內關閉在寧邊的核設施以換取美國提供其重油援助，另外也在1月30日到31日於北京進行的不同會議中就解除北韓的金融制裁進行會談（Michishita, 2010: 173）。此後，兩國相關問題的談判均在「六方會談」框架中進行，其中兩國曾於3月5日到6日於紐約就邦交正常化進行會談，美國也於6月15日實際上解除對北韓的金融制裁，2008年6月26日在北韓將相關核計劃資料交給中國後，布希宣佈將北韓從《與敵國貿易法》名單中除名，也於10月11日將北韓從「贊助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名（月間論調，2007；礒崎敦仁、澤田克己，2010：287；Bush, 2008；Michishita, 2010: 174, 176）。

（四）歐巴馬政府

北韓在歐巴馬政府就任前，就發表了許多與對美政策以及呼籲美國改變對北韓政策的聲明。如在2009年1月15日就在《勞動新聞》中發表〈美國應該爲朝鮮半島的和平保障採取負責任的態度〉之社論，認爲兩國之前數十年的敵對關係是起源於美國的對朝敵視政策，美國作爲《停戰協定》的締約國且在南韓實行軍事統制，自然有義務和北韓就和平協議問題進行會談，以達成朝鮮半島之和平[39]。

---

[38] KCNA (Oct. 17th, 2006), "DPRK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Totally Refutes UNSC 'Resolution'," *Ko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6/200610/news10/18.htm#1.

[39]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1 月 15 日），〈米国は朝鮮半島平和保障の責任を履行すべきだ〉，《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0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obama2009011500.html。

又如在1月17日，外務省發言人則表示北韓的核問題和朝美兩國的邦交正常化議題是兩個完全不相干的議題，表示倘若兩國邦交正常化後美國仍不減少對北韓的核武威脅的話，北韓也仍然不會放棄其核武的[40]。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2月13日談到新政府的亞洲政策時提到，北韓核問題是歐巴馬政府希望解決的東北亞主要安全問題之一，希望能與周遭各國進行協調利用「六方會談」的框架，達成北韓全面棄核與返回NPT之目標，若北韓願意完全且可驗證地放棄其核武的話，美國願意與其就邦交正常化、達成和平協議、提供經濟與其他經濟援助等議題與北韓進行雙邊會談，而歐巴馬政府的動作將取決於北韓當局的反應（Clinton, 2009a）。

北韓在4月5日北韓以發射人造衛星爲名，進行「大浦洞二號型」（Taepodong-2）的洲際飛彈試射。當時人在捷克訪問的歐巴馬認爲不論北韓所聲稱的發射火箭的理由爲何，都嚴重影響到東北亞地區的安全，也認爲這與北韓企圖威脅周遭國家與進行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擴散有關，因此美國會將此議題提交聯合國安理會上去，同時也呼籲爲了促使北韓達到全面放棄其核計劃，各國應該施壓促使北韓改變其作爲，同時也向北韓表示，國家的安全和尊嚴是不會透過威脅他國和取得非法武器而得來的（Obama, 2009a, 2009b）。5月25日，北韓第二度進行核武試爆，並強調「核武實驗是以先軍的威力守護國家與民族的自主權、守護社會主義，爲朝鮮半島和周邊地區的和平安全保障爲前提進行的。」[41]歐巴馬在次日召開記者會譴責北韓的行爲，認爲「北韓的行爲促使東北亞地區的人民陷入恐慌中，它們是明顯違反國際法、違反北韓自己所答應之承諾的行爲」，並承諾會同中、俄、日、韓等國在聯合國安理會上處理這次核試爆議題（Obama, 2009c）。針對歐巴馬政府的發言與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1874號決議》對北韓的制裁，北韓方面認爲：

> 這是美國所主導的，想要解除我國武裝、使我國經濟窒息的欲破壞我國人

[40]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1 月 17 日），〈米国との関係正常化と、核は別問題〉，《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0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yosong2009011700.html。

[41]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5 月 25 日），〈地下核実験実施〉，《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cyokaku2009052500.html。

民所選擇的思想與制度之國際性壓迫攻勢的醜陋產物之一……我國第二次核試驗是為了對抗美國敵對行為所採取的沒有牴觸國際法的自衛性措施。今天，在有關和平與安全問題的對決之本質上，是攸關我們共和國自主權與尊嚴的問題，是朝美對決的問題……事到如今，要我國放棄核武是絕對徹頭徹尾不可能的事情，這跟外國承不承認我國擁有核武與否一點關係也沒有……以報復回應制裁，以全面對決回應對決，是我國基於先軍思想將會堅決採取的對應手段。[42]

6月11日，美國新任的六方會談代表博斯沃斯（Stephen Bosworth）發表了歐巴馬政府的對北韓政策的「四類戰略」（”four-pronged strategy”），強調和區域國家間緊密的合作與協商、強調併用聯合國與美國國內法下的制裁手段、強調採取必要的防禦性手段、強調若北韓展現出願意棄核之誠意將與其進行外交接觸，同時也表示出願意與北韓就和平協議和關係正常化進行會談（Michishita, 2009: 144-145）。歐巴馬在8月接受NBC訪問時也曾提到，歐巴馬政府的北韓政策是「要確保北韓政府按照國際社會的基本規範運作。」[43]同年12月10日，國務卿希拉蕊也表示「我們政府所採取的途徑是在與六方會談盟友的緊密協調下的戰略性容忍，我認為向北韓當局表明我們的期待為何以及我們如何前進是必要的」（Clinton, 2009b）。由此看來，歐巴馬時期的對北韓政策是要追求打破之前三任政府在與北韓交涉的「危機趨動」循環，不試圖改變北韓體制也不強求其完全接受西方式觀念，在與國際社會密切合作與協調的情形下，要求北韓按照國際社會的規範行事，並希望北韓放棄其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和重返相關國際建制當中，而只要是有關這方面議題的會談，美國都樂意以雙邊或多邊的型式與北韓進行對話和接觸，但是在北韓不遵守相關規定的情形下，美國也不惜以多邊或國內法來制裁北韓，促使其改變有危區域安全和不擴散建制之行為。而這種「以靜待變」的作為也使得北

[42]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6 月 13 日），〈安保理「決議」で朝鮮外務省声明〉，《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cyokaku2009061300.html。

[43] The New York Times (Aug. 8th,.2009), “Coming to Terms With Containing North Korea,” *The New York Times*. Accessed in Jun. 11th,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09/08/09/weekinreview/09sanger.html?fta=y.

韓的「非傳統式」外交難以發揮效用，導致兩國關係在歐巴馬政府時期既未惡化，亦未改善。

兩國自 2009 年下半年到 2011 年上半年間並沒有太多的密切互動，期間兩位前總統柯林頓和卡特曾分別在 2009 年 8 月和 2010 年 8 月為了營救為北韓所拘補的美國公民以私人名義前往北韓，其中柯林頓曾和金正日、卡特同金永南間均曾就其他議題進行討論，北韓方面也希望藉此機會能夠突破歐巴馬政府的「戰略性容忍」政策，但是歐巴馬政府將兩位前總統的訪朝行程定位為「私人行程」（”private tour”），因此未就兩位前總統與北韓領導人之間的會談給予任何政治上的追認與承諾[44]。同時，2010 年 3 月 26 日的「天安艦（*Cheonan*）事件」和 11 月 23 日的「延坪島（Yeonpyeong）砲轟事件」中，美國均站在譴責北韓的立場，使得北韓在這對段期間對美國的發言相當強硬，斥責其軍事外交作為仍維持冷戰時代的思維[45]，美國所謂的「北韓威脅論」只是為了合理化其侵略戰爭的藉口[46]，並指責美國透過軍事部署和聯合軍事演習行為，才是破壞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區域安全的真正挑釁[47]。

2011 年下半年，朝美兩國進行了多次的會談。美國國務卿希拉蕊在 2011 年 7 月 24 日邀請北韓副外長兼「六方會談」北韓代表金桂冠到紐約與博斯沃斯進行會談（Clinton, 2011），雙方於 28 日和 29 日進行會談，雙方就北韓重返「六方

---

[44]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8 月 27 日），〈カーター元米大統領訪朝〉，《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cyomi2010082700.html; CNN (Aug. 4th, 2009), “U.S. journalists head home from North Korea,” *CNN*. Accessed in Jun. 11th, 2012. http://articles.cnn.com/2009-08-04/world/nkorea.clinton_1_two-american-journalists-clinton-spokesman-north-korea?_s=PM:WORLD; The New York Times (Aug. 5th. 2009), “Bill Clinton and Journalists in Emotional Return to U. S.,” *The New York Times*. Accessed in Jun. 11th,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09/08/06/world/asia/06korea.html?partner=rss&emc=rss.

[45]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2 月 1 日），〈冷戦思考方式の永久駐屯妄言〉，《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obama2010020100.html；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8 月 30 日），〈合同軍事演習は、冷戦式思考方式のあらわれ〉，《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obama2010083000.html。

[46]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9 月 21 日），〈朝鮮「脅威」説は、侵略戦争政策合理化の口実〉，《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obama2010092100.html。

[47]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1 年 3 月 17 日），〈米国こそが、真の挑発者〉，《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obama2011031700.html。

會談」與北韓的核計劃進行討論，金桂冠本人則表示「這次會談相當具有建設性和實務性」[48]，不過美方則將其定義爲「試探性會談」（exploratory talks），不是真正的高層會談[49]。北韓外務省在 8 月 1 日也發表聲明表示希望在沒有前提條件的情況下召開「六方會談」[50]。10 月 22 日，朝美兩國的軍方代表也在曼谷進行三天會談後達成協議，北韓方面允許美方進入北韓境內針對韓戰時期失蹤與陣亡美軍的遺骸進行搜尋，期間所有費用由美國單方面負擔[51]。10 月 24 日和 25 日，金桂冠和博斯沃斯與將接任成爲新任美國駐「六方會談」代表的戴維斯（Glyn Davies）在日內瓦進行會談，過程中雖然沒有達成具體共識，但是美方代表表示這次會談有助於建立足以重啓「六方會談」之具體共識，同時雙方的歧見也有縮小[52]。

貳、南韓

一、金正日時期兩韓關係之性質

北韓的對南政策一直以來都與其對美政策有密切關係，因爲北韓不承認南韓政權的合法性，認爲南韓只是美國帝國主義下所扶持的「傀儡政權」，雖然這種說法在兩韓自 1970 年代有更爲密集的交流以來有所軟化，但北韓至少仍視南韓爲美國的「附庸國」，認爲美國對南韓有極大影響力（Armstrong, 2004b: 50-51），

---

[48] USA Today (Jul. 29th, 2011), "Talks between U. S., North Korea end," *USA Today*. Accessed in Jun. 11th. 2012. http://www.usatoday.com/news/nation/2011-07-29-north-korea-nuclear-program_n.htm.

[49] China Daily USA (Jul. 29th, 2009), "US, DPRK end 'business-like' talks," *China Daily USA*. Accessed in Jun. 11th, 2012. http://usa.chinadaily.com.cn/us/2011-07/29/content_13007279.htm.

[50] KCNA (Aug. 1st, 2011), "DPRK to Hold Six-party Talks without Preconditions,"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1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11/201108/news01/20110801-20ee.html.

[51] 大紀元（2011 年 10 月 22 日），〈美朝達成尋找失蹤美軍遺骸協議〉，《大紀元》。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0/22/n3408346.htm%E7%BE%8E%E6%9C%9D%E9%81%94%E6%88%90%E5%B0%8B%E6%89%BE%E5%A4%B1%E8%B9%A4%E7%BE%8E%E8%BB%8D%E9%81%BA%E9%AA%B8%E5%8D%94%E8%AD%B0；大紀元（2011 年 11 月 3 日），〈美付鉅款重啓在北韓挖掘美軍遺骸〉，《大紀元》。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11/11/3/n3419693.htm%E7%BE%8E%E4%BB%98%E9%89%85%E6%AC%BE%E9%87%8D%E5%95%9F%E5%9C%A8%E5%8C%97%E9%9F%93%E6%8C%96%E6%8E%98%E7%BE%8E%E8%BB%8D%E9%81%BA%E9%AA%B8。

[52] BBC (Oct. 25th, 2011), "No agreement but US has 'positive' talks with N Korea," *BBC*. Accessed in Jun. 11th, 2012. 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pacific-15424869.

甚至希望繞過南韓或是製造美韓之間的磨擦來處理朝鮮半島議題。在金正日時代，雖然南北韓同爲聯合國會員國，但是北韓仍舊不承認南韓政權的合法性，但是卻在北韓改善同美國、日本間關係，以及改善國內經濟狀況兩方面上，更加地善用南韓這顆棋子，特別是利用金大中（Kim Dae Jung）、盧武鉉（Roh Moo Hyun）兩任左派政府確立了兩韓之間的經濟合作架構，也藉由當時所達成的雙邊共識來批判接任的李明博右派政府和國際社會上對北韓的譴責，甚至也利用南韓希望來牽制美國和日本對北韓不友善的政策。

就金正日時代兩國關係發展的過程來看，大致上可以分爲四個時期：「和平共存摸索期」、「關係停頓期」、「政經關係密切期」與「政冷經熱時期」。「和平共存摸索期」是由盧泰愚（Roh Tae Woo）總統的《七・七宣言》開始，兩韓在冷戰結束之際所進行的一連串接觸，這段時間雙方進行多次的總理級會談，達成《南北和解、互不侵犯，交流與合作協議》和《朝鮮半島非核化宣言》，兩國也同於 1991 年 9 月共同加入聯合國成爲正式會員國。「關係停頓期」則始於第一次核武危機開始，加上 1993 年初美國宣佈進行該年度的「團隊精神」聯合軍演和北韓宣佈退出 NPT，加上金泳三（Kim Young Sam）本身搖擺不定的對朝政策，讓兩韓關係陷入停頓不前的局面。金大中和盧武鉉時期是兩韓「政經關係密切期」，金大中的「陽光政策」（”Sunshing Policy”）和盧武鉉的「和平繁榮政策」（”Peace and Properity Policy”）使得兩任政府都採取積極與北韓交往、交流的政策，期間不僅舉行了兩次南北高峰會，南韓也在「六方會談」中採取略爲偏向北韓立場，同時也就金剛山（Kumgangsan）、開城等經濟特區達成基本協議，南韓也對北韓的提供糧食、能源等之援助。李明博政府雖然提出「非核・開放・3000」（”Non-nuclaer Opening 3000”）和「共存共榮」（”Co-Existence Co-Prosperity”）的對朝政策，不過李明博政府希望在維持和北韓間的經濟合作與政治對話前提上，修正前兩任政府的政策，與美國和日本進一步合作希望解決北韓核武問題，這導致北韓方面中止和南韓間的鐵路和金剛山觀光計劃，北韓高層也出現「和美國談判，孤立南朝鮮」的態度（Han, 2011: 48），南韓也在「六方會談」中採取更爲

強硬的態度甚至加入「防擴散安全倡議」（Proliferation Security Initiative，以下簡稱 PSI），但期間兩韓之間的經濟交流，尤其是開城工業區的經濟交流依舊熱絡（金向東，2011：763-766），使得兩國進入「政冷經熱時期」。

從內容和目的來看，北韓隨著追求目的之不同，而有不一樣的對政策內容，因此有必要先討論北韓對南韓政策目的。北韓對南政策的終極目標是要追求朝鮮半島的統一，並希望以自己的條件來達成此目標，只是目前的大環境因素對北韓言相當不利，因此北韓在堅持赤化統一南韓的終極目標前提下，也追求利用南韓的經濟優勢，藉由南韓給予的援助與兩韓間的經濟合作關係，使其政權體制得以維繫。而北韓追求朝鮮半島統一的原則，主要包括金日成所提出的「祖國統一三原則」[53]、「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方案[54]和「全民族大團結十大綱領」，以及金正日所提出的「民族大團結五大方針」等，這些爲北韓至今在南北會談和對外發言中不斷強調，也在實際對外行爲上奉爲圭臬的行爲準則。

根據上述的目的和原則，北韓把和南韓之間的關係定位爲國內事務，南北韓之間的問題不應該有外力的介入而應該由南北韓雙方共同解決；在實際談判方面，北韓的談判態度也由原本極力爭取正統性的「鬥士型談判」轉變爲希望解決問題以獲得具體利益的「商人型談判」（Hun, 2006）；在雙邊關係的具體協議中，北韓也亟力地希望把上述金日成與金正日有關朝鮮半島統一的主張納入其中，希望能夠至少在法律條文上，營造出符合北韓條件的統一方向。

二、金正日時期朝韓關係的發展

（一）盧泰愚政府

盧泰愚上台後便提出「北方政策」（*Nordpolitik*），希望透過改善與社會主義

[53] 金日成於 1972 年 5 月 3 日提出「祖國統一三原則」，內容爲：在不依賴外國勢力、沒有外國力量干涉的情況下，自主地實現統一；縱使在思想、理念和體制有所不同，但要努力促成民族大團結；不使用武力，以和平的方式實現祖國統一（金日成，1972b）。

[54] 金日成於 1980 年 10 月 10 日提出「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的統一方案，希望建立一個「互相承認和容納對方思想和社會制度，成立雙方以同等資格參加的民族統一政府，雙方實行地區自制，對外採取中立政策」的過渡性邦聯政府（金日成，1980）。這個主張金日成於 1991 年化約爲「一個民族，一個國家，兩種制度，兩個政府。」

集團國家間的關係來確保南韓的安全，也希望透過改善和北韓之間的關係實現民族統一的終極目標，其中針對改善和北韓之間的關係，他提出「七・七宣言」[55]的交流原則和「韓民族共同體」[56]的統一方案（朱松柏，2004：38-41；李敦球，2007：88-93）。面對盧泰愚政府的善意以及 1990 年蘇聯和南韓建交對北韓造成的衝擊，北韓方面除了堅持透過積極的對話消除兩邊的歧見，以達成「自主、和平、民族大團結」之統一外（金日成，1991b），同時也屈服於國際現實尋求「北南共存」的對南戰略。在 1991 年年初盧泰愚表達希望可以在該年加入聯合國之期盼後，北韓外務省於 5 月 27 日放棄其兩韓單一席次加入聯合國之要求，主張與南韓分別加入聯合國，並於 6 月 7 日正式向聯合國提出申請。北韓進行政策改變的理由不是因爲北韓承認南韓政府的合法性，而是因爲北韓認爲若只有南韓加入聯合國的話，則南韓會搶得對朝鮮半島事務與全朝鮮民族利益之話語權與代表權，如此會使得聯合國中對於朝鮮半島事務之討論產生偏見，爲避免這種事情的發生才選擇與南韓分別加入聯合國。最後，兩國於 9 月 17 日共同加入聯合國（李敦球，2007：98-99）。

於此同時，兩韓也自 1990 年 9 月起進行名爲「高位級當局者會談」的總理會談，其中北韓方面以延亨默、南韓方面以姜英勳（Kang Young Hoon）爲代表。北韓方面的主張包括：停止一切對對方之誹謗與中傷活動；廢除一切有礙雙方統一的法律與制度；拆除兩韓間的軍事障礙物；早日實現各政黨、團體及人民間的自由往來；兩韓於國際舞台上密切合作；雙方均禁止與外國軍隊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禁止外國軍隊在國內進行軍事演習；爲避免兩韓衝突擴大，建立熱線電話並禁止在停戰線之軍事挑釁行爲；雙方進行階段性裁軍；朝鮮半島應劃爲非核區；

[55] 《七・七宣言》中一改過去南韓對北韓採取敵視的態度，代之以促進雙方相互了解與增進民族感情作爲當前的對朝政策，內容包括促進雙方交流、積極安排離散家庭的會面與往來、開放南北間的經貿往來、不反對友邦同北韓進行非軍事物資交易、希望結束雙方在外交上的對立和惡性競爭，以及承諾協助北韓改善和美日等國間的關係，而南韓同時尋求改善和社會主義國家間的關係。

[56] 「韓民族共同體」統一方案是指雙方基於自主、和平、民主的原則進行統一，但是在統一成爲民主共和國以前，先共同建立「韓民族聯合」（The Korean Commonwealth），共同設立高峰會議、閣僚會議、南北評議會、共同事務處等機構，同時首爾和平壤互派代表、互設代表處，共同擬定憲法與進行公民投票，再組成統一的國會與政府。

禁止外國於朝鮮半島駐紮軍隊等。在 10 月的第二次會談中，延亨默提出雙方應該簽訂互不侵犯條約（朱松柏，2005：86-88, 91）。

由於美國老布希政府在 1991 年 11 月 5 日批准〈國家安全指示 64 號〉撤出所有在南韓境內的戰術型核武，加上盧泰愚在 8 日宣佈「我們把核能源只用於和平目的，不製造、保有、貯藏、配備和使用核武器」（轉引自李敦球，2007：100），兩韓在 12 月的第五次總理會談中簽署《南北和解、互不侵犯，交流與合作協議》，雙方也在 1992 年 1 月 20 日簽署《朝鮮半島非核化宣言》，並於 9 月的會談中簽署有關履行《南北和解、互不侵犯，交流與合作協議》的協議書和各種分科委員會的組成。可是由於南韓舉行自己的「花郎」（*Hwarang*）演習和美國宣佈恢復 1993 年的「團隊精神」聯合軍演，使得北韓方面相當不滿，故於 10 月 31 日透過熱線通知南韓取消原定於該年 12 月進行的第九次總理會談（朱松柏，2004：92-97；李敦球，2007：103-106）。

（二）金泳三政府

1993 年 2 月金泳三上台以後，就面臨到第一次核武危機和北韓宣佈退出 NPT 的舉動，南韓方面也在 3 月 13 日要求北韓重新考慮退出 NPT 一事同時加強國內軍事戒備狀態，同時於 15 日宣佈中止兩國間的所有經濟合作計劃（Michishita, 2010: 94）。

4 月 6 日，在第九屆最高人民會議第五次大會中，通過了金日成所提出的「祖國統一全民族大團結十大綱領」，內容包括：建立自主、和平和中立的統一國家；以民族愛和民族自主精神爲基礎實現團結；尋求共存、共榮、共利，並在一切服從於祖國統一事業之原則下實現團結；停止助長分裂和對峙之一切政爭行爲；消除對於北侵和南親、勝共和赤化的恐懼，建立相互信任和團結；看重民主，不因思想主張的不同而排斥彼此，以在祖國統一的道路上攜手前進；保護私人和團體所擁的的物質性與精神性財產，並獎勵將這些資產運用於謀求民族大團結的事業上；透過接觸、往來和對話，實現互相了解、信任和團結：北、南和所有海外同胞應該加強彼此間之聯繫，以爭取祖國之統一；對於對民族大團結和祖國統一事

業有貢獻的人給予高度的評價（金日成，1993）。爲了回應金日成的「全民族大團結十大綱領」，金泳三在 7 月 6 日提出所謂「三階段三基調統一政策」，把國家統一的過程分爲和解合作階段、南北聯合階段和統一國家階段等三個階段，而國家統一的三個基調分別是國民意願、共存共榮和民族福祉，強調透過國民協商的方式將民族福祉放在首位，在自主、和平、民主的基礎上分階段達成階段性目標促成朝鮮半島的統一（李明，1998：138-139；李敦球，2007：170-174）。

1994 年 6 月，美國前總統卡特訪問北韓以後，在返國途中曾與金泳三總統會面，轉達金日成願意與金泳三進行高峰會的意願（Oberdorfor, 1997），南韓總理李榮德（Lee Yung Dug）便在 20 日向北韓總理姜成山就兩韓首腦會議進行建議，雙方各派出副總理級官員於 28 日在板門店進行磋商，於 7 月初達成協議，決定於 7 月 25 日和 26 日於平壤舉行高峰會。可是由於金日成於 7 月 8 日過世，北韓方面於 11 日通知南韓方面高峰會將無限期延期。可是在西方各國均向金日成的逝世表示弔唁之際，金泳三除了對高峰會無法如期進行表示惋惜外，沒有任何弔唁動作，不准南韓民眾派慰問團到北韓，更威脅使用《國家保安法》（*National Security Law*）處罰任何發表親北韓的舉動。針對這種舉動，北韓方面不僅指責金泳三爲「一個連做人起碼的道德也不具備的低能兒」，也認爲「其種種叛逆行爲已失去坐在權力寶座上之資格，全民族和南朝鮮人一同不再承認金泳三是同民族和人類。」（李敦球，2007：164, 166-167；Hoare, 2008: 74-75）原本有機會改善的兩韓關係，卻因爲金泳三不願弔唁金日成，而使得雙方關係再度陷入緊張。

1995 年 1 月 24 日，北韓方面以「政黨團體聯合會議」的名義，向南韓各政黨提出在希望可以共同慶祝停戰紀念日五十週年，並舉行「大民族會議」共同協商祖國統一的方法。隔日，南韓統一院發表聲明，任爲此舉對南北關係的實質改善毫無幫助，主張仍以《南北和解、互不侵犯，交流與合作協議》之精神，由負責當局進行接洽。2 月 6 日，《勞動新聞》發表社論，認爲南北韓進行接觸的先決條件，是南韓要廢除其《國家保安法》，並對禁止南韓人士弔唁金日成一事進行謝罪（李敦球，2007：167-168）。

由於北韓在 1995 年遇到嚴重水患導致農業欠收，因此首度向國際社會求取糧食援助，並希望日本轉達給南韓，北韓願意接受南韓沒有附加條件的糧食援助。5 月 26 日，南韓統一部宣佈向北韓提供不附政治條件的糧食援助，雙方也在 6 月 13 日到 21 日於北京就糧食援助的細節進行商討，並決定於 6 月至 10 月間，南韓將提供北韓多達 15 萬噸的稻米。同年 9 月，南韓政府也允許南韓紅十字會等民間企業和團體對北韓提供人道援助。總計，南韓光在 1995 年一年就援助北韓高達 2.32 億美元的物資，爲南韓歷年來官方援助北韓最多的一年（李敦球，2007：165, 190-191；Haggard & Noland, 2007: 142-143）。

1996 年 2 月 22 日，北韓外務省提出希望和美國達成暫時性協議、希望組織朝美聯合軍事機制，並希望就上述兩議題儘快與美國進行會商等三點建議，希望以暫時性協議日後可以發展成爲和平協議以取代《停戰協定》，也希望朝美聯合軍事機制可以取代「停戰協定委員會」。爲了突顯《停戰協定》的不良以及促使美韓兩國儘早與北韓就此議題進行會談，4 月 4 日北韓人民武力部第一副部長金光鎮（Kim Kwang Jin）表示由於南韓方面把大量武器裝備和部隊運送到非軍事區內，因此軍事分界線和非軍事區的狀態已經無法維持了，朝鮮人民軍板門店代表團也於同日宣佈會減少人民軍方面在非軍事區內的管控義務。5 日到 7 日之間，北韓方面在共同守備區中增加了 200 多名的軍力，9 日金光鎮則表示非軍事區南邊已經喪失作爲兩韓軍事緩衝區的意義，並認爲戰爭的爆發只是時間上的問題而已。11 日，朝鮮人民軍士兵跨越軍事分界線南方多達 300 公尺，另外還有一批北韓士兵則佔據在軍事分界線南方的山頭到次日才離開；19 日，兩艘北韓巡邏艦則跨越了南韓在黃海上所劃定的北界線（Northern Limit Line），5 月 23 日也有五艘巡邏艦則跨越北界線，接近延坪島一帶。針對北韓大規模的軍事動作，南韓方面在 5 日宣佈提高美韓聯軍對北韓的監視級別，並於 9 下令要求前線軍人對闖入南韓境內的北韓士兵採取必要的手段，也同 7 月時進行以北韓爲假想敵的軍事演習（李敦球，2007：166；Michishita, 2010: 141-142）。4 月 16 日，柯林頓總統訪問濟州島（Jeju）和金泳三會面，雙方共同提爲了建立朝鮮半島的永久和平機

制，並化解非軍事區內的緊張局勢和處理《停戰協定》問題，希望可以進行由南北韓、美國與中國共同參加的「四邊會談」（朱松柏，1997：19）。

1996 年 9 月 17 日，南韓在其東海岸發現一艘北韓「鯊魚級」（*Sang-O*）潛艦，該潛艦的目的是要派遣船上的情報人員到江陵（Kangnung）一帶取得該地軍事設施的相關情報，但是在潛艦要接回情報人員時卻擱淺，船員因而打算經陸路逃回北韓卻被南韓民眾發現通報軍方，南韓軍方馬上展開海陸方面的戒嚴令進行大規模的搜捕行動，持續到 11 月 5 日。在過程中，共有 24 名北韓士兵死亡、1 名遭到俘虜，尚有 1 名據說經陸路逃回北韓，下落不明，南韓方面則有 16 名士兵和 27 位平民在搜捕行動的槍戰中身亡。金泳三在 20 日的表示「這是一種軍事挑釁行爲，而不是如過去一樣的情報搜集侵入行爲」，但北韓方則回應表示「該潛艦的引擎發生問題因而往南漂去，使得船員別無選擇只能冒著發生軍事衝突的危險，踏上敵人的土地」，同時要求南韓方面歸還潛艦與死者遺體。這段期間，北韓爲了報復南韓對其情報人員的追捕，於 10 月 1 日在海參崴（Vladivostok）毒殺了一名南韓外交官，所使用的毒品和入侵南韓情報員身上所攜帶的毒品一模一樣。金泳三政府因此對北韓方面採取強硬的措施，禁止紅十字會提供北韓援助、擱置了南韓參加 KEDO 輕水反應爐專家小組的訪問計劃，也要求大宇集團（Daewoo）撤回其派到北韓南浦（Nampo）工業園區的人員。12 月 29 日，北韓外務省發表聲明對於此次事件的發生感到遺憾，並表示未來會努力確保類似的事件不再發生。次日，南韓方面便在板門店歸還死亡的北韓人員之遺骸，結束這起南韓稱爲「江陵地域武裝共匪侵透事件」的軍事衝突（李敦球，2007：168-170；Dies, 2004）。

由於兩韓間的軍事緊張，南韓政府方面取消了雙邊的援助計劃，在 1996 年和 1997 年兩年間只透過聯合國兒童基金（UNICEF）和世界糧食計劃總署提供 2980 萬美元的援助（Haggard & Noland, 2007: 142），和 1995 年的單年份的 2.32 億美元有極大差距，雙方也沒有進行高層會談。不過兩國紅十字會則在 1997 年 5 月達成運輸援助物資的協議，南韓紅十字會可以直接對北韓紅十字會進行援助，

成爲民間援助北韓的主要管道。7 月 16 日，由於北韓軍隊不顧南韓軍方的警告跨過在江原道（Gangwon Province）鐵原郡（Cheorwon-gun）的非軍事區，南韓方面以機槍進行回擊，北韓方面則以機槍和大砲回擊，雙方進行了約一個小時的軍事衝突（Michishita, 2010: 143-144）。北韓方面聲稱這次的軍事衝突是起於金泳三傀儡政府的挑釁行爲，阻礙了朝鮮人民軍在軍事分界線上的例行巡邏任務，因而被迫要採取自衛行爲[57]。

1997 年 8 月 4 日，金正日發表了正式掌權以來的第一篇有關對南政策的文章，名爲〈讓我們貫徹偉大金日成主席的統一遺訓〉。在文章中，金正日將金日成主張的「祖國統一三原則」、「全民族大團結十大綱領」和「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方案稱爲「祖國統一三大憲章」，是北韓推行統一事業的最高指導原則。其中爲了促成進一步的南北合作，金正日強調民族主義的精神：

> 為了達到民族大團結，要把思想、理念和制度上的不同放在後頭，將民族的共同利益放在最前面，以此為基礎堅持團結的原則。祖國統一偉業不只是為了解決民族內部的階級矛盾和體制對立，更是為了確立民族自主權的民族偉業。若沒有民族而只有階級或階層，民族的自主性無法實現，民族成員的自主性也無法獲得保障……不論北南間存在的思想和制度差異有多大，都無法超越透過悠久歷史所建立起來、所強力發展的我們民族的民族共通性……祖國愛和民族愛乃是所有民族成員的共同思想與感情，是促成民族團結的思想基礎。（金正日，1997）

同時，金正日也希望能夠改善在金泳三時代日漸惡化、緊張的兩韓關係：

> 北南關係的改善，是實現祖國自主和平統一當今最迫切的要求……只有將北南關係由不信任和對決轉變為信賴與和解，才能團結全民族的力量實現祖國自主和平統一……現任南朝鮮政權出現以來，北南之間不僅沒有達到和解，反而使得對立更為嚴重，不是使和平，而是使發生戰爭的危險愈來

[57] KCNA (Jul. 16th, 1997), "Armed conflict on military demarcation line,"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2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1997/9707/news7/16.htm#13.

愈濃厚……要解除北南間的政治對立，必須先解除軍事對峙狀態，才能實現民族的和解與團結……南朝鮮當局應該放棄其危險的戰爭政策，緩和目前日益緊張的情勢。南朝鮮應該中止加強軍備、輸入武器，以及和外國軍隊進行聯合軍事演習的行為……為了解決北南間的對立和促成民族和解與團結，南朝鮮應該要先促成內部社會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目前的南朝鮮政權的法西斯統治手法無助於解決北南對立，無法讓南朝鮮各黨、各派、各界自由地進行祖國統一的討論和活動。只要限制為同族的北南人民接觸交流為犯罪、鎮壓南朝鮮統一愛國勢力的反民族反統一惡法「國家保安法」還存在，無論經過多久也無法達成民族和解和團結，也無法實現北南接觸與交流。（金正日，1997）

基於改善兩韓關係的立場，北韓以金桂冠爲代表參加了在 1997 年 8 月、9 月和 11 月所舉行的「四邊會談」預備會議，並參加 12 月 9 日和 10 日在日內瓦舉行的第一輪會議，而北韓方面也希望藉此促成朝鮮半島的和平與安全，並堅持兩韓間的問題是屬於民族內部事務[58]。

（三）金大中政府

金大中在 1998 年 2 月 25 日的「讓我們開創新時代：大步躍進克服國家危機」就職演說中，提出了新政府對北政策的三原則：不允許任何型式的軍事挑釁行爲、南韓政府不懷有傷害和吸收北韓的企圖、會由雙方最容易達成共識的項目開始積極地推到南北之間的和解與合作。另外，金大中也表示願意支持北韓與美國、日本和其他國際組織間改善關係，向北韓承諾南韓會按 KEDO 規定履行給與北韓輕水反應爐之承諾，也不會在糧食援助上提出過份的要求，最後呼籲儘量恢復離散家庭的會面（D. J. Kim, 1998）。針對金大中的就職演說，《勞動新聞》在 28 日進行評論，認爲金大中的演說是令人失望的，因爲無法從演說內容中分辨他與前一任政府的不同之處爲何，若持續下去北韓方面只能期待南韓的下一次政權輪替，

[58] KCNA (Dec. 12th, 1997)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on 'quad talks',"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2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1997/9712/news12/12.htm#1.

並重申北韓雙方應該不依靠外國力量並強調國家民族的主體性[59]，但是北韓方面卻仍願意與南韓就統一議題進行會談，並強調唯有建立互信才是創造有建設性會談氣氛的基本條件，因此呼籲南韓新政府應該放棄前任政府的敵對、對立與互不信任之心態，努力創造有助於民族合作、團結和統一的良好氣氛才有助於改善兩韓關係[60]。爲了回應金大中在就職演說中所提出的新對北政策，金正日在 4 月 18 日提出了「民族大團結五大方針」予以回應，其內容爲：堅持民族自主的原則、在愛國愛族的旗幟下團結、致力改善北南關係、反對一切外部力量的支配與反統一勢力、強化全民族相互間的接觸對話與連帶關係（金正日，1998）。金正日所提出的「民族大團結五大方針」與他在 1997 年演說中所提到的金日成時代的「祖國統一三大憲章」成爲金正日時代推行對南政策和統一活動的主要原則與依據。

金大中的「陽光政策」具體而言是以南韓的國力和美韓同盟爲基礎，透過政府間對話和民間交流合作之手段，首先消除對彼此的敵對情緒和不信任感，希望將休戰狀態轉變爲和平體制，並在和平體制內透過對話、交流與合作引導北韓走向開放，助其轉型成爲市場經濟國家以實現朝鮮半島統一之目標；在具體行爲上則採取「政經分離」的原則，也就是不因爲雙方在政治方面的磨擦而中止和北韓之間的經濟合作關係，藉此取得北韓方面的信任，更希望藉此促進北韓進一步的改革開放（李敦球，2007：205-207）。在此政策邏輯下，南韓於 3 月 28 日放寬南韓企業對北韓投資的限制，撤銷投資不得超過 500 萬美元的現制，也大多批准韓國企業領導人訪問北韓的申請（李敦球，2007：262-263）。南韓方面的善意促成了 4 月 11 日到 18 日間兩國在北京進行了中斷近四年的政府間直接會談（朱松柏，2004：100-101），和 6 月與 10 月現代（Hyundai）集團創業者鄭周永（Chung Ju Yung）訪朝促成金剛山觀光事宜。

不過經濟和人員交流的提升不代表的在軍事和政治層面上關係的改善。1999

[59] KCNA (Feb. 28th, 1998), "Rodong Sinmun on S. Korean ruler's 'inaugural address',"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3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1998/9802/news02/28.htm#2.
[60] KCNA (Feb. 28th, 1998), "Atmosphere should be created first for negotiations,"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3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1998/9802/news02/28.htm#3.

年 6 月初開始，北韓的巡邏艦便一直越過南韓所劃定的北界線，南韓海軍方面也數度將北韓船隻驅逐回去，金大中也同時表達南韓「捍衛北界線」和「不首先開火」之決心，但是在 6 月 15 日終究爆發了「延坪島海戰」。南韓船艦爲了驅逐在北界線以南捕魚的北韓漁船而發出警告，引起四艘北韓巡邏艦越界衝撞南韓船艦，後來北韓方面又有三艘魚雷艦加入，南韓方面因而向北韓艦艇開槍，擊沉一艘北韓魚雷艦，雙方另外各有多艘船艦受損（Michishita, 2010: 145-147）。北韓方面宣稱是因爲南韓艦艇闖入北韓領水當中進行挑釁行爲，同時譴責南韓方面首先開火的行爲，也要求南韓政府立即爲此進行道歉[61]。6 月 22 日到 7 月 1 日，兩韓再度在北京進行副部長級會議，其中北韓代表要求南韓先就延坪島海戰進行道歉，南韓方面則希望優先討論離散家族議題和未來進行更高層級會談之可能性，最後在雙方於離散家庭、延坪島海戰、肥料援助等議題上均無法達成共識（朱松柏，2004：101）。

2000 年 1 月 20 日，金大中就表示有意願積極促成南北高峰會的達成，3 月 9 日，金大中在柏林自由大學（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中發表演講，成爲促成第一次南北峰會的「柏林宣言」。其內容如下：

> 我國政府從來沒有放棄試圖努力結束雙方的對立結構並為半島帶來永久和平……目前，南韓的經濟沒有強大到足以支持北韓……北韓人民也沒有居住在自由社會中的經驗……當我們考慮這些因素後，立即性的領土統一就成為一個不可行的選項。因此，與其尋求達到迅速的統一，更現實且更合理的途徑應該是透過先尋求和解、合作、共存和共榮，以排除一直存在的衝突威脅……我國對平壤作出三個重要承諾：保證其國家安全、協助其經濟復甦，並積極支持其加入國際社會。作為回報，我國希望得到來自平壤的三項承諾：首先，北韓必須永遠放棄任何對南韓的軍事挑釁行為；第二，北韓必須遵守不發展核武的承諾；第三，北韓必須放棄發展長程飛彈

[61] KCNA (Jun. 15th, 1999), "S. Korean warships fire KPA navy warships,"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3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1999/9906/news06/15.htm#1.

的野心……我們不希望與北韓再進行另一場戰爭。我們想要共存並想要幫助她……我們歡迎並鼓勵任何與平壤增進交流的國際力量……我們希望很多國家能改善同北韓間的關係……我作出以下建議是希望能夠同北韓達成永久和平，並實現雙邊的和解與合作…首先，大韓民國政府已經準備好要協助北韓渡過其經濟危機……其次，就現階段言，我們的立即性目標是要結束冷戰對立以達成和平，而不是試圖達成統一……第三，北韓應該就我們所提出的離散家庭相聚進行回應……第四，為了有效地處理相關議題，兩韓政府當局應該立即展開對話……我們相信所有有關朝鮮半島的議題終將由兩韓政府來共同解決。大韓民國政府會以持續性和耐心遵守上述原則。（D. J. Kim, 2000）

對此，北韓在 3 月 17 日便派朝鮮亞太和平委員會（Korean Asian and Pacific Peace Committee）副委員長宋浩京（Song Ho Gyong）和南韓在上海進行秘密接觸，後來在北京舉行正式會談，於 4 月 10 日宣佈南韓總統金大中應北韓國防委員會委員長金正日的要請，於 6 月 12 日到 14 日訪問平壤[62]。

南北高峰會最後於 13 日到 15 日間於平壤舉行，金大中分別和金正日與金永南進行了不公開的會面，雖然雙方對於統一問題存在很大異議[63]，但是金正日和金大中最後還是在 6 月 15 日達成《共同宣言》（以下稱為《六・一五共同宣言》）。根據《六・一五共同宣言》第五條的規定，雙方便展開在各方面的會談，包括雙方的紅十字會會談、部長級會談、國防部長級會談和經濟合作實務會談等，其中在金大中任內進行三次十字會會談、九次部長級會談、一次國防部長級會談和兩次經濟合作實務會談（朱松柏，2004：104-114；李敦球，2007：222-226）。此外，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書記金容淳（Kim Yong Sun）作為金正日的特使也在 9 月 11 日和 14 日間訪問首爾並發表聯合公報，要求雙方儘快進行紅十字會會談

[62] KCNA (Apr. 10th, 2000), "North-south agreement,"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3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0/200004/news04/10.htm#1.

[63] 中國時報（2000 年 6 月 22 日），〈簽署共同宣言前　兩金曾有激烈攻防〉，《中時電子報》。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3 日。http://forums.chinatimes.com/report/korea/meet/89062201.htm。

以推進離散家庭訪問、儘快舉行京義線鐵路開工、就雙重課稅問題進行進一步接洽、北方派經濟考察團到南方、雙方共同整治臨津江（Rimjin River）等[64]。

兩韓雖然在 2002 年 6 月 29 日於黃海發生小規模軍事衝突（Michishita, 2010: 150），加上金大中任期末年爆發第二次核武危機，不過雙方仍在 2002 年 10 月及 2003 年 1 月舉行兩次部長級會談，就透過對話解決包括核武開發在內的所有問題達成共識（李敦球，2007：224）。北韓也分別在 2002 年 10 月 23 日指定金剛山一帶爲「金剛山觀光地區」，委託南韓現代集團進行開發，也在 11 月 13 日建立「開城工業區」，委託現代峨山（Hyndai Asan）集團和韓國土地公司（Korean Land Housing Cooporation）進行開發（朴鍾碩，2010：196-213）。

（四）盧武鉉政府

在兩韓合作密切之際，左派的盧武鉉在 2002 年 12 月 20 日當選南韓總統，他在當選感言中即表示其對北政策和金大中時代相比不會有太大的改變，並希望與美國、日本密切合作，和平解決北韓的核武問題[65]，在接受外國媒體訪問時，盧武鉉也表示他認爲「陽光政策」並沒有失敗，因爲正是「陽光政策」爲北韓帶來「不可忽視的變化」[66]，另外他也認爲北韓不是罪犯，而是個可以與其協商的對象[67]。2003 年 2 月 25 日，在他的「走向和平、繁榮、飛越的時代」就職演說中，提出「和平繁榮政策」之對北政策，提出所有問題通過對話解決、優先建立相互信任並實行互惠主義、以南北當事者爲基礎上謀求國際合作，以及提高對內對外的政策透明度，擴大國民參與並進行超越黨派的合作等四點對北政策原則，希望可以達成促進朝鮮半島和平和實現朝鮮半島與東北亞地區的共同繁榮等兩

---

[64] KCNA, (Sept. 14th, 2000), "Joint communique between north and south released,"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3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0/200009/news09/14.htm#4.

[65] 朝鮮日報（2002 年 12 月 20 日），〈盧武鉉闡明和平解決北韓核問題〉，《朝鮮日報》。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2/12/20/20021220000023.html。

[66] 朝鮮日報（2002 年 12 月 24 日），〈盧武鉉：除了陽光政策別無他法〉，《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2/12/24/20021224000010.html。

[67] 朝鮮日報（2003 年 2 月 24 日），〈盧武鉉：北韓不是罪犯，而是協商對象〉，《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3/02/24/20030224000000.html。

大戰略目標。爲了達到上述目標，盧武鉉提出了解決北韓核問題、深化南北合作，以及最終達成和平協定的三階段任務（李敦球，2007：297-301）。針對盧武鉉的當選與其對北政策，北韓方面除了在 2002 年 12 月 21 日以「南朝鮮民族民主陣線」（National Democratic Front of South Korea）發言人名義表示透過這場選舉「人民表示其不想要傾美事大主義也不要與北對立，而只想要在六・一五共同宣言下活出民族自主性精神」[68]外，沒有做出太多的針對性發言與評論，只有多次在透過官方媒體強調民族合作[69]和呼籲履行《六・一五共同宣言》[70]等內容。

雙方在 4 月 27 日到 30 日之間於平壤進行第十次部長會談之後，達成下列幾點重要共識：

> 南北重新確認 2000 年 6 月 15 日南北共同宣言之基本精神，並會持續遵循和履行之……南北會就朝鮮半島核議題互相充份地交換意見，並會持續的對話以和平手段解決此議題……南北會積極地提倡雙方已經同意執行和即將執行的合作計劃……包括京義線和東海鐵路連結、開城工業區的開工儀式、金剛山觀光計劃和愛國人道事業……南北雙方會積極地尋求解決離散家庭問題。（Ministry of Unification, 2003）

這次的部長會談可以說是爲日後盧武鉉政府時期的兩韓關係進行定調，也把雙方希望解決的問題於此聲明中進行闡明。此後，兩韓在盧武鉉任內進行了十二次的部長會談，以及多次的將軍級會談和紅十字會會談（李敦球，2007：364-370, 373-376）。

兩韓除了在政府間會談相當密切之外，更重要的是兩韓在這段期間於經濟領域方面的合作和人員方面的交流。其中金剛山觀光計劃和 2005 年正式開始的開

---

[68] KCNA (Dec. 22nd, 2002), "NDFSK spokesman on results of presidential election,"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2/200212/news12/23.htm#1.

[69] KCNA (Jan. 7th, 2003), "Rodong Sinmun on national cooperation,"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3/200301/news01/08.htm#10.

[70] KCNA (Jan. 9th, 2003), "KCNA calls for implementation of inter-Korean declaration,"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3/200301/news01/10.htm#6; KCNA (Jan. 21st, 2003), "Rodong Sinmun on June 15 Declaration,"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3/200301/news01/22.htm#3.

城工業區是兩國經濟合作關係的重要指標，兩者在盧武鉉任內有顯著的成長，也連帶促成兩國間貿易額的成長，而金剛山旅遊和開城工業區的發展，也促使兩韓之間在人員和物流方面往來的增加。此外，也由於兩韓關係的正向發展，南韓提供給北韓方面的援助額也維持一定的水準，而在盧武鉉時代也有 10852 人次的離散家屬會面和 3748 人次的離散家屬視訊會面。在 2007 年 5 月 17 日，南北韓同時舉行京義線和東海線鐵路的開通運行儀式，於 12 月 11 日起正式開使運作，以南北之間的貨物運輸爲主（李敦球，2007：382-383；張少文，2010：190）。

兩國關係如此密切除了雙方持續且密切的高層會談之外，更重要的是盧武鉉和歷屆南韓總統相比，持有極度親北韓的態度。他在 2004 年 11 月 12 日於洛杉磯外交事務委員會（Los Angeles World Affairs Council）發表演講時便表示，北韓發展核武的原因是作爲保護自己不受到外來侵略的嚇阻能力，並認爲當北韓透過改革開放發現自己的安全得到確保以後便願意放棄其核武計劃，也認爲北韓對於國際社會的不信任是其不遵守條約內容的原因（Roh, 2004），而北韓方面則對於盧武鉉的談話給予正面的回應[71]。此外，盧武鉉本人也認爲北韓崩潰的可能微乎

表 5-1　盧武鉉時期兩韓經濟關係量（萬美元）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金剛山觀光[72]	418.5	1511	1679	1320	1942
開城工業區	—	—	1491	7373	18478
兩國貿易額	72400	69700	105500	135000	179800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Unification

[71]朝鮮日報（2004 年 11 月 25 日），〈北韓對盧武鉉“洛杉磯發言”予以積極評價〉，《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4/11/25/20041125000035.html。

[72] 金剛山觀光的金額是由旅客數計算出來的，因爲根據研究北韓平均從每一名參與金剛山旅遊的遊客賺取 56.3 美元（張少文，2010：191）。

表 5-2　盧武鉉時期兩韓人員交流與援助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人員往來（人次）	16303	26534	88341	101708	159214
援助金額（百萬韓圜）	3373	4230	3926	2982	4397

資料來源：Ministry of Unification

其微[73]，要求布希不要再公開批評金正日[74]，並認爲「鞭子」對北韓行不通故呼籲停止對北韓進行制裁[75]，希望用說服來取代懲罰以改變北韓的行爲[76]，也曾提出希望在援助的物資和制度方面對北韓進行大幅度的讓步[77]。不過由於北韓在 2006 年 7 月進行飛彈試射，南韓方面停止了政府對北韓方面的援助，北韓也因此停止和南韓當局的所有會談。北韓方面表示飛彈試射是軍事訓練的一環，今後將會持續進行[78]，而盧武鉉則表示這對解決北韓核問題增加了許多困難[79]，但是重申這不是一種軍事威脅行爲，而只是北韓爲了達到政治目的所採取的行爲而已

[73] 朝鮮日報(2004 年 12 月 5 日)，〈盧武鉉總統稱北韓崩潰可能性微乎其微〉，《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4/12/05/20041205000002.html。

[74] 朝鮮日報(2005 年 2 月 14 日)，〈盧武鉉曾要求布希不要公開指責金正日〉，《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5/02/14/20050214000020.html。

[75] 朝鮮日報（2005 年 4 月 14 日），〈盧武鉉正式表明反對對北制裁立場〉，《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5/04/14/20050414000017.html；朝鮮日報（2006 年 8 月 11 日），〈盧武鉉：用”鞭子”對北韓行不通〉，《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6/08/11/20060811000025.html。

[76] 朝鮮日報(2006 年 8 月 16 日)，〈盧武鉉光復節致詞：說服北韓更爲重要〉，《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6/08/16/20060816000006.html。

[77] 朝鮮日報（2006 年 5 月 10 日），〈盧武鉉總統稱想對北韓做出大幅讓步〉，《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6/05/10/20060510000005.html。

[78] KCNA (Jul. 6th, 2006), “DPRK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on Its Missile Launches,”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6/200607/news07/07.htm#1.

[79] 朝鮮日報（2006 年 7 月 12 日），〈盧武鉉首次談及北韓試射導彈“讓人無法理解”〉，《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6/07/12/20060712000015.html。

[80]。雙方的緊張關係因爲 10 月北韓的核武試射而持續下去，直到 2007 年 4 月由於「六方會談」的進展，南韓才恢復對北韓的援助（李敦球，2007：391-392）。

2005 年 6 月 17 日金正日會見盧武鉉特使統一部的鄭東泳（Jong Tong Yong）時，便轉達南韓方面希望舉辦第二次南北高峰會的期望，青瓦台在 2006 年 2 月 16 日也重申了此原則（李敦球，2007：371-373）。在雙方私下的接觸下，最後北韓朝鮮勞動黨統一部部長金養健（Kim Yang Gon）和南韓國家情報院（National Intelligence Service）院長金萬福（Kim Man Bok）在 2007 年 8 月 5 日達成協議將於 8 月 28 日至 30 日間於平壤進行第二次的南北高峰會[81]。後來由於北韓發生水災[82]，因此高峰會延到 10 月 2 日到 4 日進行。最後，金正日和盧武鉉在 10 月 4 日簽署《發展南北關係與和平繁榮共同宣言》（以下簡稱《十・四宣言》），希望積極實現《六・一五共同宣言》的內容、緩和雙方在軍事關係上的緊張氣氛、擴大雙方經濟合作發展，並建立相互尊重與信賴的南北關係[83]。雙方也在這次高峰會後於 11 月 14 日到 16 日舉行總理會談，並達成《關於履行發展南北關係與和平繁榮共同宣言第一回合總理會談協議書》，並就雙方共同開發黃海（南北韓稱爲西海）以及促進兩韓經濟的共同繁榮發展，達成建立「西海和平合作特別地帶促進委員會」和「北南經濟合作共同委員會」之共識[84]。

（五）李明博政府

2008 年 2 月 25 日李明博在「共同走向先進化道路」的總統就職演說中，針

---

[80] 朝鮮日報（2006 年 9 月 8 日），〈盧武鉉：北韓試射大浦洞導彈是出於政治目的〉，《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6/09/08/20060908000007.html。

[81] 新華社（2007 年 8 月 8 日），〈朝韓將於 8 月底在平壤舉行首腦會晤〉《新華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7-08/08/content_6492804.htm。

[82] The Hankyoreh (Aug. 20th, 2007), "Rescheduled summit focus shifts to solidifying six-party agreement," *The Hankyoreh*. Accessed in Jun. 15th, 2012. http://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national/230038.html.

[83] KCNA (Oct. 4th 2007), "Declaration for Development of North-South Relations and Peace and Prosperity,"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7/200710/news10/05.htm#2.

[84]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7 年 11 月 16 日），〈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と大韓民国の総理会談合意書および付属合意書〉，《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07111600.html。

對對北關係進行如下的說明：

> 南北關係的發展要比以往更具生產性，將以實用主義的尺度來解決對北問題，而不是理念的尺度。正如「非核・開放・3000」構想所示，只要北韓選擇棄核、開放的道路，南北關係就會展開一個新的局面。我們將與國際社會合作幫助北韓居民在十年內達到年收入 3000 美元。南北政治領導人應共同研究怎樣才能讓七千萬國民富裕起來、怎樣才能相互尊重，並開啟統一的大門。[85]

李明博在競選期間已經提出「非核・開放・3000」的對北韓政策，在當選後也曾表示應該消除朝鮮半島上的核武，兩韓應在維護和平的同時謀求共同繁榮，而北韓擁有核武器，會導致無法和平共存共榮，也無法實現統一[86]。李明博政府的對北政策除了「非核・開放・3000」外，還有他在 3 月所提出的「共存共榮」：達成「非核・開放・3000」的目的是要尋求韓民族的共存與共榮，而後者乃是盧泰愚所提出的「韓民族共同體」統一政策的延續，在達成兩韓和解與合作的第一階段時，南韓方面希望北韓逐步朝非核化和開放方向改革，爲此南韓方面將會根據相互性的原則與北韓進行經濟合作和援助計劃，同時也會積極地邀請國際社會協助北韓的經濟發展，也願意採取各種彈性手段與北韓進行接觸（W. G. Park, 2011: 322-324）。本質上來說，李明博對北政策仍是奠基在希望與北韓和解、減少軍事對立，且不尋求吸收統一北韓之前任政府政策原則上，只是更重視北韓方面在行爲上的回應性，也就是針對北韓的挑釁行爲或是不善意回應，李明博政府將不再像前任政府一樣只以正面手段回應，必要時也願意採取強硬的制裁手段來回應北韓的不合作與挑釁行爲。

在觀察與檢視李明博的對北政策後，《勞動新聞》在 4 月 1 日發表了一篇名

---

[85] 轉引自朝鮮日報（2008 年 2 月 25 日 a），〈李明博：我們攜手爲實現韓半島新神話邁進〉，《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8/02/25/20080225000025.html。

[86] 朝鮮日報（2008 年 2 月 25 日 b），〈李明博：不會爲政治目的走形式的南北首腦會談〉，《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8/02/25/20080225000010.html。

爲〈南朝鮮當局的反北對決行爲只會招致自身毀滅〉的社論：

> 李明博與其保守執政力量反北對決政策的真實身份，顯現在其所謂的「非核・開放・3000」之對北政策上。「非核・開放・3000」以我國的「全面棄核」與「開放」作為北南關係之前提條件的要求是極為荒唐的僭越言論，是把民族利益出賣給外國勢力、追求對決與戰爭的使北南關係破局的反統一宣言……李明博為了其不純的政治目的濫用以達成民族共同繁榮為目的北南合作事業，赤裸裸地展現其真實面貌為和平與合作的阻撓者、統一和繁榮的敵人……李明博「非核・開放・3000」的根本是反動的「實用主義」。李明博打出「實用主義」的口號，全面否定受到全民族、全世界一致支持與歡迎的六・一五共同宣言和十・四宣言，更妨害這兩者之履行……現在的南朝鮮政權把北南關係置於外交關係的下位，使前者服從於後者之下，這正是愚蠢的賣國賊李明博所公開在做的事情……在當今李明博逆賊踐踏北南間的共同宣言和協議、依附在外國勢力進行對決之時，我國也不得不改變應對的方法……背叛民族的叛徒是沒有未來的。[87]

除了指名道姓地批評李明博政府的對北政策外，北韓方面也在 3 月 29 日宣佈中止所有兩韓間的對話與接觸[88]，更在 6 月以「祖國統一研究院」的名義舉出了李明博政權上台 100 天來的三大罪狀：向民族自主進行挑戰，赤裸裸地進行事大、賣國和策動戰爭之舉動；否定《六・一五宣言》和《十・四宣言》，造成北南關係的中斷；虐殺民主和民心，尋求法西斯獨裁的復辟[89]。對此，南韓方面則回應不會因爲北韓的威脅性言論而向其提供幫助或進行談判[90]。

---

[87]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8 年 4 月 1 日），〈「非核・開放・３０００」は反統一宣言〉，《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08040100.html。

[88]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8 年 3 月 29 日），〈「先制攻撃」発言の取り消しと謝罪要求〉，《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08032900.html。

[89]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8 年 6 月 1 日），〈李明博「政権」100 日間の行跡を断罪〉，《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08060100.html。

[90] 朝鮮日報（2008 年 4 月 17 日），〈李明博稱不會因北韓威脅被逼提供援助〉，《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

7 月 11 日在金剛山發生南韓女遊客被北韓軍人射殺的事件，南韓方面在當天便宣佈自 13 日起中止所有前往金剛山的旅遊團[91]，北韓方面在 12 日發表聲明爲此事感到遺憾，但是表示該名遊客越過有明顯標記的邊界防護欄，闖入軍事禁區，在遭到北韓軍方警告後，由於該名遊客不顧士兵鳴槍警告奔跑，迫使北韓軍人開槍，並要求南韓方面爲此進行道歉[92]。李明博在 16 日則表示「爲查明韓國遊客在金剛山被槍擊身亡事件的真相，南北韓應共同進行調查，並制定預防對策。若不採取能夠保障遊客人身安全的措施，我們不會重新啓動金剛山旅遊。」[93]對此，北韓不僅在 8 月 3 日拒絕與南韓針對此事進行共同調查，更自 10 日驅逐仍待在金剛山的南韓人員[94]。

11 月 24 日朝鮮人民軍向北韓表示將自 12 月 1 日起全面停止金剛山旅遊、停止南韓人民到開城觀光、停止兩韓間的鐵路運行、關閉兩韓間的經濟合作辦公室、減少南韓在開城工業區的常駐人員等嚴格措施[95]。12 月 1 日對此在《勞動新聞》發表〈無法就破壞北南關係免責〉之社論，表示北韓採取此強硬措施的原因正是李明博政府之行爲所致，批評南韓勾結外國勢力尋求打倒北韓政權，並踐踏兩次南北高峰會所達成的共同宣言，除非南韓方面改變其政策立場與態度，不然北韓只能採取斷然措施[96]。2009 年 1 月 17 日發表了更爲強硬的說詞，強調北韓將會與李明博政府進入「全面對決」的態勢，要求南韓中止各種軍事挑釁行爲並

---

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8/04/17/20080417000006.html。

[91] Reuters (Jul. 11th, 2008), "South Korean tourist shot dead by North soldier." *Reuters*. Accessed in Jun. 15th, 2012.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8/07/11/us-korea-north-shooting-idUSSEO14908720080711.

[92] KCNA (Jul. 12th, 2008), "South Side to Blame for Incident at Mt. Kungang Resort,"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8/200807/news07/14.htm#1.

[93] 朝鮮日報（2008 年 7 月 17 日），〈李明博：只有查明真相才能重啓金剛山旅遊〉，《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8/07/17/20080717000003.html。

[94]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8 年 8 月 3 日），〈金剛山観光地区から不要な南側人員をすべて追放〉，《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08080300.html。

[95] KCNA (Nov. 24th 2008), "KPA Notifies S. Korean Puppet Authorities of Crucial Measure to Be Enforced by It,"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8/200811/news25/20081124-11ee.html.

[96]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8 年 12 月 1 日），〈北南関係破綻の責任転嫁〉，《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08120100.html。

儘快恢復兩韓間的對話[97]。

兩國關係在進入 2009 年後更爲緊張，包括 3 月底北韓以「批評體制」爲由拘禁了一名在開城工業區工作的南韓員工[98]、4 月到 5 月間進行多次的飛彈試射、5 月 25 日進行第二次核武試爆等。期間雙方雖然有在開城就兩國關係事務進行協商，但是因爲無法達成具體共識，北韓方面在 5 月 15 日甚至提出開城工業區契約「無效宣言」[99]，試圖改變李明博政府的立場。李明博政府並沒有向北韓強硬的行爲低頭，反而在北韓進行核武試爆後宣佈加入 PSI[100]，也提高美韓聯軍對北韓的警戒狀態[101]。針對南韓加入 PSI 的舉動，北韓強烈地反對，認爲這是一種對北韓的「宣戰行爲」，因此將不再遵守《停戰協定》的內容，而針對北韓船艦的任何檢查和追緝，北韓將視爲對主權與領土的侵害，會「毫無同情」地反擊[102]。現代峨山集團總裁玄貞恩（Hyun Jeong Eun）在 8 月中訪問北韓就拯救被拘留的南韓籍員工和恢復開城、金剛山事業與北韓方面進行會談，並於 16 日與金正日會面，就恢復金剛山和開城觀光、擴大開城工業區規模與恢復離散家族會面會談等達成共識，不過南韓政府方面雖然認爲這有助於改善兩韓關係，不過認爲這只是非政府協議，南韓對北韓的政策並沒有因此改變（K. H. Lee, 2009a: 16-18）。北韓當局也釋出善意，在 8 月 13 日釋放被拘禁的員工、21 日重開邊境、21 日到 23 日派黨書記金基南（Kim Ki Nam）爲團長前往南韓悼念金大中，也在 9 月 10 日在有關要求爲開城工業區北韓籍員工加薪的會談中進行讓步（Han, 2011: 49；

---

[97]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1 月 17 日），〈対北対決政策に対処し全面対決態勢に〉，《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09011700.html。

[98] 朝鮮日報（2009 年 3 月 31 日），〈北韓以批評體制爲由扣留一名開城韓方職員〉，《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9/03/31/20090331000002.html。

[99]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5 月 15 日），〈開城工業地区契約の無効宣言〉，《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09051500.html。

[100] The Korea Times (May 26th, 2009), "S. Korea to Join US-Led Anti-Proliferation Drill," *The Korean Times*. Accessed in Jun. 18th, 2012. http://www.koreatimes.co.kr/www/news/nation/2009/05/113_45671.htm.l

[101] BBC (May 28th, 2009), "Alert level raised on North Korea," *BBC*. Accessed in Jun. 18th, 2012.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8071175.stm.

[102] KCNA (May 27th, 2009), "CPRK Regards S. Korea's Full Participation in PSI as Declaration of War against DPRK,"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18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9/200905/news27/20090527-17ee.html.

K. H. Lee, 2009b: 2-8）。

9 月 21 日，李明博在紐約提出了「大妥協」（”Grand Bargain”）的新對北談判策略[103]：由於他認爲過去優先由雙方容易達成共識的部份進行談判的談判方法容易爲北韓以「義大利臘腸切割」談判方法（”salami tactic”）[104]利用，進行議題區隔化行爲以獲取自己的最大利益，因此李明博提出應該透過「六方會談」先討論北韓棄核之核心議題，同時在其中再就北韓與各國間的次要議題進行討論，是一種「綜合式」的解決模式（W. G. Park, 2011: 326）。對此，北韓方面提出強烈抗議，認爲核武問題是北韓和美國之間的問題，南韓方面在美國沒有新提議下擅自提出新的解決方案是意圖妨礙朝美間達成協議的行爲，北韓也表示不會因爲任何國家的提案而去改變其對外行爲，最後重申「在美國沒有撤除對我國的敵對政策前，要我國放棄核武乃是場荒唐無稽的夢。」[105]

11 月 10 日，雙方在黃海的大青島（Daecheong）一帶發生海戰[106]，南韓方面認爲雖然這次的衝突是場意外，但是北韓的戰艦是有意攻擊南韓艦艇的，並希望北韓爲此道歉[107]；北韓方面則認爲這次衝突是肇因於南韓艦艇侵入北韓領水的挑釁行爲所致[108]，不承認南韓所謂的「北界線」而只認定其所劃定的「海上軍事境界線」爲兩國領水界線，並認爲南韓的行爲是對民族和解與團結的破壞行爲，應該向全朝鮮民族進行道歉[109]。北韓海軍司令部在 12 月 21 日重申上述立場，表

---

[103] 朝鮮日報（2009 年 9 月 22 日），〈李明博：應推進“大妥協”解決北核問題〉，《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9/09/22/20090922000001.html。

[104]「義大利臘腸切割」談判方法是指將大任務分成一個個小任務分次解決，每解決一個問題就進行一點讓步和承諾，所以最後的協議是一連串小協議的總和。

[105]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9 月 30 日），〈「グランド・バーゲン」は核問題解決に百害〉，《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09093000.html。

[106] 中央日報（2009 年 11 月 11 日），〈北朝鮮警備艇５０発に韓国軍高速艇は２００発〉，《中央日報》。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japanese.joins.com/article/582/122582.html?sectcode=510&servcode=500。

[107] Yonhap News Agency (Nov. 10th 2009), “Koreas clash in Yellow Sea, blames each other,” *Yonhap News Agency*. Accessed in Jun. 18th, 2012. http://english.yonhapnews.co.kr/national/2009/11/10/27/0301000000AEN20091110007900315F.HTML.

[108]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11 月 10 日），〈南朝鮮軍が西海で武力挑発〉，《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09111000.html。

[109]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11 月 13 日），〈西海武力挑発、境界線守るため軍事的措置取る〉，

示會以一切物理力量捍衛「海上軍事境界線」，同時也宣佈了在這個區域北韓軍事訓練的砲擊區域[110]。

2010 年 2 月，兩韓曾就恢復金剛山與開城地區的旅遊進行會談，北韓方面雖然希望可以重啓南韓企業在這兩地區的旅遊計劃，希望在 3 月 1 日和 4 月 1 日就開城和金剛山旅遊擬定新的協議書草案，但是由於 2008 年在金剛山發生女遊客被射殺事件，因此南韓方面希望北韓方面可以進一步查明真相、防止類似事情再度發生，以及進一部確保遊客的安全保障。對此，北韓認爲本身已經對南韓方面對次進行說明和保證，故南韓持續堅持這些立場是對雙方達成共識的妨礙，是無意重新開啓這兩地旅遊事業的證明[111]。又由於在 3 月 26 日黃海發生「天安艦」事件，而南韓當局懷疑這是由北韓魚雷所擊沉的，北韓當局認爲南韓在重啓觀光與天安艦事件上之立場均對北韓不利，因此於 4 月 8 日宣佈凍結所有南韓在金剛山的資產[112]，並於 23 日全面沒收之[113]。

在「天安艦」事件方面，南韓方面在同各國組成的「軍民聯合調查團」（Joint Civil-Military Investigation Group）於 5 月 20 日公佈報告結果，認爲天安艦是由北韓魚雷所擊沉的（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ce, 2010），李明博也在 24 日宣佈對北韓採取制裁措施，將不允許北韓船隻經過南韓領水、中止開城之外的所有兩韓經濟合作、恢復對北韓採取心理戰策略、積極參與 PSI 等防禦性措施，同時也會將此事交由聯合國安理會處理[114]。北韓方面對此亟力否認，認爲天安艦的沉船

《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09111300.html。

[110]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12 月 21 日），〈西海軍事境界線水域を平時海上射撃区域に〉，《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09122100.html。

[111]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3 月 2 日），〈開城・金剛山観光、「再開阻むなら契約破棄」〉，《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10030400.html。

[112]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4 月 8 日），〈金剛山観光地区の南側不動産凍結〉，《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10040800.html。

[113]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4 月 23 日），〈金剛山観光地区の南側資産没収〉，《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10042300.html。

[114] Xinhua (May 24th, 2010), "S Korea takes punitive measures against DPRK over warship sinking," *Xinhua Net*. Accessed in Jun. 18th, 2012. 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2010/world/2010-05/24/c_13312712.htm.

原因是由於「內部爆炸」所引起[115]，全面否定調查報告的結果[116]，並認爲這是南韓想對北韓開戰的藉口[117]。此外，北韓針對調查報告和李明博的制裁，也宣佈全面關閉兩韓關係、廢棄《南北和解、互不侵犯，交流與合作協議》，並中止兩韓間的合作事業，並在第一階段的行動中採取下列措施：

> 一、斷絕與傀儡當局的一切關係；二、在李明博一夥任期結束前，不進行和有關當局的一切對話和接觸；三、完全中止在板門店的紅十字會聯絡代表之活動；四、斷絕北南間的一切通信和聯絡；五、凍結和裁撤在開城工業區的北南經濟合作協議辦公室，並立即驅逐南朝鮮方面的有關人員；六、針對傀儡一夥的「對北心理戰」，我國將開始全面性的反擊；七、全面禁止南朝鮮的船舶和飛機通過我國領海、領空；八、有關處理北南關係之問題時，一切基於戰時法處理。[118]

2010 年 11 月 23 日，北韓對延坪島進行了一個多小時的砲轟，造成南韓方面軍民的傷亡。北韓當局針對砲轟的原因表示，由於南韓無視於北韓對於南韓在當地軍事演習的抗議，同時也多次以取締漁船爲藉口多次侵入北韓領水，因此北韓針對南韓的挑釁行爲以無慈悲的軍事手法進行回應[119]。李明博則在 29 日針對此事發表談話，表示這次北韓的挑釁行爲與以前不同，是自韓戰以來首次對南韓領土進行砲轟，雖然南韓方面希望透過對話與合作來解決核武問題和提供人道協助，但是北韓的軍事冒險主義使得南韓方面認識到期待北韓棄核是很困難的，因此除了日後針對北韓的挑釁行爲南韓方面會對等地回應之外，也將尋求國際社會的支持，特別是美國方面的支持來譴責北韓的野蠻行爲，同時也會強化南韓軍隊

---

[115]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4 月 17 日），〈南朝鮮海軍艦船沈没の「北関連説」の真相〉，《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10041700.html。

[116]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5 月 28 日），〈「調査結果」を全面否定〉，《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enan2010052800.html。

[117]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5 月 26 日），〈南朝鮮が、事件を宣戦布告の口実にした〉，《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enan2010052602.html。

[118]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5 月 25 日），〈北南関係の全面閉鎖を宣言〉，《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enan2010052500.html。

[119]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11 月 23 日），〈我が方領海砲撃に軍事的措置〉，《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yongpyondo2010112300.html。

的實力，以固守「西海五島」[120]。

在 2011 年的新年共同社論中，北韓方面一改前一年的強硬態度，再度希望可以與南韓方面重啓會談：

> 我們今年將高高舉起「開展北、南和海外全民族協力合作達成自主統一新局面」的口號，為達成北南關係改善和祖國統一之鬥爭更進一步果敢地奮鬥。必須盡早地解除北南之間的對立狀態……必須積極地推動對話和合作事業。將民族的共同利益放在第一，積極努力地促成北南間對話和合作的氣氛……北、南和海外的全朝鮮民族將以北南共同宣言與其基本精神作為我們民族同胞的理念，堅持祖國統一運動的生命線，並使其徹底實現，如此我們民族將會有光明的前程。（勞働新聞、朝鮮人民軍、青年前衛，2011）

北韓自 2011 年 1 月起提出願意無條件與南韓當局恢復會談以來[121]，便提議許多型式與內容的會談，包括重啓金剛山觀光會談[122]、南北軍事高位者會談[123]、議員接觸[124]和紅十字會會談[125]等。南韓方面在接受美國和中國方面的建議後，答應與北韓進行軍事高位者會談的預備會議，但是卻因爲北韓方面堅稱「天安艦」事件無關，因此雙方無法達成共識導致協商破局（平井久志，2011：404）。6 月初北韓刻意洩漏出兩韓曾在 5 月於北京進行有關舉辦南北高峰會之秘密接觸事宜[126]，甚至威脅不惜公佈錄音內容[127]，目的是希望南韓方面能夠採取更柔軟的對北

---

[120] 共同通信（2010 年 11 月 29 日），〈韓国大統領の特別談話要旨〉，《47News》。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www.47news.jp/CN/201011/CN2010112901000263.html。

[121]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1 年 1 月 5 日），〈北南当局会談の、無条件開催を提案〉，《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11010500.html。

[122]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1 年 1 月 12 日），〈金剛山観光再開・開城工業地区会談を提案〉，《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11011200.html。

[123]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1 年 1 月 20 日），〈北南高位級軍事会談を提案〉，《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11012000.html。

[124]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1 年 1 月 28 日），〈北南議員の接触と協議を提案〉，《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11012800.html。

[125]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1 年 2 月 1 日），〈北南赤十字会談の早期開催を要求〉，《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ongil2011020100.html。

[126] 朝鮮日報（2011 年 6 月 2 日），〈北韓曝光南北爲峰會秘密接觸是何居心〉，《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1/06/02/20110602000000.html。

[127] 朝鮮日報（2011 年 6 月 10 日），〈北韓威脅升級：要公開南北秘密對話錄音〉，《朝鮮日報中

政策。7 月 22 日，北韓「六方會談」代表、外務省副相李勇浩（Ri Yong Ho）和南韓「六方會談」代表，外交通商部韓半島和平交涉部部長魏聖洛（Wi Sung Lac）在峇里島東協區域論壇的場外進行第一次「無核化會談」，其中南韓方面對於天安艦與延坪島事件隻自未提，重點放在向北韓方面介紹李明博政府的「大妥協」政策，會後李勇浩則說這次會談解決了許多過去北韓方面的誤解[128]。在東協區域論壇的會場中，北韓外相朴宜春（Pak Ui Chun）也在私下場合中與南韓外交通商部長金星煥（Kim Sung Hwan）會談，重新表示北韓擁有核武的立場與原因[129]。兩國於 9 月 21 日在北京舉行第二次「無核化會談」，其中北韓方面不在如過去一樣要求先解除對北韓制裁和優先討論和平協定，只要求無條件重新進行「六方會談」，但南韓方面則認爲北韓違反「六方會談」精神在先，故要求北韓要取消濃縮鈾計畫、允許 IAEA 人員重返北韓，並中斷核武與導彈連結之計劃[130]。

參、中國

一、金正日時期朝中關係的特質

在冷戰期間，北韓利用中、蘇之間的矛盾，游走於兩國之間，一方獲取自己國家的最大利益，另外一方面也避免在政治上成爲任何一國的附庸，以維持其「政治自主」的地位（Koh, 1969）。在後冷戰時期，雖然歷經中國與南韓建交時間朝中關係的冷卻，中國也於實際上不再同北韓是攻守同盟關係，但是從兩國的政治密切程度和經濟交流程度來看，中國是後冷戰時期影響北韓最大的外國（J.

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1/06/10/20110610000001.html。

[128] 朝鮮日報（2011 年 7 月 23 日），〈南北六方會談團長巴厘島舉行無核化會談〉，《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1/07/23/20110723000003.html。

[129] 朝鮮日報（2011 年 7 月 29 日），〈南北對話、韓中 FTA…韓外長暢談外交懸案〉，《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1/07/29/20110729000022.html。

[130] 朝鮮日報（2011 年 9 月 21 日），〈無核化會談北京舉行　南北雙方分歧仍存〉，《朝鮮日報中文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11/09/21/20110921000017.html。

Hwang, 2006: 207），而北韓對中國的仰賴程度也相當大（J. M. Kim, 2011）。

從金正日時期朝中關係的過程和內容來看，兩國經過了「熱絡─冷淡─熱絡」的起伏期，而其中 1992 年中韓建交到 1999 年北韓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委員長金永南和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之間互訪是兩國關係較為冷淡的時期，雖然如此兩國在這段時間還是維持儀式性的同盟關係，北韓沒有如批評前蘇聯般地與中國撕破臉。就具體內容來看，在政治方面以兩國熱絡的高層互訪為主，其中金正日自 2000 兩國關係改善以來就訪問中國八次，江澤民於 2001、胡錦濤於 2005、溫家寶於 2009 也曾訪問北韓，其中兩國黨、政、軍高層也有多次互訪；在經濟方面，中國自蘇聯瓦解以來就是北韓對外貿易的主要對象，也是北韓的主要援助國，兩國在 2005 達成〈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後，中國對北韓的投資額也大幅提升，目前可以說是北韓經濟的「生命線」（Nanto & Manyin, 2010: 13）。

北韓希望透過朝中關係可以達到兩個主要目的：取得政治支持和取得經濟物資以確保政權維繫。從政治支持來看，雖然兩國之間具攻守同盟性質的《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條約》（*Sino-North Korean Mutual Aid and Cooperation Friendship Treaty*，以下簡稱〈中朝條約〉）仍就有效，但是中國自 1980 年代以來已經將對北韓的支持由戰略合作轉為政治支持（劉德海，1993），也表示中國是不會支持北韓主動對南韓的南侵行為，同時在外交上也採取「兩個韓國」的政策，不過中國反對國際社會對北韓的制裁、在北韓核武事件中扮演中介者的角色，以及雙方在政治、經濟和軍事方面的密集往來都是當前北韓所需要的，因此北韓在中韓建交時相當克制自己沒有發表任何批判性言論，目的就是希望維持中國對北韓的政治支持。其次從經濟援助來看，中國是北韓第一大貿易對象，北韓每年以優惠價格從中國進口大量的糧食、能源和民生必需品，兩國間的邊境貿易以及中國企業對北韓的投資對北韓而言是重要的經濟來源，而中國固定每年給予北韓的糧食援助更是北韓重要的糧食來源，因此北韓維持和中國間的友好關係，對於北韓在經濟物資需求方面是有所助益的。

二、金正日時期中朝關係的發展

（一）江澤民時期

朝中關係雖然在江澤民時期初有密切的高層互動，但是中國方面當時由於希望改善和南韓之間的關係，故兩國關係已經開始有所轉變。1991 年 5 月 3 日到 6 日，中國總理李鵬訪問北韓，和金日成與當時的北韓總理延亨默會面，一方面中國方面表示對北韓統一政策的支持，雙方的邦誼將不會受到改變，也認爲兩國領導人必須對國際情勢經常交換看法[131]；7 月 10 日在《中朝條約》簽署 30 週年之際，中國方面也打電報給金日成進行恭賀，強調兩國「山水相連，唇齒相依」的關係[132]；10 月 5 日到 13 日，金日成訪問中國，和中國國家主席楊尙昆、中共總書記江澤民和總理李鵬等人會面，還參訪了山東、江蘇等地，中國方面除了再次支持金日成所提出的統一方案之外，也希望兩韓以對話和協商的方式來解決彼此間的問題[133]，北韓方面也認爲金日成這次的訪中之行進一步加強了兩國間的友好關係[134]。不過在上述密切互動的同時，中國在 5 月李鵬訪朝時便表達了中國對於南韓申請加入聯合國一案將不會行使否決權的態度，希望北韓方面進行因應（Woo, 2001: 126），北韓也因此於該次聯合國大會申請加入聯合國獲准；1992

---

[131] 人民日報（1991 年 5 月 4 日），〈中朝兩國總理舉行會談　雙方認爲在國際形勢複雜動蕩情況下　增進兩國傳統友誼合作具有重要意義〉，《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20&channelid=199105&searchword=_28_28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人民日報（1991 年 5 月 5 日），〈金日成會見李鵬總理　金日成高度評價中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取得巨大成就　李鵬表示堅決支持朝鮮爲爭取祖國自主和平統一的鬥爭〉，《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13&channelid=199105&searchword=_28_28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

[132] 人民日報（1991 年 7 月 11 日），〈江澤民楊尙昆萬里李鵬打電報給金日成延亨默　祝賀中朝友好互助條約簽訂 30 週年〉，《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1950&channelid=199107&searchword=&sortfield=。

[133] 人民日報（1991 年 10 月 5 日），〈江澤民同金日成舉行會談　賓主盛讚中朝友誼並就雙邊關係和國際問題交換意見〉，《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37&channelid=199110&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D_BD。

[134] 人民日報（1991 年 10 月 17 日），〈朝鮮高度評價金日成訪華成果　朝中友誼發展到一個新高度〉，《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10&channelid=199110&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

年 1 月 26 日，北韓應中國要求，兩國達成新的貿易協定，取消自 1950 年以來的政府間記帳貿易方式，改以支付現金的方式進行兩國貿易[135]，而由於北韓當時外匯不足，使得兩國貿易量在 1994 年起較前年下降了 30.7%（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使館，2007），對北韓的經濟構成嚴重影響。

中國和南韓在 1992 年 8 月 24 日正式建交，其中針對朝鮮半島議題，中國方面只表示「尊重朝鮮民族早日實現朝鮮半島和平統一的願望，並支持由朝鮮民族自己來實現朝鮮半島的和平統一」（新華社，1992），並沒有採取「一個韓國」的政治立場」。早在 7 月中時，中國外長錢其琛乘軍機秘密前往平壤向金日成轉達江澤民的口信表示：「當前國際形勢動盪不定，隨時都可能發生重大變化。在此情況下，我們宜抓緊時機，創造有利的國際環境……我們認爲中國與韓國進行建交談判的時機已經成熟。」對此，金日成則回應既然中國已經決定和「南朝鮮」建交，北韓方面只能接受，但也表示將堅持自主發展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秦軒、張哲，2010）。雖然北韓方面沒有發表任何評論中韓建交的社論和報導，甚至還在 9 月 9 日於《勞動新聞》發表一篇強調朝中友誼的社論，並希望中國人民能夠繼續支持北韓的社會主義建設與統一大業（Woo, 2001: 130-131），但同時北韓方面中止了兩國一切的交流活動，同時也把大量的中國親韓學者和官僚列入黑名單中（C. J. Lee, 1998: 194）。

1994 年 7 月 4 日金日成過世時，鄧小平便表示「金日成同志的逝世使朝鮮人民失去了偉大的領袖，也使我失去了一位親密的戰友和同志」[136]，另外在江澤民等人對金日成的悼詞中則表示「金日成同志一貫以極大的熱忱維護和發展中朝兩國人民的傳統友誼，他同中國老一代革命家結下了深厚的友誼，推動中朝友好

[135] 人民日報（1992 年 1 月 28 日），〈中朝簽署兩國政府貿易協定〉，《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2&channelid=199201&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

[136] 人民日報（1994 年 7 月 10 日），〈鄧小平電唁金日成逝世　向朝鮮勞動黨中央、朝鮮政府和全體朝鮮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http://data.people.com.cn/101.jsp。

合作關係不斷向前發展」[137]，同時也象徵兩國過去建立在領導人友誼上的關係結束，往後的兩國關係將會考慮更多現實國內外政治經濟的因素於其中（C. J. Lee, 1998: 196）。李鵬在 1997 年時也曾表示：「朝鮮不是中國的盟友或敵人，只是我們的鄰國而已。」（轉引自 Oh & Hassig, 2000: 158）此後到 1999 年為止，兩國的互訪多為副部長層級以下（邱坤玄，2001：98），兩國間的軍事交流也大都是象徵性和儀式性的交流（S. S. Kim, 2006: 188-189）。不過這段期間中國給予北韓很多援助，特別是在 1996 年 5 月 22 日北韓副總理洪成南和李鵬會面以後，中國開始大量給予北韓糧食和能源方面的援助，在兩國貿易上也恢復優惠價格（Haggard & Noland, 2007: 156）。

這段期間，北韓為了希望中國可以加強和自己的關係，則打出了「台灣牌」，一方面希望可以建立和台灣之間的經貿合作，另外一方面也藉此希望可以吸引中國方面的注意。北韓在 1992 年 10 月由負責無邦交國家關係的「金剛山國際集團」（Kumkangsan International Group）社長朴鍾根（Park Jong Keun）名義，邀請我國監察委員林秋山前往平壤訪問，並於 11 月 23 日同「高麗民族產業發展協會」（Korea National Industrial Development Association）簽定備忘錄，北韓和我國擬定以副部長人員進行非正式會談。此後，北韓與我國多次互派代表團訪問，並在經貿與體育方面進行交流，北韓方面建議我國就柳京飯店、羅津先鋒地區等十五項計劃進行投資，我方也派遣農技團前往北韓進行協助，甚至希望可以成為 KEDO 的成員之一。北韓和台灣在 1998 年 11 月至 1999 年 1 月間就雙方互設代表處已經有密切會商，不過因為北韓外交官叛逃和朝中關係的改善，未能有進一步進展（林秋山，2011：33-144, 179-183）。為此，中國方面在 1995 年 6 月副外長唐家璇訪問北韓時曾向金永南表達北韓和台灣關係過於密切之不滿（C. J. Lee,

[137] 人民日報（1994 年 7 月 10 日），〈江澤民李鵬喬石電唁金日成逝世　向朝鮮勞動黨中央、中央軍委、政務院及全體朝鮮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悼和最誠摯的慰問　堅信朝鮮人民將繼承金日成同志的遺志，緊密團結在金正日同志為手的朝鮮勞動黨中央周圍，為建設好自己的祖國，爭取朝鮮半島的持久和平而繼續前近〉，《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http://data.people.com.cn/deta1l?record=22&channelid=199407&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D。

1998: 198），1997 年 1 月 31 日中國也曾對北韓希望向台灣購買低放性核廢料進行抗議[138]，1998 年 10 月 20 日也以台灣不是主權國家爲由反對台灣加入 KEDO[139]。

在兩國關係相對較爲不密切的時期，北韓同美國和南韓在北京舉行了五個回合的「四方會談」，在中國作爲仲介者的情況下，提供南北韓和美國討論有關朝鮮半島和平安全建制的議題。中國的作爲使得北韓方面願意恢復與中國之間的高層往來，金永南於 1999 年 6 月 3 日到 7 日間，以兩國建交 50 週年爲契機，率領龐大的代表團訪問中國，將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總理朱鎔基和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李鵬進行會談，同時還參訪了杭州、上海等地。在這些場合當中，朝中雙方都強調兩國將不論國際形勢的變化，堅持兩國的友好關係，同時金永南還稱讚了中國改革開放的表現[140]，江澤民則表示希望南北韓改善關係，並支持北韓和美、日、歐等西方國加間實現關係正常化[141]。在與朱鎔基會面時，中國方面也承諾給予北韓 15 萬噸的糧食和 40 萬噸的焦煤援助[142]。10 月 5 起，爲了參加朝中建交五十週年的紀念活動，中國外長唐家璇也率領代表團訪問北韓，和金正日、金永南和北韓外長白南舜（Paek Nam Sun）等人會面。白南舜在接受《人民日報》專訪時，針對當前的朝中關係發展則認爲「世世代代鞏固和發展朝中友誼不僅符合兩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也有利於東北亞地區乃至世界的和平與穩定……在兩國領導人的親切關懷下，傳統朝中友誼必將不斷得到鞏固和發展」，而針對北韓未來在國

---

138 人民日報（1997 年 1 月 31 日），〈外交部發言人答記者問　台灣當局處理核廢料舉措旨在破壞中國與有關國家的關係，爲兩岸關係改善和發展設置障礙〉，《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http://data.people.com.cn/101.jsp。

139 FAS News Taiwan (Oct. 20th, 1998), "CHINA/TAIWAN/KEDO," *FAS News Taiwan*. Accessed in Jun. 19th, 2012. http://www.fas.org/news/taiwan/1998/981020-taiwan.htm.

140 人民日報（1999 年 6 月 5 日 a），〈朱鎔基會見金永南　相信這次訪問必將推動兩國傳統友好合作關係進一步鞏固和發展〉，《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39&channelid=199906&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D_B3_AF。

141 人民日報（1999 年 6 月 5 日 b），〈江澤民會見金永南　希望雙方共同努力，繼承傳統、面向未來，把兩國友好合作關係帶入新世紀〉，《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38&channelid=199906&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

142 KCNA (Jun. 7th, 1999), "Chinese government decides to grant aid to DPRK,"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1999/9906/news06/07.htm#11.

際社會中的發展，白南舜表示「要使世紀成爲實現自主、永久和平與安全的世紀，就必須在國際關係中建立起徹底消除霸權和專橫的公正的國際新秩序……朝鮮將繼續堅持自主、和平、友誼的對外政策基本理念。」[143]

2000 年和 2001 年間，兩國高層互訪持續熱絡。金正日先是在 3 月 6 日訪問了中國駐北韓大使館[144]，北韓外相白南舜也於 18 日回訪中國與唐家璇、朱鎔基等人會面[145]。金正日也在兩韓高峰會前夕的 5 月 29 日到 31 日間應江澤民的邀請非正式地訪問中國，和諸多中國高層領導人會面，會談中承諾將重新推進中朝關係的發展，也同意繼續兩國領袖的高層會談[146]。《勞動新聞》也在 6 月 3 日發表社論大力稱讚金正日訪中的行程對兩國關係的鞏固有永續發展是具有重大意義的，並認爲朝中關係的發展要一代一代傳承下去[147]。10 月 9 日，江澤民參加了北韓駐中國大使館所舉辦的朝鮮勞動黨建黨 55 週年的活動[148]，同時也致賀電給金正日，「願同朝鮮黨和人民共同努力，繼往開來，加強合作，使中朝睦鄰友好關係在 21 世紀更加蓬勃地發展。」[149]中國國防部長遲浩田也在 10 月 22 日到 26

---

[143] 人民日報（1999 年 10 月 6 日），〈朝中友誼之樹常青—訪朝鮮內閣外務相白南舜〉，《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26&channelid=199910&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D_B3。

[144] KCNA (Mar. 6th, 2000), "Kim Jong Il visits Chinese embassy,"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0/200003/news03/06.htm#1.

[145] 人民日報（2000 年 3 月 18 日），〈唐家璇與朝鮮外務相會談〉，《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16&channelid=200003&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人民日報（2000 年 3 月 21 日），〈朱鎔基會見朝鮮外務相〉，《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12&channelid=200003&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

[146] KCNA (Jun. 1st, 2000), "Kim Jong Il pays unofficial visit to China,"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0/200006/news06/01.htm#1.

[147] KCNA (Jun. 3rd. 2000), "DPRK-China friendship everlasting,"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0/200006/news06/03.htm#10.

[148] 人民日報（2000 年 10 月 10 日），〈江澤民出席朝鮮勞動黨成立五十五週年慶祝宴會〉，《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88&channelid=200010&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D_B3_AF。

[149] 人民日報（2000 年 10 月 10 日 b），〈江澤民總書記致電金正日總書記　熱烈祝賀朝鮮勞動黨成立 55 週年〉，《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87&channelid=200010&searchword=_5B_B1_EA_CC_

日間率團參加中國志願軍參與韓戰 50 週年紀念，強調「中朝傳統友誼和友好合作關係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並日益顯示出它所具有的歷史基礎與旺盛生命力。」[150]

金正日在 2001 年 1 月 15 日到 20 日之間再度非正式訪問中國，這次將重點放在參觀上海改革開放的情形，並針對上海的發展表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尤其是上海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證明了中國共產黨所採取的改革開放政策的正確性」[151]，也表示要以上海特區爲模式建經濟特區[152]，中國方面也表達對北韓政府的支持，也樂見兩韓關係的改善[153]。江澤民則於 9 月 3 日到 5 日間訪問北韓，作爲自中韓建交以來第一位訪問北韓的中國元首，江澤民強調「中朝友誼受住了時間和歷史的考驗，具有深厚的基礎，顯示了強勁的生命力」，並表示「中國不僅要同我們的友好鄰邦朝鮮，而且願同我們周邊的所有國家，在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其他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的基礎上，不斷發展睦鄰友好、互利合作關係，促進共同繁榮和發展」[154]。除了進一步鞏固兩國關係外，中國方面也表達對南北韓未來達到自主統一的支持，更承諾給予北韓大量援助，而北韓也在同月稍晚取得中方 20 萬噸糧食和 30 萬噸柴油的援助（Imamura, 2002: 61-63）。

2002 年朝中兩國雖然在高層互訪的層級上沒有如前幾年一樣高，不過仍有 3

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D_B3_AF_CF_CA。

[150] 人民日報（2000 年 10 月 26 日），〈紀念我志願軍赴朝參戰五十週年　朝鮮政府舉行盛大集會〉，《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5&channelid=200010&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

[151] 人民日報（2001 年 1 月 21 日），〈應江澤民總書記邀請金正日總書記對我國進行非正式訪問江澤民同金正日舉行會談〉，《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3&channelid=200101&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

[152] 朝鮮日報（2001 年 1 月 26 日），〈金正日指示：”要建上海式的特區”〉，《朝鮮日報》。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1/01/26/20010126000026.html。

[153] KCNA (Jan. 20th, 2001), “Kim Jong Il pays unofficial visit to China,”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1/200101/news01/21.htm#1.

[154] 人民日報（2001 年 9 月 4 日），〈江澤民在金正日歡迎宴會上講話〉，《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57&channelid=200109&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

月北韓副外相金永日（Kim Yong Il）訪中[155]、5 月中國政治局委員賈慶林率團訪朝[156]，以及 10 月北韓最高人民會議議長楊亨燮（Yang Hyong Sop）訪中[157]等，其中賈慶林訪朝時曾兩度和金正日會面[158]，楊亨燮也曾和當時仍爲國家副主席的胡錦濤會面，顯示兩國都有意在中國即將進入第四代領導班子時繼續鞏固兩國關係。此外，兩國在 2002 年也有許多具體的合作措施，包括 4 月 14 日中國以慶祝金日成 90 誕辰爲名，給予北韓價值 5 千萬人民幣的援助物資[159]；5 月 14 日兩國簽訂科技合作議定書，未來將在奈米技術、微生物、農業、石化、自動化機械和採礦等方面進行交流合作[160]；6 月 14 日簽訂《中朝海運協定》[161]；7 月 17 日簽訂國境河流航運合作議定書，雙方同意對通過鴨綠江對方港口的船舶進行更爲嚴格的出入港檢查[162]。年末發生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時，中國方面也沒有如其他國

---

[155] KCNA (Mar. 11th, 2002), "DPRK Foreign Ministry delegation leaves for China,"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2/200203/news03/11.htm#10.

[156] 人民日報（2002 年 5 月 7 日），〈賈慶林赴朝鮮訪問〉，《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355&channelid=2002&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D_B3_AF_C。

[157] KCNA (Oct. 15th, 2002), "DPRK delegation leaves for China,"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2/200210/news10/15.htm#5.

[158] 人民日報（2002 年 5 月 10 日），〈金正日會見賈慶林〉，《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350&channelid=2002&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D_B3_AF。；人民日報（2002 年 5 月 11 日），〈金正日再次會見賈慶林〉，《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347&channelid=2002&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D_B3_AF。

[159] KCNA (Apr. 14th, 2002), "Chinese government offers grant aid to DPRK," *Korean News Service*. Retirieved in Jun. 2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2/200204/news04/14.htm#9.

[160] 人民日報（2002 年 5 月 16 日），〈中朝簽訂科技合作議定書〉，《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342&channelid=2002&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

[161] 人民日報（2002 年 6 月 15 日），〈中朝簽訂海運協定〉，《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324&channelid=2002&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

[162] 人民日報（2002 年 7 月 19 日），〈中朝簽訂國境河流航運合作協議書〉，《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293&channelid=2002&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

家一樣譴責北韓，反而是主張應該透過對話和協商的方式來解決此問題，同時也表示了其支持朝鮮半島非核化的立場[163]。

2002 年 9 月 12 日，北韓最高人民會議常任委員會宣佈在朝中邊境的新義州設立「新義州特別行政區」，並於通過《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希望把新義州特區建立爲「國際性的金融、貿易、商業、工業、尖端科技、娛樂和觀光地區」（第十三條），並 24 日任命荷蘭籍中國人楊斌爲特區行政長官。可是在 10 月 4 日楊斌卻被中國警方以涉嫌逃漏稅、非法開發房地產及炒股的名義被逮捕[164]，並於 11 月被起訴，使得北韓方面仿傚中國建設特別行政區的計劃無法實現。雖然中國方面表示對於楊斌的調查和新義州完全沒有關係[165]，但是一般認爲中國此舉是爲了要牽制北韓，因爲據傳朱鎔基曾建議北韓在開城建立經濟特區，因爲在新義州建立經濟特區會吸走中國建設東北三省的外國投資，而且中國方面也擔心若新義州成爲港、澳類型的城市的話，可能會因爲賭場等娛樂事業，而成爲東北地區非法洗錢和非法活動的重心，因此中國方面才會透過逮捕楊斌牽制北韓（朴鍾碩，2010：195）。北韓方面雖然對次表示抗議也曾派人至瀋陽與中國交涉，但是沒有下文。

（二）胡錦濤時期

胡錦濤在上台之後便面臨到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而中國方面對此之立場可以表現於 2003 年 1 月 20 日中國外長唐家璇的演說中，他提到中國在北韓核武問題上堅持三點主張：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與穩定、透過外交和政治手段解決分歧，以及保持朝鮮半島非核化等三點，並進一步強調此問題的解決主要應該透過朝美

[163] 人民日報（2002 年 10 月 18 日），〈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115&channelid=2002&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D_B3_AF_CF_CA。

[164] 朝鮮日報（2002 年 10 月 4 日），〈新義州特區長官楊斌被中國警方傳喚〉，《朝鮮日報》。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2/10/04/20021004000012.html。

[165] 朝鮮日報（2002 年 10 月 8 日），〈北韓與中國就解除楊斌長官職務一事達成協議〉，《朝鮮日報》。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0 日。http://cn.chosun.com/big5/site/data/html_dir/2002/10/08/20021008000014.html。

間的直接對話進行，而任何的解決方案後構想都應該得到北韓方面的同意[166]。由於一個不穩定的朝鮮半島對中國的經濟發展有弊，同時胡錦濤政府也提出了「和平崛起」、「和諧社會」等政治綱領，因此中國爲了展現自己爲「負責任的區域大國」，便多次在美國和北韓之間傳遞訊息（H. Kim, 2010: 64）。北韓方面起先斥責以多邊型式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提議，認爲唯有透過朝美兩國簽訂和平協定才有可能解決此問題[167]，不過在中國的奔走與協調下，朝美中三國在 4 月 23 日到 25 日間進行「三邊會談」。後來在 8 月 4 日，北韓外務省宣佈北韓將參加「六方會談」[168]，中國副外長王毅也在 7 日到 9 日間訪問北韓，就核武事件以及北韓參與「六方會談」的相關事宜進行討論[169]。在北韓和美國之間缺乏互信的情況下，中國居中協調的角色終於促成了「六方會談」的形成。

在「六方會談」架構之外，兩國的高層來往也相當頻繁。2004 年 1 月中國共產黨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瑞訪問北韓，3 月中國外長李肇星也訪問北韓。金正日於 4 月 19 日到 21 日間對中國進行非正式訪問[170]，就鞏固兩國邦誼、「六方會談」成果、雙邊經濟合作和中國對北韓援助等內容進行討論（B. K. Park, 2010: 135），在金正日回程途中由於北韓在平安北道（North Pyongan Province）發生嚴重的爆炸意外，中國也向北韓提供了 1000 萬人民幣的救援物資[171]。2005 年 3 月

---

[166] 人民日報（2003 年 1 月 22 日），〈唐家璇就伊問題及朝核問題　闡明中國政府立場〉，《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202&channelid=2003&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

[167] KCNA (Mar. 10th, 2003), "KCNA refutes U. S. absurd call for 'multilateral talks',"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2nd,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3/200303/news03/11.htm#2.

[168] KCNA (Aug. 4th, 2003), "DPRK Foreign Ministry Spokesman on Six-Party Talks,"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2nd,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3/200308/news08/05.htm#12.

[169] 人民日報（2003 年 8 月 9 日），〈我副外長與朝外務省官員會談〉，《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67&channelid=200308&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D_B3_AF_C。

[170] KCNA (Apr. 22nd, 2004), "Kim Jong Il Pays Unofficial Visit to China,"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2nd,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4/200404/news04/23.htm#1.

[171] 人民日報（2004 年 4 月 25 日），〈中國向朝提供緊急援助〉，《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363&channelid=2004&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D_B3_AF_CF_。

22 日到 27 日，北韓總理朴奉珠訪問中國，期間簽訂了〈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並參訪上海考察當地企業，也前往遼寧進行考察[172]。10 月 8 日到 10 日，中國副總理吳儀訪問北韓，承諾在礦產、鋼鐵以及港口發展上與北韓進行經濟合作計劃（B. K. Park, 2010: 135）。10 月 28 日到 30 日間，胡錦濤則訪問北韓，期間除了大談中國改革開放的成果外[173]，也在和金正日會談中提出繼續高層往來並加強溝通、拓展交流領域並豐富合作內涵、推進經貿合作以促進共同發展、積極協調以維護共同利益等四點促進兩國關係之建議，獲得金正日的贊同[174]，兩國也簽定〈中朝經濟技術合作協定〉。金正日於 2006 年 1 月 10 日到 18 日再度非正式訪問中國，主要以考察武漢、宜昌、廣州、珠海和深圳地方的經濟特區與企業發展爲主，表示「朝鮮十分注意發展經濟，願意進一步加強同中國的交流與合作，以便更好地探索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175]

從上述兩國高層的互訪中可以了解到，雙方談論的重點除了兩國邦誼的鞏固、北韓核武問題和「六方會談」之外，最主要的討論的內容集中在雙邊的經濟合作上，而兩國間的〈促進和保護投資協定〉和〈中朝經濟技術合作協定〉都可視爲此脈絡下的成果。由下頁表 5-3 和 5-4 來看胡錦濤時代的兩國貿易與中國對北韓投資的量來看，都有顯著的成長，顯示朝中兩國在貿易和經濟合作上較之前更爲

---

[172] 人民日報（2005 年 3 月 28 日），〈朝鮮總理朴鳳柱結束訪華回國〉，《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9&channelid=200503&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

[173] 人民日報（2005 年 10 月 29 日），〈在金正日總書記舉行的歡迎宴會上的講話〉，《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14&channelid=200510&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

[174] 人民日報（2005 年 10 月 29 日），〈胡錦濤同金正日舉行會談〉，《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13&channelid=200510&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D_B3_AF_CF_。

[175] 人民日報（2006 年 1 月 19 日），〈應胡錦濤總書記邀請金正日總書記對我國進行非正式訪問胡錦濤同金正日舉行會談〉，《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2&channelid=200601&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3D_BD_F0_D5_FD; KCNA (Jan. 19th, 2006), "Kim Jong Il Pays Unofficial Visit to Central and South China,"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2nd,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6/200601/news01/20.htm#12.

密切。中國總理溫家寶在和金正日於 2006 年 1 月會面時提到，未來兩國間的經貿合作將以「政府引導、企業參與、市場運作」[176]爲原則來進行，顯示中國方面希望透過經濟手段不只滿足傳統戰略上的利益，也希望可以透過市場原則取得經濟方面的利益。此外，這幾次金正日和朴奉珠對中國的訪問中，除了北京外，也還到了上海、遼寧、廣州等地進行參觀，參觀的具體地點包括相關經濟特區、地方企業和科學技術方面的機關單位，顯示北韓不僅希望可以透過雙方高層的頻繁互訪取得更多來自中國的經貿合作和援助物資，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可以學習中國改革開放後的成果，配合 2002 年後北韓開放「特別經濟區」和進行「經濟秩序改善措置」等經濟改革行爲，爲朝鮮式社會主義建設找尋新的一條路。

表 5-3　胡錦濤時期朝中兩國貿易額（億美元）

年度	北韓進口	北韓出口	總貿易額	成長
2003	6.28	3.96	10.24	38.6%
2004	8.00	5.85	13.85	35.4%
2005	10.28	4.99	15.80	14.1%
2006	12.32	4.68	17.00	7.5%
2007	13.92	5.82	19.74	16.1%
2008	20.31	7.50	27.81	40.9%
2009	18.88	7.93	26.82	-3.8%
2010	22.78	11.93	34.72	29.6%

資料來源：日本経済新聞[177]、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使館（2007）、Park(2010: 136)

[176] 同前注第一條。

[177] 日本経済新聞（2011 年 1 月 27 日），〈北朝鮮、中国依存高める　中朝の 2010 年貿易額 29%増で最高に〉，《日本経済新聞》。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www.nikkei.com/article/DGXDASGM2605C_W1A120C1FF1001/。

表 5-4　胡錦濤時代中國對北韓投資流量（萬美元）

年度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投資流量	112	1413	650	1106	1840	4123	586	1214

資料來源：〈2010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

雖然朝中關係在高層互訪和經貿交流的往來相當密切，但是卻因爲核武和飛彈問題，使得中國方面對北韓方面相當不滿。2005 年 2 月 10 日，北韓宣佈對外宣佈已經擁有核武，對此中國外交部沒有特別提出看法，只有在例行記者會中由外交部發言人表示「我們注意到了有關報道，正在關注事態發展。我們一貫主張朝鮮半島無核化，維護半島和平穩定。我們希望六方會談繼續下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a），但是外長李肇星卻在之後幾天內分別和美、俄、韓、日等國外長通過電話，討論相關事情。北韓在 2006 年 7 月 5 日向日本海發射大浦洞二號飛彈時，中國外交部只提到「希望有關各方保持冷靜和克制，多做有利於朝鮮半島和東北亞和平穩定的事。」（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a）到北韓於 10 月初宣佈將發射核武時，中國方面才首次指名道姓地說「希望朝方在核試問題上務必保持冷靜和克制」（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b），並在 10 月 9 日北韓發射核武後發表聲明指出「朝鮮……無視國際社會的普遍反對，悍然實施核子試驗，中國政府對此表示堅決反對。實現半島無核化，反對核擴散，是中國政府堅定不移的一貫立場。中方強烈要求朝方信守無核化承諾，停止一切可能導致局勢進一步惡化的行動，重新回到六方會談的軌道上來。」（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c）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有北韓核試的制裁案中，中國雖然投下了贊成票，但是大使王光亞也表示「制裁本身並不是目的……如朝方遵守該決議的有關要求，安理會將暫停或取消對朝制裁……中方不贊成對進出朝鮮貨物進行檢查的做法。因此，我們對決議中的相關條款持保留態度」（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d），而於外交部的例行記者會中表示不會擴大制裁的範圍、不會停止對北韓的能源和糧食援助，也不會干涉兩國間的正常貿易活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e、

2006f）。作爲胡錦濤的特使，國務委員在 19 日前往平壤和金正日會面，就北韓核試和「六方會談」問題進行討論，金正日在會談中表示沒有進行第二次核子試驗的計劃，但是如果外界施加更大的不公正的壓力，北韓方面有可能考慮採取進一步的措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f）。

朝中關係一直到 2009 年兩國建交 60 週年才有所改善。金正日和胡錦濤先是在元旦賀電中將該年定義爲「朝中友好年」[178]，1 月 21 日中國共產黨對外聯絡部部長王家瑞則訪問北韓並受到金正日的接見[179]。3 月 17 日到 21 日，北韓總理金英逸則訪問中國參加「朝中友好年」的開幕典禮，並和胡錦濤、溫家寶等人進行會談[180]。北韓在 5 月底接連進行三次飛彈試射和第二次核武試爆，在此之前，中國方面分別在 1 月王家瑞訪朝、2 月外交部副部長武大偉訪朝和 3 月金英逸訪中時三度勸北韓不要冒然進行飛彈試射（平井久志，2010：166），也一貫保持希望朝鮮半島非核化的立場，因此在 5 月 25 日北韓進行第二次核武試爆時，中國外交部也發表聲明表示強烈的抗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9a）。針對中國的批評，北韓透過外務省發言人對中國的回應含蓄地進行反駁：

> 事態會發展到此的全部責任，都在將我國和平發射衛星之事提報告聯合國進行譴責的美國與其扈從勢力。這些國家一面在我國面前聲稱發射衛星是主權國家的自主權利，但又在我們進行時在聯合國策動對我們的彈劾。[181]

中國雖然在這次聯合國安理會中所討論的制裁案中也投下的贊成票，但是也表示兩國之間的正常來往不會因此而受到改變（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9b）。爲

---

[178] KCNA (Jan. 1st, 2009), "Kim Jong Il Sends Greetings to Hu Jintao,"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2nd,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9/200901/news01/20090101-10ee.html.

[179] 人民日報（2009 年 1 月 24 日），〈胡錦濤向金正日致親署信〉，《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4&channelid=200901&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D_2B_。

[180] KCNA (Mar. 19th, 2009), "Kim Yong Il Pays Courtesy Call on Chinese President,"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2nd,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9/200903/news19/20090319-07ee.html.

[181]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5 月 29 日），〈国連安保理の挑発には、さらなる自衛的措置〉，《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cyokaku2009052900.html。

了修補兩國關係，中國方面先是在 9 月 16 日到 18 日派國務委員戴秉國爲特使前往北韓[182]，溫家寶更於 10 月 4 日到 6 日前往平壤參加「朝中友好年」的閉幕典禮。溫家寶這次訪朝，除了希望能夠修補兩國關係之外，也和北韓簽訂〈有關朝中經濟科技合作議定書〉，以及其他與教育、軟體產業合作和觀光有關的協議[183]，同時也同意要在兩國界河的鴨綠江上修建新的橋[184]，以利兩國交流。

朝中關係在此後全面恢復，光金正日就分別在 2010 年 5 月和 8 月及 2011 年 5 月和 8 月四度非正式訪問中國，其中特別訪問大連、瀋陽、長春、哈爾濱和內蒙古，顯示金正日重視中國東北在 2002 年中國推行「東北振興戰略」後東北地區的經濟發展，以及此區和北韓經濟的連繫作用。朝中兩國在 2010 年 2 月 25 日簽訂〈朝中關於共同建設、管理和維護鴨綠江界河公路大橋的協定〉，而該橋也在 12 月 31 日完工。在經濟方面，朝中兩國目前在羅津港有所合作，中國方面出資進行維修並租用使用權，北韓方面收取使用費，中國也有許多企業投資於北韓的礦產、鋼鐵等產業上（平井久志，2010：353-359；B. K. Park, 2010: 134-146）。政治方面，兩國之間的「血盟」情誼似乎有所恢復，除了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委郭伯雄在參加「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 60 週年」慶上提到「中朝之間的友誼是兩國人民和軍隊用鮮血凝成的」[185]之外，在胡錦濤和金正日在 2010 年 5 月的會談中也提到要「加強戰略溝通。雙方隨時和定期就兩國內政外交重大問題、國際和地區形勢、治黨治國經驗等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溝通」（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使館，2010），也在 2011 年 5 月和金正日會面時重申同樣的立場，而金正日也對此表示「對於我們兩黨、兩國之間戰略想法交流的緊

---

[182] KCNA (Sept. 16th, 2009), "Chinese Envoy Here,"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2nd,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9/200909/news16/20090916-21ee.html.

[183] KCNA (Oct. 4th, 2009), "Agreement and Agreed Documents Signed between DPRK, Chinese Governments,"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2nd,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9/200910/news04/20091004-11ee.html.

[184]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10 月 4 日），〈金英逸総理と温家宝首相が会談〉，《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aigai2009100400.html。

[185] 人民日報（2010年10月26日），〈朝鮮舉行盛大集會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入朝參戰六十週年〉，《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data.people.com.cn:8080/deta1l?record=13&channelid=201010&searchword=_5B_B1_EA_CC_E2_2C_D5_FD_CE_C4_2C_BC_E7_B1_EA_CC_E2_2C_B8_B1_B1_EA_CC_E2_5。

密性，透過我國和中國黨中央領導間的共識精神，以政治、經濟、文化等不同領域之實現感到滿意。」[186]

肆、日本

一、金正日時期朝日關係的特質

日本對北韓而言是具有多層次意義的國家：一方面，由於過去被殖民統治的經濟和二戰後日本與美國和南韓建立同盟關係等原因，北韓長期以來將日本塑造爲自己的主要敵人之一，在教育體系與官方媒體中對日本進行嚴厲的批判；可是另一方面，日本作爲亞洲的經濟強國和美國在亞洲地區最主要的盟友，又是北韓可以藉此改善經濟狀態和影響美國行爲的重要媒介；同時，朝總聯是在兩國進行政府間接觸時期雙邊交流和經貿、金融往來的主要機關，也是北韓以日本爲根據地訓練情報員的重要據點。因此對北韓而言，雖然和日本之間的關係不如同美國、南韓和中國之間重要，但若朝日關係改善的話，北韓又可以獲得政治（朝日建交、釋出善意等）和經濟（貿易、金融往來、經濟產業科技等）方面的重大利益，因此成爲金正日時期北韓次於美國最想要改善關係的國家。

從朝日間在金正日時期的來往過程來看，和朝美關係的「危機趨動」過程相反，危機往往是促使兩國政府間交流中斷的因素，同時日本的國內因素也使得日本政府難以採取對朝溫和的態度。金日成在 1990 年主動提出希望與日本就建交進行會談的善意，兩國則自 1991 年和 1992 年進行八回合的「國交正常化交涉」，後來因爲兩方歧見、「李恩惠」（Yi Un Hye）事件[187]和第一次核武危機而中斷；1997 年底，時任自由民主黨（Liberal Democratic Party，以下簡稱自民黨）總務

[186]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1 年 5 月 25 日），〈胡錦濤総書記の招待宴での両国最高指導者の演説〉，《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kishi2011052500.html。

[187] 1987 年北韓利用諜報人員將韓航 858 號客機進行爆破後，其中一名諜報人員金賢姬（Kim Hyon Hui）被捕獲，交由日本當局進行偵訊。在偵訊過程中，金賢姬表示她在北韓接受訓練時是由名爲「李恩惠」的人教授她日文與日本文化相關的知識，日本政府便懷疑李恩惠是北韓所綁架的日本公民田口八重子（Yaeko Taguchi）。北韓方面雖然承認田口八重子是被北韓當局所綁架的，但不承認有李恩惠這號人物。

會長的森喜朗（Yoshirou Mori）議員訪朝就再度進行國交正常化交涉和給予北韓援助和北韓達成共識，卻因爲受到日本外務省官僚反對和 1998 年北韓試射飛彈緣故，因而中止；兩國在森喜朗與小泉純一郎（Jyunichirou Koizumi）政府期間有較好的關係，期間進行四回合的國交正常化交涉，小泉也兩度訪問平壤與金正日會面，並達成《平壤宣言》（*Pyongyang Declaration*），可是因爲日本國內對於「拉致事件」的重視，以及北韓核武與飛彈試射對日本構成的安全威脅，日本對北韓進行嚴厲的經濟制裁，兩國高層自 2006 年以來以沒有互訪活動，只能在「六方會談」和其他多邊場合中進行接觸。

從朝日關係的內容來看，除了小泉兩次訪問北韓之外，兩國之間的接觸主要是外交官實務層級的接觸和日本國會議員訪朝團和朝鮮勞動黨之間的接觸，此外尚有朝總聯以日本民間團體身份在日本所進行的親北韓言論和相關交流活動，在冷戰時期於對日外交中佔重要地位的情報活動在金正日時期已經不再重要。只是由於日本自 2006 年以來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的決議和國內《外匯與對外貿易法》對北韓進行嚴格的制裁，兩國間目前幾乎不存在任何雙邊貿易關係，日方也原則上禁止北韓籍的人士入境，在對朝政策上也採取和美國同調的行爲。因此，兩國目前的雙邊關係可以說是處於停頓的狀態。

從北韓希望透過朝日關係達到的目的來看，主要可以分爲政治和經濟兩方面來說明。政治方面，北韓主要希望可以和日本邦交正常化，讓日本放棄「一個韓國」的官方政策[188]，並希望日本可以就過去殖民時代對北韓所造成的損害進行道歉。更重要的是，北韓希望可以透過和日本建立正式的雙邊關係管道來加強和日本之間的交流，利用日本對美國和南韓的行爲進行牽制和影響。經濟方面，北韓在歷次國交正常化交涉和《平壤宣言》中，都希望日本可以就過去殖民時代進行賠償，也希望日本在和北韓建交以後，可以和北韓進行經貿、科技方面的合作，

[188] 日本在和南韓於 1965 建交簽訂《日韓關係基礎條約》以來，就承認南韓爲代表朝鮮半島的唯一合法政府。雖然近年來和北韓之間的高層交流日益頻繁，也拿掉了原本日本護照「不適用於北朝鮮」之規定，但是至今在日本外務省官網中仍將北韓和台灣、巴勒斯坦（Palestine）和紐埃（Niue）等地同列在「地域情勢」而非「各國情勢」中，顯示日本政府在官方上仍不承認北韓爲一主權獨立國家。

這些對北韓而言是促進產業升級、賺取外匯和吸引國外投資的重要來源，也是維持北韓政權存續的最重要因素。

二、金正日時期朝日關係的發展

（一）1990 年代的朝日關係

朝日之間在 1990 年代起有頻繁的接觸起因於 1989 年 1 月 11 日北韓外務省突然發表了有關改善朝日關係的談話，內容中一改過去拒絕政府間接觸與對話的態度，希望日本方面可以在修正對韓一邊倒政策、對於殖民地支配進行道歉和負起賠償義務的前提下，和日本政府展開對話。日本方面在 20 日於〈關於我國朝鮮半島政策〉的政見說明中表示將「就日朝間所有未解決問題不設前提條件，也準備不論任何形式與朝鮮進行會談」（福原裕二，2004：79）。日本首相竹下登（Noboru Takeshita）在 3 月 30 日也在國會中對於日本過去殖民朝鮮半島表示「深刻的反省與遺憾」，並表示「希望能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在沒有前提條件下進行會談。」（重村智計，2000：101）1990 年 9 月 24 日到 28 日，自民黨副總裁金丸信（Shin Kanemaru）和日本社會黨副委員長田邊誠（Macoto Tanabe）以拯救「第十八富士山丸號」（*18 Fujisanmaru*）船員爲由訪問北韓，並與金日成會面，最後達成〈有關日朝關係的日本自由民主黨、日本社會黨、朝鮮勞動黨共同宣言〉（以下簡稱《三黨共同宣言〉\》），其中第一條提到「三黨對於日本造成朝鮮人民 36 年的不幸與災難、戰後 45 年對朝鮮人民所造成的損失，日本方面必須對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進行公開的謝罪，並認爲應該予以賠償」，首次承認日本有對北韓賠償的義務，並提到「三黨希望消除日朝兩國間存在的非正常狀態，儘早就樹立國家關係」（第二條），且希望「爲了解決日朝兩國建交前夕的現有和過去問題，同意強力勸說政府在十一月中開始進行政府間交涉」（第七條）。雖然《三黨共同宣言》受到日本國內的強力反對（和田春樹，1998：188-189；重村智計，2000：114；Halloran, 1998: 217），但是朝日兩國自 1991 年 1 月 30 日起，在平壤進行第一回合的國交正常化交涉。

金日成在 1991 年接受日本「岩波書店」的訪問時曾提到：

> 解決朝日關係問題的出發點在於，日本必須誠實地就其過去的錯誤進行反省……今天日本作為經濟大國，為了往新的發展方向前進，應該要自我反省不要再承襲過去和其他國家間錯誤的發展，如此才能發展真正的有好關係。（金日成，1991）

因此，北韓在國交正常化交涉談判中，對於日本在就過去殖民進行道歉和賠償，成爲北韓方面相當重視的議題。在八次會談中，兩國間的問題可以分爲以下幾點：首先，就殖民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問題來看，北韓方面要求日本進行公開道歉，認爲日本以《日韓併合條約》強行吞併朝鮮半島是不合理的，也認爲由於兩國目前仍處於戰爭狀態，因此日本必須就殖民時代和戰後時期對北韓所造成的所有損失進行賠償；日本方面願意道歉，但是認爲日本沒有義務爲戰後的北韓損失進行賠償，認爲在戰時由於朝鮮半島沒有國家存在，日本和朝鮮間從來沒有進入過戰爭狀態，此外也認爲在當時的時空環境下，《日韓併合條約》是合法的。其次，就核子問題方面，日本認爲北韓應該要全面接受 IAEA 的視查，但北韓方面卻認爲這是朝美之間的問題，和日本沒有關係。第三，日本方面也希望北韓能夠和南韓有更密切的往來，也希望兩國能夠就彼此的核設施進行視查，北韓也以這和日本無關爲由拒絕討論。在此之外，北韓還提出慰安婦問題，日本希望北韓就「李恩惠」事件進行說明，也希望解決日本人妻返日省親[189]的問題。由於北韓希望只針對殖民時代賠償和建立邦交關係進行會談，而日本希望採取「一籃子」討論模式，最後在 1992 年 11 月的第八回合會談中，金正日對於日本履履提出「李恩惠」事件感到不滿而下令中止會談，北韓代表也表示「朝鮮是不會拋棄自己的尊嚴和原則改善同日本間的關係。」（和田春樹，1998：190-196；重村智計，2000：118-122）

北韓在發生經濟危機時，則於 1994 秋天和 1995 年 1 月兩度向日本求取援助，

[189] 自 1956 年日本和北韓就在日朝鮮人歸國一事達成協議，並自該年底起以雙方紅十字會爲中介協助在日朝鮮人的歸國，其中不少在日朝鮮人也帶著日本籍的妻兒返回北韓。可是由於後來朝日兩國沒有正式往來，加上北韓政府對於國民的出入境管理極度嚴格，這些日本籍的妻子再也沒返鄉省親的機會，形成朝日關係的重要問題之一。

但是都爲日方所拒絕（Haggard & Noland, 2007; 137）。不過也因爲北韓方面的主動接觸，北韓黨統一戰線部轄下的亞洲太平洋和平委員會副委員長李種革（Lee Jong Hyuk）和日本自民黨政調會長保利耕輔（Kousuke Hori）於 1995 年 2 月 16 日在新加坡進行密會，敲定由執政黨率團訪問北韓（重村智計，2000：169）。以前副總理渡邊美智雄（Michio Watanabe）爲團長的自民黨、社會黨和先驅新黨（New Party Sakigake）代表於 3 月 28 日到 30 日間訪問北韓，除了答應給予北韓糧食援助外，也達成〈重啓日朝會談協議書〉，同意在沒有前提條件的情況下重啓國交正常化會談。朝日雙行後來透過紅十字會會談，日本方面於 7 月提供北韓價值 23.4 億日圓的糧食援助，10 月以政府名義提供 20 萬噸的糧食援助，次年 6 月也經由紅十字會提供 1.5 萬噸的糧援（東鄉育子，2011：102-103）。可是北韓方面不僅沒有善意的回應，朝鮮勞動黨書記金容淳反而說：「日本爲了解決朝日關係正常化問題，一直表示希望透過送糧食給我們來對過去造成朝鮮的傷害進行謝罪……這次的糧食交易不是爲了解決我國的饑荒問題……而是基於『既然日本懷著謝罪的心態要送糧給我們，沒有理由不接受它』立場才接受的」（轉引自福原裕二，2004：86），引起日本國內極大的反彈。雖然兩國間後來透過紅十字會在 1997 年 9 月和 1998 年 1 月達成兩次日本人妻返日省親（東鄉育子，2011：103），自民黨總務會長森喜朗也於 1997 年 11 月率領執政黨訪問北韓，但是兩國因爲 1997 年起爆發的拉致問題與北韓對日本構成的飛彈威脅，使得雙方關係仍沒有具體進展。

1998 年 8 月 31 日，北韓往日本海進行「大浦洞一號」飛彈的試射，飛彈還飛越日本本土上空。對此，日本政府於 9 月 1 日表達嚴重抗議，也宣佈中止對北韓的一切糧食援助、中止參與 KEDO 活動、中止和北韓進行國交正常化交涉，並不排除將此問題提到聯合國安理會上進行處理（首相官邸，1998）。但北韓方面真正構成安全威脅的國家其實是日本，認爲日本國內的反動份子稱北韓爲「擁有核武的恐怖主義政權」之言論構成對北韓主權的侵害，故北韓才必須有所回應

[190]。日本雖然在 10 月恢復在 KEDO 之活動（李明，2001：108），但是兩國間的高層接觸一直到 1999 年 12 月 1 日到 3 日由前首相村山富市（Tomiichi Murayama）率團訪問北韓才又恢復，兩國同意重啓政府和政黨間的對話，日本也在 2000 年 3 月應北韓要求透過世界糧食計劃署給予北韓 10 萬噸的糧食援助（東鄉育子，2011：103）。

（二）森喜朗、小泉純一郎政府

接續著在小淵惠三（Keizo Obuchi）內閣後期朝日關係的改善，在森喜朗內閣的短暫一年多內，朝日兩國就有四次主要的會面。朝日兩國分別在 2000 年的 4 月、8 月和 10 間進行了中斷八年以來的「國交正常化交涉」，其中在 4 月的第九回合會談中日本要求北韓接受 IAEA 的視查，也希望日本在飛彈的開發、生產、試射和配置上能夠克制自己的行爲，但是北韓認爲核問題是和美國與 IAEA 之間的問題，飛彈開發則是主權國家的權利，兩者都與日本無關。到了 8 月和 10 月的會談中，北韓堅持雙方的任何討論都要先從處理過去的問題開始，而日方則希望可以以經濟合作方法來處理賠償問題，另外也在會談中提出了希望北韓方面可以認真處理拉致事件的問題，雙方仍在討論內容毫無交集（松本英樹，2003：34-35）。另外在 7 月 26 日，北韓外相白南舜和日本外相河野洋平（Yohei Kono）也在曼谷舉行兩國首次的外長會談，其中白南希望在尊重主權、平等互惠和不干涉內政的原則上與日本建立善鄰友好的關係，並認爲日方只要有勇氣就過去的錯誤進行處理，朝日關係一定可以正常化的；河野則提到由於兩國過去的不正常關係導致沒有接觸的機會，因此必須先由建立起雙方間的信任感開始，並認爲透過解決兩國間的問題可以建立政府間與國民間的互信，在這種情況下建立的邦交關係才有利於區域和平與安全（外務省，2000）。

小泉純一郎接任首相後，起先對於和北韓之間的接觸沒有太積極，直到 2001 年 12 月在奄美群島（Amami Islands）外海發現北韓間諜船，及北韓向日本紅字

[190] KCNA (Sept. 4th, 1998b), "KCNA on real threat from Japan,"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5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1999/9909/news09/04.htm#16.

會宣佈中止對拉致事件的調查爲契機，兩國才又開始有政府間接觸，並且在經過兩國外務省的局長會談後，宣佈小泉將於 2002 年 9 月 17 日訪問北韓。在這次的朝日首腦會談中，金正日不僅和小泉會面，還出乎所有人預料之外地承認北韓確實曾在 1970 到 1980 年代間由歐洲和日本綁架了十三名日本公民，小泉針對這點也向金正日表示抗議，並希望北韓方面可以給日本一個明確的調查報告和交代。另外，北韓方面也否認 2001 年 12 月的間諜船爲北韓船隻，同時宣佈原本和美國達成的暫停試射飛彈計劃將延長到 2003 年年底（首相官邸，2002a）。雙方最後簽署了《平壤宣言》，日本方面就過去的殖民統治向北韓方面道歉，並表示在雙方建交以後，會以無償資金協力、低利長期貸款等方式與北韓進行雙邊和多邊的經濟合作；北韓方面則承諾不會再發生造成日本國民生命安全威脅的事件（指拉致事件）；雙方也共同承諾將持續「國交正常化交涉」，並以對話的方式希望可以處理朝鮮半島上的核子與飛彈問題。金正日也在會後接受共同通信社（Kyodo News）訪問時提到「如果能改善朝日之間的不正常關係的話，也就能解決日本國民所擔憂的安全問題。雖然日本針對我國的國防能力之強化一直懷有不安的想法，但是我國的國防政策是徹頭徹尾的自衛政策。」（金正日，2002b）

日本方面爲了調查被北韓當局綁架的日本公民的生活情形和已經過世者的消費，組成調查團於 9 月 28 日至 10 月 1 日間進行調查（首相官邸，2002b）。日本方面也在 10 月 9 日發表未來與北韓進行國交正常化會談時之基本立場，強調會以處理拉致事件爲最優先的考量（首相官邸，2002c）。朝日於 29 日和 30 日舉行第十二回合的國交正常化交涉，北韓方面表示透過金正日的公開道歉，會有誠意地解決此問題，但是對於日本方面所要求討論的核武、飛彈等問題，北韓方面認爲起因是來自於美國對北韓的安全威脅，而北韓方面也強調會遵守《平壤宣言》來處理兩國間的所有問題，也希望兩國儘早就雙方間的《防護管制協定》進行會談（外務省，2002）。不過由第二次核武危機的爆發和北韓退出 NPT 事件之發生，日本方面不僅接受 IAEA 對北韓制裁的決議，也大力譴責日本退出 NPT 之行爲，並表示會和美國、南韓等國密切合作希望儘速促成北韓廢棄其核子開發計劃（外

務省，2003）。

在第二次核武危機爆發之後，日本在內的各國透過每次的高峰會談均希望可以以和平的型式解決北韓核武問題，也促成了 2003 年「六方會談」。但是由於各方的歧見太大，無法達成具體進展，於是日本方面爲了促使北韓能夠往棄核方向改變，於 2004 年 2 月推動《外匯與對外貿易法》的修正，把原本禁止日本單方面對任何一國進行經濟制裁的規定改爲，日本可以爲了國家安全爲由對該國進行貿易和金融方面的制裁（Sato, 2009: 79-80），同時也通過可以在一定期間內禁止特定船舶入港的《特定船舶入港禁止法》（東郷育子，2011：105）。

兩國在 2004 年 2 月進行高層會談之後，小泉於 2004 年 5 月 22 日再度訪問北韓，就拉致事件中仍倖存的日本公民返國省親與核問題等相關事情與金正日進行會談。小泉這次訪朝主要的成果除成功促使五名被綁架的日本公民得以返國省親之外，也得到金正日會按《平壤宣言》精神推展朝日關係的承諾（首相官邸，2004）。日本方面則在 5 月給予北韓 25 萬噸的糧食援助和相當於 1000 萬美元的醫療用品援助，同年 8 月也給與總計相當於 4700 萬美元的糧食和醫療用品援助。可是在同年底日本方面發現北韓所歸還的被綁架日本公民的遺骸是假的，引發日本國內的軒然大波，因此日本外務省便以此爲由表示將會停止對北韓提供人道援助（外務省，2004），並於 12 月 28 日凍結對北韓的人道援助。北韓對日本方面的指控相當生氣，認爲所爲的鑑定結果是日方早就設定好的「劇本」[191]，並針對日方所提出的報告書內容一一反駁[192]。

由於第四輪「六方會談」在 2005 年 9 月 19 日達成《共同聲明》，兩國間的高層會談一直年 11 月和 12 月間才又進行了兩次的的政府間協議。在 11 月 3 日到 4 日的協議中，雙方就拉致問題、歷史賠償問題、安全保障和未來兩國間的協議型式進行討論，並確定未來兩國間會談會以「處理兩國懸案問題（包括拉致問

[191]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4 年 12 月 14 日），〈遺骨「鑑定結果」は政治的脚本〉，《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shiriyo.tyoson.2004121400.html。

[192]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5 年 1 月 24 日），〈日本は反共和国謀略劇の責任から絶対に逃れられない〉，《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shiriyo.tyoson.2005012400.html。

題）」、「處理兩國安全保障問題（包括核武和飛彈）」和「國交正常化交涉（包括處理歷史問題）」等三方面進行（外務省，2005a）。在 12 月 24 日到 25 日間的會談中，北韓同意日本所提出的三個討論議題與交涉層級，並同意自 2006 年 1 月底起開始進行會談，日本方面在拉致問題上除了堅持「不解決拉致問題就不談國交正常化」的立場之外，也希望北韓能夠讓被綁架者歸國、查明事情真相並引渡罪犯，可是北韓方面堅持此問題已經解決完畢，並認爲這次的會談是有關邦交正常化的會談，因而沒有任何有關拉致問題的新消息可以告知日本當局（外務省，2005b）。北韓方面認爲日本一直以拉致問題爲由阻撓兩國關係正常化只是爲了取得美國認同的作爲而已，並認爲若日本繼續對此議題的堅持的話，只會使得雙邊會談更加的不順利[193]。

兩國雖然在 2006 年 2 月 4 日到 8 日召開討論三大議題的的會議，但是沒有取得任何共識（外務省，2006a）。由於日本堅持拉致問題優先處理的原則，使得兩國關係無法，因此北韓便加強對日本批判的力度。批評日本以「反恐」爲名所建立的迅速反應部隊是日本右傾化、軍事化的舉動[194]，批評日本提出把防衛廳升格的舉動是軍事大國化、膨脹海外擴張野心的彰顯[195]，更認爲日本加入美國的飛彈防禦體系目的是要對北韓採取先發制人攻擊的侵略作爲[196]，也認爲日本所謂的「朝中威脅論」只是擴軍的藉口而已[197]。2006 年 7 月 5 日，北韓再度朝日本海進行飛彈試射，日本透過駐北京大使館除了表達抗議與遺憾之外，也認爲北韓的舉動違反了《平壤宣言》的精神（外務省，2006b），日本政府也向國際海事組織（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和國際民航組織（International Civil Aviation

[193] KCNA (Dec. 30th, 2005), "KCNA Blasts Japan's Political Row over 'Abduction Issue',"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5/200512/news12/31.htm#9.

[194]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5 年 9 月 26 日），〈尋常でない軍事的措置〉，《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anpo.2005092600.html。

[195]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5 年 12 月 3 日），〈軍隊保有主張にひそむ腹黒い下心〉，《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anpo.2005120300.html。

[196]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6 年 1 月 10 日），〈無謀な段階に至った先制攻撃企図〉，《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anpo.2006011000.html。

[197]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6 年 5 月 16 日），〈「朝中脅威論」は軍事力増強の名分〉，《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anpo.2006051600.html。

Organization）提出認爲北韓的舉動違反國際法希望可以進行制裁（外務省，2006c），並在聯合國安理會《第 1695 號決議》通過後，於 9 月 19 日根據《外匯與對外貿易法》對北韓實施金融制裁（外務省，2006d）。北韓先是在 7 月 20 日外務省朝日國交正常化會談擔當大使宋日昊（Song Il Ho）的訪問中表示由於日本對拉致問題的執著，兩國關係已經從「糟糕的狀態」惡化爲「對立的局面」，並認爲日本因爲飛彈而不准北韓船隻入港是極爲不人道的作爲[198]。而針對日本對北韓進行的金融制裁，朝鮮中央通信社則批評這是日本爲了要討好美國而採取的逢迎作爲，認爲反動份子不顧兩國關係的惡化和《平壤宣言》的精神而執意要追隨美國的對朝敵視政策，而北韓將會採取必要的反制措施[199]。

（三）後小泉時期

安倍晉三在接任小泉上任不久，北韓便於 2006 年 10 月 9 日進行第一次核試驗，安倍在記者會上表示北韓此舉不僅違反了《平壤宣言》和「六方會談」的各國共識，也對亞太地區安全和全球核不擴散建制帶來莫大的破壞，他進一步表示日本將會與美國、中國和南韓等國密切協調應變對策，同時日本將會在聯合國安理會中提出對北韓的制裁案（首相官邸，2006）。在 10 月 15 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對北韓制裁的《第 1718 號決議》後，日本政府也宣佈對北韓實施進一步的經濟制裁，包括禁止奢侈品的出口和交易，以禁止一切有關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原料、設備和技術的貿易行爲（外務省，2006e）。北韓對此沒有直接的回應和抨擊，只有透過媒體的社論批評美日同盟和日本迎合美國的行爲[200]。

2007 年 2 月 13 日「六方會談」的《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中決定建立日朝國交正常化工作小組，因此兩國高層也在此工作小組的架構下進行兩回合的會

---

[198] 朝鮮新報（「日本は体系的に平壤宣言に違反」：2006 年 7 月 20 日、宋日昊大使の記者会見），《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shiriyo.kaku.2006072000.html。

[199] KCNA (Sept. 23rd, 2006), "KCNA Blasts Japan's Financial Sanction on DPRK,"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6/200609/news09/25.htm#1.

[200] KCNA (Nov. 13th, 2006), "Japan's Hostile Policy toward DPRK Assailed,"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6/200611/news11/14.htm#6; KCNA (Nov. 27th, 2006), "Japan's Policy of Toeing U.S. Line under Fire,"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6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6/200611/news11/28.htm#2.

談，但是雙方仍就對拉致問題以及賠償問題上沒有辦法達成共識（外務省，2007a、2007b）。北韓對日本的態度相當地不滿，在 4 月 19 日《勞動新聞》以〈妨礙六方會談進展的阻撓者〉爲題批評日本，認爲「六方會談」應該是討論朝鮮半島非核化的場合才對，但是由於日本對於過去的罪行不予承認和道歉，也破壞的「六方會談」之精神，故「是導致六方會談沒有進展、原地踏步的罪魁禍首」[201]，甚至認爲以本國利益爲優先考量的日本應該退出「六方會談」才對[202]。

兩國關係自 2008 年 8 月的第二次朝日實務者協議後就再也沒有政府層級的往來。由包括前社會黨和社會民主黨（Social Democratic Party）成員組成的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 of Japan）在 2009 年執政以後，也沒有採取親北韓的政策，其對朝政策根據選舉期間的《2009 年民主黨政權政策》（*DPJ Manifesto 2009*）中包括要求北韓放棄核武、飛彈和生化等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生產、配備和開發，並會與各國合作實施貨物檢查措施，此外也把拉致問題視爲對日本主權和人權的侵害，承諾會舉全國之力解決之（民主党，2009）。在和李明博的首腦會談中，鳩山由紀夫（Yukio Hatoyama）提到「針對北朝鮮的核武與飛彈問題，若北朝鮮沒有具體的行動和意思表示的話，不會進行經濟合作，應該說，上述所提到的意思表示是給予經濟合作的前提條件才是正確的思考方向」（首相官邸，2009），也在內閣中設置「拉致問題對策本部」，由首相擔任部長，另外副部長則兼任「拉致問題擔當大臣」。面對兩國關係無法改善，北韓方面對於日本的謾罵和批評也仍舊砲火猛烈，認爲鳩山的下台是因爲採取追隨美國到不顧尊嚴與面子的結果[203]，認爲日本試圖成爲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不知自己斤兩」的愚蠢作爲[204]，也對批評日本近來不斷聲稱對獨島（Dokdo，日本稱爲「竹島」〔Takeshima〕）主

[201]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7 年 4 月 19 日），〈日本は６者会談を妨害する邪魔者〉，《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5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rokusya.2007041900.html。
[202]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8 年 2 月 19 日），〈日本は６者会談から退くべきだ〉《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rokusya2008021900.html。
[203]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6 月 3 日），〈鳩山辞任、民心を裏切った者の悲惨な運命〉，《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hatoyama2010060300.html。
[204]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9 月 26 日），〈常任理事国入り支持要請は、身のほど知らず〉，《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kann2010092600.html。

權之行爲進行批評[205]。

伍、俄國

一、金正日時期朝俄關係的特徵

雖然北韓在冷戰時期在蘇聯和中國之間以政治自主爲名義進行「鐘擺式」的外交行爲，但是蘇聯在冷戰期間是北韓主要的貿易夥伴、原料與能源來源、糧食來源、武器與軍備來源以及科學技術來源，對於北韓的經濟發展和政權維繫相當重要。政治上，蘇聯不只在北韓建國之初提供很大的協助，冷戰期間也採取不承認南韓的「一個韓國」政策，支持北韓所提出的「高麗聯邦共和國」統一方案，和北韓間也簽有軍事同盟條約。但是自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上台以後，由於蘇聯和南韓在經濟關係上的連結，北韓在蘇聯的外交順位中日漸下降；蘇聯瓦解後，俄國雖然沒有和北韓斷交，但是葉爾欽（Boris Yeltsin）總統的親西方與資本主義發展政策也使得兩國關係的發展沒有具體進展，直到普亭（Vladimir Putin）總統上台後因爲俄國外交政策的轉變，才使得兩國關係恢復，而北韓也善加利用俄國希望在東北亞地區能扮演積極角色的目標，利用俄國作爲對周邊國家之牽制。

從朝俄關係在金正日時期的發展過程來看，由於對俄政策在此時不是北韓對外關係的重點，因此北韓基本上是處於被動的地位，隨著俄國當局外交戰略與朝鮮半島政策的改變而隨之變化。蘇聯末期蘇韓建交和希望同北韓以外匯進行交易時，北韓方面雖然批評蘇聯因爲金錢而背叛傳統盟邦，但是也未與蘇聯斷交；葉爾欽初期俄國片面宣佈不遵守《蘇朝友好互助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Cooperation and Mutual Assistance between USSR and DPRK*，以下簡稱《蘇朝條約》）中有關軍事自動介入之義務，也在片面宣佈不延長條約時，北韓均冷淡以對，直到普里馬柯夫（Evgenii Primakov）擔任外長後，兩國關係才有所好轉；

[205]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1 年 4 月 13 日），〈松本外相の独島「固有の領土」主張を非難〉，《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kann2011041300.html。

普亭上台後兩國簽署《俄朝友好睦鄰合作條約》（*Treaty of Friendship, Good Neighboriness, and Cooperation between Russia and DPRK*，以下簡稱《俄朝條約》），並於 2000 年主動訪問北韓會見金正日後，兩國政治關係開始密切發展，金正日也在第二次核武危機時主動邀請俄國參加「六方會談」，而朝俄間良好的高層政治互動關係也由於俄國希望可以在南北韓和解和朝鮮半島核問題中扮演「誠實掮客」（”honest broker”）角色以及推動俄韓朝三方經濟合作計劃，持續到麥德維傑夫（Dmitry Medvedev）總統任內。

就兩國關係的內容來看，主要是兩國政治高層的互動和在邊境地區的經濟合作計劃：在高層互動方面，包括有四次的首腦會談和副總理級、國會議員和部長級的會談；經濟方面，兩國除了有「俄朝政府間貿易、經濟、科學、技術委員會」（Russo-DPRK Intergovernmental Commission on Trade, Econom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ooperation）之會議外，另外兩國在朝俄邊境也有鐵路、港口等基礎建設的合作，俄國企業在羅先地區也有投資。

從金正日時期北韓對俄政策的目的來看，北韓從早期追求可以從俄國取得經濟和軍事物資，轉變到希望爭取俄國在政治上的支持並確保俄國在朝鮮半島事務的發言地位，兩國經濟合作成爲次要議題。兩國關係恢復之初，北韓希望可以自俄國取得軍備、石油和糧食等物資，也希望可以增加遠東省和西伯利亞地區雇用北韓勞工的機會，但是俄國方面則希望北韓先償還蘇聯時代的債務、根據市場價格以外匯進行交易，因此雙方在經濟上的密切合作難以推展。俄國則因爲無法參與第一次核武危機的處理和後來的「四邊會談」而覺得被排除在東北亞區域議題之外，北韓便利用俄國的心理由金正日主動邀請俄國參與「六邊會談」，也參與俄國所提出的俄韓朝三邊經濟合作計劃希望維持俄國在此區域的利益，希望利用俄國作爲美國、中國等國之牽制與平衡。

二、金正日時期朝俄關係的發展

（一）戈巴契夫、葉爾欽時期

戈巴契夫上台以後，雖然和北韓科技、核能、貿易等多項經濟議題達成協定，也協助提升了北韓在空軍和空防方面的能力（Zhebin, 1995: 728-731），但是北韓對其所推行的「改革」（*peresroika*）和「開放」（*glasnost*）政策卻不以爲然，批評他的政策爲「社會民主主義」，認爲這是「公然走上復辟資本主義的道路」，是「向帝國主義投降的產物。」（金正日，1990c：14-20）蘇聯爲了推動經濟發展而希望和南韓建立邦交關係，也擴大了和南韓之間經貿往來，戈巴契夫和盧泰愚也曾在舊金山會面，而 1990 年 9 月 2 日到 3 日，蘇聯派外長謝瓦納澤（Eduard Shevardnadze）向北韓外長金永南說明蘇聯立場，北韓方面則指控蘇聯的舉動是分裂朝鮮半島之舉動，也威脅若蘇聯堅持與南韓建交，北韓將會承認波羅的海三國，也會在北方四島議題上支持日本立場（Woo, 2001: 120-121）。9 月 30 日，蘇韓正式建立外交關係，北韓指責蘇聯行爲「是對社會主義的背叛，是公然參與分裂朝鮮的行動，是不履行自己的諾言，走向背信棄義、變節、非正義和專橫的道路。」（轉引自徐文吉，2007：58）。1990 年 11 月，在蘇聯的要求下兩國簽訂新的協定，自次年 1 月起兩國貿易將根據市場價格以外匯進行（Joo, 2009: 197）；1991 年 7 月，北韓呼籲蘇聯要履行《蘇朝條約》之內容，蘇聯方面只回應說該條約是建立在朝鮮半島上有兩個政權爲前提簽訂的，也要求兩韓以對話方式和平統一（Joo, 2001: 472）。總之，兩國關係蘇韓建交後極速下降，導致北韓在蘇聯 1991 年「八月政變」[206]時支持反對派（Zhebin, 1995: 737），更使得兩國關係跌到冰點。

1991 年 12 月蘇聯瓦解後，俄國外長 Valeri Ermolov 針對當時仍有效的《蘇朝條約》提到會和北韓當局重新檢視條約的內容，特別是有關自動軍事介入的部

[206] 蘇聯內部當時有部份高層對戈巴契夫的改革政策不滿，因此趁戈巴契夫到克里米亞渡假之際於莫斯科發動政變，並於政變領導人和戈巴契夫在談判之際，由俄羅斯共和國總統葉爾辛平定，政變因而失敗，卻也加速了蘇聯的瓦解。

份應該要修改或刪除，但是也強調不會放棄與北韓之間的外交關係，因爲「這樣的發展只會破壞朝鮮半島和東北亞的戰略安全體系」，並於隔年 1 月派副外長 Igor Rogachev 向北韓方面討論有關修改條約的事宜，同時要求北韓遵守 IAEA 的規定，不過北韓方面沒有積極回應。1992 年 7 月，俄國不顧南韓要求宣佈《蘇朝條約》按條文規定自動延長五年，但是在 1993 年 1 月時俄國副外長 Georgi Kunadze 訪朝時則提議雙方以備忘錄形式就有關軍事關係的內容進行補充說明，由於北韓方面對此亦無回應，因此俄國方面片面宣佈會按《聯合國憲章》（*UN Charter*）執行此條約，且只有在北韓未進行挑釁前提下受到攻擊，俄國才可能介入。雖然在 1994 年 9 月俄國副外長 Aleksandr Panov 訪朝時和北韓達成重新啓動雙邊關係的協議，但是由於俄國在金日成過世時未派弔唁團或進行任何官方致意，加上葉爾欽在 1994 年 6 月和南韓總統金泳三見面時提到不會在 1996 年《蘇朝條約》到期時繼續延長此約，以及俄國自 1993 年起不斷向北韓追討蘇聯時期的債務，使得兩國關係仍舊沒有改善（Buszynski, 2009: 812-813; Joo, 2001: 468-469, 472-473; Joo, 2009: 197）。這段期間的北韓對俄國政策大致上是相當消極被動的，一來是因爲北韓沒有能力和手段扭轉俄韓交流和改變俄國領導人親南韓的態度，二來是因爲北韓此時的外交重心放在改善同美、日兩國之關係上，因此兩國雖然仍維持邦交關係，可是在政治、經貿和軍事方面的交流完全不能與蘇聯時代以及俄韓關係進行比較。

1996 年 1 月，負責俄國對外情報部門的普里馬柯夫成爲外交部長，採取了追求俄國同兩韓關係平衡發展的朝鮮半島政策，使得俄朝關係出現改善的契機。在條約問題方面，在條約失效的 1996 年 9 月 10 日前，北韓於 7 日向俄國當局提出北韓版本的新條約內容，兩國則自 1997 年 2 月起就新條約進行談判，其中北韓方面希望俄國當局接受北韓的統一政策，而俄國則反對這項提議，只表示兩韓衝突的解決應該按聯合國與國際法原則進行處理。朝俄在 1999 年 3 月 17 日同意新條約內容，並於 2000 年 2 月 9 日由北韓外長白南舜和俄國外長伊凡諾夫（Igor Ivanov）在平壤正式簽署《俄朝條約》，成爲兩國關係的基礎條約，並保留俄國

在有事之際介入朝鮮半島事務的權利（Joo, 2001: 474-476）。在兩國政經交流方面，朝俄於 1996 年 4 月和 1997 年 10 月召開了兩次「政府間貿易、經濟、科學、技術委員會」，希望可以將雙邊交流恢復到 1991 年的水準；1997 年兩國政府也就投資保護、科學合作、文化交流達成協定，也建立兩國外長和國會之間的固定交流機制，同時也和俄羅斯國防出口公司（Rusvooruzhenye）達成軍事合作的協議（Joo, 2001: 471; Joo, 2009: 193, 199）。1998 年 3 月 3 日，北韓駐平壤大使館也特別召開記者會，重申俄國希望與北韓建立善鄰關係，同時也表達俄國支持朝鮮半島非核化和和平解決兩韓問題的俄國對朝政策原則[207]。

（二）普亭政府時期

普亭政府對外關係的根本政策可見於 2000 年 1 月 10 日的總統命令中，其中俄國將其在外交方面的國家利益界定爲「維持主權並強化自己作爲多極世界中強權之一具中心影響力的地位，以發展和所有國家間平等互惠之關係，特別是和獨立國協國家和俄國的傳統夥伴間發展整合性關係」（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ussian Federation, 2000），而外長 Grigori Karasin 也把俄國遠東政策的重點整理爲全面參與國際安全建制以確保區域穩定與可預測性、追求長期的國界安全、希望與有助於建設俄國遠東地區的所有區域國家建立政治與經濟關係（Joo, 2001: 479-480）。因此，透過改善和北韓政府之間的關係成爲俄國追求區域安全與區域穩定的最主要手段。

2000 年 7 月 19 日到 20 日，普亭應金正日的邀請在前往沖繩參與 G8 高峰會時訪問北韓，成爲自蘇聯時代以來第一位訪問北韓的俄國元首，會中普亭和金正日就兩國關係和飛彈問題進行會談，普亭也把將兩韓鐵路和俄國跨西伯利亞鐵路連結起來的「鐵絲路」（”Iron Silk Road”）計劃介紹給金正日，而會中金正日除了提出希望俄國方面可以增加北韓勞工前往俄國遠東和西伯利亞地區工作的機會外，也承諾若有國家願意協助北韓發射人造衛星的話願意停止長程飛彈的發展

[207] KCNA (Mar. 3rd 1998), “Press conference at Russian embassy,”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9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1998/9803/news03/04.htm#3.

（Meyer, 2006: 206; Takeda, 2006: 196-197）。會後，兩國也達成共十一點的「共同宣言」，其除了確認《友好睦鄰合作條約》將成爲強化兩國友好、睦鄰、互利、互相合作之傳統邦誼作用外，承諾兩國在面臨安全問題時會馬上與另一國諮商，不會加入和參與任何一個對對方懷有敵意的條約、組織和同盟關係，也不會干預對方的國內事務和制度，共同反對任何企圖發展飛彈防禦系統的作爲，接受兩韓問題之解決應不受外力介入，也表示兩國會在貿易、經濟、科技等方面有更緊密的合作與交流[208]。

2001 年 4 月 26 日到 28 日間，北韓人民武力部長金一哲（Kim Il Chol）訪問俄國，和俄國就軍事技術合作和兩國國防部長定期接觸之架構達成協議，北韓方面另外提出希望可以用 5 億美元向俄國購買最新型的武器，但是俄國方面婉拒，只提供北韓已經擁有的蘇聯時代軍備的技術更新，同時也同意協助北韓進行軍官和技術人材的訓練（Joo, 2009, 194; Takeda, 2006: 197）。同年 7 月 26 日到 8 月 18 日，金正日對俄國進行長達 24 天的國事訪問，其中金正日參觀了許多軍事設施、太空研究中心和西伯利亞地區的經濟發展情形，並與普亭在 8 月 4 日於莫斯科會面，發表八點《莫斯科宣言》，雖然內容大體上與前一年的內容差不多，但是明文提到朝俄兩國會就鐵道事業進行合作，北韓方面也向俄國表示希望美軍撤出朝鮮半島的立場，俄國方面表示了解也希望能夠以和平手段處理朝鮮半島問題[209]，而普亭也藉此透過和金正日進行會談展現其在朝鮮半島事務上的影響力。2002 年 8 月 20 日到 24 日間，金正日再度非正式地訪問俄國遠東地區，訪問包括共青城（Komsomolsk）、哈巴羅夫斯克（Khabarovsk）和海參崴（Vladivostok）等地，重點在參訪當地的企業與經濟發展情形[210]，並與普亭於 23 日在海參崴會面，金正日也承諾北韓將會參與「鐵絲路」計劃（Joo, 2009: 186-187）。

---

[208] KCNA (Jul. 20th, 2000), DPRK-Russia joint declaration released,“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9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0/200007/news07/20.htm#5.

[209] KCNA (Aug. 4th, 2001), “DPRK-Russia Moscow Declaration,”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29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1/200108/news08/05.htm#1.

[210] 新華社（2002 年 8 月 25 日），〈金正日結束訪俄回國　第二次訪俄有兩個重要目的〉，《中國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9 日。http://www.china.com.cn/chinese/2002/Aug/193757.htm。

2002 底爆發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後，俄國有鑑於前次北韓核武危機時俄國被邊緣化的角色，普亭於 2003 年 1 月派 Aleksandr Losyukov 爲特使前往北韓，向北韓當局提出俄國的解決方案，包括確保朝鮮半島的非核化、主要行爲者履行包括《框架協議》在內的國際條約義務、確保北韓的安全，並恢復對北韓的人道援助和經濟合作計劃。金正日雖然表示這是不錯的提案，但是並沒有接受之，而 Losyukov 則在訪國後表示若朝美雙方在此議題上都不願意妥協的話，那朝鮮半島發生軍事衝突的可能性將會很高（Joo, 2009: 189; Takeda, 2006: 201-202）。在北韓和美、中就會談進行討論後，金正日於 7 月底致電普亭希望俄國可以參與相關會談並擔任主辦國，普亭則表示願意參與相關會談，但是不會與中國爭擔任主辦國的資格（Joo, 2009: 188-189）。

2006 年 7 月 5 日北韓進行飛彈試射，俄國當局雖然譴責北韓的飛擔試射會對太平洋地區的船隻產生危害[211]，但是也不認爲此飛彈試射的目標是俄國[212]，並呼籲各方以對話的方式解決此問題[213]。雖然俄國在 7 月 15 日的安理會《第 1695 號決議》上投下贊成票，但是俄國方面反對將軍事行動納入制裁方案內，認爲這會使得北韓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和「六方會談」走入「死胡同」[214]。10 月 9 日北韓進行第一次核武試爆時，俄國同意聯合國對北韓進行政治經濟方面的制裁，不過依舊反對軍力介入，普亭在 25 日也表示強烈反對北韓擁有核武，要求「六方會談」各國儘快透過對話解決危機，也批評美國在談判桌上的強硬態度是導致北韓採取激進行爲的元兇。第一副外長 Andrei Denisov 也提到制裁的目的不是要懲罰北韓，目的是要使北韓返回 NPT 與談判桌以解決此問題（Joo, 2009: 191）。

在三次金正日和普亭的高峰會後，兩國之間經濟合作也有所進展。其中在俄

---

[211] Ria Novosti (Jul. 5th, 2006), "Russia blasts N. Korea over missile danger to ships, no warning," *Ria Novosti*. Accessed in Jun. 29th, 2012. http://en.rian.ru/russia/20060705/50933881.html.

[212] Ria Novosti (Jul. 6th, 2006), "Putin: no reason to think N, Korean missile program aimed at Russia," *Ria Novosti*. Accessed in Jun. 29th, 2012. http://en.rian.ru/russia/20060706/50996713.html.

[213] Ria Novosti (Jul. 5th, 2006), "Russia parliamentarian calls for N, Korea dialogue over missile," *Ria Novosti*. Accessed in Jun. 29th, 2012. http://en.rian.ru/russia/20060705/50918770.html.

[214] Ria Novosti (Jul. 12th, 2006), "Russian foreign minister blasts UN draft resolution on N. Korea," *Ria Novosti*. Accessed in Jun. 29th, 2012. http://en.rian.ru/russia/20060712/51248255.html.

朝鐵道連結工程上，北韓鐵道相在 2006 年 3 月訪問俄國時和俄羅斯鐵道公司（RZD）就以國際合資方式進行北韓羅津和俄國哈桑（Khasan）之間的鐵路工程達成共識，於 7 月俄羅斯鐵道公司代表團訪問北韓時決定由俄羅斯鐵道公司負責鐵路工程和羅津港的重建工程，並於 2007 年 4 月簽訂協議，2008 年 3 月也完全相關法律與合資企業等技術性問題的討論，並於 2008 年 10 月舉行開工典禮（三村光弘，2010：105；Joo, 2009: 202-203）。2007 年 1 月，俄國也宣佈將減免兩國 80 億美元債務中的八成，以吸引北韓持續參與「六方會談」和參與兩國經濟合作計劃[215]。

（三）梅德韋傑夫政府

梅德韋傑夫在上任以後，便以總統命令發表了俄國的外交政策指導方針，其中在朝鮮半島政策上，俄國將會追求四個主要目標：確保並維持俄國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的發言權、與兩韓同時維持建設性邦交關係、鼓勵並促成兩韓對話，以及強化東北亞區域安全等目標（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Russian Federation, 2008）。他也在接受中國中央電視台採訪時認爲朝鮮半島問題不存在軍事武力解決的選項，也是無法透過雙邊機制解決的，唯有有關各國共同參與、互爲擔保，才有助於處理核問題和兩韓關係（中國中央電視台，2011）。由此看來，梅德韋傑夫延續普亭時代的對朝政策，希望透過「六方會談」機制和兩國關係的建設性發展，營造有利朝鮮半島相關問題可以和平解決的氛圍。

雖然 2009 年 4 月 23 日到 24 日間，俄國外長 Sergei Lavrov 訪問北韓和金永南與北韓外長朴宜春等人會面，兩國也簽署了有關文化與科技交流的協定[216]，但是由於同年北韓進行飛彈和核武試射，使得兩國關係不若之前熱絡。針對 4 月的飛彈試射，俄國方面表示遺憾並呼籲北韓即早返回「六方會談」談判桌上[217]。而

[215] 新華社（2007 年 1 月 6 日），〈俄擬減免朝鮮債務〉，《新華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mrdx/2007-01/06/content_5572479.htm。

[216] KCNA (Apr. 23rd, 2009), "Plan of Cultural and Scientific Exchange between DPRK and Russian Governments Signed,"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3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09/200904/news23/20090423-18ee.html.

[217] The Telegraph (Apr. 14th, 2009), "North Korea threatens to restart nuclear programme as it quits peace talks," *The Telegraph*. Accessed in Jun. 30th, 2012.

在 5 月北韓核武試射時，俄國更明言北韓的行爲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第 1718 決議》，並會支持國際社會對北韓進行經濟制裁，但同時也反對加諸新的經濟制裁，因爲這樣會使事態往「相反的方向發展」[218]。在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發射核武進行制裁表決時，俄國也投下贊成票通過安理會《第 1874 決議》，而俄國代表表示北韓的行爲明顯地違反相關的國際規定，並認爲唯有強硬的行爲才能促使北韓重回談判桌，但是也表示一旦北韓展現出重返談判桌的意願時，各國應該逐步解除對北韓的制裁（UN Security Council, 2009a）。對於俄國投下贊成票的行爲，北韓只採取含蓄的抗議動作[219]。

兩國到 2010 年底才又恢復高層的交流。北韓外相朴宜春在 2010 年 12 月 13 日到 14 日間訪問俄國，並和俄國外長會面，北韓方面表達了在延坪島砲擊事件中的北韓立場，俄國也表示尊重北韓爲了和平用途發展核能[220]，兩國也就次兩年外交部之間的交流活動達成協議[221]。金正日在 2011 年 8 月 20 日到 25 日之間也訪問俄國，參觀了遠東地區的水力發電廠，也在 8 月 24 日和梅德韋傑夫會面，北韓方面同意俄國經由北韓國境建立連結俄國與南韓間的天然氣管線[222]，而俄國方面也同意賣電給北韓[223]，兩國也就北韓積欠俄國之債務達成共識[224]，此外，金正日也表示北韓願意無條件返回「六方會談」，並願意就其核能電廠與核計劃提

---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asia/northkorea/5152655/North-Korea-threatens-to-restart-nuclear-programme-as-it-quits-peace-talks.html.

[218] Xinhua (May 25th, 2009), "FM: Russia urges DPRK to demonstrate responsibility," *Xinhua Net*. Accessed in Jun. 30th, 2012. http://english.people.com.cn/90001/90777/90853/6665383.html.

[219] 同注 180。

[220] KCNA (Dec. 14th, 2010), "DPRK FM Spokesman on Talks between DPRK and Russia,"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3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10/201012/news14/20101214-18ee.html.

[221] KCNA (Dec. 14th, 2010b), "2011-2012 Plan for Exchange between DPRK and Russia Inked," *Korean News Service*. Accessed in Jun. 30th, 2012. http://www.kcna.co.jp/item/2010/201012/news14/20101214-14ee.html.

[222] Ria Novosti (Aug. 24th, 2011), "N. Korea agrees gas pipeline deal and return to nuclear talks," *Ria Novosti*. Accessed in Jun. 30th, 2012. http://en.rian.ru/world/20110824/166106669.html.

[223] Los Angeles Times (Aug. 24th, 2011), "North Korea leader Kim Jong Il meets with Russian President Dmitry Medvedev," *Los Angeles Times*. Accessed in Jun. 30th, 2012. 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1/aug/24/world/la-fgw-north-korea-russia-meet-20110824.

[224] Ria Novosti (Aug. 24th, 2011), "Russian, North Korean leaders agree on Soviet debt plan," *Ria Novosti*. Accessed in Jun. 30th, 2012. http://en.rian.ru/russia/20110824/166112778.html.

出暫時凍結之承諾[225]。

陸、小結

筆者在本節中簡要地介紹了北韓與各國關係間的發展，其中北韓在與各國關係中所追求的主要目標、次要目標、兩國關係發展之障礙與北韓對各國政策之變化與態度整理於下表中。

表 5-5　金正日時期北韓與主要國家間關係

	主要目標	次要目標	各國希望北韓改善之處	北韓政策變化、手段與態度
美國	● 安全承諾 ● 駐韓美軍問題 ● 國交正常化	● 解除制裁 ● 離間美日、美韓關係	● 核武、飛彈 ● 人權問題	● 一致 ● 外交、軍事兼用 ● 主動
南韓	● 拉攏左派勢力 ● 兩韓自主解決朝鮮半島問題 ● 經濟合作	● 赤化統一 ● 離間美韓關係 ● 安全承諾	● 核武、飛彈 ● 傳統武力威脅	● 政治目標轉爲經濟目標 ● 外交、軍事、諜報兼用 ● 主動
中國	● 爭取政治支持 ● 維護傳統邦誼 ● 經濟合作	● 軍事合作與交流	● 核武問題 ● 經濟改革	● 一致 ● 外交手段 ● 被動
日本	● 求取賠償與道歉	● 國交正常化 ● 離間美日關係	● 核武、飛彈 ● 拉致事件	● 由積極到消極 ● 外交、軍事手段 ● 由主動到被動
俄國	● 爭取政治支持	● 經濟合作	● 核武問題 ● 債務問題	● 由冷淡到熱絡 ● 外交手段 ● 被動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225] 同註 222。

在與美國關係中，北韓雖然名義上是希望能促成朝美關係正常化，從金日成末年到金正日時代以來也一直追求此目標，但北韓更重視的是希望美國能夠給予北韓安全承諾以及希望美國能撤離駐韓美軍或使駐韓美軍中立化，這是源於北韓受到歷史因素中的韓戰經驗影響，認爲美國至今仍對北韓採取敵對政策、仍對朝鮮半島有野心的認知，因此認爲唯有美國給予北韓安全承諾使北韓能夠信任美國以後，兩國才可能就其他議題進行討論。此外，北韓雖然也多次要求美國解除對北韓的制裁，這北韓方面並不認爲這會對兩國關係有實質上的改變，只是美國釋出善意的方法，而從兩國關係來看，美國多次對北韓解除相關經濟、金融制裁，可是兩國關係仍受到其他因素而惡化。

在與南韓關係方面，北韓追求以北韓的條件統一朝鮮半島的終極目標並沒有改變，追求以「自主、和平、民族大團結」原則解決朝鮮半島問題的態度也始終沒有改變，這是源於反對事大主義、韓戰導致兩韓分裂，以及「主體思想」的內容所採行的。不過北韓也了解到目前兩韓在經濟和軍備的實力上差距甚大，同時南韓還有美韓同盟予以保護，因此現階段以追求拉攏左派人士和透過南北經濟合作計劃取得經濟物資爲主，前者源於抗日游擊隊時代與建國初期希望建立「統一戰線」的傳統，而後者則是源自北韓近年來「實利主義」的新經濟思維。

在與中國關係方面，兩國間因爲《中朝條約》雖然名義上仍爲軍事同盟關係，但是北韓也了解到中國只可能在北韓在沒有進行對外挑釁前提下被攻擊才有可能軍事介入，因此北韓在朝中關係中強調延續兩國的傳統邦誼，同時也希望爭取中國在國際場合中對北韓的支持，而其中對於傳統邦誼的強調則是受到傳統儒家思維和金日成崇拜中強調世代傳承以繼承革命事業的傳統。此外，朝中關係慣例在元首會面後不會發表共同聲明，而中國對於對朝援助額實際數目之隱瞞在國際媒體中也時有耳聞，導致這些行爲的國內因素之根本是源自中國對北韓「主體思想」的理解而致，特別是刻意壓低公佈對朝援助額以及不特別強調兩國貿易中中國提供給北韓「友情價格」（”friendly price”）之行爲乃是協助北韓自圓其「民族自立經濟」的官方經濟政策，也是兩國基於傳統邦誼的默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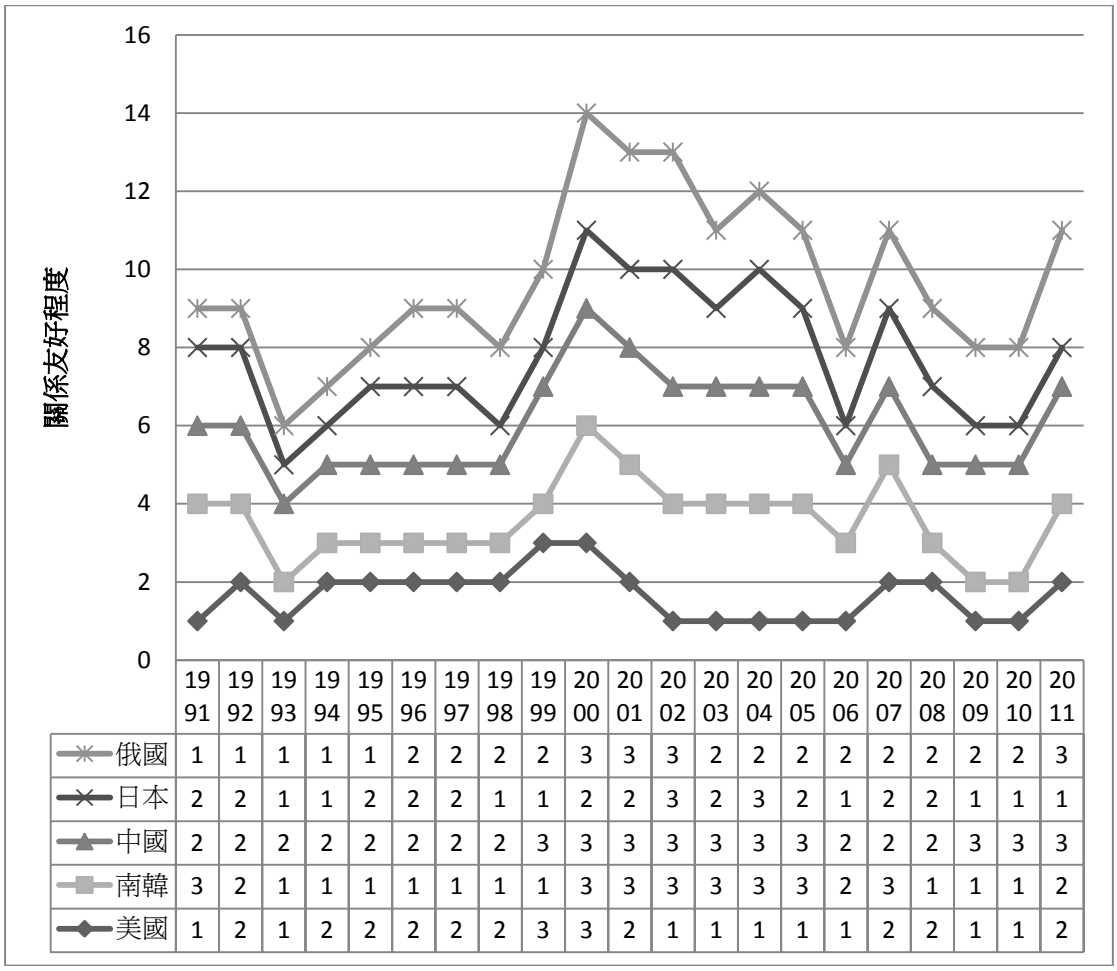
在與日本關係方面，北韓早期積極推動與日本國交正常化，但是到現在由於日本的對朝政策以處理拉致問題爲主，加上北韓認爲此議題已經獲得解決，因此北韓對日關係不再如之前積極，也在官方媒體中也恢復大量對日本的批評與謾罵。北韓希望同日本國交正常化的原因是希望可以如同日韓在 1965 年建交時一樣，取得日本針對過去殖民統治時代的道歉與賠償，而兩國在多次的國交正常化交涉中也圍繞在議題上，這對政權正當性是建立反日民族主義和抗日游擊隊傳統的北韓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在對俄關係上，北韓了解到俄國已經不可能如蘇聯時代一樣給予北韓大量的物資和軍事上的援助，因此利用普亭希望恢復俄國傳統大國角色的外交目標，轉而爭取俄國在政治上的支持，而北韓參與俄國所提出的「鐵絲路」和天然氣管線連結計劃，目的也是爲了保持俄國在東北亞與朝鮮半島地區有其利益與發言權的手段。北韓爭取俄國支持的行爲不只是用來與美國、日本和南韓對抗而已，同時也是用來牽制在政治上支持北韓的中國，讓中國了解到北韓不是完全依賴中國的，仍有俄國這個政治選項，而這種作法其實是避免過度地傾向單一國家，是源於北韓對事大主義的反對以及「主體思想」中對政治自主的追求，也是北韓「鐘擺外交」的一貫性作爲。

綜合來看北韓推展與各國關係之政策手段，除了面對中、俄是以完全外交手段爲主之外，在對美、韓、日之關係中北韓都有運用軍事與諜報手段（對日關係中的諜報手段在金正日時代已經不明顯，但是朝總聯作爲北韓在海外的重要諜報據點之作用仍在），顯示了對北韓而言對外關係不只是單面向的，是可以透過多重手段達到其目的的。值得注意的是，北韓在對美、韓、日三國採取軍事挑釁和實際軍事行爲的同時，卻由同時希望改善與這三國之間的關係，其中北韓更希望能與美、日國交正常化，這也顯示北韓在對外行爲上是與正常國家有別的，而採取這種「非傳統」作風的根本正是北韓的抗日游擊隊傳統。另外在外交行爲上經常採取軍事手段的作爲，也與「先軍政治」有密切的關係，因爲軍方在北韓對外關係決策地位的提升，加上爲了樹立北韓「軍事大國」的形象，以軍事挑釁、飛

彈核武試射和實際軍事衝突等軍事手段的使用機率在金正日時代也有所提升。

此外，北韓對有些國家的政策與行爲態度是一致的，有些則有產生變化，這除了與兩國政府領導人政策態度的轉變與兩國關係利益變化有關以外，也和北韓利用各國利害和立場不同用以相互牽制的外交策略有關。筆者將金正日時期北韓與上述五國間政治關係的好壞以一到三分（一分爲關係惡劣或是沒有接觸，三分爲關係密切良好）進行評分後，可以繪出下圖。



	1991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2009	2010	2011
俄國	1	1	1	1	1	2	2	2	2	3	3	3	2	2	2	2	2	2	2	2	3
日本	2	2	1	1	2	2	2	1	1	2	2	3	2	3	2	1	2	2	1	1	1
中國	2	2	2	2	2	2	2	2	3	3	3	3	3	3	3	2	2	2	3	3	3
南韓	3	2	1	1	1	1	1	1	1	3	3	3	3	3	3	2	3	1	1	1	2
美國	1	2	1	2	2	2	2	2	3	3	2	1	1	1	1	1	2	2	1	1	2

圖 5-1　金正日時期北韓與主要國家關係趨勢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整理

由此圖中可以看到，在 1990 年代初期北韓和中國與蘇聯不如冷戰時期熱絡之時，北韓尋求和美國、南韓和日本改善關係，但是在同韓、日間關係無法改善之際，便尋求與美國之間保持穩定的關係。1990 年代後半段，特別是 1999 年和 2000 年中，北韓先後和中國與俄國恢復冷戰時期的熱絡政治關係，同時也因爲

美國和南韓的對朝政策改變，北韓和這幾個國家間的關係都有所改善，唯獨日本因爲在這段時間拉致問題成爲日本國內日益重要的議題，兩國關係沒有明顯進展。2000 年前半段，由於美國布希政府對北韓採取強硬的態度，因此北韓除了接續兩韓高峰會後原有和南韓的密切政治關係外，也開始尋求改善和日本之間的關係，希望利用韓、日來牽制美國，同時繼續和中國維持密切高層互動，也透過邀請俄國參與「六方會談」使俄國在朝鮮半島議題上保有發言權，用其來牽制美、中等大國。2006 年北韓第一次核試爆後，這五個國家都對北韓進行譴責，北韓與各國關係也有所惡化，可是韓、中、俄卻保持著「制裁北韓是爲了要讓北韓回到談判桌上，一旦北韓行爲有所改善就會解除對北韓之制裁」態度，因此並未降到谷底，南韓也在 2007 與北韓舉行第二次兩韓高峰會，將兩國政治關係再推到另一個高點。「六方會談」於 2007 年 2 月達成《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後，美國逐步解除對北韓的制裁，日本也與北韓重開國交正常化的會談，可是在 2008 年南韓李明博以及日本麻生太郎（Tarou Asou）上任後都對北韓採取強硬政策，2009 年美國歐巴馬採取「戰略忍耐」的對北韓政策以及日本民主黨政權延續之前以解決拉致問題爲主的對朝政策，都使得在 2007 年、2008 年之際看似要改善的北韓同美、韓、日間關係又有所下降；同時，北韓和中國以建交 60 週年之際使雙邊關係再度加溫，和俄國藉由 2011 年金正日的出訪也有所回升，又回到了類似冷戰時代北韓利用中、俄兩國來牽制美、韓、日集團的態勢。但在 2011 年，北韓和美國的「六方會談」代表間舉行多次氣氛良好的會談，北韓也主動釋出善意希望改善和南韓間的關係，也舉行兩次的「無核化會談」，這背後包括美、韓兩國面對朝、中、俄建立更爲緊密關係的回應，也包括北韓希望利用美、韓敦促日本與北韓接觸的策略。

從具體事件來看的話，1991 年到 1992 年間的兩韓和解及朝日國交正常化交涉可以視爲北韓針對中俄與南韓改善關係、盧泰愚「北方政策」以及美國老布希政權表示在朝鮮半島沒有核武發言之回應。在第一次北韓核武危機爆發後，北韓和韓、日關係沒有具體改善反而有所惡化，但是和美國之間卻因爲雙邊對話機制

的建立和《框架協議》的達成而有所改善。1998 年北韓的飛彈試射目的則是在喚醒周遭國家對北韓的再度注意，因爲當時 KEDO 的輕水反應爐計劃沒有如期進行、朝美間的飛彈談判沒有進展、中國的朝鮮半島政策仍是以南韓爲主、南韓金大中政權雖然提出親北韓的政策但是無具體表現，而朝俄之間就新條約的談判也沒達成共識。在飛彈試射之後的兩年多內，朝美關係改善許多、兩韓於 2000 年進行高峰會、朝中關係自 1999 年起恢復密切的政治往來、朝俄間也在 2000 年簽訂《俄朝條約》和恢復高層往來。2001 年由於美國布希政府上台導致朝美關係惡化，北韓便改採「親韓日以牽制美國」的戰略，其中最重要的是在對日關係上由金正日本人向小泉首相承認北韓曾經綁架日本公民一事，並且願意與日本合作解決相關問題，使得兩國中斷許久的關係在小泉任內有所提升，而美國不樂見此北韓越過自己與韓日逕自改善關係的「過頂外交」，因此在 2002 末利用凱利訪朝之際導出了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在 2002 年末到 2006 年北韓試爆核武之前，除了朝日兩國因爲拉致問題而關係退化以外，各國大致上和北韓間的關係沒有過多變化，可是由於「六方會談」沒有具體成果加上美國對北韓進行金融制裁，北韓才會利用核試爆提升自己的談判籌碼。在此之後雖然北韓和美韓日之間的關係有一段時間有所提升，但是大致上於「六方會談」與東北亞國際關係中「朝中俄 VS 美韓日」之格局已經成型。

從北韓所追求的制度存續外交目標來看北韓於金正日時期與這五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也可以觀察到其對各國的主要外交作爲與此終極目標是緊密相關的。北韓認爲美國是在國際社會中對其政權構成主要威脅的國家，因爲此希望透過改善和美國之間的關係，以促成邦交正常化或取得來自美國的安全承諾，同時也希望駐韓美軍可以撤軍或是中立化以解除此部隊對北韓所構成之威脅，也希望美方可以承諾不對北韓使用核武或不威脅使用核武等，這些都是爲了避免美國以軍事手段顛覆其政權以確保政權、國家存續的作爲。爲此，北韓希望在國際社會上取得政治與經濟方面的支持：維持和中國之間的傳統邦誼以及加強和俄國之間的關係是在獲取政治支持方面的努力，同時也試圖拉攏南韓境內的左派政治勢力，一

方面在國際社會爭取對朝友好的國家，另一方面也確保朝鮮半島局勢不會完全朝親韓的態勢發展；在經濟方面，北韓透過維持和南韓之間的經濟合作以及和中國間的密切經濟往來，在不進行全面性改革開放的前提下取得維持政權所需的物資、相關經濟技術以及外國投資。值得注意的是，北韓本來也希望透過改善和日本之間的關係希望可以取得有助於制度存續的經濟物資，但是由於兩國關係因爲拉致事件和核武、飛彈問題而遲遲無法改善，因此北韓則回到將日本妖魔化的官方宣傳中，鞏固北韓政權建立在抗日民族主義的正統性上，藉此由國內宣傳的角度來維繫其制度存續。

綜合本節中前五段之北韓與各國關係介紹與本段中的討論，可以發現北韓在看似反覆且不理性的外交行爲中，其實有其所希望追尋的一貫性目標，也會因爲客觀環境的變化而進行對外行爲與政策目標的轉換，而這些對外行爲除了受到國際環境體系因素的影響之外，歷史、政治及意識型態等國內因素對北韓對外行爲的影響也是相當深遠的。光從北韓與主要國家間的雙邊關係來看，北韓反對朝鮮時代的「事大主義」、對日本殖民統治經驗的痛恨、北韓政權抗日游擊隊之傳統、韓戰經驗所導致的兩韓分裂與對美敵視、「主體思想」、「先軍政治」和 21 世紀的「實利主義」等因素都影響了北韓在金正日時期對外行爲的具體作爲與政策目標的選訂，也是分析北韓任何對外政治、軍事、經濟行爲時不可不留心的要素。

第三節　北韓的對外經濟關係

在研究北韓對外關係時，對於北韓對外經濟行爲的討論是比較少的，但是從前面的章節中可以發現，北韓在經濟思想方面於金正日時代有所轉變，也於 2002 年推行國內的「經濟秩序改善措置」，另外在兩韓和朝中關係中，兩國經濟往來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部份，故本章希望針對北韓在金正日時期的對外貿易行爲進行簡單的介紹。本章首先介紹北韓的對外貿易行爲，其次則介紹北韓四個經濟特區的發展情形，最後則就這兩段內所提到的北韓對外經濟與國內因素的連結進行分析。

壹、對外貿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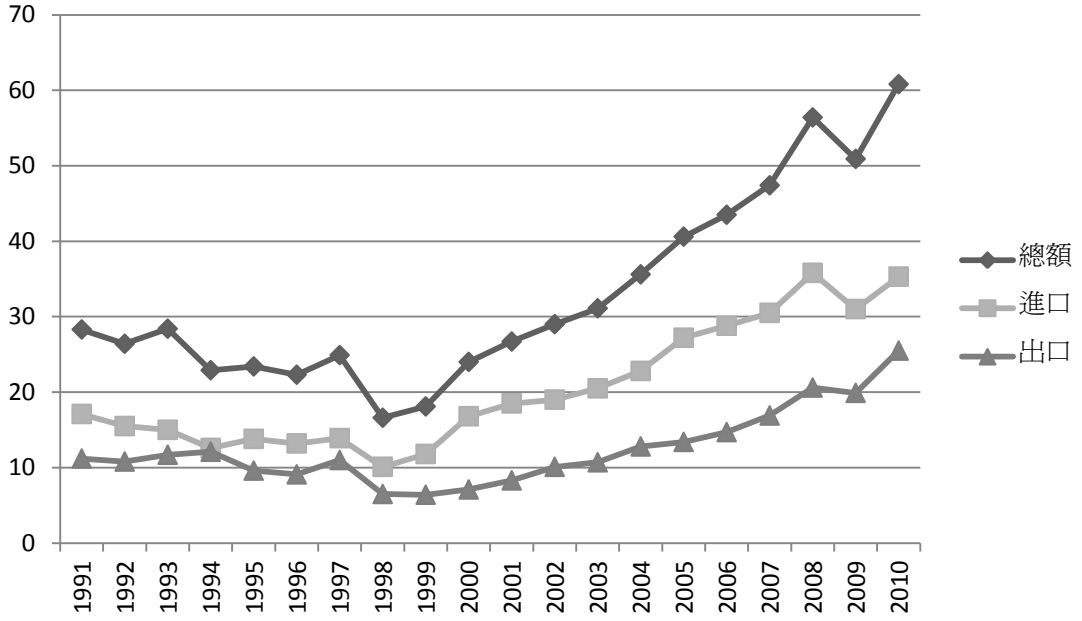


圖 5-2　金正日時期北韓對外貿易額（單位：億美元）

資料來源：整理自金向東（2011）、Ministry of Unification、North Korea Statistics。

從上圖可以得知，北韓的總體貿易額是相當少的，其中 2010 年的總體對外貿易額不過才 60.8 億美元而已。另外，北韓在 1990 年的總體貿易額是 47 億美元（和田春樹，1998：251），但是到了 1991 年卻減少了近一半只剩下 28.3 億美元，並於 1998 年達到最低點的 16.6 億美元，一直到金正日結束「遺訓統治」正式接班，北韓採取新的經濟思維與政策後，其對外貿易額才有穩定的上升，到 2007 年才恢復到冷戰前的水準。由此圖也可以發現，北韓長期以來處於貿易逆差狀態，這和冷戰前的情形是相同的，導致北韓不僅本身的外匯存量不足、能夠獲取外匯的產業不多，也導致北韓自 1970 年代以來積欠大量的外債。此外，筆者也就不同時段北韓的前兩大主要貿易國進行比較。

表 5-6　北韓的前兩大主要貿易國與其佔北韓整體貿易比例

1986	1996	2001	2006	2010
蘇聯(45%)	中國(25.4%)	中國(32.6%)	中國(39.1%)	中國(60.4%)
中國(14.3%)	南韓(11.2%)	日本(20.9%)	南韓(31.1%)	南韓(31.4%)

資料來源：金向東（2011）、Choe & Kim & Cho (2003)、Minisitry of Unification。

由此來看，中國自冷戰瓦解以來已經成爲北韓主要的貿易對象，北韓對中國的整體貿易依存度也不斷在上升，但是北韓長期以來與中國貿易關係處於貿易逆差狀態，於 2008 年甚至高達 12.8 億的貿易逆差（Nanto & Mayin, 2010: 15），可見北韓大量需要來自中國的產品和原料，但是中國對於北韓產品的需求卻不高。具體而言，北韓自中國進口礦物燃料、機電設備和民生用品爲主，而北韓則出口礦產、金屬及其製品和農產品爲主（李俊江、范碩，2012：14-15），換言之，北韓主要從中國進口能源和工業產品爲主，而出口第一級產業商品給中國。此外，兩國在國界上尚有邊境貿易（今村弘子，2008：91-94），中國對於援助北韓的具體數量也大多未公佈，因此北韓對中國的依賴程度是比上述貿易統計數字更高上許多的。

此外由上表中也可以發現，南韓成爲北韓的第二大貿易夥伴，而且對北韓和南韓的貿易額也持續在增加，從 2000 年的 4.3 億美元上升到 2006 年 13.5 億美元，而到 2010 年已經高達 19.1 億美元，反映出和兩國政治關係完全相反的發展趨勢。南北韓之間的貿易可以分爲一般貿易、委託加工貿易和開城工業區貿易三種，其中委託加工是只以支付加工品爲條件，向生產者提供全部或部份加工原料，而開城工業區貿易則是指在當地貨物之進出口。雖然在「天安艦」事件後南韓對北韓進行貿易制裁，但主要影響的是一般貿易和委託加工貿易兩者，對於象徵兩韓合作的開城工業區貿易沒有進行制裁行爲，也導致前兩者佔兩韓貿易的比例愈來愈低（金向東，2011：205-208）。就兩國商品交易的內容來看，除了委託加工和開城工業區貿易外，北韓主要從南韓進口化學製品和紡織品等，而北韓則主要輸出

第一級產業商品（Choe & Kim & Cho, 2003: 109）。

貳、北韓的特別經濟區

自 1984 年北韓制訂《合營法》和一系列法令以來，北韓希望可以吸引外資來協助發展經濟，但是卻同時害怕過度開放國家會導致資本主義等北韓官方認爲「不健全的思想要素」進入北韓國內，影響到政府長期以來所建立的意識型態，因此採取的金正日所謂的「蚊帳式戰略」，也就是在國家的邊境地區設立特別經濟區，並對特區內外的交流進行高度的限制，同時在特區內也建立各種優惠的投資環境，希望在吸引外資進入同時避免這些外來思想與北韓人民接觸。在這種思維下，北韓先後建立了羅津─先鋒（後改稱羅先）、金剛山、新義州和開城等四個經濟特區。

北韓最早在 1991 年 12 月 28 日將包含羅津與先鋒兩個不凍港的地區劃定爲「羅津─先鋒自由經濟貿易地帶」，在其中除了允許合營企業外，也允許外國人在這經濟特區中進行獨營企業，同時對投資國家沒有限制，也承諾會以法律來保障外國人士之資本、財產與利潤。1993 年 3 月，北韓公佈《羅津先鋒地區國土建設總計劃》，對此地進行三階段的開發，希望先將此地發展成爲貨物轉運地，再逐步發展成爲出口導向、金融服務的綜合性經濟交流據點，並於 1994 年 11 月將此地升格爲直轄市，同時引入 16000 名勞工進入此地進行開發（朱松柏，1995：58-60）。可是到 2000 年爲止，該地的總投資額只有 3500 萬美元，問題在於包括交通、電力、港口運輸等基礎建設的不足，當地產業結構無法順利轉行成爲加工出口業，以及面臨到北韓核武問題、官員貪污腐敗、北韓政府履行債務名聲不佳等因素，因而無法發展，而於 2001 年原先的直轄市地位被降級，改稱羅先市（南穎，2006；Lankov, 2007: 231-234）。由於中俄兩國經濟的發展以及希望在北太平洋地區尋找不凍港，因此俄國自 2006 年起積極地推動羅津和俄國哈桑之間的鐵路修築工作，也承諾協助改善羅津港的設備，並於 2008 年 10 月正式開工；中國方面則創立了「羅先國際物流合營公司」，並於 2007 年取得羅津三號和四號港的

50 年租借權，同時也將鋪設羅津但中國琿春之間的鐵路線（三村光弘，2010：103-105；Joo, 2009: 203）。2009 年 12 月 16 日，金正日到羅先市視查，並指示希望積極發展此地的對外貿易與經濟活動，2010 年 1 月 4 日便將此地升格爲「羅先特別市」（平井久志，2011：354）。同年 3 月，北韓將中國的港口租用年限延長爲 50 年，同時也給予俄國在羅津北邊的港口 50 年的租用權[226]，中國方面也在同年 12 月起正式啓用羅津港，藉由此地把吉林地區開採的石炭運到上海港[227]。

金剛山觀光地區的起源是南韓現代集團總裁鄭周永於 1998 年 10 月訪問北韓時所洽談成功的，並自 1998 年 11 月起開始由南韓江原道東海（Donghae）經海路前往金剛山觀光的路線，現代峨山集團也自 1999 年到 2003 年間在此地投資了 1.4 億美元進行碼頭、溫泉、旅館、遊樂設施等基礎建設（李敦球，2007：268-269）。2002 年 11 月 13 日，北韓正式將此地設置成爲金剛山觀光地區，並由現代峨山及制訂自 2005 年到 2020 年間兩階段的開發計劃，除了發展南韓爲主之觀光事業以賺取外匯外，也作爲兩韓民間交流與離散家庭聚會的重要場地（朴鍾碩，2010：196-205）。可是在 2008 年 7 月 11 日發生南韓女遊客被北韓軍人射殺的事件後，南韓先在當天便宣佈自 13 日起中止所有前往金剛山的旅遊團，北韓方面則於 11 月 24 日朝表示將自 12 月 1 日起全面停止金剛山旅遊。雖然北韓試圖就重啓金剛山旅遊與南韓當局進行會談，但是由於沒有具體成果，因此於 2010 年 4 月沒收當地的所有南韓資產，並於 2011 年 4 月於原地設立「金剛山國際觀光特別區」，在 8 月公佈新的規劃藍圖[228]。

爲了吸引來自中國的投資，北韓於 2002 年 9 月 12 日設立新義州特別行政區，希望仿傚中國的香港模式來建立特別經濟區，制訂了給予區高度自治地位的《新

---

[226] 中央日報（2010 年 3 月 9 日），〈北羅津港、ロシアには５０年使用権、中国には１０年延長〉，《中央日報》。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japanese.joins.com/article/982/126982.html?sectcode=500&servcode=500。

[227] レコードチャイナ（2011 年 1 月 4 日），〈中国が北朝鮮・羅津港の利用を開始、日本海経由で石炭運ぶ―韓国メディア〉，《レコードチャイナ》。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www.recordchina.co.jp/group.php?groupid=48317&type=1。

[228] Daily NK（2011 年 8 月 29 日），〈朝鮮公佈「金剛山觀光」藍圖……「誰會投資？」〉，《Daily NK》。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www.dailynk.com/chinese/read.php?cataId=nk00300&num=8673。

義州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同時也任命荷籍中國人楊斌爲首任特首，試圖將此區建設成爲國際性的金融、貿易、工商業、科技和觀光地區（朴鍾碩，2010：188-196；徐文吉，2007：134-142）。可是在楊斌受到中國政府逮捕以後，相關的發展計劃便停擺，雖然北韓於 2004 年 8 月任命美籍華人沙日香爲新任特首[229]，但是北韓方面對於此地的進一步發展並不積極（Lankov, 2007: 236）。目前雖然新義州並沒有往特別經濟區的方向發展，但是此處進行的邊境貿易佔朝中貿易的八成，仍是朝中兩國貿易的主要口岸（龍婧，2011）。

2000 年 8 月金正日和到訪的現代集團會長鄭夢憲（Chong Mong Hun）達成共識，將於朝韓邊境的古都開城建立工業區，並於 12 月起由現代峨山與韓國土地公司進行勘查並向北韓當局提出規範當地活動的法律草案，也於 2001 年 1 月 30 日的南北經濟合作促進委員會上成立「開城工業區建設實務協議會」。2002 年 11 月，北韓宣佈成立「開城工業區」並制訂《開城工業區法》，南韓方面也自 2003 年 6 月起進行第一期工程，自 10 月起開始有企業入駐生產，2006 年底完成此地與南韓方面的電力連結，2007 則通行貨運鐵路（李敦球，2007：385-387）。於李明博政府時期，兩韓關係緊張也威脅到開城工業區的發展，其中北韓於 2008 年 12 月 1 日停止兩韓間的鐵路運行，並要求減少南韓在開城工業區的常駐人員，也在 2009 年 3 月底北韓以「批評體制」爲由拘禁了一名在開城工業區工作的南韓員工，甚至於 5 月提出契約無效之宣言。「天安艦」事件爆發後，李明博中止了開城以外的所有兩韓經濟合作計劃，北韓雖然也下令中止相關經濟合作計劃，但是開城工業區的計劃卻沒有受到太大影響。到 2010 年爲止，共有 444 間南韓廠商在開城設廠，雇用 45000 多名的北韓勞工，平均月薪爲 66 美元，自 2005 年以來已經創造了高達 10 億美元的產值（朴一，2010：87-88；Ministry of Unification, 2011），爲北韓重要外匯來源和象徵兩韓合作的重要據點。

[229] 大紀元（2004 年 8 月 25 日），〈沙日香可望出任北韓新義州特首〉，《大紀元》。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www.epochtimes.com/b5/4/8/25/n639371.htm。

參、小結

直到今日，北韓政治發展與對外關係的發展都不是以經濟發展爲主，政治、軍事、思想層次的重要性依舊在經濟發展之上，經濟發展只是作爲輔助上述因素發展的基礎而已。北韓至今的經濟政策仍是以「主體思想」中「經濟自立」原則所發展出來的「自立民族經濟」爲其最高經濟指導原則，而在「新思考」下雖然強調與國外進行經濟交流與合作，並加入類似資本主義和重視效益的管理模式，但是從北韓的實際對外經濟作爲，以及 2007 年以來加強對國內經濟約束的政策發展來看，其根本的經濟原則是沒有改變的。

北韓的總體對外貿易額少，除了因爲北韓本身不具有在國際市場中有競爭優勢的產業外，更重要的是於第四章第三節中所介紹的北韓經濟思想，也就是反對國際分工體系、強調「互通有無」式的國際貿易，因此就北韓領導人來看，貿易只是用來取得北韓所不生產的物品的手段而已。雖然近年來北韓希望建立出口導向和出口加工產業，但是目前僅規劃限於特別經濟區內和兩韓合作事業中，其中羅先和新義州的發展目前均尚不具規模性，兩韓合作自李明博上台以來目前僅以開城工業區爲主，因此難以將出口導向和出口加工產業推行到北韓境內其他地區。因此，雖然「新思考」和「實利主義」的經濟思想改變確實讓北韓經濟管理模式、國內貨品流通和推動特別經濟區計劃上和過去有明顯的改變，但是「主體思想」中的經濟概念對北韓領導層的影響仍相當深刻，也導致在「思想優先」的北韓經濟發展中，始終無法完全以利益和區位優勢（location advantage）的觀點來進行考量與發展。

其次，若從其特別經濟區發展來看，由於北韓本身缺乏熟悉資本主義運作發展、善於吸引外資等有利於引入市場經濟管理模式的經濟人才，因此除了新義州任命了外籍特首外，金剛山和開城均是由南韓的現代峨山所進行開發的。而唯一一個北韓試圖自力發展的羅先在經歷了 1990 年代後期到 2000 年代的失敗後，目前由中國和俄國在當地進行開發與發展，方才有所起色。導致人才荒的原因除了

前述的「自立民族經濟」觀念之外，「蚊帳式戰略」導致北韓經濟人才與外界交流機會很少，也難以大量吸收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內涵，自然也難以大量培養相關人才。同時，「蚊帳式戰略」也將特別經濟區鎖定在北韓國境的邊境，北韓當局對於人流的管制和當地北韓籍居民的挑選標準也相當嚴厲，因此就算四個特別經濟區得以高度發展，是否能像中國經濟特區經驗一樣散佈到北韓其他地區也是一個值得思考的問題。但不可否認的是，雖然北韓在思想和人才上面臨到諸多限制，但是爲了政權延續而引入外來資本與技術的努力，以及同韓、中、俄三國在經濟和基礎建設上之合作仍是不應被忽視的。

最後從北韓對外經濟行爲和其國內因素的連結來看，北韓的對外經濟行爲雖然在金正日時代透過對外貿易額的回升、特別經濟區的建立，以及同中、韓經濟關係之密切發展而日趨積極，但是仍無法擺脫「主體思想」中所建立的北韓基本經濟戰略方向以及其中對於資本主義、國際分工體系之厭惡與排斥，成爲北韓進一步發展對外經濟的主要阻礙。可是至少就現階段而言，雖然北韓經濟沒有產生顯著的發展，透過和中國與南韓間少量的貿易取得維持政權所需的能源與糧食物資，也透過和南韓的合作中取得在民生工業方面技術的提升，政權的穩定性已經高於金正日初期；換言之，這種小規模在對外經濟方面的改變對北韓領導層要維繫政權以及其特權地位而言已經足夠了，這是由於受到傳統儒家文化影響，北韓傳統上是「重政治、輕經濟」的，而金正日政權只要能成功地拉攏軍方和「核心階級」即可達到維繫政權之目的。由此來看，北韓的對外經濟發展，除了受到國內因素的限制很深以外，也成爲北韓相對於政治、軍事領域，不積極發展的經濟的主要原因。

第四節　北韓的核武、飛彈發展與外交

北韓在後冷戰與金正日時期會成爲東北亞地區和國際焦點的主要原因就是其包括核武與飛彈在內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發展，使得一個經濟規模相當小的共產主義國家成爲美國、中國、日本、南韓和俄國等國際社會中主要爲者的注目焦

點，而北韓也利用國際社會對於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議題之重視，藉此和這些大國接觸，並以此取得其延續政權所需之承諾與物資。本節中主要討論北韓的核武與飛彈發展，以及以處理北韓核武問題爲主的六方會談，並於北節的小結中分析北韓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之行爲與其所追求的目標和國內因素之間的關係。

壹、核武發展與兩次核武危機

北韓的核武計劃發展甚早，在 1956 年便和蘇聯簽署核能研究合作計劃，每年派遣數十名科學家到莫斯科的杜夫納核子研究所（Joint Institute for Nuclear Research in Dubna）學習，另外也在 1959 年同蘇聯簽署和平利用核能之協定，並自 1962 年起引進蘇聯技術在寧邊地區成立原子能研究所，也在金日成大學等其他校園內設立原子能科系，自 1965 年開始擴大在寧邊的研究，自蘇聯引進一座二萬千瓦的研究用原子反應爐，並由蘇聯提供所需的濃縮鈾原料，而所有的核廢料也由蘇聯回收（朱松柏，1994：2；馬仲可，1993：42；廖文義，2008：5-6）。1974 年，北韓加入了 IAEA，並自 1980 年起開始自力發展核能技術，並將核能設施作爲商業化用途，其中包括一座於 1980 年建造、1987 完工五萬千瓦原子反應爐，和一座於 1985 年開始建造的二十萬千瓦超大型原子反應爐（金民榮，2006：49），兩者均爲石墨反應爐。同時，北韓也尋求蘇聯的技術建造輕水反應爐以爲發電所用，但是蘇聯怕北韓會藉此發展核武技術，便要求以北韓加入 NPT 爲代價來換取蘇聯。北韓答應了蘇聯的這項要求，於 1985 年 12 月以無核武國身份加入 NPT，也和蘇聯簽訂相關協定（何晨青，2010：116；馬仲可，1993：43；Asada, 2004: 332）。北韓外交部也在 1986 年發表聲明指出，北韓政府「將不會測試、生產、堆積和引進核子武器。」（轉引自 Mack, 1991: 88-89）

NPT 規定非核武締約國須在 180 天內與 IAEA 就締約國履行條約義務之《防護管制協定》展開談判，並於 18 個月內生效，但是雙方直到 1992 年 1 月才簽訂《防護管制協定》，其中除了 IAEA 曾於 1987 年 6 月因爲送件錯誤而多給了北韓十八個月的延長期限之外（Mack, 1991: 90），北韓仍延遲了三年多才達成《防護

管制協定》。由於美國在 1980 年代末期透過人造衛星探測指出，北韓所建設的第三座原子反應爐由於牆壁厚度過厚，周遭也都沒有任何發電廠和送電設施，因此推測這座發電廠是用來將核廢料加工爲核武用鈽元素（朱松柏，1994：2），另外其也探測到北韓正在進行用來製造內爆式核彈頭所需要的傳統高爆破測試（Mazarr, 1995: 94），因此譴責其發展鈽元素並要求北韓回歸與 IAEA 間的《防護管制協定》談判。北韓於 1990 年 2 月做出回應，表示之所以會願意加入 NPT 是建立在美國將會因此減少對北韓的核武威脅的前提之下才加入了，但是國際情勢的發展卻實際上「增加」了北韓所承受的核武威脅，因此北韓要求在與 IAEA 之《防護管制協定》中加入兩項修正條文：其一，要求 NPT 中的核武國不會利用核武對非核武國進行威脅，這很明顯是衝著美國而來的；其次，要求朝鮮半島非核化並要求移除任何可能對北韓構成威脅之核武，這則是衝著美國在南韓所部屬的戰術型核武而來的。北韓政府也表示，倘若其要求沒有辦法達成的話，將不排除引用 NPT 第十條退出該條約（Mack, 1991: 90-91）面對北韓這種升高緊張情勢的作爲，美韓兩國在 1991 年和 1992 年採取一連串釋出善意的作爲，終於讓北韓重新與 IAEA 進行談判，於 1992 年 1 月簽署《防護管制協定》，並於 4 月由北韓最高人民會議批准通過，IAEA 也於 5 月起開始進入進行檢查。

自 1992 年 5 月到 1993 年 1 月間，IAEA 對北韓進行了六次的專門和例行檢查。IAEA 視察員在這六次的檢查當中，雖然沒有發現任何發展核子武器的跡象，但是根據 IAEA 對其視察與北韓提供的資料進行對比分析後發現，北韓應該仍存在有未申報的鈽元素，而根據化驗北韓所提出的鈽元素結果顯示，北韓仍有部份的核廢料未提交給 IAEA 進行檢驗（Asada, 2004: 334）。於是在 1993 年 2 月 IAEA 要求對北韓在寧邊的兩座可疑設施進行特別檢查，這是自 IAEA 成立以來的首次要求特別檢查。北韓以該兩處爲軍事設施爲由拒絕了 IAEA 所要求的特別檢查，也於 3 月 12 日表示 IAEA 特別檢查的要求使「北韓出現了民族自主權和國家安全受到威脅的嚴重事態」（轉引自馬仲可，1993：40），宣佈退出 NPT。IAEA 理事會（Board of Governors）於 4 月 1 日達成決議，認爲北韓並沒有遵守其在《防

護管制協定》下之義務，同時也無證實北韓是否有把核廢料轉爲核武原料之舉動，因此決定按《IAEA 規約》(*IAEA Statute*)將此案件移交聯合國安理會(Asada, 2004: 335)。5 月 11 日，安理會通過《第 825 號決議》，敦促北韓允許 IAEA 人員對其核設施進行特別檢查，重新考慮退出 NPT 一事，否則將予以制裁(何晨青，2010：117；Asada, 2004: 335)

北韓則以雙面手法回應各方譴責，一方面宣稱「制裁即宣戰」，並揚言讓南韓陷入「一片火海」(何晨青，2010：117-118)；另一方面，也在聯合國體系下和美國展開四次的副部長級會談(朱松柏，1994：4)。根據 1993 年 4 月 21 日北韓駐聯合國大使的說法，北韓願意重回 NPT，前提是下列的五項條件得到滿足：永遠停止美韓的「團隊精神」聯合軍事演息、允許北韓視察南韓基地、美國保證不向北韓使用核武、在南韓去除美國的核保護傘，及美國必須承認北韓的社會主義制度(馬仲可，1993：41)。朝美於 6 月 11 日達成共識，北韓宣佈「暫緩」("suspend")退出 NPT，而美國則對北韓提出安全保證，雙方持續進行官方對話。7 月起，雙方在日內瓦進行第二輪的談判，北韓有條件地允許 IAEA 視察員回到寧邊，並願意在國際的協助下建造輕水反應爐取代其目前正在興建的石墨反應爐(何晨青，2010：118；Asada, 2004: 335)。雖然北韓和 IAEA 在 1994 年 2 月 15 日就檢查核設施任務達成協定，但是北韓仍舊拒絕 IAEA 檢查，並在 5 月重啓寧邊的石墨反應爐並移走了被封存的 8000 條石墨棒，這讓 IAEA 於 6 月 10 日對北韓提出制裁，決定停止對北韓提供非醫療性的援助，而北韓則在三天後以退出 IAEA 以爲回應(Asada, 2004: 336-337)。在緊張情勢再度升高之際，卡特在 6 月中訪問平壤拜會金日成，而金日成則表示願意以凍結核子計劃以交換「一包裹利益」，而美國政府也就卡特之承諾給予官方承認(Mazarr, 1995: 95-97)。雙方最後於 10 月 21 日達成《美朝框架協議》，其中有關核能主要內容爲：

> 雙方將合作以輕水反應爐取代朝鮮現有石墨反應爐及其他相關設備：(一)為呼應美國總統於 1994 年 10 月 20 日之保證信，美國將進行準備為朝鮮提供輕水反應爐之計劃，將在 2003 之前見構發電量為 2000 百萬千瓦的發

電廠……（二）為呼應美國總統於 1994 年 10 月 20 日之保證信，美國將代表這項機制（作者按：指 KEDO）在第一座發電廠完工前，補償朝鮮凍結石墨反應爐和相關設施之後所缺的能源……

1995 年 3 月，美國和日本與南韓達成協議，成立 KEDO，負責向北韓輸送重油與輕水反應爐建造的相關事宜，KEDO 也於同年 12 月與北韓達成《對朝鮮提供輕水反應爐協議》（*Agreement on Supply of a Light-Water Reactor Project to the DPRK*）（Asada, 2004: 338）。

在可以用來製造發展鈽元素的石墨反應爐受到 IAEA 監視的同時，北韓則尋求也可以用來製造核武的「精煉濃縮鈾」技術，並透過 Abdul Quadeer Khan 手中取得相關的技術藍圖。根據叛逃的北韓高官黃長燁所言，1996 年夏天（另有一說是 1992 年），北韓和巴基斯坦就以核武技術交換飛彈技術達成共識，其中北韓提供飛彈技術，巴基斯坦則提供北韓發展飛彈的資金和發展精煉濃縮銪所需的遠心離心機技術，而前巴基斯坦總統穆夏拉夫（Pervez Musharraf）在其自傳中也提到曾經把兩種不同的離心機藍圖交給北韓當局。雖然北韓的精煉濃縮鈾一般認爲是在 2000 年才開始啓動，但是在 1998 年巴基斯坦的核武試爆中，印度發現巴基斯坦同時進行了鈽以及鈾不同元素的核試爆，被認爲可能是同時替北韓的核武進行試爆（重村智計，2006：43-46；斎藤直樹，2009：112-115；吉田康彦，2006：52；Becker, 2005: 188；Niksch, 2010: 17-20）。

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的發生是由於其精煉濃縮鈾計劃爲美方所發現，並於 2002 年 10 月 3 日到 5 日之間由助理國務卿凱利訪問北韓，向北韓方面進行質問，獲得姜錫柱的承認。美國國務院則於 10 月 16 日召開記者會公開北韓承認其正在進行秘密發展濃縮鈾之計劃，並指責其違反 NPT。在美國要求下，KEDO 於 11 月 14 日以北韓違反《框架協議》爲由，自隔月起停止向北韓方面輸送重油。北韓於 10 月 25 日公開否認凱利的說法，並譴責美國之行爲違反了《框架協議》，並於 11 月 21 日宣佈《框架協議》失效，不再允許 KEDO 人員進入北韓。12 月 12 日，北韓宣佈重新啓動寧邊的反應爐，其理由是爲了彌補因爲停止輸送重油

所造成的電力損失，並自 21 起開始拆除 IAEA 的監視設備，於 27 日命令所有的 IAEA 視查員出境，次年 1 月 10 日宣佈退出 NPT，2 月重啓其石墨反應爐（Michishita, 2010: 163-164）。

貳、飛彈發展、外銷與談判

北韓最早是於 1969 年由蘇聯引進射程只有 50 公里的「蛙式五型」（Frog-5）地對地飛彈，開始了其飛彈研發工作。1971 和中共簽約共同研發彈道飛彈，其技術是來自蘇聯取自德國的 V2 火箭，1976 正式參與「東風 61 型」飛彈的研發，同年更從埃及取得兩枚蘇聯製的「飛毛腿 B 型」（Scud B）飛彈。1979 在從蘇聯購買飛毛腿 B 型飛彈的同時也要求蘇聯技術轉移但是遭到拒絕，不過於 1981 與埃及簽訂了合作開發飛彈的協定，引進移動型飛彈發射架，並於 1984 自行研製成功名爲「火星五號」（Hwason-5）的飛毛腿 B 型飛彈，射程可達 280 公里。在不斷改良後，於 1987 年開始量產，在載重 1000 公斤下射程可達 320 到 340 公里，並於 1988 年於北韓人民軍第四軍團中成立「火星五號飛彈連隊」，近入實戰部署。1989 年改良「火星五號」飛彈，研發出載重只有 770 公斤、射程 500 公里可達南韓全境的「火星六號」（Hwason-6）飛彈，並於同年服役。在研發「火星六號」的同時，北韓也在研發中程彈道飛彈，於是以「火星五號」、「火星六號」的飛毛腿 B 型與 C 型技術爲基礎，研發出了飛毛腿 D 型的「蘆洞」（Nodong）飛彈，其載重 700 公斤彈頭射程可達 1300 公里，可以攻擊日本本土全境。「蘆洞」飛彈於 1993 年 5 月 29 日首次試射成功。（朱松柏，2000：2-3；Becker, 2005: 160）

1990 年代起，北韓開始進行中長程彈道飛彈的「大浦洞」飛彈研發計劃，而 1998 年 8 月 31 日試射成功的「大浦洞一號型」飛彈就是以「蘆洞」飛彈和「火星六號」飛彈爲其一、二節的兩截式飛彈，其射程可達 1500 到 2000 公里。「大浦洞二號型」飛彈則從 1999 年便開始研發其試作型，希望把原本以「火星六號」飛彈爲推進器的那截以新型態的推進器來取代以增加其射程。雖然 2006 年 7 月 4 日的飛彈試射中也有「大浦洞二號型」飛彈，但是卻是以失敗收場。2009 年 4

月 5 日以發射載有人造衛星「光明星二號」的火箭爲名試射「大浦洞二號型」飛彈，其射程已經遠達 3200 公里（朱松柏，2000：3-4；斎藤直樹，2009：121-125；平井久志，2010：157-160；Hildreth, 2009: 1-3）。近年來除了北韓一直在試圖研發洲際彈道飛彈之外，也以蘇聯在 1960 年代研發的 R-27 潛艇彈道飛彈爲基礎進行新型中程飛彈的改造計劃。北韓在 1990 年初趁蘇聯瓦解之際取得 R-27 飛彈的技術並進行研發改造，雖然至今尚未試射過，但是相信目前已經發展出地上發射型和艦艇發射型兩種，其中地上發射型被稱爲「舞水端」（Musadan）或是「蘆洞 B 型」（Nodong B）飛彈，在 2007 年 4 月朝鮮人民軍建軍紀念日的閱兵儀式上曾公開亮相過（Hildreth, 2009: 4）。

除了北韓單方面不斷強化自己的導彈技術和實際的軍事部署對東亞區域安全造成危害之外，另外更令國際社會所擔心的是北韓飛彈技術的外銷。前面已經提到北韓和巴基斯坦之間曾在 1996 年達成用飛彈技術交換離心機技術之協定，除此之外，北韓也曾將飛彈技術賣給伊朗、敘利亞、葉門、利比亞和埃及等國，其中又以北韓和巴基斯坦與伊朗之間的關係最爲密切。北韓與巴基斯坦在 1980 到 1988 年間的兩伊戰爭中共同提供武器給伊朗，開啓了兩國之間的軍事往來，1985 年起伊朗開始資助北韓的飛彈計劃，並自 1987 年起開始和北韓購買一百多枚「火星五號」飛彈。1990 年兩國達成協定，北韓提供貸款協助伊朗購買「火星六號」飛彈，並協助在伊朗東部的飛彈維修廠改造爲飛彈裝配裝置，換取伊朗所提供的石油和資金。1993 年伊朗革命衛隊總司令 Mohsen Rezaee 訪問北韓並對北韓所發展的「蘆洞」飛彈技術相當滿意，開始向北韓購買，並發展成「流星三型」（Shahab-3）飛彈，於 1998 年 7 月 21 日試射成功。2005 年伊朗再向北韓購買 18 枚「舞水端」飛彈並發展成「流星四型」（Shahab-4）飛彈，於次年 1 月 17 日進行試射（朱松柏，2000：4-6；重村智計，2006：41-42；斎藤直樹，2009：127-128；Becker, 2005: 160）。

北韓和巴基斯坦之間的合作雖然是以核武技術爲主，不過自 1993 到 1990 年代末期以來，據說也向北韓購買了 17 到 37 枚的「蘆洞」飛彈，並研發成於

1998 年 4 月試射的「高里」（Ghauri）飛彈。1991 年起北韓也向敘利亞販賣改良過後的飛毛腿飛彈，另外也在 2002 年 12 月被西班亞海軍發現在北韓商船中藏有運往葉門的飛毛腿飛彈（斎藤直樹，2009：128-129； Becker, 2005: 160）。近年來，北韓也和委內瑞拉政府關係密切，2005 年查維茲總統（Hugo Chavez）表明支持北韓的反美立場並提出以石油換取飛彈的構想，雙方也展開了石油技術合作，副總統 Jose Rangel 並於 2006 年 8 月表明願意向北韓輸出石油，不過有關飛彈技術的合作，目前仍舊不明朗（重村智計，2006：38-43）。

由於北韓飛彈技術的日益發展和其向外販售飛彈的行爲影響到了中東地區的安全，因此美國方面也開始關注此問題，從 1996 到 2000 年爲止進行了六回合的飛彈談判。前兩輪談判由 Robert Eihorn 和李赫哲（Ri Hyong Chol）於 1996 年 4 月和 1997 年 6 月分別在柏林和紐約舉行，北韓方面提出若美國方面可以給予相對應的補償則願意停止其飛彈出口，但是不願意放棄其國內的飛彈研發計劃和部署，美國方面拒絕賠償但是表示北韓停止飛彈出口的舉動有助於兩國關係的和解。由於美國對三間疑似涉及飛彈貿易的北韓公司進行制裁，以及北韓駐埃及大使叛逃到美國，因此北韓宣佈中止原訂要進行的第三輪會談。（Michishita, 2010: 119-120; Samore: 2002）

北韓於 1998 年 8 月 31 日試射成功的「大浦洞一號型」飛彈試射使得美方積極地開展中止的飛彈談判，其中第三和第四回合的談判仍止於雙方各說各話的階段而沒有具體的成果。1998 年 11 月，柯林頓任命前國防部長佩里負責對北韓政策，而於次年 5 月向北韓提出一份「誘因與反誘因」、「胡蘿蔔與棍子」兼具的解決方案給北韓，北韓方面則於次月表示美朝會談舉行期間並不會舉行飛彈試射。1999 年 9 月的朝美會談中，北韓表示將會在三年內暫緩長程飛彈的試射換取美國對其解除經濟制裁，而美方也於 2000 年 6 月 19 日表示會部份解除對北韓的經濟制裁。金正日在 2000 年下半年中數度表示願意凍結發展、生產、部署和測試射程 500 公里以上的飛彈來換取美國提供免費的人造衛星發射，同時也願意停止飛彈出口以換取「某種形式」的補償。10 月先後有北韓國防委員會副委員長趙

明祿和美國國務卿歐布萊特訪美和訪朝，除了達成《美朝聯合公報》外，金正日也承諾不再發展中、長射程的飛彈，以及停止飛彈出口，不過在 11 月的第六回合會談中則提到限制的發展只限於「蘆洞」和「大浦洞」計劃，飛毛腿飛彈的改良計劃不在此限。（Michishita, 2010: 121-128; Samore: 2002）北韓於 2002 年 9 月因爲兩韓關係的改善以及日本小泉純一郎首相訪問北韓達成《平壤宣言》，宣佈將會把長程飛彈發展計劃的凍結再延長三年，並於 2005 年 3 月因爲與美國和日本的關係均未改善，故宣佈不會再遵守飛彈發展凍結的約束（平井久志，2010：158；Beal, 2007: 121）。

參、「六方會談」與後續發展

在第二次北韓核武危機爆發時，美國已經決定不以軍事手段解決北韓核武問題（Laney & Shaplen, 2003: 21-23），加上美國在 2003 年 3 月發動對伊拉克的戰爭，因此雖然對北韓是採取強硬的態度，但是也同時尋求與北韓對話的可能。美方一方面丟出了願意在多邊架構下與北韓就核武問題進行會談，試圖「國際化」此事件，另一方面也在 2 月國務卿鮑威爾訪問中國時希望中國可以說服北韓加入處理其核武問題的多邊會談。3 月中國副總理錢其琛在訪問北韓時轉達了美方的提案，同時又由於美國在伊拉克戰爭中迅速地推翻了海珊（Saddam Hussein）政權，因此北韓於 4 月 12 日發表聲明指出：「若美國有意解決朝鮮半島的核問停並改變對北韓之政策，北韓將不會拘泥於對話的形式。」（矢野義昭，2008：99-100；廖文義，2008：38）於是北韓、美國及中國於 4 月 23 日到 25 日在北京就北韓核武問題展開了一次「三方會談」，但是這次會談的成果不佳。美方認爲朝鮮半島核問題是屬於「周邊問題」（”neighborhood problem”），因此參與會談的國家應該包括朝鮮半島周邊的所有國家，另外也堅持北韓的核武一定要以「完整的、可證實的且不可逆轉的方式拆卸」（complete, verifiable, and irreversible dismantling，以下簡稱 CVID）；北韓方面則表示要求其進行核裁軍和凍結核計劃是可以接受的，但是認爲自己應該至少保留一發核彈的反擊實力，另外也宣示具有進行核轉

讓和核實驗之權利（矢野義昭，2008：100；廖文義，2008：38-39）。雖然談判沒有具體的成果，但是至少北韓方面承諾將會參加於 7 月所召開多邊協商機制，並在北韓要求下加入俄國。

在前三輪的六方會談中，雖然北韓和美國都曾提出自己對於解決核武問題的看法，但是由於雙方的觀點差距過大，導致美朝雙方對彼此之提案無法接受，也讓其他與會國無法協助雙方達成共識。其中北韓方面在第一輪時提出下列的建議：首先，美國應該恢復對北韓的重油供給，提升對北韓的糧食援助，而北韓將同時放棄其核計劃；其次，美國與北韓將締結互不侵犯條約並賠償北韓近年來的電力損失，而北韓則將允許對其核設施進行核查與監視；第三，在北韓同美、日分別建立外交關係時，北韓將徹底解決美、日所關切的導彈計劃；最後，在美國所承諾的兩座輕水反應爐完工時，北韓將宣佈放棄核計劃並拆除相關的核設施（廖文義，2008：39；Pritchard, 2007: 102）。美國方面則在第三輪時提出解決方案：美國在北韓進行核放棄的前三個月之「準備期」間，要求北韓凍結其核計劃，而作爲回報，美國則會默許其他國家向北韓輸送重油；另外美方也會給予北韓「暫時性安全保證」（provisional security assurance），並將其從「贊助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刪除（廖文義，2008：40-42）。

從前三輪會六方會談來看，美國和北韓之間的存在三點爭議。首先，北韓矢口否認美國指出的濃縮鈾核計劃之存在；其次，美國一直堅持北韓應以 CVID 方式解除其核計劃，「凍結」不在美國可接受的範圍之內，但北韓方面則認爲此次的問題應比照過去的方式來解決，也就是雙方要先採取互諒互讓的措施而非先解除核武後補償的方式；最後，北韓方面則主張自己有和平使用核能的權利，但美方則要求北韓完全停止所有包括和平用途在內的核計劃（金民榮，2006：104）。換言之，美、朝雙方之歧見在於對棄核方面的認知不同，美方認爲凍結核計劃是整體棄核的一部份，但北韓方面則認爲凍核和棄核是兩個完全獨立的階段。雖然如此，第三輪六方會談與前兩輪相比仍達成了一些成果，包括各方都提出了解決問題的方案和設想、就棄核第一階段達成共識，並同意以循序漸進的方式，按照

「口頭對口頭、行動對行動」的原則尋求核問題的和平解決（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4）。

原訂於2004年9月進行的第四輪六方會談因爲諸多的原因而無法如期舉行。首先是因爲美國面臨到總統大選，因此布希發表許多抨擊北韓政權的言論，導致北韓不願重返「六方會談」，而北韓方面也觀望著美國大選的結果，希望民主黨（Democratic Party）可以勝出。9 月 2 日，南韓公開承認其在 2000 年所提煉的濃縮鈾遲到 2004 年才向 IAEA 進行申報，這使得北韓認爲美國和 IAEA 在朝鮮半島核問題上過於偏袒南韓，故於 9 月 11 日表示將要把南韓濃縮鈾議題與「六方會談」掛鉤（廖文義，2008：42）。2005 年 2 月 10 日，北韓對外正式宣佈擁有核武，並表示其發展核武是基於自衛目的[230]。由於此舉讓無法如期舉行的「六方會談」雪上加霜，因此包括中國方面不斷向北韓施壓，南韓方面則承諾提供北韓額外的電力之外，美國方面也將其代表團團長由凱利改由希爾擔任，也在第四輪的準備會議上多次與北韓代表進行雙邊性的對話，促使北韓於 7 月 8 日宣佈重回六方會談（Pritchard, 2007: 107-110）。

第四輪的六方會談分爲兩階段進行，在 7 月 26 日到 8 月 7 日的第一階段會談當中，各方基本上處於各自表述的階段，因爲美國和北韓針對「無核化」的適用對象、範圍和補償時機等出現爭論，故留到第二階段進行討論（金民榮，2006：105；廖文義，2008：42）。在 9 月 13 日到 19 日進行的第二階段會談中達成了《共同聲明》：其中北韓方面承諾，放棄一切核武器及現有核計劃，返回 NPT 以及 IAEA 保障監督，但聲明其擁有和平利用核能的權利；美方則重申在朝鮮半島沒有部署核武，並無意以核武或傳統武力攻擊或入侵北韓，也對北韓承諾尊重主權，將根據各自之政策逐步實現關係正常化；南韓方面重申其在《朝鮮半島非核化宣言》之承諾，並確認在其領土中沒有核武，重申其 2005 年 7 月 12 日提出的有關向北韓提供 200 萬千瓦電力援助之方案；日本方面承諾根據《平壤宣言》，在清

[230] 同註 28。

算不幸歷史和妥善處理有關懸案基礎上，逐步實現關係正常化；中、日、韓、俄、美也表示願意向北韓提供能源援助；最後，六國也都承諾共同致力東北亞地區持久和平與穩定、同意探討加強東北亞安全合作的途徑，以及同意根據「承諾對承諾、行動對行動」原則，以協調一致步調分階段落實上述共識（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b）。

第五輪第一階段的會談在美國對北韓實施金融制裁的情況下於 11 月 9 日到 11 日召開，僅發表了一份希望可以儘快展開第二階段會談的《主席聲明》就草草結束（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c）。北韓在 12 月到 4 月間數度要求美國解除對北韓的金融制裁，不然將不會重返「六方會談」，但是美方均不予以回應，於是北韓便以展現其威懾性力量的方式希望迫使美國讓步。首先，北韓先在 7 月 5 日進行了七次的導彈測試，向各國展現其飛彈實力；另外又在 10 月 9 日進行地底核武測試。10 月 14 日，聯合國安理會通過了《第 1718 號決議》譴責北韓的核武試爆，要求所有會員國對北韓實施與核武技術、大型武器和奢侈品之禁運，凍結與此有關的個人或組織在北韓境外的財產，要求北韓不再進行核試驗、暫停與彈道飛彈有關的所有活動、放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並撤回 2003 年退出 NPT 之聲明（聯合國，2006）。10 月 31 日北韓宣佈願意返回「六方會談」，第二階段的會議便於 12 月 18 日到 22 日間召開，北韓團長金桂冠強調無法接受美方提出的未解除制裁前就要求北韓停止使用核設施並接受 IAEA 視查的要求，而美方團長希爾則表示北韓堅持把金融制裁納入六方會談之行為感到失望（廖文義，2008：44）。

第五輪第三階段的六方會談於 2 月 8 日至 13 日召開，在此之前，金桂冠和希爾曾於 1 月 16 至 18 日間在柏林進行會晤，雙方達成「一定的共識」，其中北韓視其為與美國之間的「雙邊會談」，而美方則認為這只是一次「預備性會談」[231]。第三階段最後達成了《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的文件：北韓方面承諾以最終廢

[231] BBC (Jan. 19th, 2007), 'Progress' in N Korea-US talks, BBC, Accessed in Jul. 1st, 2012, http://news.bbc.co.uk/2/hi/asia-pacific/6277551.stm.

棄核計劃爲目標，關閉並封存寧邊核設施，並邀請 IAEA 人員重返北韓並進行雙方所同意的一切必要的監督和驗證；北韓與其他各國討論《共同聲明》所述之全部核計劃清單，包括從燃料棒中提取出的鈽，根據共同聲明這些核計劃應予放棄；朝美間將開始雙邊談判，旨在解決懸而未決的雙邊問題並向全面外交關係邁進，美國承諾不再把北韓視爲援助恐怖主義國家，並將推動終止對朝適用《與敵國貿易法》的進程；朝日將開始雙邊對話，旨在根據《平壤宣言》在清算不幸歷史和妥善處理有關懸案基礎上實現邦交正常化；各方同意合作向朝北韓提供經濟、能源及人道主義援助，並同意在起步階段向朝方提供緊急能源援助；爲實施起步行動，全面落實共同聲明，同意設立朝鮮半島無核化、朝美關係正常化、朝日關係正常化、經濟與能源合作，及東北亞和平與安全機制等五個工作小組，其責任是討論制定各自領域落實共同聲明的具體方案，並向六方會談團長會報告工作進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7a）。

第六輪的六方會談也是採兩階段進行，3 月 19 日到 22 日之間主要是聽取五個工作小組的報告，並討論落實下一階段之行動計劃。第二階段的會談則在 9 月 27 日到 30 日之間舉行，會中通過了《落實共同聲明第二階段行動》的文件，其內容主要有四大項目：在朝鮮半島無核化方面，北韓同意對一切現有核設施進行以廢棄爲目標的去功能化，並在 2007 年 12 月 31 日以前完成對寧邊地區核設施去功能化，同意對其全部核計劃進行完整、準確的申報，並承諾不轉移核材料、核技術或核相關知識。在國家關係正常化方面，北韓和美國、日本之間都將致力於推動國家關係正常化。在對北韓的能源經濟援助方面，提供相當於 100 萬噸重油的經濟、能源與人道主義援助。最後，各方承諾未來將會在適當的時機於北京召開六方外長會議（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7b）。

北韓於 2007 年 7 月 14 日關閉在寧邊的反應爐，11 月 27 日到 29 日由六方會談其他五國組成調查團對北韓核設施去功能化進行實地調查，並於 2008 年 6 月 26 日向六方會談代表團提交其國內核子專案及核子設施清單，美方允諾將北韓從援助支持恐怖主義國家的名單中除名，並解除《與敵國貿易法》中相關貿易

制裁。2008 年 7 月 10 日到 12 日召開「六方會談」代表的非正式會議，並在會中就北韓核計劃的檢證機制進行確立，但因爲美方對於檢證細節有所疑慮導致美國遲遲未將北韓從「贊助恐怖主義國家」名單中除名，使得北韓在 8、9 月間揚言要重啓寧邊的核設施，兩國後來在 10 月 11 日達成「口頭共識」，美國也將北韓從名單中除名。（楊永明，2008：389；Michishita, 2010:174,176）北韓於 11 月 24 日表示北韓對美國沒有任何書面協議承諾要提交核相關的樣本給國際社會，也認爲若各國無法按「行動對行動」原則給予北韓經濟補償的話，將會對未來「六方會談」的進行造成嚴重的妨礙[232]，而後來於 12 月 8 日到 11 日間由於北韓拒絕在各方給予其經濟補償前談論核檢證細節，因此未能產生共識（Michishita, 2010: 176）。

北韓於 2009 年 2 月發表由官方媒體發表聲明，認爲朝鮮半島非核化不應該單方面要求北韓放棄核計劃，而應該是要解除美、韓對北韓構成的安全威脅，給予北韓安全承諾後，北韓放棄核計劃化才有其意義[233]，也認爲真正在進行核擴散行爲危害世界安全的國家是美國，並強調自己的核計劃是爲了自衛而生產的[234]。北韓卻在 2009 年 4 月 5 日北韓進行「大浦洞二號」的洲際飛彈試射，聯合國安理會也於 13 日發佈主席聲明要求北韓遵守《第 1718 號決議》，不要再進行導彈試射（UN Security Council, 2009a），北韓則於 14 日宣佈驅逐了 IAEA 的視察人員[235]、重啓其核項目，並退出六方會談[236]。29 日北韓要求安理會若不對侵犯北

[232]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8 年 11 月 24 日），〈経済補償は６者会談進展の重要問題〉《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rokusya2008112400.html。
[233]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2 月 2 日），〈朝鮮半島非核化は、「北の核の廃棄」ではない〉，《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rokusya2009020200.html。
[234]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2 月 10 日），〈核軍拡競争の全責任は米国にある〉，《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rokusya2009021000.html。
[235] 美國之音中文網（2009 年 4 月 14 日），〈北韓驅逐國際監督人員重啓核專案〉，《美國之音中文網》，檢索於 2011 年 7 月 2 日，http://www1.voanews.com/chinese/news/a-21-w2009-04-14-voa60-61260082.html。
[236]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4 月 14 日），〈６者会談不参加、燃料棒再処理する〉，《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rokusya2009041400.html。

韓自主權的行動賠禮道歉，將會再次進行核子試爆和試射洲際飛彈[237]，聯合國並沒有予以回應，於是在 5 月 25 日再次進行地底核武試爆，而南韓於次日宣佈正式加入 PSI，北韓也在 27 日發表聲明將南韓加入 PSI 的行爲看作對北韓之宣戰行爲，故表示將不再遵守《停戰協定》之約束[238]。聯合國安理會於 6 月 12 日通過《第 1874 號決議》，對於北韓進行核子試爆行爲提出進一步的經濟制裁，加強管制北韓除輕型武器以外的武器進出口，並授權各國可攔檢北韓的可疑船隻及貨物（UN Security Council, 2009b），北韓則無視於此制裁案，於 7 月 4 日往東海方向試射了七枚地對地導彈。

北韓在 2009 年 9 月 3 日宣佈其濃縮精鍊鈾技術正式發展成功[239]，於 2010 年 5 月 12 日宣佈已經發展出核融合的技術[240]，同時也強調自己是在合乎國際法規範中脫離 NPT[241]，並認爲在北韓的安全威脅尚未解除前是有權力強化其核嚇阻能力的[242]，不過北韓仍未完全認爲「六方會談」是不可能再舉行的。在 2009 年 9 月及 10 月金正日分別在與戴秉國和溫家寶的會面上，北韓方面均提出了願意重回六方會談的意願[243]，也在 2011 年 8 月金正日和梅德韋傑夫的會面中表示願意無條件返回「六方會談」[244]，並認爲核問題的解決要透過朝美進行雙邊對話才會有突破[245]，「六方會談」的進行必須建立在朝美兩國對彼此有信賴關係才可

---

[237]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4 月 29 日），〈６者会談は、「議長声明」で存在意義喪失〉，《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rokusya2009042900.html。

[238] 同註 102。

[239]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9 月 3 日），〈ウラン濃縮実験成功〉，《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cyokaku2009090300.html。

[240]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5 月 12 日），〈朝鮮、核融合に成功〉，《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cyokaku2010051200.html。

[241]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5 月 14 日），〈ＮＰＴ脱退は、合法的な権利の行使〉，《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cyokaku2010051400.html。

[242]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5 月 24 日），〈核抑止力拡大・強化の権利ある〉，《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cyokaku2010052400.html。

[243] The Hankyoreh (Sept. 19th, 2009), "North Korea's Kim Jong-il declares the possiblity of return to the six-party talk," *The Hankyoreh*. Accessed in Jul. 2nd, 2012. http://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northkorea/377612.html; The Hankyoreh (Oct. 7th, 2009), "Kim Jong-il's remark on six-party talks gives green light on N. Korea's nuclear issue," *The Hankyoreh*. Accessed in Jul. 2nd, 2012. http://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northkorea/380586.html.

[244] 同註 222。

[245] 朝鮮中央通信社（2009 年 11 月 2 日），〈まず朝米直接対話で非核化の解決策模索すべきだ〉，

能重啓[246]，而朝鮮半島問題的真正解決不應該是以軍事手段處理，應該是透過對話與協商來達成之[247]。北韓和美國在 2011 年 7 月和 10 月由雙方「六方會談」代表會面，兩韓也在同年 7 月及 9 月進行兩次的「無核化會談」，金桂冠也曾於 10 月和俄國外交部第一副部長就核武問題進行過會談[248]。這些北韓的行動和發言顯示，在金正日後期，北韓正試圖於「六方會談」架構外利用核武來換取北韓所希望取得的安全承諾與經濟補償。

肆、小結

有關北韓爲何要發展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的原因，在討論北韓對外行爲的相關研究中是經常出現的問題，其中 Victor D. Cha 提出了「盾牌」（”shields”）、「劍」（”swords”）、「名牌」（”badges”）三種可能性，認爲北韓發展核武可能是爲了要追求自衛所建立的嚇阻能力，可能是要在戰場上實戰使用的兵器，也可能只是爲了用來提升自己在國際社會中的威望（Cha, 2002）。雖然 Cha 的分析大致上點出了北韓發展核武的所有可能性，但是 Hymans 利用敘述性統計所做出的研究卻和傳統研究不同，他指出北韓發展核武不是一個精心經過標準成本分析流程的政策產生，是一個以「革命性」思考居多的「情感下的產物」（”product of emotions”），也就是國內因素是主要影響北韓發展核武的原因（Hymans, 2008: 262-271）。而由於北韓的核武和飛彈議題對東北亞區域安全至關重要，故筆者認爲有必要來釐清北韓發展這兩者的主要目的。

先從核議題來看，這個問題可以分爲和平用途的核能發電和核武兩個層面。在冷戰時期，北韓擁有蘇聯核保護傘的保護，因此核技術之發展是以核能發電爲主。雖然自 1959 年的朝鮮勞動黨決定以火力和水力發電爲國家電力主要來源，

《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cyokaku2009110200.html。

[246]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1 月 26 日），〈６者会談再開には、朝米信頼醸成が急務〉，《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cyokaku2010012600.html。

[247]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1 年 1 月 11 日），〈朝鮮半島情勢打開の鍵は、対話と協議，《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cyokaku2011011100.html。

[248] 朝鮮中央通信社（2010 年 10 月 28 日），〈朝ロ第１外務次官が、核問題で意見交換〉，《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cyokaku2011102800.html。

但是因爲前者仰賴來自國外的石油和煤碳輸入，後者則因爲灌溉因素和河川管理不良，故自 1960 年代後期起兩者之電力供給已經不足，故轉向發展核能發電（矢野正昭，2008：24-25）。金日成在 1976 年也表示：「我國的核能研究設施並不是爲了建造核武而建立的，其目的是要透過發展核能發電來促進人民經濟的發展」，於是在 1980 年的黨大會中確立了以核能發電爲其國家基本電力來源之政策方針（吉田康彥，2006：40）。換言之，北韓的核技術發展是由核能發電轉向核武發展的。北韓積極發展核能發電的主要原因在於北韓國內本身生產鈽元素，因此在能源上可以自給自足，合乎「主體思想」中追求「經濟自立」、不希望在能源上仰賴他人的概念，因此與蘇聯積極地進行核能技術方面的合作，也在金正日時期和其他各國有關核議題的談判中一直希望可以取得輕水反應爐。因此，追求核能發電不僅是北韓一貫性的政策，也是合乎其官方意識型態思想的。

至於發展核武的目的爲何，筆者認爲可以從北韓在朝美談判、六方會談，以及各種北韓的官方發言可以看出端倪。綜合北韓官方的核武政策，除了強調這是爲了保衛國家而發展的嚇阻能力外，北韓官方也強調不會優先使用核武、不會進行核武技術的擴散，另外從北韓一直希望和美國就核議題進行雙邊會談來看，北韓建立核嚇阻力的原因正是美國對北韓所構成的安全威脅所致。由此來看，北韓發展核武在政策目的上，是爲了要嚇阻美國以保衛國家安全，而這種至今仍是視美國對北韓懷有敵意的概念，乃源於北韓在韓戰時受到美國破壞的歷史經驗影響，也因此影響了北韓在「主體思想」中「國防自衛」具體政策內容的概念。特別是在朝鮮半島軍力平衡明顯偏向南韓之際，北韓需要一個足以平衡軍事戰略實力的媒介，而核武由於可以建立在北韓既有的核能知識與設施上發展，故對北韓而言是相對成本較低的選擇。在制訂發展核武政策的過程中，由於金正日時代的「先軍政治」與「先軍體制」，因此軍方和軍事工業領導人在政府決策的角色地位有所提升，因此傾向於核武發展之偏好（Pinkston, 2003: 9-10），加上金正日自 1980 年代便是核技術發展的主要負責人（矢野正昭，2008：21-26），在一人獨裁政權體制下也更傾向於進行核武發展的決策。

而從北韓將核武當作談判籌碼來看，北韓主要希望可以從中獲得安全承諾、國際協助其建設輕水反應爐、美日與其邦交正常化，以及經濟合作等。其中來自美國的安全承諾源自北韓所認爲的美國採取之敵視北韓政策，取得輕水反應爐和北韓一貫的核能政策有關，和美、日邦交正常化則源自歷史因素使得北韓無法與兩國國交正常化，而經濟合作則與北韓近十年來「實利主義」的新經濟思維有關。因此，這些看似紛亂的政治目的，其實都是源自於北韓領導層受到國內因素制約而追求的，也是北韓領導人爲了維持政權延續所認爲應該取得的利益。

從飛彈發展來看，北韓從早期的中短程距離飛彈發展與部署，到現在發展長程洲際彈道飛彈其實是有不同用途的。早期的中短程飛彈目標包括南韓和日本全域，主要的目標是南韓全域、駐韓美軍和駐日美軍，除了希望發揮真正打擊效果之外，更重要的是希望可以發揮嚇阻能力讓美、日不要介入可能發生的朝鮮半島軍事衝突，這與北韓所認知的美、韓、日對朝政策，以及受到韓戰經驗影響所希望發展的戰略嚇阻能力有密切的關係。長程飛彈方面，北韓至今沒有實戰部署且精準度也受到高度質疑，因此雖然號稱可以攻擊到美國本土，但是其所象徵的嚇阻能力和「強盛大國」目標中軍事大國形象比起其實際打擊能力更爲重要。而在發展飛彈的決策過程中，「先軍政治」與「先軍體制」所導致的軍方在政府決策地位之提升也是扮演關鍵性的作用（Pinkston, 2003: 5-10）。

而從朝美間的飛彈談判來看，北韓雖然願意不外銷飛彈技術，但是希望美國給予經濟上的補償，可見外銷飛彈是北韓主要外匯來源之一。另外，在談判中北韓也一直不願意放棄中短程飛彈，表示北韓希望持續保有前述對南韓全域、駐韓美軍及駐日美軍的嚇阻與打擊能力，以確保北韓在朝鮮半島的戰略平衡上不會與美韓差距過大。

若從追求制度存續的角度來看北韓的核武與飛彈外交，也可以從中觀察到其與北韓追求政權、制度和國家存續之間的關連。從核能發電來看，北韓希望藉此來改善國內能源不足的問題，一來可以減少對於外國能源的依賴，二來也可以透過電力的恢復重建國內的經濟，這對北韓確立其政權與制度存續的物質基礎有很

大的幫助。從核武發展來看，北韓了解到目前朝鮮半島的戰略均勢已經往有利於南韓的態勢在發展，因此希望透過擁有核武來平衡半島的戰略態勢，藉此發展嚇阻能力希望嚇止美國和日本等南韓盟國在朝鮮半島有事之際介入。從飛彈發展來看，中短程飛彈所追求的是具體的打擊能力，也就是實際上可以在戰場上運用的武器，藉此提升其國防能力，也可以對駐韓與駐日美軍發揮嚇阻的作用；長程飛彈發展方面，目前北韓透過此發展除了希望確立其嚇阻能力外，更重要的是作爲「軍事大國」的對國內象徵意義，以及相關軍方部門的利益考量，也就是主要有助於由國內來鞏固其政權與制度。最後從利用兩者爲談判籌碼的外交行爲來看，北韓利用這兩者希望可以取得安全承諾、輕水反應爐、經濟物資與合作、改善和美國與日本關係等具體內容，這些都與前述北韓的外交目標以及制度存續有密切的關連，若可以成功取得部份或全部利益的話，對於北韓政權、制度和國家的存續都會有莫大的助益。

綜合來看北韓的核武和飛彈外交與國內因素的連結，筆者認爲可以整理出三個主要的重點。首先，北韓透過兩者的發展最主要追求的是對美國與南韓的嚇阻能力，其中前者是北韓認爲仍對自己抱有敵視政策的帝國主義國家，而後者是北韓所不承認的美帝扶持之傀儡政權，這與韓戰所導致的兩韓分裂和北韓仇視美國情緒有密切的關係。另外，嚇阻力的追求也是北韓「國防自衛」思想在現實國際環境中的反映，因爲在經濟和軍備上北韓都在兩韓中居於劣勢，因此透過相對發展成本較低的大規模毀滅性武器，北韓才能拉進與南韓之間的戰略平衡關係。其次，北韓透過核武和飛彈外交所希望取得的回報是與其維持政權存續的國家利益有密切關係的，包括安全承諾、核能發電協助、經濟物資等，但在同時卻又不願爲了取得這些東西而犧牲自己的主權與權利（如堅持行動相互性、不樂意接受核視查等），可見「主體思想」對於北韓對外行爲仍有很大的影響。最後，北韓以核武和飛彈爲籌碼所追求的不只是安全層次上的補償，也希望可以取得在政治和經濟方面的利益，可見這兩者作爲北韓的外交工具，是有多層涵義的，也顯現了北韓在外交與軍事政策目標上的一體性或整合性，外交辭令和軍事行動的混合加

上北韓的談判手法，充份顯現北韓受到游擊隊傳統影響所展現出來的「非傳統式」外交談判手法。

第六章　結論

在前面五個章節中，筆者分別從歷史因素、國內政治制度和意識型態因素等三個不同層次的國內因素進行切入，說明這些不同國內因素的演變與發展如何形塑和約束北韓的對外行爲表現與政策目標，並在第五章中就金正日時期北韓與主要國家之間的關係、北韓的對外經濟行爲和北韓的核武與飛彈外交進行進一步的描述，分析國內因素和北韓對外行爲表現之間的關連，以及如何透過這些外交行爲達成制度存續之外交目標的經過。透過上述的討論，筆者認爲，唯有對北韓的國內因素有深入的了解，才有可能理解北韓領導層是如何看待目前的國際體系變化，才有可能理解北韓透過對外行爲所希望追求的國家利益與外交目標爲何，也才可能理解北韓所採取的對外行爲手段背後的涵義爲何。

從本研究中可以發現，北韓在金正日時期的諸多外交表現都和歷史、政治制度和意識型態等不同的國內因素有不同程度的連接，因此對這些不同國內因素的了解是筆者認爲能夠對北韓對外行爲有更深入了解的關鍵。據此，筆者綜合了在本研究中所討論的北韓於金正日時期 20 年間對外行爲的表現，從國內因素的角度提出了這段期間北韓對外行爲的主要特徵，希望爲未來從事北韓對外行爲研究的人士提供一個概念式的框架，以有助於迅速抓到北韓對外行爲的主要脈絡與重點。

首先，在金正日時期「對美外交是金正日時期的外交重心」。縱看金正日時期北韓的主要對外議題，如核武、飛彈、國際制裁、「六方會談」和東北亞區域安全等議題中，美國都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北韓也多次認爲核議題應該是朝美之間的事情、朝美之間應該會談以達成取代《停戰協定》的「和平協定」等要求。北韓認爲美國是造成目前朝鮮半島分裂的罪魁禍首，也認爲美國一直對北韓懷有敵視政策，這種認知加上韓戰經驗以及美國和南韓、日本間的同盟關係，使得北韓對美國得敵意更爲加深，也因此爲了達到制度存續的外交目標，改善和美國之

間的關係成爲金正日時期北韓對外行爲的重點。北韓多次要求兩國進行有關邦交正常化的會談，希望美國結束對北韓的敵視政策並給予其安全承諾，也對美國歷任政府的對朝政策相當關注都是基於上述原因。同時，北韓和其他國家之間的關係變化很多時候也是爲了吸引美國與其接觸所進行的，這包括透過改善同南韓與日本間的關係釋出善意或是用來牽制美國，透過改善朝中關係希望彌補因爲以美國爲首國對北韓之經濟制裁所導致的損失並拉攏中國成爲兩國問題的中介，也透過改善朝俄關係希望可以制衡美國在東北亞多邊區域安全中的影響力等。因此，北韓在金正日時期中對美關係之積極乃是希望解除來自美國的安全威脅，此想法源於過去的歷史經驗所形成的對美觀念，其目標是希望確保不會在軍事上對北韓構成威脅。

其次，在金正日時期的對外關係中「思想因素影響相當深遠」。此處所謂的思想因素不單指本文第四章所討論的意識型態而已，也包括在第二章內所討論到的各種歷史因素對北韓領導層之世界觀所導致的影響。北韓對外政策的基本邏輯，正如北韓官方所發表的「自主政治」內容大致上是一樣的：極度重視國家主權、反對外國對北韓的壓力和干涉、希望自力達成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建立強大的軍隊以捍衛國家獨立性和民族尊嚴等。這些內容不僅與「主體思想」和「先軍政治」有密切關係，也和歷史因素所產生的世界觀有關，如極度重視國家主權和希望建立強大的軍隊源於朝鮮王朝曾經被滅國的經驗、反對外國干涉和希望自力達成革命與建設源自北韓政權強力譴責朝鮮王朝中日俄對朝鮮內政的干涉等。除此之外，北韓目前利用大規模毀滅性武器爲後盾所建立的戰略嚇阻能力與韓戰經驗、「主體思想」中的「國防自衛」及「先軍政治」有關。北韓的談判模式和軍事政治併用的外交手段與抗日游擊隊傳統，以及「主體思想」中的「政治自主」和「創造性」解決問題的概念有關，對外經濟行爲也和「自立民族經濟」、「蚊帳式戰略」、「新思考」和「先軍政治」中的「先軍後勞」等經濟思想概念有關。同時北韓在進行政策調整時也必須要在思想層次上建立合理性，如改善對日關係時強調日本對北韓的道歉與賠償，進行經濟改革強調「實利」等概念。如此可見，思想因素

不僅對北韓的對外行爲產生全方位且深遠的影響，也反映了金正日本人長期以來從事黨思想工作以建立自身統治正當性的個人政治發展歷程。更重要的是，北韓領導層必須在這些思想教條和邏輯下遂行其外交政策，因爲這些思想因素構成北韓政權的統治正當性，從國內的角度來看，也是維持其制度存續的重要基礎。

第三，北韓在的具體對外行爲中「偏好採取非傳統手段」。北韓所採取的非傳統手段有危機外交、戰爭邊緣外交及創造談判籌碼等內容：其中危機外交的主要目的是要吸引對方的注意，也就是如北韓這樣的小國爲了要吸引美國等大國的注意，不能只循正當的外交管道表達自己的訴求，必須要刻意製造危機以吸引國際社會的目光，同時也會在談判中利用如試射飛彈、軍方和外交部門發佈挑釁式言論等手段，升高危機層級來營造更有利於己的外交空間；戰爭邊緣外交則是一種同時兼具侵略性和挑釁意味的外交手段，其目的是在避免讓對手辨別出自己的底線同時去刺探對手最大限度的讓步空間；而前述兩個手段除了可以創造有利於北韓的外交空間和開啓外交會談之外，同時也具備有創造談判籌碼的功用。這種「非傳統」手段從北韓的核武與飛彈外交可以得到最明顯之體現：北韓利用這兩者希望換取朝美雙邊溝通關係建立、取得輕水反應爐、獲得安全承諾、促使同美日關係正常化、解除對北韓之制裁以及取得具體物資援助和經濟合作等內容，爲此北韓時而採取合作性態度、時而升高緊張局勢，同時也善於游走於各國不同的利益與立場間，希望最大化自己的利益。這種以軍事手段作爲追求和平目標的行爲除了與北韓政權的抗日游擊隊傳統有密切關係外，這也與「主體思想」中強調以「創造性手法」達成目的的思想概念有密切關連。

第四，北韓的「外交決策體系是高度集中」的。北韓的決策是高度獨裁且個人化的，雖然不同部門間會有可能產生不同的利益取向，也雖然在朝鮮勞動黨中也仍保留集體領導和黨內民主的形式存在，但最後的決策是由「首領」個人決定的，而這不論是在國內事務上，或是國防、外交等對外事務上都是一樣的。在北韓的外交決策中最主要的影響因素是金正日針對國內外環境因素的評估所做的決策，這充份反應在金正日時期北韓對外關係深受思想因素限制以及大打「核武

牌」的特色，這和金正日在黨內長期以來是負責思想的宣傳與煽動業務，軍中核計劃的主要負責人也是金正日有密切關係。此外，在進行對外談判時，北韓代表往往很難對於重大讓步進行同意，北韓代表會高度遵守其底線，難以產生大幅度的讓步，不過在經過休息過後的再度談判開始時，北韓有時會產生讓步或是底線的轉變，這和北韓代表不具有進行決策的權力，因此無法就己方立場與底線之外的內容進行決定，必須在休會的期間向上級請示，上級經過討論後再把決定告知談判代表進行下一階段的談判有很大的關連。會導致北韓出現這樣的外交決策行爲，則與其政治體制由聯合陣線到單一派系獨掌大權到一人獨裁體制建立之歷史發展過程有很大的關係。此外，由於歷史因素影響而產生的「成分」社會分級制度，也導致下層民意根本無法影響到政治決策，而政治菁英在進行決策時也只要思想到鞏固「核心階級」和軍方之利益和對政權之支持即可。

最後，在眾多北韓的對外行爲中，「對外經濟在對外關係中只是達成政治目標的輔助性條件」而已。在所有現存的共產主義國家中，北韓是在經濟方面改革與開放幅度最小的國家，其所進行的經濟開放措施、特別經濟區建立及吸引外資的手段和其他國家相比，都是限制重重且「半調子」的。而這種輕視經濟的態度受到朝鮮式儒家思想和「主體思想」、「先軍政治」等因素的影響，導致北韓不論是在早期優先順位的是思想與政治事務，或是在「先軍政治」提出後國防事業成爲最主要的國事的時期，經濟事務都只是爲了達到「政治自主」和「國防自衛」目標的物質基礎而已。在北韓的政治制度下，最高領導人只要能掌握到黨、政、軍的統治菁英及其家屬的支持，便可以確保體制的安穩，因此經濟力只要足夠拉攏這些菁英階層就足夠了，唯有在經濟狀態已經嚴重到挑戰政權與體制存續時，如爲了解決「苦難的行軍」時期所導致的經濟高度衰敗狀態，北韓才會看重民生經濟政策。

北韓作爲一個在對外行爲上採取現實主義與務實主義態度的國家，追求維持既有體制存續與主權獨立國家地位的政治目標，透過外交、軍事、經濟、諜報等各種手段，以改善朝美關係爲重心，於金正日時期成爲東北亞區域局勢的一個重

要行爲者。可是針對北韓對外行爲邏輯與策略的不了解，往往成爲各國制訂對朝政策和分析與預測北韓行爲與企圖時的最大阻礙。筆者認爲這是由於在北韓的「首領主導黨國制」的特殊政治體制之下，北韓的對外決策高度集中，而這群政治菁英又深受其各種國內因素的影響，不僅形成北韓獨特的世界觀和政治目標，同時也成爲囿限北韓對外行爲的重要因素，故筆者認爲對北韓國內行爲的進一步了解有助於歸納並理解北韓在金正日時期的對外行爲及其所追求的政策目標。從歷史、政治制度和意識型態等三個因素來分析北韓與主要國家間外交關係、北韓的對外經濟行爲與北韓的核武和飛彈外交後，筆者認爲金正日時期的北韓對外行爲包括「對美外交是金正日時期的外交重心」、「思想因素對北韓對外行爲的影響相當深遠」、「對外行爲中偏好採取非傳統手段」、「外交決策體系高度集中」和「對外經濟在北韓對外關係中只是達成政治目標的輔助性條件」等五個核心特徵，這五個核心特徵不僅在金正日時期北韓的對外關係之不同面向上都有所展現與貫徹，也是北韓對外行爲看似反覆或前後矛盾的主要因素。筆者希望在透過由國內因素分析金正日時期北韓的外交目標和對外行爲特徵後，有助於我們進一步深入理解北韓在金正日時期對外行爲的內涵，也成爲日後分析金正恩時期的北韓對外行爲的重要分析框架。

參考資料

壹、中文部份

一、官方文獻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4），〈新共識、新步伐──王毅談第三輪北京六方會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1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gxh/wzb/zxxx/t140664.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a），〈外交部發言人孔泉就朝核問題答記者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gxh/wzb/fyrbt/dhdw/t183170.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b），〈第四輪六方會談共同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1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gxh/wzb/zxxx/t212681.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5c），〈第五輪六方會談第一階段會議《主席聲明》全文〉，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11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221070.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a），〈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就朝鮮試射導彈事發表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gxh/wzb/fyrbt/dhdw/t261535.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b），〈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就朝鮮宣布將進行核子試驗發表談話〉，《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gxh/wzb/fyrbt/dhdw/t274867.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c），〈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gxh/wzb/fyrbt/dhdw/t275346.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d），〈王光亞大使在安理會通過關於朝鮮核子試驗問題的決議（第 1718 號決議）後的發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

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pds/wjb/zzjg/jks/fywj/t309145.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e），〈2006 年 10 月 19 日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gxh/wzb/fyrbt/t276826.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6f），〈2006 年 10 月 24 日外交部發言人劉建超在例行記者會上答記者問〉，《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gxh/wzb/fyrbt/t277291.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7a），〈落實共同聲明起步行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1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zt/ywzt/wzzt/cxbdhwt/5lfht/liufanghuitandisan/t297462.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7b），〈落實共同聲明第二階段行動〉，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1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pds/ziliao/1179/t369082.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9a），〈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表聲明〉，《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gxh/wzb/zxxx/t564332.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2009b），〈2009 年 6 月 11 日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舉行例行記者會〉，《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www.fmprc.gov.cn/chn/gxh/wzb/fyrbt/t567209.htm。
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國家外匯管理局（2011），〈2010 年度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統計公報〉，《中華人民共和國商務部》。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hzs.mofcom.gov.cn/accessory/201109/1316069604368.pdf。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使館（2007），〈近年中朝貿易統計〉，《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使館》。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http://kp.china-embassy.org/chn/zcgx/jmhz/zcjmgk/P020070112305886099687.doc。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使館（2010），〈朝鮮勞動黨總書記

金正日對我國進行非正式訪問〉，《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大使館》。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2 日。http://big5.fmprc.gov.cn/gate/big5/kp.china-embassy.org/chn/zcgx/gchf/sbgx2010/t692853.htm。

金日成（1983），《朝鮮人民貫徹主體思想的鬥爭》。平壤：外文出版社。

金正日（1990a），《對主體哲學要有正確的觀點和理解》。平壤：外文出版社。

金正日（1990b），《我國社會主義是體現了主體思想的我們朝鮮式社會主義》。平壤：外文出版社。

金正日（1990c），《關於社會主義的思想基礎的幾個問題》。平壤：外文出版社。

金正日（1991），《我們朝鮮式社會主義戰無不勝》。平壤：外文出版社。

金正日（1994），《社會主義是科學》。平壤：外文出版社。

金正日（1995），《思想工作先行，是完成社會主義事業必不可少的要求》。平壤：外文出版社。

金正日（1996），〈尊崇革命前輩，是革命者崇高的道德情義〉，《中朝網》，檢索於 2012 年 4 月 25 日。http://dprk-cn.com/history/jong-il/works/951225senior.htm。

金正日（2002a），《關於主體思想》。平壤：外文出版社。

勞動新聞、朝鮮人民軍、青年前衛（2007），〈朝鮮新年共同社論：滿懷勝利的信念奔向先軍朝鮮的全盛期〉，《朝鮮研究博客》。檢索於 2012 年 3 月 30 日。http://dprk.blog.hexun.com/7166826_d.html。

朝鮮勞動黨（2008），《先軍政治與朝鮮半島和平》。平壤，外文出版社。

新華社（1992），〈中韓建交聯合公報〉，《新華網》。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06-12/19/content_5508253.htm。

聯合國（2006），〈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1718（2006）號決議〉，《聯合國》，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1 日。http://www.un.org/chinese/aboutun/prinorgs/sc/sres/06/s1718.htm。

二、專書

中日關係研究會編（1972），《北韓論「日本軍國主義」》。台北市：中日關係研究會。

王明星（1998），《韓國近代外交與中國（1861-1910）》。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朱立熙（2006），《韓國史：悲劇的循環與宿命》。台北市：三民。

朱松柏（2004），《南北韓的關係與統一》。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

沈儀琳編（1983），《朝鮮主體思想資料選譯》。北京：人民出版社。

李明（1998），《南北韓政經發展與東北安全》。台北市：五南。

李庚嬉（2008），《怎麼看北韓核武危機》。台北市：文英堂。

李敦球（2007），《戰後朝韓關係與東北亞格局》。北京：新華出版社。

林宗達（2011），《國際關係理論概論：國際關係之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相關理論》。新北市：晶典文化。
林秋山（2011），《前進朝鮮：與北韓交流二十年》。台北市：國史館。
林碧炤（1997），《國際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市：五南。
芭芭拉・德米克著、黃煜文譯（2011），《我們最幸福：北韓人民的真實生活》，台北市：麥田。譯自 Barbara Demick (2009), *Nothing to envy: Ordinary Lives in North Korea*, New York: Spiegel & Grau.
金哲佑（2002），《金正日先軍思想》。平壤：外文出版社。
姜赫、菲利普・格蘭傑羅著，陳怡華譯（2011），《這就是天堂！我的北韓童年》。新北市：衛城出版。譯自 Kang Hyok & Philippe Grangereau (2004), *Ici, C'est Le Paradis! Une enfance en Corée du Nord*, Neuilly-sur-Seine Cedex, France: Michel Lafon.
徐文吉（2007），《朝鮮半島時局與對策研究》。濟南：山東大學出版社。
楊永明（2008），《國際安全與國際法：國際安全秩序規範與機制的建構與挑戰（第二版）》。台北市：元照。
簡江作（2005），《韓國歷史與現代韓國》。台北市：台灣商務印書館。
簡江作、劉順福編（2009），《韓國與朝鮮現代史》。台北市：國立編譯館。

三、期刊與專書論文

朱松柏（1994），〈朝鮮半島的核武危機〉，《問題與研究》，33(7)，頁 1-10。
朱松柏（1995），〈北韓的經濟發展與對外開放〉，《問題與研究》，34(8)，頁 51-61。
朱松柏（1997），〈朝鮮半島四邊會談的構想與實際〉，《問題與研究》，36(8)，頁 19-28。
朱松柏（2000），〈北韓的飛彈外交與亞太安全〉，《問題與研究》，39(2)，頁 1-12。
何晨青（2010），〈第一次朝鮮半島核危機〉，《阜陽師範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 年第 1 期，頁 116-119。
李明（2001），〈朝鮮半島能源開發組織（KEDO）之運作和限制〉，《國際關係學報》，(16)，頁 93-127。
李明（2002），〈北韓推行改革開放的前景及其限制〉。收錄在張啓雄編，《戰後東北亞國際關係》，台北市：中央研究院亞太研究計劃。
李俊江、范碩（2012），〈中朝經貿關係發展現狀與前景展望〉，《東北亞論壇》，(100)，頁 11-20。
邱坤玄（2001），〈冷戰後中共與朝鮮半島的權力平衡〉，《中國事務》，(4)，頁 90-102。
南穎（2006），〈朝鮮羅津─先鋒經貿區的發展與環境變遷研究〉，《延邊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39(2)，頁 38-43。
徐雲龍（1984），〈北韓獨裁體制結構性之研究〉，《復興崗學報》，(33)，頁 195-232。
馬仲可（1993），〈北韓退出防止核武器擴散條約和朝鮮半島的核問題〉，《問題與

研究》，33(7)，頁 40-50。
黃奎博（2007），〈外交與決策分析〉。收錄在張亞中主編，《國際關係總論（第二版）》，台北縣：揚智文化。
張少文（2010），〈北韓實行「12・1 措施」對兩韓關係的影響評估〉，《韓國學報》，(31)，頁 184-192。
張慧智（2010），〈新時期朝鮮經濟發展戰略調整〉，《東北亞論壇》，19(3)，頁 17-24。
都興烈（1988），〈北韓的社會變化與主體思想〉。收錄在朱松柏編，《共產主義與亞洲傳統社會》，台北市：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
廖文義（2008），〈北韓核問題與「六方會談」：回顧、分析與展望〉，《通識研究集刊》，(14)，頁 31-56。
劉德海（1993），〈中共對北韓政策之變遷─由戰略合作到政治支持〉，《韓國學報》，(12)，頁 193-207。

四、學位論文

金民榮（2006），《北韓發展核武對朝鮮半島的影響》，台北：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五、網路文章

中國中央電視台（2011），〈專訪俄羅斯總統梅德韋傑夫 HQ 環球視線〉，《YouTube》，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30 日。http://www.youtube.com/watch?v=xOsGFfJZ9DM&feature=relmfu。
秦軒、張哲（2010），〈中朝關係一甲子〉，《南方週末》。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9 日。http://www.infzm.com/content/53852。
龍婧（2011），〈出新義州記〉，《時代週報》。檢索於 2012 年 7 月 2 日。http://time-weekly.com/story/2011-08-25/118331.html。

貳、日文資料

一、官方文獻

外務省（2000），〈日朝外相会談（概要）〉，《外務省》。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n_korea/n_k/kaidan.html。
外務省（2002），〈日朝国交正常化交渉第 12 回本会談（評価と概要）〉，《外務省》。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n_korea/abd/nego12_gh.html。
外務省（2003），〈川口外務大臣談話：北朝鮮の NPT 脱退宣言について〉，《外務省》。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danwa/15/dkw_0110.html。

外務省（2004），〈事務次官会見記録（平成 16 年 12 月）〉，《外務省》。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kaiken/jikan/j_0412.html#2-A。
外務省（2005a），〈日朝政府間協議（11 月 3、4 日、於：北京）の概要〉，《外務省》。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n_korea/abd/seifukan_0511.html。
外務省（2005b），〈日朝政府間協議（12 月 24－25 日、於：北京）（概要）〉，《外務省》。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n_korea/abd/seifukan_0512.html。
外務省（2006a），〈第 1 回日朝包括並行協議（概要）〉，《外務省》。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n_korea/abd/hokatsu.html。
外務省（2006b）〈北朝鮮のミサイル発射に対する我が国よりの抗議について〉，《外務省》。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18/rls_0705b.html。
外務省（2006c），〈北朝鮮のミサイル発射と海上・航空の安全に関する我が国の国際機関への働きかけについて〉《外務省》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18/rls_0710c.html。
外務省（2006d），〈外国爲替及び外国貿易法に基づく北朝鮮のミサイル又は大量破壊兵器計画に関連する資金の移転を防止する措置について〉，《外務省》。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n_korea/abd/shikin.html。
外務省（2006e），〈北朝鮮への奢侈品の輸出禁止措置等について〉，《外務省》。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n_korea/abd/shashihin.html。
外務省（2007a），〈第 1 回「日朝国交正常化のための作業部会」の概要〉，《外務省》。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n_korea/seijyoka.html。
外務省（2007b），〈第 2 回「日朝国交正常化のための作業部会」〉，《外務省》。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www.mofa.go.jp/mofaj/area/n_korea/seijyoka2.html。
金日成（1953），〈停戦協定締結に際して：全朝鮮人民への放送演説〉，《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5 月 22 日。http://kcyosaku.web.fc2.com/ki1953072800.html。
金日成（1955），〈思想活動において教条主義と形式主義を一掃し、主体性を確立するために〉，《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5 月 14 日。http://kcyosaku.web.fc2.com/ki1955122800.html。
金日成（1965），〈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における社会主義建設と南朝鮮革命について〉，《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5 月 14 日。

http://kcyosaku.web.fc2.com/ki1965041400.html。
金日成（1967），〈国家活動のすべての分野で自主、自立、自衛の革命精神をいっそう徹底的に具現しよう〉，《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5 月 14 日。http://kcyosaku.web.fc2.com/ki1967121600.html。
金日成（1972a），〈我が党のチュチェ思想と共和国政府の対内対外政策のいくつかの問題について〉《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5 月 14 日。http://kcyosaku.web.fc2.com/ki1972091700.html。
金日成（1972b），〈祖国統一の３大原則について〉，《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shiriyo.tongilu.1972050300.html。
金日成（1980），〈高麗民主連邦共和国創立方案について〉《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shiriyo.tongilu.1980101000.html。
金日成（1990），〈全民族が団結して祖国の統一を促進しよう〉，《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 日。http://kcyosaku.web.fc2.com/ki1990081800.html。
金日成（1991a），〈「岩波書店」社長の質問にたいする回答〉，《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 日。http://kcyosaku.web.fc2.com/ki1991092600.html。
金日成（1991b），〈自由、平和の新しい世界のために〉，《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1 日。http://kcyosaku.web.fc2.com/ki1991042900.html。
金日成（1993），〈祖国統一のための全民族大団結 10 大綱領〉《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2 日。http://kcyosaku.web.fc2.com/ki1993040600.html。
金正日（1981），〈党の思想活動をさらに改善するために〉，《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5 月 14 日。http://kcyosaku.web.fc2.com/kj1981030800.html。
金正日（1986），〈チュチェ思想教育における若干の問題について〉，《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5 月 14 日 http://kcyosaku.web.fc2.com/kj1986071500.html。
金正日（1987），〈反帝闘争の旗を高くかかげ、社会主義・共産主義の道を力強く前進しよう〉，《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5 月 24 日。http://kcyosaku.web.fc2.com/kj1987092500.html。
金正日（1997），〈偉大な領袖金日成主席の統一遺訓を貫徹しよう〉，《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2 日。http://kcyosaku.web.fc2.com/kj1997080400.html。
金正日（1998），〈全民族が大団結して、祖国の自主的平和統一をなし遂げよう〉，《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3 日。

http://kcyosaku.web.fc2.com/kj1998041800.html。
金正日（2001），〈強盛大国建設の要求に合わせ社会主義経済の管理を改善強化することについて〉，《世界》，2004 年 11 期，頁 238-249。
金正日（2002b），〈共同通信社社長の質問に対する回答〉，《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http://kcyosaku.web.fc2.com/kj2002091400.html。
金正日（2003），〈先軍革命路線は我々の時代の偉大な革命路線であり、朝鮮革命の百戦百勝の旗印である〉，《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5 月 16 日。http://kcyosaku.web.fc2.com/kj2003012900.html。
首相官邸（1998），〈北朝鮮によるミサイル発射を受けての当面の対応にかかる官房長官発表〉，《首相官邸》。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http://www.kantei.go.jp/jp/obutisouri/tyoukan/980902kanbo.html。
首相官邸（2002a），〈日朝首脳会談後の記者会見〉，《首相官邸》。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2/09/17press.html。
首相官邸（2002b），〈拉致問題に関する事実調査チームの調査結果〉，《首相官邸》。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http://www.kantei.go.jp/jp/singi/nittyo/rati/021002/tyousakekka.html。
首相官邸（2002c），〈日朝国交正常化交渉に関する基本方針〉，《首相官邸》。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http://www.kantei.go.jp/jp/singi/nittyo/kettei/021009kihon.html。
首相官邸（2004），〈日朝首脳会談後の記者会見〉，《首相官邸》。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5 日，http://www.kantei.go.jp/jp/koizumispeech/2004/05/22press.html。
首相官邸（2006），〈韓国訪問に関する内外記者会見〉，《首相官邸》。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www.kantei.go.jp/jp/abespeech/2006/10/09koreapress.html。
首相官邸（2009），〈日韓首脳共同記者会見〉，《首相官邸》。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www.kantei.go.jp/jp/hatoyama/statement/200910/09kyoudou.html。
労働新聞（2006），〈先軍は現代における自主偉業の偉大な旗印である〉，《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5 月 16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tyutye.2006071900.html。
労働新聞、朝鮮人民軍、青年前衛（1999），〈ことしを強盛大国建設の偉大な転換の年に輝かせよう〉《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4 月 27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shiriyo.sks.1999010100.html。
労働新聞、朝鮮人民軍、青年前衛（2010），〈党創建 65 周年を迎える今年、再び軽工業と農業に拍車をかけて人民生活で決定的転換をなし遂げよう〉，《私設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 日。http://www.piks.or.tv/date/newyear/20100101.html。
労働新聞、朝鮮人民軍、青年前衛（2011），〈今年もう一度軽工業に拍車をかけ、

人民生活向上と強盛大国建設で決定的転換を起こそう〉,《私設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8 日。http://www.piks.or.tv/date/newyear/20110101.html。

二、專書

渥美文夫（2007）,《金日成・金正日体制と東アジア》。東京：現代企画室。

礒崎敦仁、澤田克己（2010）,《LIVE 講義：北朝鮮入門》。東京：東洋経済新報社。

ガバン・マコーマック著、吉永ふさ子譯（2004）,《北朝鮮をどう考えるのか：冷戦のトラウマを越えて》,東京：平凡社。譯自 Gavan McCormack (2004), *Target North Korea: Pushing North Korea to the Brink of Nuclear Catastrophe*. New York: Nation Books.

久保田るり子（2008）,《金正日を告発する：黄長燁の語る朝鮮半島の実相》。東京：産経新聞出版。

高峻石（1993）,《金日成体制の形成と危機》。東京：社会評論社。

重村智計（2000）,《北朝鮮の外交戦略》。東京：講談社。

重村智計（2006）,《北朝鮮「核」外交：北朝鮮の戦術と経済力》。東京：講談社。

鐸木昌之（1992）,《北朝鮮：社会主義と伝統の共鳴》。東京：東京大学出版会。

徐大粛著、古田博司譯（1996）,《金日成と金正日：革命神話と主体思想》。東京：岩波書店。

平井久志（2010）,《なぜ北朝鮮は孤立するのか：金正日破局へ向かう「先軍体制」》。東京：新潮社。

平井久志（2011）,《北朝鮮の指導体制と後継：金正日から金正恩へ》。東京：岩波書店。

藤本健二（2003）,《金正日の料理人－間近で見た権力者の素顔》。東京：扶桑社。

藤本健二（2004）,《金正日の私生活－知られざる招待所の全貌》。東京：扶桑社。

宮塚利雄、宮塚寿美子（2007）,《北朝鮮・驚愕の教科書》。東京：文藝春秋。

矢野義昭(2008)《日本はすでに北朝鮮核ミサイル２００基の射程下にある》。東京：光人社。

吉田康彦（2006）,《「北朝鮮核実験」に続くもの──核拡散は止まらない》。東京：第三書館。

李相哲（2011）,《金正日と金正恩の正体》。東京：文藝春秋。

和田春樹（1998）,《北朝鮮：遊撃隊国家の現在》。東京：岩波書店。

三、期刊與專書論文

井口治夫、松田康博（2007），〈日本の復興と国共内戦・朝鮮戦争〉。收錄在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今村弘子（2008），〈中朝経済関係に関する考察〉，《東洋文化研究所紀要》，(153)，頁 77-103。
嚴敞俊（2005），〈金正日政権の統治メカニズム：先軍思想とは何か〉，《立命館国際地域研究》，(23)，頁 67-80。
康宗憲（2006），〈金正日政権の内政統治と生存戦略：先軍思想による経済再建は可能か〉，《国際公共政策研究》，11(1)，頁 289-305。
姜英之（2004），〈北朝鮮の経済改革と金正日体制〉，《北陸大学紀要》，(28)，頁 145-159。
千葉功（2007），〈列強への道をたどる日本と東アジア情勢－日清・日露戦争〉。收錄在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経済研究（2006），〈先軍時代の経済路線の基本要求に即して社会主義的生産部類間の均衡設定で提起される幾つかの問題〉，《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5 月 25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shiriyo.tyoson.2006063000.html。
月間論調（2007），〈金融制裁問題関連日誌－2005 年９月から 2007 年５月の間－〉，《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10 日。http://tabakusoru.hahaue.com/rokusya.2007051500.html。
駒込武（2007），〈国際政治の中の植民地支配」〉。收錄在川島真、服部龍二編，《東アジア国際政治史》，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
斎藤直樹（2009），〈北朝鮮の核兵器開発と弾道ミサイル開発についての一考察〉，《慶應義塾大学日吉紀要・人文科学》，(24)，頁 109-131。
佐藤尋生（1997），〈金正日体制の成立と課題〉，《政教研紀要》，(21)，頁 1-25。
金向東（2011），〈北朝鮮の対外貿易の特徴と展望〉，《立命館経済》，59(5)，頁 757-777。
鈴木典幸（1996），〈「苦難の行軍」の開始－北朝鮮の政治経済状況〉，《国際問題》，(433)，頁 45-58。
玉城素（1969），〈北朝鮮における「自主」路線の形成過程〉，《国際問題》，(108)，頁 12-21。
東郷育子（2011），〈理想と現実のジレンマを超えて：日本の NGO による対北朝鮮人道支援活動の実像〉，《神田外語大学国際社会研究所紀要》，2，頁 73-142。
三船恵美（2002），〈米国の北朝鮮政策〉，《国際関係学部紀要》，(29)，頁 1-18。
三村光弘（2010），〈北朝鮮をとりまく境界：北東アジアにおける新たな秩序形成の可能性〉，《国際政治》，(162)，頁 99-113。
中川雅彦（2001），〈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における軍隊統制：金日成，金正

日と朝鮮人民軍〉,《アジア経済》，42(11)，頁 2-27。
中川雅彦（2004a）,〈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における自力更生：重工業投資を優先した経済建設の推進過程，1945~1970 年〉,《アジア経済》，45(5)，頁 2-33。
中川雅彦（2004b）,〈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国の工業管理体系と経済改革：行政機関と国営企業との関係〉,《アジア経済》，45(7)，頁 2-28。
朴一（2010）,〈太陽政策期における北朝鮮の政治・経済システムの変化と連続性：開城工業団地と「７・１経済管理措置」を中心に〉,《経済学雑誌》，111(1)，頁 81-92。
朴鍾碩（2010）,〈北朝鮮経済特区の実験〉,《北大法学論集》,60(6) ,頁 171-216。
福原裕二（2004）,〈日朝「平壌宣言」への道─北朝鮮の対日「自主独立外交」の変容〉,《アジア社会文化研究》，(5)，頁 69-96。
松本英樹（2003）,〈日朝国交正常化交渉の経緯と朝鮮半島をめぐる最近の動向〉,《レファレンス》，平成 15 年 8 号，頁 31-52。
宮田敦司（2007）,〈金正日の統治手法「先軍政治」の虚構〉,《日本大学大学院総合社会情報研究科紀要》，8，頁 103-112。
民主党（2009）,〈民主党の政権政策 Manifesto2009〉,《民主党》。檢索於 2012 年 6 月 26 日。http://www.dpj.or.jp/special/manifesto2009/pdf/manifesto_2009.pdf。
尹大奎（2003）,〈北朝鮮の対外経済開放政策と法制の変化〉,《神奈川法学》，36(1)，頁 7-23。

參、西文資料

一、官方文獻

Bush, George W. (2001), “Statement by the President,”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ccessed in Jun. 5th, 2012.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1/06/20010611-4.html.

Bush, George W. (2002), “President Delivers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ccessed in Aug. 24th, 2011.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2/01/20020129-11.html.

Bush, George W. (2006), “President Bush’s Statement on North Korea Nuclear Test,”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ccessed in Jun. 10th, 2012.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6/10/20061009.html.

Bush, George W. (2008), “President Bush Discusses North Korea,”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Accessed in Jun. 10th, 2012.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8/06/20080626-9.html.

Clinton, Hillary Rodham (2009a), "U.S.-Asia Relations: Indispensable to Our Future,"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ccessed in Jun. 10th, 2012.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02/117333.htm.

Clinton, Hillary Rodham (2009b), "Remarks With Croatian Foreign Minister Gordan Jandrokovic After their Meeting,"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ccessed in Jun. 1st, 2012.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09a/12/133416.htm.

Clinton, Hillary Rodham (2011), "Visit of North Korean Vice Foreign Minister Kim Kae-gwan to New York," *U. S. Department of State*. Accessed in Jun. 11th, 2012. http://www.state.gov/secretary/rm/2011/07/169003.htm.

Kim, Dae-jung (1998), "Let Us Open a New Era: Overcoming National Crisis and Taking a New Leap Forward," *EduCafe: Korean Resources for DLI*. Accessed in Jun. 13th, 2012. http://shlel.tripod.com/krinaug.htm.

Kim, Dae-jung (2000), "Address by President Kim Dae-jung of the Republic of Korea, Lessons of German Reunification and the Korean Peninsula," *Le Monde dipliomatique*. Accessed in Jun. 13th, 2012. http://www.monde-diplomatique.fr/dossiers/coree/A/coree2000.

Ministry of Defence (2010), "Investigation Result on the Sinking of ROKS 'Cheonan'," *Ministry of Defence*. Accessed in Jun. 18th, 2012. http://www.mnd.go.kr/webmodule/htsboard/template/read/engbdread.jsp?typeID=16&boardid=88&seqno=871&c=TITLE&t=&pagenum=3&tableName=ENGBASIC&pc=undefined&dc=&wc.

Ministry of Foreign Affiars of Russian Federation (2000), "National Securit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iars of Russian Federation*. Accessed in Jun. 29th, 2012. http://www.mid.ru/bdomp/ns-osndoc.nsf/1e5f0de28fe77fdcc32575d900298676/36aba64ac09f737fc32575d9002bbf31!OpenDocumen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iars of Russian Federation (2008), "The Foreign Policy Concept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iars of Russian Federation*. Accessed in Jun. 30th, 2012. http://www.mid.ru/ns-osndoc.nsf/0e9272befa34209743256c630042d1aa/cef95560654d4ca5c32574960036cddb?OpenDocument.

Ministry of Unification (2003), "Joint Press Release at the 10th Meeting of Inter-Korean Ministerial Talks," *Ministry of Unification*. Retireived in Jun. 15th, 2012. http://eng.unikorea.go.kr/CmsWeb/viewPage.req?idx=PG0000000586&boardD

ataId=BD0000218567&CP0000000002_BO0000000102_Action=boardView&CP0000000002_BO0000000102_ViewName=board/english/BoardView&curNum=5.

Ministry of Unification (2011), "Major Statistics in Inter-Korean Relations," *Ministry of Unification*. Accessed in Jul. 2nd, 2012. http://eng.unikorea.go.kr/CmsWeb/viewPage.req?idx=PG0000000541.

Obama, Barack (2009a),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Before Meeting with President Klaus and Prime Minister Topolanel of the Czech Republic." *The White House*. Accessed in Jun. 11th, 2012.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meeting-with-president-klaus-and-prime-minister-topo.

Obama, Barack (2009b), "Remarks by President Barack Obama," *The White House*. Accessed in Jun. 11th, 2012.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barack-obama-prague-delivered.

Obama, Barack (2009c),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on North Korea," *The White House*. Accessed in Jun. 11th, 2012.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north-korea.

Perry, William J. (1999), "Review of the United States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s," *Report: Office of the North Korea Policy Coordinator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s.*

Roh, Moo-hyun (2004), "The U. S.-Republic of Korea Alliance and the Situation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Los Angeles World Affairs Council*. Accessed in Jun. 15ht, 2012. http://lawac.org/speech-archive/pdf/2004/Moo-Hyun_420.pdf.

The People's Korea (1997), "Resource Material: 1993 DPRK-US Joint Statement," *The People's Korea*. Accessed in Jun. 1st, 2012. http://www1.korea-np.co.jp/pk/011th_issue/97100102.htm.

UN Security Council (2009a), "SC/9634," *United Nations*. Accessed in Jul. 2nd, 2012, 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09/sc9634.doc.htm.

UN Security Council (2009b), "SC/9679," *United Nations*. Accessed in Jun. 30th, 2012, http://www.un.org/News/Press/docs//2009/sc9679.doc.htm.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2002), *Nuclear Posture Review Report*. Accessed in Jun. 5th, 2012. http://www.fas.org/blog/ssp/united_states/NPR2001re.pdf.

二、專書

Becker, Jasper (2005), *Rogue Regime: Kim Jong Il and the Looming Threat of North Kore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Chon, Hyun Joon (2004), *A Study of the Social Control System in North Korea: Focusing in the Ministry of People's Security*. Seoul: 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Chon, Hyun-Joon & Young-Tae Jeung & Soo-Young Choi & Ki-Dong Lee (2009), *North Korea's Regime Maintenance Policy since the Kim Jong-il Regime and Prospects for Change*. Seoul: Korea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Ford, Glyn (2008), *North Korea on the Brink: Struggle for Survival*. London: Pluto Press.

Funabashi, Yoichi (2007), *The Peninsula Question: A Chronicle of the Second Nuclear Crisis*. Washin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Haggard, Stephan & Marcus Noland (2007), *Famine in North Korea: Markets, Aid, and Refor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un, Moon-Young (2006), *North Korea's Negotiation Behavior toward South Korea: Continuities and Changes in the Post Inter-Korean Summit Era*. Seoul: Korean Institute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Jeung, Young-Tai (2007), *North Korea's Civil-Military-Party Relations and Regime Stability*. Seoul: Korea Institution for National Unification.

Kim, Sung Chull (2006), *North Korea under Kim Jong Il: From Consolidation to Systemic Dissonance*.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Lankov, Andrei (2007), *North of the DMZ: Essays on Daily Life in North Korea*. Jefferson, NC: MacFarland & Company Inc., Publishers.

Lim, Jae-Cheon (2009), *Kim Jong Il's Leadership of North Korea*. Oxon, U. K.: Routledge.

Lintner, Bertil (2005), *Great Leader, Dear Leader: Demystifying North Korea under the Kim Clan*. Chiang Mai: Silkworm Books.

Michishita, Narushige (2010), *North Korea's Military-Diplomatic Campaigns, 1966-2008*.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Noland, Marcus (2000), *Avoiding the Apocalypse: The Future of the Two Koreas*. Washington D. 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h, Kongdan & Ralph C. Hassig (2000), *North Korea 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 Washington D. C. ;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Pritchard, Charles L. (2007), *Failed Diplomacy: The Tragic Story of How North Korea Got the Bomb*. Washington D. 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Sigal, Leon V. (1998), *Disarming Stranger: Nuclear Diplomacy with North Kore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Snyder, Scott (1999), *Negotiating on the Edge: North Korean Negotiating Behavior*. Washington D. C.: 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ocess.

三、期刊與專書論文

Aaltola, Mika (1999), "Emergency food aid as a means of political persuasion in the North Korean Famine," *Third World Quarterly*, 20(2), pp. 371-386.

An, Tai Sung (1977), "North Korea: From Dictatorship to Dynasty," *Asian Affairs*, 4(3), pp. 172-183.

Armstrong, Charles K. (2004a), "U. S.-North Korean Relations," *Asian Perspective*, 28(4), pp. 13-37.

Armstrong, Charles K. (2004b), "Inter-Korean Relations: A North Korean Perpective." In Samuel S. Kim ed., *Inter-Korean Relation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Armstrong, Charles K. (2005), "Familism, Socialism and Political Religion in North Korea," *Totalitarian Movements and Political Religions*, 6(3), pp. 383-394.

Armstrong, Charles K. (2011), "Trends in the Study of North Korea,"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70(2), pp. 357-371.

Asada, Masahiko (2004), "Arms Control Law in Crisis? A Study of the North Korean Nuclear Issue," *Journal of Conflict & Security Law*, 9(3), pp. 331-355.

Beal, Tim (2007),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North Korean Missile and Nuclear Tests," *New Zealand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9(2), p. p. 104-125.

Buszynski, Leszek (2009), "Russia and North Korea: Dilemmas and Interests," *Asian Survey*, 49(5), pp. 809-830.

Cha, Victor D. (2002), "North Korea's 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Badges, Shields, or Sword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117(2), pp. 209-230.

Chen, Cheng & Ji-Yong Lee, "Making sense of North Korea: 'National Stalinism' in comparative-historical perspective,"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40, pp. 459-475.

Cheong, Seong-Chang (2000), "Stalinism and Kimilsungis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deology and Power," *Asian Perspective*, 24(1), pp. 133-161.

Choe, Sang T. & Suk-Hi Kim & Hyun Jeong Cho (2003), "Analysis of North Korea's Foreign Trade: 1970-2001," *The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11(1), pp. 103-114.

Choi, Jinwook (2009), "The Changing Party-State System and Outlook for Reform in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pp. 142-165.

Choi, Jinwook & Meredith Shaw (2010), "The Rise of Kim Jong Eun and the Return of the Par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 Unification Studies*, 19(2), pp. 175-202.

Chon, Hyun-joon (2010), "An Evaluation of North Korean Leader Kim Jong-il's Political Leadership", *Vantage Point*, 33(3), pp. 46-57.

Choo, Jaewoo (2008), "Mirroring North Korea's Growing Economic Dependence on

China: Political Ramifications," *Asian Survey*, 48(2), pp. 343-372.

Chung, Young Chul (2004), "North Korea Reform and Opening: Dual Strategy and '*Silli* (Practical) Socialism," *Pacific Affairs*, 77(2), pp. 283-304.

Habib, Benjamin (2011),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programme and the maintenance of the *Songun* system," *The Pacific Review*, 24(1), pp. 43-64.

Haggard, Stephan & Marcus Noland (2010), "Sanctioning North Kore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Denuclearization and Proliferation," *Asian Survey*, 50(3), pp. 539-568.

Hale, Christopher D. (2005), "Real Reform in North Korea? The Aftermath of the July 2002 Economic Measures," *Asian Survey*, 45(6), pp. 823-842.

Halloran, Richard (1998), "North Korean Relations with Japan." In Dae-Sook Suh & Chae-Jin Lee eds., *North Korea after Kim Il Sung*, Boulder, CO: Lynne Reinner.

Han, Kibum (2011), "North Korea's South Korea Policy: An Evaluation of Determining Variables and Propects for 2012,"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20(2), pp. 27-68.

Harnisch, Sebastian (2002), "U. S.-North Korean Relations under the Bush Administration: From 'Slow Go' to 'No Go'," *Asian Survey*, 42(6), pp. 856-882.

Ha, Yong Chool & Chaesung Chun (2010), "North Korea's Brinkmanship and the Task to Solve the 'Nuclear Dilemma'," *Asian Perspective*, 34(1), pp. 87-109.

Hildreth, Steven A. (2009), "North Korean Ballistic Missile Threat to the United State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Hoare, Jim (2008), "Does the Sun Still Shine? The Republic of Korea's Policy of Engagement with the 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Asian Affairs*, 34(1), pp. 69-82.

Hong, Ihk-pyo (2002), "A Shift Toward Capitalism? Recent Economic Reforms in North Korea," *East Asian Review*, 14(4), pp. 93-106.

Hwang, Balbina (2009), "Shattering Myths and Assumptions: The Implications of North Korea's Strategic Culture for U. S. Polic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18(1), pp. 28-53.

Hwang, Jaeho (2006), "Measuring China's Influence over North Korea," *Issues & Studies*, 42(2), pp. 205-232.

Hymans, Jacques E. C. (2008), "Assessing North Korean Nuclear Intentions and Capacities: A New Approach,"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8, pp. 259-292.

Imamura, Hiroko (2002), "China and North Korea Relationship in a New Era," *Far Eastern Studies*, 1, pp. 61-77.

Jeon, Jei Guk (2000), "North Korean leadership: Kim Jong Il's balancing act in the ruling circle," *Third World Quarterly*, pp. 761-779.

Joo, Seung-Ho (2001), "The New Friendship Treaty between Moscow and Pyongyang," *Comparative Strategy*, 20, pp. 467-481.

Joo, Seung-Ho (2009), "North Korea Policy toward Russia." In Tae-Hwan Kwak & Seung-Ho Joo eds., *Nor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under Kim Jong Il: New Perspectives*, Farnham, UK: Ashgate Publishing.

Kang, David C. (1995), "Rethinking North Korea," *Asian Survey*, 35(3), pp. 253-267.

Kim, Heungkyu (2010), "From a buffer zone to a strategic burden: evolving Sino-North Korea relations during the Hu Jintao era,"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2(1), pp. 57-74.

Kim, Jin Moo (2011), "North Korea's Reliance on China and China's Influence on North Korea,"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3(2), pp. 257-271.

Kim, Kap-sik (2008), "Suryong's Direct Rule and the Political Regime in North Korea under Kim Jong Il," *Asian Perspective*, 32(3), pp. 87-109.

Kim, Samuel S. (2006), "Sino-North Korea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World." In Young Whan Khil & Hong Nack Kim eds., *North Korea: The Politics of Regime Survival*, Armonk: M. E. Sharpe.

Kim, Samuel S. & Matthews S. Winters (2004), "Inter-Korean Economic Relations." In Samuel S. Kim ed., *Inter-Korean Relations: Problems and Prospect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Koh, B. C. (1965), "North Korea and Its Quest for Autonomy," *Pacific Affairs*, 38(3/4), pp. 294-306.

Koh, B. C. (1969), "North Korea and the Sino-Soviet Schism," *The Western Political Quarterly*, 22(4), pp. 940-962.

Koh, B. C. (1991), "Pyongyang's Foreign Policy: Continuity and Change," *Korean Studies*, 15, pp. 1-14.

Koh, B. C. (1998), "North Korean Policy Toward the U. S." In Dae-Sook Suh & Chae-Jin Lee eds., *North Korea after Kim Il Sung*, Boulder, CO: Lynne Reinner.

Laney, James T. & Jason T. Shaplen (2003), "How to Deal With North Korea," *Foreign Affairs*, 82(2), p. p. 16-30.

Lankov, Andrei (2003), "Pyongyang: rules of engagement," *The Pacific Review*, 16(4), pp. 613-622.

Lankov, Andrei (2006), "North Korea: De-Stalinization From Below And The Advent Of New Social Forces," *Havard Asia Quarterly*, 10(2), pp. 4-14.

Lankov, Andrei (2009a), "North Korea in Transition: Changes in Internal Politics and the Logic of Survival,"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18(1), pp. 1-27.

Lankov, Andrei (2009b), "Pyongyang Strikes Back: North Korean Policies of 2002-08 and Attempts to Reverse 'De-Stalinization From Below'," *Asia Policy*, (8), pp.

47-71.

Lee, Chae-Jin (1998), "China and North Korea: An Uncertain Relationship." In Dae-Sook Suh & Chae-Jin Lee eds., *North Korea after Kim Il Sung*, Boulder, CO: Lynne Reinner

Lee, Chong-Sik & Ki-Wan Oh (1968), "The Russian Faction in North Korea," *Asian Survey*, 8(4), pp. 270-288.

Lee, Kwang-ho (2009a), "Breakthrough in Stalled Inter-Korean Business," *Vantage Point*, 32(9), pp. 16-20.

Lee, Kwang-ho (2009b), "N. K.'s Mixed Attitude toward Seoul, Washington," *Vantage Point*, 32(10), pp. 2-8.

Lim, Jae-Cheon & Ho-Yeol Yoo (2010),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the cults of the Kims: its implication for North Korean political succession,"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2(3), pp. 341-354.

Lim, Jae-hyoung (2002), "The Power Hierarchy: North Korean Foreign Policy-Making Process," *East Asian Review*, 14(2), pp. 89-106.

Mack Andrew (1991), "North Korea and the Bomb," *Foreign Policy*, (83), pp. 87-104.

Manyin, Mark E. & Mary Beth Nikitin (2008), "U. S. Assistance to North Korea,"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Mazarr, Michael J. (1995), "Going Just a Little Nuclear: Nonprolifertaion Lessons from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2), pp. 92-122.

McEachern, Patrick (2009), "North Korea's Policy Process: Assessing Institutional Policy Preferences," *Asian Survey*, 49(3), pp. 528-552.

Meyer, Peggy Falkkenheim (2006), "Russo-North Korean Relations Under Kim Jong Il." In Young Whan Khil & Hong Nack Kim eds., *North Korea: The Politics of Regime Survival*, Armonk: M. E. Sharpe.

Michishita, Narushige (2006), "Coeercing to Reconcile: North Korea's Response to US 'Hegemony'," *The Journal of Strategic Studies*, 29(6), pp. 1015-1040.

Michishita, Narushige (2009), "Playing the Same Game: North Korea's Coercive Attempt at U. S. Reconciliation," *The Washington Quarterly*, 32(4), pp. 139-152.

Nanto, Dick K. & Emma Chanlett-Avery (2010), "North Korea: Economic Leverage and Policy Analysi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Nanto, Dick K. & Mark E. Manyin (2010), "China-North Korea Relations,"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Nuechterlein, Donald (1979), "The Concept of National Interest: A Time For New Approach," *Orbis*, 23(1), pp. 73-92.

Niksch, Larry A. (1998), "North Korea's Negotiating Behavior." In Samuel S. Kim

ed., *North Korean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Hong Kong: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iksch, Larry A. (2010), "North Korea's Nuclear Weapons Development and Diplomacy," *CRS Report for Congress*.

Noland, Marcus (2009), "The (Non-) Impact of UN Sanctions on North Korea," *Asia Policy*, (7), pp. 61-88.

Park, Byung-Kwang (2010), "China-North Korea Economic Relations during the Hu Jintao Er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19(2), pp. 125-150.

Park, Won Gon (2011), "North-South Relations under the Lee Myung-bak Administration: The North's Provocation and the South's Principled Response," *The Korean Journal of Defense Analysis*, 23(3), pp. 321-333.

Pinkston, Daniel A. (2003), "Domestic Politics and Stakeholders in the North Korean Missile Development Program,"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10(2), pp. 1-15.

Pinkston, Daniel A. & Phillip C. Saunders (2003), "Seeing North Korea Clearly," *Survival*, 45(3), pp. 79-102.

Quinones, C. Kenneth (2003), "Dualism in the Bush Administration's North Korean Policy," *Asian Perspective*, 27(1), pp. 197-224.

Quinones, C. Kenneth (2009), "*Juche*'s Role in Nor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In Tae-Hwan Kwak & Seung-Ho Joo eds., *North Korea's Foreign Policy under Kim Jong Il: New Perspectives*, Farnham, UK: Ashgate Publishing.

Reiss, Mitchell B. (2001), "Avoiding Déjà Vu All Over Again: Lessons from U.S.-DPRK Engagement," *American Asian Review*, 19(2), pp. 49-70.

Rose, Gideon (1998), "Neoclassical Realism and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World Politics*, 51(1), pp. 144-172.

Roy, Denny (1988), "North Korea's Relations with Japan: The Legacy of War," *Asian Survey*, 28(12), pp. 1280-1293.

Samore, Gary (2002), "U. S.-DPRK Missile Negotiations," *The Nonproliferation Review*, 9(2), p. p. 16-20.

Sato, Heigo (2009), "A Japanese Perpective on North Korea: Troubled Bilateral Relations in a Complex Multilateral Framework,"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 18(1), pp. 54-92.

Scalapino, Robert A. (1963), "The Foreign Policy of North Korea," *The China Quarterly*, (14), pp. 30-50.

Schweller, Randall L. (2003), "The Progressiveness of Neoclassical Realism." In Colin Elman & Miriam Fendius Elman eds., *Progress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Cambridge, MA: MIT University Press.

Smith, Hazel (1996), "North Kore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1990s: the Realist

Approach." In Hazel Smith & Chris Rhodes & Diana Pritchard & Kevin Magill eds., *North Korea in the New World Order*,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Snyder, Scott & Joyce Lee (2010), "The Impact of the Korean War on the Political-Economic System of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14(2), pp. 161-182.

Takeda, Yoshinori (2006), "Putin's foreign policy toward North Korea,"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Asia-Pacific*, 6, pp. 189-207

Wolfowitz, Paul D. "Clinton's First Year," *Foreign Affiars*, 73(1), pp. 28-43.

Woo, Seongji (2001), "Adversarial Engagement and Alliance Relations: Triangular Politics on the Korean Peninsula, 1988-94," *Issues & Studies*, 37(2), pp. 106-146.

Zhebin, Alexander (1995), "Russia and North Korea: An Emerging, Uneasy Partnership," *Asian Survey*, 35(8), pp. 726-739.

四、學位論文

Lee, Ergene (2000), *The 1993 North Korean Nuclear Crisis: A Foreign Policy Analysis*. Unpublished master thesis. Virginia Polytechnic Institute and State University, Blacksburg, VA.

五、網路文章

Christian Mission (2012), "Juche Religion," *BillionBibles.org*. Accessed in Apr. 23rd, 2012. http://www.billionbibles.org/north-korea/juche-religion.html.

Crawford, Jamie (2012), "North Korea: Why did it launch a rocket?" *CNN*. Accessed in May 24th, 2012. http://articles.cnn.com/2012-04-12/asia/world_asia_north-korea-launch-why_1_kim-jong-ballistic-missile-north-korea?_s=PM:ASIA.

Dies, Harry P. Jr. (2004), "North Korean Special Operation Forces: 1996 Kangnung submarine infiltration," *Resource Library*. Accessed in Jun. 12th, 2012.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0IBS/is_4_30/ai_n13822276/?tag=content;col1.

Fitzpatrick, Mark (2012), "North Korean rocket may shoot down Leap Day deal," *IISS Voices*. Accessed in Mar. 26th, 2012. http://iissvoicesblog.wordpress.com/2012/03/16/north-korean-rocket-may-shoot-down-leap-day-deal/.

Koh, B. C. (2005), "'Military-First Politics' And Building A 'Powerful And Prosperous Nation' In North Korea," *Policy Forum Online*. Accessed in Apr. 26th, 2012. http://www.nautilus.org/fora/security/0532AKoh.html.

Oberdorfor, Jon (1997), “The peacemaker--role Jimmy Carter played in 1994 North Korea crisis,” *Resource Library.* Accessed in Jun 4th, 2012. http://findarticles.com/p/articles/mi_m1316/is_n12_v29/ai_20089207/?tag=content;col1.

參、主要使用網路資料庫

人民日報圖文數據庫：http://www.people.com.cn/GB/43063/index.html
小林よしおの研究室：http://tabakusoru.hahaue.com/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http://www.fmprc.gov.cn/chn/gxh/tyb/
日本外務省：http://www.mofa.go.jp/mofaj/
北朝鮮 WEB 六法：http://www.geocities.co.jp/wallstreet/3277/
朝鮮日報中文網：http://chn.chosun.com/big5/
Daily NK：http://www.dailynk.com/chinese/
Korean News Service：http://www.kcna.co.jp/
Ministry of Unification：http://eng.unikorea.go.kr/
North Korea Leadership Watch：http://nkleadershipwatch.wordpress.com/
North Korea Statistics：http://kosis.kr/bukhan/
Ria Novosti：http://en.rian.ru/